

小鳥

以 文 学 之 名



卷十二 2021.12



小说

小说家 | P5 流调报告 李静睿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13 红 庆宇
P19 滑坡体 森目
第二回 | P25 惯性原理 高桑
故事群岛 | P31 杀死一个孩子 斯蒂格·达格曼
P33 母亲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
P37 当老鼠没能来时 杰拉尔德·默南
P45 一抹蓝色 刘宇昆
P55 一曲微茫 保罗·鲍尔斯

非虚构

长乐路 | P61 两个做咖啡的人 杨樱
生活亲历者 | P73 唐明宝 | 定海桥往事② 路明
田野中国 | P77 《英雄联盟》和不确定的治疗世界 饶一晨
P85“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 普通人的苏联口述史① 马强
到上海去 | P91 11号线 许佳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97 “民族城”里的日本人 吉井忍
局外人 | P105 再给我一些时间 Christopher St. Cavish

档案

小鸟访谈 | P109 加入世贸组织 20 年，中国做对了什么？ 曾梦龙
先睹为快 | P117 外婆家 | 长辈的故事② 熊景明
发现经典 | P121 康熙帝一生的七个阶段 史景迁

诗歌

只有诗 | P125 大地的馈赠，或诗歌的纠正 | 罗棣的植物诗学 罗棣 西渡

专栏

对照记 | P137 纳博科夫：杀人犯总能写好文章 黄昱宁
作家笔记 | P143 彼得·汉德克的夜生活 王竞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49 昔人已随青楼去，此地空余小红楼 王永智
昨日世界 | P153 从边界到边界 潘尼克
小鸟 2021 年终回顾 | P159 瘟疫之下：2021 年度文化观察笔记① 曾梦龙



来自 Clay Banks on Unsplash

小鸟问答 Vol.12

小鸟 | 小鸟问答

小鸟图书馆上线，
一种新的短篇小说阅读方式开始了。

2021 年最后一个月，我们招馆长了！

小鸟图书馆已经上线。

本来想作为 2022 年的新年礼物送给读者，但我们很希望它可以早一点与大家见面。

它有这样的特点：

- 1、我们会与各版权机构合作，尽可能把优秀的国内外短篇小说囊括于此；
- 2、图书馆的馆长会与编辑一道，以某种意想不到的形式组成各种专题，初期大约每周一到两个专题吧。
- 3、你可以理解成是短篇小说版本的音乐歌单或者豆列。
- 4、现在有 1600 篇小说正在陆续上传到后台。我们第一轮计划是达到 3000 万字左右规模的阅读库。
- 5、已经上传的小说中包括了博尔赫斯、波拉尼奥、纳博科夫、理查德·耶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杜鲁门·卡波蒂、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海明威等诸多作家的版权（包括中文翻译版权）作品，当然也有公版作品。

小鸟文学的年费用户，可以阅读所有这些馆藏小说。

普通用户还是可以按照 12 元读三篇的价格阅读小鸟图书馆的文章（也可以跨界购买哦，比如说一篇杂志文章 + 两篇图书馆）。

当然，你也可以搜索你喜欢的作家，按自己的想法愿意读哪篇小说都可以。如果暂时没搜到也不要着急，上传在小鸟不巧是个手工活儿，慢。

关于图书馆的专题，我们希望读者投稿参与。投稿是指：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神秘原则做一个短篇小说的专题。要求是：
——每个专题三到五篇。

——你选中的这些短篇小说已经在我们图书馆中。

——专题应该有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好名字。

——还要有一句话说明。

如果馆长认可并发布了你的投稿，我们将提供一年小鸟年费会员资格。（就是 588 元那个）

如果你希望有哪个作家应该进入我们的图书馆，请告知我们。

如果是版权所有者有意与小鸟图书馆合作，可以邮件联络：info@aves.art

好了，说正事。

图书馆招馆长，条件如下：

- 1) 会写小说。
 - 2) 会画画。
 - 3) 养猫，不止一只。
 - 4) 住在长江边上。
 - 5) 在俄罗斯留过学，还把这段经历写成过书。
 - 6) 有上海户口。
- 有符合条件者联系我们。

i

读者第一百万次问，为什么不出 iPad 版本？

我们的预算还没有多到开发 iPad 版本的地步。

当然，也有读者很体贴地说，不需要额外的开发成本，只要适配就可以。

我们也注意到了这种简单的办法，我们觉得直接搬过来并不好看。

后来我们四川籍编辑贡献了一个办法：把字体设置放大到接近于“关怀模式”的字号。我们认为这个折衷的办法好像很务实，安排了。

同时，这里也回答另外略少于一千万次被问到的问题：小鸟文学没有出纸质版杂志的计划。

其实下载单期杂志也可以，你可以自由处置。

ii

真快啊，好像一年快过去了。我们年费用户有什么优惠吗？

我们正在琢磨这件事，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种考虑：

- 1) 年费用户续费。一年内阅读（包括下载）小鸟文学 + 小鸟图书馆 + 未来增加的其他内容。
- 2) 年费用户续费。更长时间的阅读权限（比如买一年 12 个月额外送 3 个月，或者 6 个月……）
- 3) 年费用户续费。与其它付费服务网站的合作。

对老用户肯定有优惠，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们。

iii

你们对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评价过于刻薄了。他为非洲文学做了很多事的！

这个名字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吧？他就是上个月得了诺贝尔奖那位英国作家啊。我们可能确实刻薄了一点，毕竟能做正经事做实事总是让人敬重的。其实上回说的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踩在正确的时间点上，每件事都做在正确的时机，该做难民做难民，该用母语用母语，该用英文用英文，该去支教去支教，那么，这个人的成就就值得警惕。”我们可能只是觉得他的成就不足以匹配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但这事可能并不怪古尔纳？

让古尔纳成为一个无辜的获奖者，我们认为瑞典文学院的评奖体系可能有一点问题。

iv

感觉你们的“24 小时文学聚会”并不是真的喜欢现实主义。投了几篇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小说，完全没有反应。

哦。我们三个小说编辑在对“现实”的把握上，各有各的侧重。比如其中一位比另外两位要更有正义感一些，对于展现社会弱势者生存问题的小说就要宽容一些，客观地说，有点接近于普利策小说奖和瑞典文学院的价值体系；而又有一位觉得“轻浮”是小说大敌，随便拣一条报屁股上的新闻就拿过来当成小说来写，而且——至少很多小说的作者对人类的关怀远没有对自己的自怜来得更多，虽然在呈现社会现实，但总觉得这现实作者也不太了解，不知道他的关切落实到了哪里……所以，“轻浮！”——它替代了“庸俗”成为这位编辑的口头禅。

v

你们按照自己也不明确定义出来的标准选文章，就不属于某种小团体吗？

村上春树先生最近在大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里有个故事，里面写到了一个在棒球场边卖啤酒的男孩，每次有顾客掏钱，他就会很抱歉地说：“真是对不住，只有黑啤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滋味更友好的拉格，而不是苦苦的黑啤。

作为小说里的“我”随后说，写小说的时候，也非常想向读者说：“真是对不住，只有黑啤酒！”

现在做小鸟的我们也很想这样说，小鸟对刊发在这个 app 里的文字都有某种属于自己的审美，这个审美建立在某种公共性上，是出于我们对于“好”的理解，而不是出于对人对当下这个时代的讨好——“真是对不住，只有黑啤酒！”

如果说小鸟有什么私心——它希望于某种匮乏和不平衡中种下一些种子，至于以后会生发出什么，大约需要一点时间来看。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几十天会有一个简短的高兴仪式，半夜跑去办公室偷偷打印朋友发来的小鸟文学，这属于兴建了独立印刷、自办发行的地下盗版工厂”。

干杯，这位读者！

对了，如果愿意一起享受黑啤酒，我们的作者和潜在作者，未来的小说家们，记得多发稿件给 jingrui.li@aves.art

本期封面来自于.....

这一期的“小说家”，作者是李静睿。作为小鸟的文学顾问，她还犹豫在自己顾问的平台上发自己的小说是不是很尴尬。东北编辑很社会地说，先看一看！看一看总可以的吧！

看一看的结果是我们都很喜欢，并且把这篇小说作为全年最后一卷的“小说家”，有一种预期之外的暖意。这篇叫做《流调报告》的小说有个严肃的名字，却是一个（或者两个，看你怎么看了）爱情故事——干净、爽利、健康，是很久没看到的令人高兴的爱情故事。

手动介绍本期目录

这一期有一篇“24 小时文学聚会”，让我们想起石康《晃晃悠悠》或者诸如《在路上》这种文字。小说的主人公是个驾校司机，他过着一种毫无功利心的生活，如果他做什么工作，仅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需，这也包括他结识的女人，甚至是整个社会关系。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展开的。一种“极为自主的随机”吸引了我们。后来我们联系了作者，他的经历很有意思，你在第一个周末可以看到。

在最后一卷，很多栏目会走向最后一期。比如说 Chris 的“局外人”，他的这一期专栏会写“离别”，不是他个人，而是他所看到的近 5 年之内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离开上海这个城市。

王竟的“作家笔记”会以彼得·汉德克收尾。黄昱宁在最后一卷会讲纳博科夫。许佳也将最后一次“到上海去”。

“长乐路百业指南”、“吉井忍的二次会”和陈以侃的专栏都会继续。我们将在最后一周推出一系列文章作为这一年的收尾，其中包括“荒诞笔记”的年度话题，小鸟年度文化笔记以及“24 小时文学聚会”的年度特辑。

还有一个告示：12 月 11 日是中国入世 20 周年的日子，我们在当天推出经济学家魏尚进的访谈，那是个周六，因此“24 小时文学聚会”暂停一期。

真快啊，一年了，你们有什么新计划。

这个要留一点悬念给下个月。

我们回想了这一年，总是感觉还没有怎么样这一年就过去了。不过，回顾这一年做的事的时候，就会有种很漫长的感觉：

元旦上线：

3 月推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一篇，一直坚持到现在，质量居然一直也很高；6 月推田野中国，哗地一下打开我们的视野，进入到人类学家的领域，像我们一直以来所期待的，发现真问题是最重要的事。与此同时的还有小鸟访谈，我们要跟智慧的头脑在一起。

同时在 6 月上线的还有小鸟推荐。这是我们一次最低调的扩张，它免费，它有巨大的容量，它可以容纳的东西有很多。它和小鸟文学的主瀑布流一起，构成我们未来的框架。

还有这一次的小鸟图书馆。如前所述。

小的栏目一直都有更新，如别册设置、用户下载、单期购买这些小功能总是一直在持续更新中。想起来还真的是有点意外，它多么丰富啊！

所以，如果说我们未来会有什么新计划，那么最重要的是，小鸟文学的第一年，我们几乎倾尽自己财力做了一个可以延展到很有想象力的结构，这与其说是我们对未来所做的事情的期待，不如说是对未来的一种信心。

期待 2022 年。

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栏目介绍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Sei on Unsplash](#)

小说

流调报告

李静睿 | 小说家

他们和所有故事都不一样，
好像两个人决心自我隔离，
以便和世界断开关联。

确诊病例 13，王某某，女，42岁，四川自贡人，现住通州区永顺镇富豪村，为永顺镇金马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通州基地员工。王某某为确诊病例张某某的同事，12月24日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同日进行核酸检测。12月26日通州区疾控中心反馈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日，经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主要行程轨迹如下：12月13日—16日，因病居家。

12月17日，上午10时驾驶电动车至通州妇幼保健院复诊并返家。

12月18日，到公司上班，8时至凌晨2时前往通州区宋庄镇小堡环岛西北佳方物流院内德邦物流大件中转场兼职。

12月19日—22日，公司上班，北关环岛京客隆购物，晚上同一时间段大件中转场兼职。

12月23日，公司上班，中午和女儿秦某某在通州万达四层“蓉李记”就餐，后在二楼华为体验店购物，下午回公司继续上班，晚上同一时间段大件中转场兼职。

12月24日，在公司上班，9时30分接到区疾控中心电话后，自行隔离并被转运至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酒店。

卉敏喜欢说，你给我好生点。

23号秦茗茗来公司，是张云峰进车间告诉她，茗茗来了，没扫健康宝，在外头进不来。卉敏说，好的张工，谢谢。张云峰看了看她，没说什么。张工今年40岁，当年就是他们班上最小的，现在仍有一点孩子气，不高兴的时候抿着嘴，像二十五年前参加全省奥数竞赛，三道题，他有一道没有做出来，第二天上课一直沉着脸。卉敏妈妈前一天包了笋丁包子，卉敏课间溜回来装了一饭盒，他一面吃，一面就这般抿嘴。卉敏说，高兴点没有，云峰点点头，又摇摇头，偷偷握住她的手指尖。

深秋里有一天，卉敏下了班，云峰照例在北关桥底下的社区小花园等她。卉敏到晚了，远远见他裹紧了大衣，站在一株掉光叶子的银杏下面吃包子，这附近就有一家东北馆子卖包子，咸得不得了的酸菜馅儿。卉敏说，今晚不过去了，我找了个兼职，要半夜去宋庄分快递。张云峰起先似乎没有听懂，还在吃包子，后来才把嘴紧紧抿起来。云峰开车把卉敏送到宋庄，看着极窄一个入口，进去却是巨大空地，探照灯搁在废弃的篮球架上，白光灼灼，毫不留情照在千万个快递箱上面。

秦茗茗手机掉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小偷能偷到手机了，茗茗的是掉进了马桶。我捞起来了，但开不了机。茗茗从包里拿出那个iPhone 7，四年前她考上人大经济学院，卉敏给她买的，换过两次屏，装在一个画着小猫的手机壳里。她们在蓉李记一人吃了一碗担担面，这就下楼看手机，卉敏的意思是买个iPhone 12，茗茗还有半年毕业了，但茗茗自己选了一个两千块的华为。妈，我够用了，茗茗说。出了万达她想把

茗茗送到地铁口，茗茗不让，要自己走过去，两个人在万达门口僵持了一会儿。她们长得并不像，但一眼看过去都知道是母女，分开前卉敏习惯地想摸茗茗的辫子，但茗茗刚剪了短发，卉敏也剪了，两人都是自然卷，头发一短就乱糟糟满头小卷，想揪也无处下手。

卉敏想到以前他们去艾叶滩玩，那地方也没什么可玩的，不过下了河滩钓龙虾，或者脱了鞋，在水中寻找一个一个小小旋涡，他们就呆呆地，站在各自的旋涡里。初夏，河水还没涨起来，河滩上满是嶙峋怪石，云峰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连从这块石头走到那块石头也不敢，他自尊心强，不好意思让卉敏牵着自己，就假意揪卉敏的辫子。那时候她的辫子长到腰下，家里没有热水器，洗一次头非常慎重，脸盆也装不下她那么多头发，卉敏把浴盆搬到院子里，再搬一壶开水一壶凉水，这样才能洗头，厚厚黑发在浴盆里晕开，像什么鬼魅，要往更远的地方游走。有一回她忘记调凉水，头发先散在水里还没觉得，手一进去卉敏烫到跳起来，整盆水被踢翻，水漫过黄桷树下的一个蚂蚁窝，那些蚂蚁的尸体过了很久，才被另一窝蚂蚁搬走。那些蚂蚁的命运总是如此，有时候是一盆滚水，有时候是一场暴雨，有时候甚至只是有人在院子里漱口，一口水就足以摧毁一切。卉敏后来想，原来这就是灭顶之灾，原来并不是一切有个定数，比如她不一定要在那天中午洗头。但在那个时候，她只是在手上缠了层层纱布，去学校给云峰看，云峰生起气来，说：你给我好生点。这句话他总说，混杂了不耐烦和一种显而易见的温柔，卉敏后来多年没有再听过。

分开的时候卉敏又跟茗茗说：你给我好生点。以往她这么说，茗茗总要不耐烦，那天她倒没有，反而捏了捏卉敏的手。知道了，妈妈，你也好生点。秦茗茗来的时候卉敏才二十岁，技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开始相亲，周围没有人关心她的工作问题，这么好看的女孩子，总归是有出路的，工作可能是最差的一种。秦方是她第二次相亲，约在区政府旁边那家九块九管饱的肥肠鱼。那地方卉敏很熟悉，四年前父母一起下岗，一个车间一个车间排着队来政府前示威，大家都不知道示威是什么意思，就铺了塑料布在门口打跑得快和炸金花，都下岗了，都没钱，打一毛的底，三番封顶。卉敏下课过来，看见爸爸坐在远处花坛上，也不打牌，闷头抽红梅，妈妈面前堆满了一毛纸币，那些钱合在一起，正好是一顿肥肠鱼。秦方矮墩墩一个人，那时候已经在看起来前途无量的拆迁办，介绍人也在肥肠鱼现场，说得很有技巧，只提卉敏是单亲家庭，妈妈以前在新华印刷厂当工人，四十岁下岗，五十岁退了，有退休金和职工医保。没得负担，介绍人说，给秦方夹了长长一截肥肠头子。介绍人想得周到，秦方不是自贡人，是资阳考公考过来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哪怕只是发生在五年前。

秦方对卉敏很好，带着一点公务员对失业青年的怜悯，恋爱没多久就给她买金戒子，一口气买五个，卉敏戴着一嘟噜的戒子去河边茶坊打牌。茶坊里开五桌，三桌是下岗工人，一桌是退休工人，还有一桌是二十上下的年轻女孩，都没找到工作，只得天天打牌。她们都羡慕卉敏，轮流看她满手的戒子，都是技校毕业，都在相亲，都在肥肠鱼和跳水兔之间穿梭，寻找下一个单身公务员。两个人先是结婚，然后生下秦茗茗，家里总要有人带孩子，秦方每天回来，也总要喝点酒吃点好菜，卉敏满手金戒子、又躲藏于这些事情中间，她事实上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这件事就沒那么明显。金马电动车是卉敏第一份工作，那时候秦茗茗已经上了初三，她一直是第一名，但镇上的中学，英语老师的口语有浓厚自贡腔，第一名也代表不了什么，上一年只有三个孩子读了高中，然后在一落千丈中进了专科学校。初二最后一次考试，秦茗茗把第二名甩了快一百分，家里人甚至有一点自我安慰地想，放在全市就不行了吧，自己老师批的卷子，主观题分数拿太高了。到了初三，第一次考试就是全市统考，秦茗茗考了第五，第二次以后就一直是前三，虽然她连一本课外习题册都没有钱买。整个家庭无法再回避这件事，卉敏去找秦方，他还在镇上拆迁办，升了正科级，拆迁办借了一套说拆而未拆的小院，门口也是一个鲜红“拆”字，一进去却有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之感。桂花开了，落满一地，卉敏在院里等了又等，索性找保安借了塑料袋捡桂花。卉敏捡了半袋子，秦科长才出来，抱着一个泡了胖大海的保温杯，他们说了几句，关于卉敏的抚养费和未来，但秦科长显然已经不再关心秦茗茗的未来。那天回家，卉敏把桂花酱熬出来，秦茗茗放学回家，空口就想吃，被烫了一嘴，卉敏揪她的辫子，你给我好生点，放几天，放几天才入味。

等到茗茗用冰糖桂花酱涂馒头，卉敏已经到了北京。她首先是厂里的装配工，岗位招聘要求是“中专及以上学历”、“从事过汽车零部件装配工作优先考虑”，这些她都没有，但她有“吃苦耐劳，能适应生产加班，责任心强，服从领导安排的其他任务”。她靠这些得到了这份工作，装配工月薪三千到五千元，她拿三千元这一档，和另外两个五千元在富豪村租了平房。北京的冬天，澡堂要穿过整个村，洗完回到没有暖气的房间，满头冰渣子，抖在地上久久不化。第二次洗完澡出来，她去村口理发店剪了头发，头发太厚，老板没收她钱，还送了她一小罐护发素。她和云峰第一次在北京见面，约在九棵树地铁站出来那家麦当劳，周末的傍晚，卉敏只加了半天班，回去洗了头，用了护发素，一头小卷无法收拾，在头上炸开，她三十六岁了，美大概还是美的，厂里车工和电工总想给她打饭，但这些美闲置多年，反而让她的落魄更为显眼。卉敏有点忐忑，怕云峰认不出短发的自己，畏畏缩缩躲在一个角落，但云峰一进来就看见她，拨过面前那些等待麦辣鸡翅和麦旋风的人群，向她走来。他们二十几年没见了，卉敏也以为自己会哭，但她没有，一点都没有。

云峰过了两个月就跳槽到她的厂，任厂里唯一一个“电机控制软件主任工程师”，这个岗位的要求就复杂了，“五年以上车用电动机或发电机的相关工作经验，有变频器、逆变器、MOSFET 和 IGBT 等相关控制经验”、“具有坚实的电机控制理论基础和实际经验，具有相关建模仿真分析软件的经验”、“拥有嵌入式工程软件编程及测试经验，拥有 TI 或者 Infineon 芯片的软件开发经验，了解弱磁算法”，工资一万五到两万五，云峰拿到了三万，一年十六个月，还有不少期权。云峰详详细细把这些说出来，带着显而易见的自得和讨好，重逢之前他已经离了婚，他之前的公司 IPO 没能过会，所以这和卉敏有什么关系呢？但卉敏渐渐意识到，他们的故事被重新讲述了，在云峰的版本里，一切都和卉敏有了关联，他的婚姻，他的事业，他这二十五年中下过

的决心，那些懦弱和背叛都变成结局的草蛇灰线，而结局已经展开了，就在那个麦当劳傍晚。

故事一点点讲得波澜壮阔，连中学老师都来恭喜他们。秦茗茗三年后考到北京，云峰开车去接她，一辆刚买的黑色奔驰 E，那正是这个故事让卉敏头晕目眩的时候，但秦茗茗坐在后座，穿洗得泛毛边的高中校服，刚坐了三十个小时硬座，秦茗茗没有露出一点倦容，人是在疲倦的时候软弱的，卉敏就总是觉得累，二十几年来一直如此。秦茗茗精神抖擞，连高考那几天她也没有打过车，坐公交车去城里考点，考完又坐公交车回来，那班公交车从乡下往城里开，秦茗茗半路上车，和鸡笼鸭笼挤在一起。父母离婚后，卉敏带着她搬回了艾叶老屋，和外婆住在一起，秦茗茗也只能像卉敏那样在院子里洗头，连澡盆都是同一个，卉敏把这件事想得很复杂，又担心她忘记调凉水，又担心冬天里那么厚的头发久久不干，老房子里用吹风总要跳闸，她甚至想过从隔壁茶馆再牵一条电线过来。洗头这件事困扰了卉敏整个青春期，但秦茗茗只这么洗了两次，就去街上理发店剪了短发，老板不收她钱，想送她护发素，秦茗茗不肯要，反复拉扯后要到了二十块钱，然后用这二十块钱买了半只兔兔，顶着一头小卷，装塑料袋里拎回家，给妈妈和外婆当一顿晚餐，老板另送了她一个兔肝。卉敏后来想，茗茗不像她，是她像茗茗，但哪里都差一点，比如到她剪短发，就只有护发素，她总是拿不到自己的二十块钱，更别说送的兔肝。

秦茗茗对张云峰没有意见，只是卉敏进了她宿舍，叮嘱她“给我好生点”，秦茗茗说，妈，你也好生点。卉敏沉默了一会儿才问，你觉得张叔叔怎么样？秦茗茗捏着她的手说，挺好的，但妈妈，你还是好生点。等她下了楼，秦茗茗在窗口挥手，张云峰也在楼下，夏天到了尽头，风已经像半个秋天，秦茗茗满头小卷在风里散开，她晒得很黑，这么黑了还看得出雀斑，后来云峰说，茗茗真像你当年。到了下一个红灯，他又说，就是头发短，也黑了点。卉敏从来没有黑过，她几乎没有晒过太阳，妈妈一直让她打伞，她从一把伞打到另一把伞。秦方说，他之前也想找个条件好点的，专科以上学历，有工作，最好有编制，那天下午他其实先见了一个小学老师，但见过卉敏，他没有办法不去看她闪着莹莹玉色的脸，到了离婚，秦方又说，狐狸精，狗日的我硬是被狐狸精迷了眼。

云峰也这么说过。他们第一次上床，在西海子公园旁边那家希尔顿，到后面云峰有点发狠，二十年，老子想了二十年，狐狸精，你这个狐狸精。结束后他们在房间里叫餐，吃寡淡无味的惠灵顿牛排，房间能望见燃灯塔，夜里亮着灯，云峰突然说，原来这就是燃灯塔，我们学校那个塔就是照这个修的。这家希尔顿后来他们总来，也是没有办法，云峰的房子在海淀，他暂时住在厂里给他分的宿舍，他们总不能去富豪村。有一次入住得早，两个人无所事事，去西海子逛了一圈，卉敏从介绍里看见，燃灯塔遇到过两次地震，第二次是唐山大地震，“塔身虽然未倾倒，但是出现了多道纵向裂缝”，这句话往后总在卉敏心里回旋，出现了多道纵向裂缝，出现了多道纵向裂缝。塔身虽然未倾倒。塔身为什么没有倾倒？雷峰塔都倒掉了，燃灯塔为什么没有？疫情刚开始，他们正好回自贡过年。三个人在机场会合，秦茗茗准备了一包口罩，卉敏和云峰都不肯戴，“没有证据表明病毒人传人”，那时候的新闻说。钟南山宣布人传人的第二天，他们一起去看房，茗茗没有去，卉敏带着妈妈，那地方有点远了，但房子没什么可挑剔，90 平方的小平层，倒送了 150 平方的院子，样板房种满绣球，这个季节只有叶子，售楼小姐翻出盛夏的照片，说，这花叫无尽夏，会一直开花一直开花，就像夏天没有尽头。老房子也有几家共用的院子，挨着一个公共厕所，水泥乒乓球台下放了一个巨大潲水缸，每年都有孩子在乒乓台上玩耍，脚滑掉进潲水里。秦茗茗掉过两次，她也不哭，自己爬出来，用水桶接了水，倒头就冲，无人打理的院子，一样开满了栀子花，在有巨大潲水缸的地方依然香气四散，栀子花一直开一直开，就像夏天没有尽头。

卉敏的妈妈在售楼处哭起来，售楼小姐不让她脱口罩，湿透的口罩蒙在鼻子上，像传说中的一种酷刑。卉敏知道，因为她也哭了，哭到后面无法喘气，直到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二十年前她毫无恨意，对父亲对云峰，对比他们更庞大、而她当时一无所知的那些存在，她一点都没有恨过，她吞下这些像吞下一缸潲水，以为这就是她的命运，但现在不行了，一切都晚了，发了芽的东西不会再退回到土里。

那天终究没有签购房合同，卉敏说不，声音很小，但她说出来了，不，我不要。妈妈整个春节没有跟卉敏说话。云峰问她，为什么？卉敏不说话，云峰就问了又问，为什么？到后面，他终于醒悟过来：你就是怪我，我晓得，你就是怪我，我能咋子办？我才十五岁，哪个让你老汉儿杀了人？哪个喊你是杀人犯的幺妹？你说，我能啷个办？二十多年了，你到底要让我啷个办？！云峰不大会说自贡话了，重逢之后他们一直说普通话，像真的是两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在北京通州谈起了倾城之恋，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回来了：晓得，咋子，老汉儿，幺妹，啷个办。当年大概云峰也说过类似的话吧，但卉敏发现自己真的忘记了，她甚至不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联系。

卉敏家连电话都没装，一直用街口那家丧葬一条龙的公用电话，爸爸出事之后，连丧葬一条龙都嫌他们晦气，起先卉敏想过，她可能错过了云峰的电话，等着等着她就明白了。又过了很多年，大家都用上手机，卉敏家一直没有装过座机，她没有错过什么，这个故事里没有误会，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写在了纸面。

没有座机，关机就是把一切拒绝在外。武汉封了城，自贡启动听也没听说过的“社区封闭管理”，老房子没什么社区，镇上就在老街出入口拉了绳子，抽调过来值班的公务员从茶馆里借来长板凳，坐在门口负责登记，都说要测温，但一时哪里都买不到额温枪，体温只能自己填。满街饭馆都关了，羊肉汤的老板为春节囤了几十只羊，现在每天拉着羊群在河边找草吃，一百斤上下的小山羊，起先胖嘟嘟的，可烤可炖，后来就都瘦了。老板杀了两只，在朋友圈里卖羊肉羊杂羊血，茗茗买回来炖了一大锅，又做了酸辣羊血，茗茗问卉敏，要不要叫张叔叔来喝羊肉汤？卉敏说，不用了吧。那锅羊肉汤三个女人吃了整整一周，卉敏的妈妈吃得少，想到那套有无尽夏的房子她总是哭，哭完再骂，骂了又哭。大家都沒有地方可去，戴着口罩在艾叶滩散心，今年冬天没几场雨，水一直下退，裸露出更盛大的滩涂，卉敏和茗茗牵着手，往河心的巨石走去。茗茗说，妈，艾叶滩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卉敏说，是啊，也和我

小时候一模一样。

要是一直这样，这个故事就会结束了，口罩，酒精，洗手液，消毒湿巾，一切都变成一种含糊决心的掩护。但日常生活一点点回来了，菜市场门口的卤兔，云峰最爱的那家豆花饭，羊肉汤馆没正式重开，但一到下午，就有人抱着锅，偷偷摸摸溜进厨房打汤。刚到三月初，茗茗有一天从外头回来，说，哇，原来艾叶滩有樱花啊，樱花开了。于是一家人都去看樱花，确实有，就那么一株，长在乱糟糟河岸，深粉色花瓣密密挨挨，像巨大的晚霞停在树梢，三个女人轮流拍照，单人，两两组合，最后找了路人拍合影，回到家里，卉敏妈妈自己抱了锅，去打了羊肉汤和两斤三线肉。街上有酒坊，酿一种极辣的高粱酒，酒缸里放了酒提子，一提两斤，茗茗去打了半提回来，她们都不会喝酒，但都喝了不少，三张红扑扑的脸蛋，像开到盛时的樱花。三个人吃到最后，才想起来给整个春节都没有给卉敏爸爸烧纸，于是舀一碗汤，夹几块肉，又倒一杯酒，在院子里烧了两刀黄纸。杀人犯，连遗照都没有，只有卉敏当年偷偷留下的一张照片，爸爸把她扛在肩膀上，她拿着一个糖龙。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因个人下岗问题，对工厂领导心生怨恨”，不是这样的，爸爸不是怨恨，他是觉得不公，政策里说了，夫妻双方，只下岗一个，啷个他们家要两个都下？他出门那天卉敏都还记得，卉敏说，爸爸，我想吃凉拌脑壳肉。爸爸说，要得，我回来给你买。他穿得整整齐齐出的门，一个普通工人，从来没有单独见过厂长，连车间主任都不怎么熟。凶器在法庭上展示过，卉敏也认出来了，确实是爸爸的试电笔，他是个电工，试电笔一直随身带着。茗茗说，外公还挺帅的哦。二十几年过去了，卉敏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是啊，爸爸就是挺帅的。卉敏早就接住了这个世界加在父亲身上的种种词语，但她长大了，又找回了那些她自己的。

到了三月底，茗茗没有开学，但厂里说要复工，卉敏戴着一个 N95 回到北京，又转了三次公交地铁抵达富豪村。大家都回来了，送外卖的，做保洁的，隔壁在地铁口租了早餐岗卖包子的安徽女人，凌晨两点就在院子里和面。卉敏半夜去公共厕所，在一旁搭了个手，给她拌肉馅儿，馅里拌了茴香，冲鼻香味在院子里一圈圈盘旋。四点多包子出锅了，卉敏吃了两个，才又回去睡了一觉，房间只有七八块瓷砖大小，卉敏睡得极为踏实，一起天光极亮，她也没有想到，巴掌大的窗户，竟然装得下所有的光。

上班第一天就看见云峰，穿着工作服，旁边的都在叫他，张工。张工显得很有力量，一切尽在掌握，而一到北京卉敏就变得孤立无援，继而软弱，继而屈从。云峰不住宿舍了，租了一个两居室，小区挨着减河，还不到五月，小区里开满了一蓬又一蓬的杂色月季，整个夏天卉敏都住在那边，下班先把电动车开去北关桥下的停车场，再坐云峰的车一起回来。房子不大，视野很好，卉敏在阳台上晒衣服，眼前水光凌凌，再往前是远处新建的商场测试灯光，一层一层变幻色彩亮上去，但富豪村其实也能看见的，光是公正的，往所有的方向闪烁。云峰的意思是，富豪村的房子可以退了，每个月多花那五百块不值得，卉敏口上应了他，但房子一直还是租着，偶尔她会回去，打扫那个不值得打扫的房间，她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就不会给光制造任何障碍。夜里和茗茗视频，茗茗有点疑惑，妈，你在哪里？卉敏就说，哦，我找了家麦当劳。卉敏不敢告诉茗茗这些，她觉得茗茗会失望，好像自己倒成了女儿，她要争气。

分快递的工作是十一月找到的，一个小时能拿八十块，一晚上五百，一周去三次，当天结款。卉敏也不知道这笔钱她挣来做什么，用来改变什么都显得可笑，也许能给茗茗买个新手机吧，她想，但她干活那三天就能回富豪村睡觉，两点半到家，睡到七点半，起床时安徽女人早就出去了，总给她在门外挂个塑料袋，留两个包子。卉敏骑着共享单车去厂里，单手扶把，另一手拿着包子，她沿着温榆河一路往前，经过一座桥，又经过一座桥，秋风浩荡，茴香浓烈的味道飘散在风里，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卉敏会短暂地双手脱把，无意识挥舞，好像想把风握在手里。她想到茗茗考上大学，都说北京就得骑车了，她借了一辆旧凤凰，陪着茗茗在河边骑，茗茗哪怕不怎么会的时候也喜欢双手脱把，摔过好几次。她很生气，茗茗，你要做啥子！茗茗一身是灰爬起来，妈我忍不住啊，我就是忍不住。如今她明白了，那种忍不住里的浩荡快意。

除了抿嘴，云峰对她的兼职没说过什么，卉敏有时候会想，原来云峰也怕她，就像她怕云峰，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恐惧。十二月初卉敏知道自己怀孕了，现在医院打胎没那么容易，已婚的女人需要丈夫签字，但卉敏没有丈夫，事情反而由此变得简单，医生让她另写了一张纸，声明后果自负，卉敏签下名字有一种郑重感，好像过了 40 岁，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后果自负。麻药一吸进去她就松弛下来，醒过来更是如此，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睡过这么长的一觉了，回家后继续睡了三天，没日没夜的睡，饿了就吃安徽女人的包子，以及她做手术前炖好的一锅红枣鸡汤，三天吃了两只鸡，她觉得自己精神好极了。第四天去厂里，云峰有点急了，跑到车间里来，偷偷问她怎么回事，又说下班等她。哦，我晚上要去宋庄分快递，卉敏几乎是欢快地说，我最近天天都要去。

然后就是现在了，住在地坛医院的定点收治病房里。云峰确诊了，但茗茗在做了三次核酸后确定没事，茗茗昨天托人送进来一个 kindle，里面装满了金庸和亦舒。卉敏想到小时候她洗了头，会搬了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一面等头发干，一面读金庸，蚂蚁们在脚下忙忙碌碌，搬运一块西瓜，寻找一颗糖，或者聚集在一片树叶底下窃窃私语，卉敏看书看闷了，会无端端一脚踩上去，而蚂蚁是不知道这些的，蚂蚁大概会把这些归纳为命运。卉敏读了一会儿《笑傲江湖》，一个人躺在床上，她不由微笑起来，你跟我好生点，这不再是命运。

确诊病例 17，姜某某，男，22 岁，四川泸县人，现住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无业人员。姜某某为确诊病人方某的密接人员，12 月 27 日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并转运至地坛医院，31 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主要行程轨迹如下：12 月 16 日至 19 日：因伤居家休息，17 日女友曾自海淀黄庄前往宋庄探视，二人未外出，女友当日返回海淀黄庄，往返地铁均佩戴口罩。

20 日至 21 日 7 时至 20 时：自行骑车前往通州北关新建村小区，为某楼业主铺装

地板，期间曾在楼下兰州拉面就餐。

22 日至 26 日 7 时至 19 时，自行骑车前往远洋新光工地打工。

27 日 9 时接到区疾控中心隔离通知后，居家等待转运，作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姜越不觉得自己是无业人员，我是自由职业，他总这么对人说。他是不专心的外卖骑手和四处代班的滴滴司机，刚来北京认识了几个小老板，手里时常有点零散活，他就四处去应急，一天铺地板，一天装柜子，有时候老板把类似的小活揽在同一天，他一天能装八个智能马桶盖，每个收七十块，他拿五十，拿到这四百块，他就能安心回到宋庄，坐在院子里喝两罐燕京。姜越脑子里好像从来没有怕，也没有死，他连沮丧都不怎么沮丧。他做蜘蛛人清洗玻璃幕墙，苦热的夏天，悬挂在半空中，玻璃墙里的人坐在一个又一个的格子间，姜越想，他们有空调，而我有风。苦热的风吹动吊绳，烈烈风声令人胆寒，但没有关系，他宁愿有风。姜越什么都会做，远洋新光那个工地好几年了，时不时会缺工人，缺混凝土工他就去混水泥，缺钢筋工他就去扛钢筋，商场封顶了，开始内部装修，他去刷过半个月油漆。乳胶漆颜色调得极美，是一种浅浅灰蓝，干透之后像云在室内躲雨。茗茗会喜欢这个，他想。后来又开始装灯，姜越装了两层，商场还有一年才开，每晚先测试灯光，一层层亮上去。他拍了视频，茗茗问他，我妈那边能看到吗？姜越就骑车去了一次富豪村，村口有个破破烂烂的五金店，老板蹲在门口抽烟，抬头看远洋新光的灯光变幻。姜越又拍了视频，跟茗茗说，能看见，哪儿都能看见。

姜越和茗茗不是在北京遇到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女生和一个通州零工小哥的故事。那种故事大概也是有的，但他们不是，两个人有一种莫名信心，他们和所有故事都不一样，好像两个人决心自我隔离，以便和世界断开关联。他们八年前就认识了，自贡举办“天府杯恐龙知识竞赛”，两个人代表各自学校参加，茗茗是永远的第一名，代表学校参加所有比赛，姜越就只参加过一个，他英语搞不清楚宾语从句，却可以说出一百多种恐龙的英文名。比赛持续两天，进展迅速的淘汰赛，姜越的学校第二轮就被踢出去，光知道一百多个单词是进不了决赛的，但茗茗的学校进去了，他们知道马门溪龙生活在早白垩纪。茗茗最终拿了第二名，抢答部分输了好几题，她好胜心强，一下台就哭了，姜越凑上去，*stegosaurus*，剑龙是*stegosaurus*，还有*asiatosaurus*是亚洲龙，你脑壳卡了哦，想想词源不就行了吗？比赛统一化妆，每个人都涂着一模一样的红脸蛋，画一模一样的红嘴唇，化妆师连腮红也没有，用口红往脸上胡乱蹭了几笔。茗茗脸哭花了，哭花了倒能让人看清她是全场最好看的女孩子，姜越的妆却还很完整，一个红脸蛋男孩没有什么尊严，茗茗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想也未想就拨开人群，往前走去。姜越在最后时刻才要到茗茗的 QQ，大家都快上大巴了，茗茗快速报了一个十一位数，车开走了，姜越对着车窗招手，你以为我记不斗是不是？你给我等斗，等我过两天去网吧。回到镇上茗茗隔了很久才有机会去网吧，现在网吧已经不多了，谁家里还没有电脑呢？但她家没有，显然他家也是。一上线就看见有人加她，名字是*asiatosaurus*，亚洲龙头像是一个红头发的少年，茗茗想到那个红脸蛋男生，一张红嘴像上了火，劣质唇膏四处蔓延，她坐在有腾腾烟气的网吧里，噗嗤笑出声来。

这也不是两个少年的爱情故事，他们真的提到“爱”这个字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在还是少年的那几年里，他们根本见不着面，一个在泸州，一个在自贡，都是镇上的孩子，大家都很穷，网吧也不能每周都去，何况他们也很难同时在线，两个孩子都不好意思约定时间，那样就太像恋爱了。两个人当过一段时间笔友，姜越很快失去了兴趣，他作文很艰难才能凑够八百字，给茗茗写信无论如何写不满一页纸，茗茗就一边收文笔澎湃的情书，一边反反复复读姜越写给他的几页纸，错别字很多，有一封信大概实在没有东西写了，就写了一个老妈蹄花的菜谱，重点是怎么调蘸水，茗茗那个周末就给外婆和妈妈做了老妈蹄花。很多年以后，他们在北京想起这回事，去村里菜市场买了八只猪蹄和三斤莲藕，回家里小火慢炖四个小时，细细调好蘸水，请院子里所有人吃老妈蹄花。那天晚上茗茗没有回学校，这其实是他们第一次过夜，姜越的房间不到十个平方，一张铁架子单人床嘎吱作响，两个聪明人，尝试了半夜才能成功，过程也并不是非常愉快，结束后他们都有点挫败。姜越垂头丧气，你饿不饿？他戳了戳茗茗。饿得要死，茗茗躲在被子里说，她没有穿衣服，而房间里没有暖气。于是姜越起床去厨房，用一个小小煤气炉给她煮面，猪蹄吃饱了，留下半锅汤，挂面就煮在汤里。天真冷啊，他双手挨着那点炉火取暖，茗茗把被子裹在身上来看他，又让他把双手伸进被子里取暖。面没有吃到，他们又回到床上，这一次就好多了，好太多了。二十岁，他们分明还是五年前的少年，却享受到成年的乐趣，这种乐趣让人头晕目眩。茗茗说，我们以后要一直这样。姜越懒洋洋把她搂在怀里，还用你说，他得意洋洋，面带红潮，像当年那个红脸蛋。

姜越不是为茗茗来的北京，正好相反。他没考上高中，跟着一个远方亲戚来北京打工，走之前他来过一次自贡，找亲戚预支了两百块钱。泸州到自贡不过两个小时车程，但他又辗转好几班公交车才到了茗茗的学校，已经放学了，他只知道这个地址，站在校门口有点茫然。姜越找了个网吧，原本想打通宵 CS，但他趴在键盘上睡着了，流了一键盘口水，他一面擦键盘，一面心疼包夜的五十块钱，这让他在校门口等到茗茗的时候满肚怨气。你咋子来这么晚？他说，手里拿一个锅盔夹凉皮。茗茗莫名其妙，你谁啊？姜越卸了妆，而茗茗只记得那个红脸蛋。他们就站在保安前面二十米，草草聊了十分钟，姜越连锅盔都没吃完。分别时茗茗有点不耐烦，晓得了，你到北京给我打个电话，别发 QQ，我 QQ 被盗了。她报出一个七位数座机号，那是她家门口丧葬一条龙的公用电话。公用电话快消失了，丧葬一条龙也是，四十年老字号，接洽临终咨询、净身穿衣、遗体接送、遗体寄存、灵堂布置、告别火化、风水选墓地、迁坟落葬等所有业务。但老板死了，在本人享受完本店丧葬一条龙服务之后，两个儿子把店面顶了出去，姜越就赶在丧葬一条龙变成艾叶土鸡脚那个时候，给茗茗打了个电话。我到咯，住在通州。秦茗茗说，通州是哪儿？姜越还是得意洋洋，通州你都不晓得，京杭大运河你晓得不？三年后秦茗茗考到北京，转好几次地铁公交，

站在大运河森林公园门口等姜越，两个人都是成年人了，往返六个小时见一面这件事被赋予了明确的含义，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又是好一阵子没有联系。两个孩子都有点被眼前这场大火吓到了，他们不再是十四五岁，这个世界面对他们，展开了写定的秩序。

两个人都有了手机，都加了对方微信，他们也尝试过，尝试尽力投入一种符合秩序、理所应当的人生流程。茗茗上课、写论文、参与社团，姜越换马桶、装空调、粉刷楼道，但大火是不管这些的，火焰盘旋在北四环到东六环的上空，以只有他们能感受的方式传递灼热。在一个热得不能再热的六月，茗茗去了一次宋庄，习惯了北京就是中关村和五道口之后，宋庄让她想到部分的自责，微妙摇摆于落魄与火热之间，拆过违建的院子一片废墟，而挨着废墟，就有人若无其事照常生活。四处种满月季，藤蔓沿着红墙游走，废墟里仍有活根，在瓦砾堆里艰难开出碗大花朵。舍不得在咖啡馆花钱，他们一个巷子一个巷子地绕着圈走，一路听到有人讨论如何扩建和装修，装个秋千，挖个鱼池，再立个篮球架，诸如此类的东西，所有人都兴致勃勃，憧憬一种并不过分的未来。茗茗问，这边不是都在拆吗？姜越浑身是汗，是啊，一直在拆，都说是违建。那边有栋房子，四层楼，院子比房子还大，说拆也就拆了。那他们怎么还在建房子？姜越想了想，万一啦，都是想着万一，盖了再说哒。

他们就在废墟和废墟的缝隙修筑自己的违建。滚烫的六月午后，两个人躲在一面将塌未塌的砖墙后面，一只胖胖橘猫在废墟间巡回，警惕地看着一对慢慢靠近的嘴唇。姜越说，你妈会不会打你哦？茗茗说，我妈也有个男朋友。姜越说，也是送快递的哦？茗茗说，不是，是个工程师，北大毕业的。姜越说，日，你妈会不会打你哦？

秦茗茗暂时没有挨打。周末过去通州，张云峰请她们吃饭，万达里的馆子来来回吃腻了，张云峰就开车带她们去宋庄，吃那家茗茗和姜越总是路过，却一直不舍得吃的四川菜。坐下来才发现所有服务员都是聋哑人，妈妈于是趁着张云峰出去抽烟，一面翻看菜单，一面止不住反复强调，张叔叔对我多好，张叔叔给我打了一万块钱，张叔叔说，再过两年，在自贡给外婆买个房子。服务员似乎会读唇语，站在一旁抿嘴微笑，他们什么都听到了，妈妈那一点点虚荣和快乐，更多的心事和不安。秦茗茗就在那个时刻决定，她一个字也不要说，因为这意味着交代，交代意味着解释，而她下决心一点也不解释，对任何人，对这个世界。吃完饭后张云峰开车送她去地铁站，她看着车离开，转身就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往宋庄走。那条路骑车太远，已经是十月，风变得严厉，但迎着风不管不顾往前实在畅快，秦茗茗和姜越共享了实时位置，他们将在半路相遇，不是这个点，就是那个点。

他们偶尔谈论未来。姜越说，他是不会一直待在北京的。北京不喜欢我，你晓得不？两个人坐在宋庄文化公园的池塘边，秋风吹过半池残荷，姜越满不在乎，又有点委屈。他说起两年前，村里四处赶人，先说是要拆，后来大概觉得拆起来也慢，就先痛快断了水电，七八点断的，掐在大家做饭洗澡那个点儿，有人一直到搬家，还满头沫子，一股子柠檬味，回旋在十一月底的北京深夜。茗茗握住他的手，后来呢？姜越反手握住茗茗，后来大家先搬去了燕郊，每天坐公交车进出北京干活。那不是很远？也还好吧，姜越想了想，就是难受，倒不是远。后来你们又都回北京了？姜越又想了想，一半吧，有一半回了老家，当时都觉得北京是回不去了，住我上铺那个山西人，给我留了三瓶醋，我以为三瓶里怎么也得有一瓶酱油吧，没有，都是醋，你怎么不想回去？姜越又拿出手机，给茗茗看银行卡余额，我就想，老子要多挣几年钱。那张农业银行的卡他已经给茗茗看过很多次，他们又共同看了一次余额，255230 元。茗茗又一次说，我靠，你好多钱哦。姜越洋洋得意，把茗茗搂了搂，你说，以后等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百万？茗茗缩在他怀里，肯定，肯定有的，我的妈呀，我们拿一百万咋子办哦？姜越说，我们慢慢想哒，也不着急哒。

他们没有等到一百万，银行卡余额变成 306179 的时候，一张激动人心的蓝图在两个人面前展开。2019 年春天，姜越接了一个高层公寓翻新的工程，不过一周的活，那对夫妻要求简单，四面粉刷，重铺地板，更换厨房和卫生间台面，再换几盏灯。小老板想省点人工，就带了姜越一个人，他猛做两个小时，能去楼道抽支烟。楼道窗户污脏，纱窗烂成一缕一缕，但能望见温榆河曲折蜿蜒，姜越想到上一个秋冬，只要茗茗过来，他们就会在绿道上骑车，一路往北，沿途满种光秃秃的碧桃和樱花。这条路据说通往昌平，冬天铅灰色的河流让人疲倦，他们总骑个十公里就调头，茗茗说，等春天吧，春天就骑个往返，春天什么花都开了。

确实什么花都开了，姜越探出头去，看绿道两旁粉云似盖，男主人却也出来抽烟，递给姜越一支硬中华，两个人不知怎么聊了起来。男主人说，你这手艺好啊，在国外能挣钱，我们在美国整天摸钥匙，生怕换锁，换把锁一百五十美元。姜越说，你们从美国回来的啊？男主人掸掸烟灰，是啊，住了八年。怎么回来了？工作不好找。我们不像你，什么都会，我们有对朋友，住加拿大，男的呢会修空调，一个月挣好几千加币呢，女的呢就一直读书一直读书，读完一个博士，正在读第二个。姜越有点呆住了，就需要修空调？男主人点头，是啊，就需要修空调，要是能通下水管就更好了。姜越又点了一支烟，他手在发抖，我会啊，我都会，我会修空调，通下水管，我会装窗户，铺地板，我会打孔，会给抽油烟机装止回阀，我还会做鞋柜餐边柜呢，我给你说，只要你给我找到图，我就能把柜子做出来，我什么都会，真的，我什么什么都会。男主人灭了烟，转身回家，你真该出去，加拿大吧，加拿大手续好办。姜越追上他，都有些什么手续？男主人想了想，不知道，谁知道，找中介呗，中介肯定都能搞定。

找好中介的第二天，他们一大早从温榆河右桥出发，正午时分刚好抵达沙河闸，全长 34.5 公里。共享单车不太好骑，茗茗说，以后去了温哥华，我们还是得买好一点的自行车。姜越隔着一点距离，试图捏她的指尖，好的，姜越温柔地说。两个人都被一种巨大的温柔震住了，有时候绿道被桥截断，就得回到行车道，过了桥再下来，他们就趁着那一点点的时间接吻，吻好一会儿才上车。沿途什么花都开了，碧桃、海棠、迎春、连翘、樱花，姜越所有花都认识，他还在草坪中辨认出鸢尾和二月兰。到了沙河后，两个人躺在草坪上，姜越说，那边好像有一圈萱草，就是黄花菜，黄花菜你吃过没有？他这才恍惚想起，自己曾经是个知道一百多种恐龙英文

名字的人，那些单词直到现在还时不时自顾自浮上来。Peteinosaurus，蓓天翼龙。Mamenchisaurus，马门溪龙。

中介说，三月就能走，于是姜越留在北京过年，收拾杂物。十平方的房间，没什么可收拾的，茗茗回自贡前过来看他，戴着口罩，又给他留下二十个口罩。现在武汉有种病，茗茗说，你小心点，干活把口罩戴上。她正在申请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博连读，想赶上明年的秋季学期，这样他们就只会分开一年半。姜越甚至没有问过什么进展，他觉得茗茗什么都能做成，她说一年半，那就是一年半。茗茗上飞机前给他发微信，他正在物资学院那边有一家里打孔，房主想换个镜柜，打孔前姜越问，后面有没有水管？房主说，没有，这哪有水管。电钻一下去水管就爆了，那一单他最后赔了三百块钱，回到宋庄他和茗茗视频，提也没提这三百块，那段时间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愉快，老子都要去温哥华修空调了，还在乎你这三百块钱？

村里一有人站岗，房东就让他走，先是持之以恒打电话，后来和村委会一起上门，当即换了锁。姜越在秦茗面前以熟练操过社会的姿态出现，但他归根结底是个老实巴交的四川小镇男青年，中学还带饭盒去学校，规规矩矩去食堂热饭，吃完规规矩矩洗碗，上一次打群架已经是十年以前。和三年前那个深秋一样，拉着一个箱子走在漆黑大路上，风呼啸而过，他感到茫然。姜越在通州那些 24 小时的肯德基和麦当劳流浪了几天，晚上和茗茗视频，茗茗看到粉红色背景墙，问这是哪里，他满不在乎，麦当劳，我饿了，想吃宵夜。茗茗没说什么，姜越不会去麦当劳吃宵夜，姜越的宵夜只有一种，半把挂面，一片白菜，两根火腿肠，拌大量熟油海椒，一整颗白菜放在门外，煮一次面剥一片叶子，剥来剥去，那颗白菜永远吃不完。流浪到第五天，房东突然又让他回去，后来才知道是村里别的房客坚持打 12345，又上微博又发抖音，评论里有人说，不能让水晶之夜在中国重演。姜越不知道什么是水晶之夜，但他有点羞愧，一切都和三年前一样，别人赶他走，他就走了，别人说可以回了，他又回来。他的命运被人呼来喝去，没有和他本人产生真正的关联，姜越忍不住想，茗茗就不会这样，茗茗不会跟着人群离开，又跟着人群回来。

姜越想过回家，又惦记据说被困在湖北老家的移民中介。他很久之前申请过外卖骑手，但现在资格过了期，每一个工地都停了工，连马桶漏水的单都接不到，来北京这么多年，姜越第一次感到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他认为牢不可破的一切，修空调，通下水管，装窗户，铺地板，打孔，给抽油烟机装止回阀，鞋柜餐边柜，一切都在传说中的病毒中溶解消散。到了三月底，事情变得明朗：中介把他拉黑了，他用另一个号重新加回去，看到那个漂亮女孩正在买一种阿胶，“落尽残红始吐芳，假名唤做百花王。千锤百炼无双艳，如此多胶百年堂”，他给茗茗买了一盒。他去过国贸那家实体店，倒是没有倒闭，门上贴着通知，“本店将于 2 月 9 日（正月十六）恢复运营，祝大家春节快乐，阖家幸福，生活美满”。店门口是一个小小的社区花园，他坐在长椅上，方圆五百米只有沉默的车流，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姜越查了几遍银行卡余额，他确实有一点懵了，但他想，我有茗茗，我们阖家幸福，生活美满。

茗茗九月才回到北京，但五月之后，生活也都渐渐回来了。修不完的马桶，打不完的孔，通来通去通不完的下水道，除了裤兜里永远得揣着两个口罩，除了他银行卡里消失的二十万，有几个晚上，姜越收了工骑车回家，看见燃灯塔若无其事闪烁，他会有点愤怒：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塔他妈的还没有倒掉？但第二天起床，他又若无其事，向下一个漏水的马桶出发，一个马桶漏水了，简而言之就是两百块。姜越在宋庄换了一个更小更远的房间，那地方已经挨着麦田了，房东养了一条血统不纯的藏獒，每天进出都要经历一番胆寒，但这里房租每个月能少一百五十块，姜越也不知道，少这一百五到底有什么意义，但他下意识就这么做了，命运从他这里抢走的东西，他想，我拿回来一点是一点。

那个单他本来可以不接的，老板说得很清楚，那人刚从印度回来，隔离是隔离过了，核酸也核酸了好几次，还是没人肯接他的单。洗衣机跑了水，水往楼道漫去，电梯都被淹了，业主们拼命打 12345，维保的人来修了电梯，但洗衣机就没入管。让她就洗手呗，洗衣服怎么了，大家都这么说，那女孩子却不肯，持之以恒地找师傅上门。姜越想到，茗茗说过，她妈妈最恨手洗衣服，家里没有洗衣机，在十八岁前的傍晚永远在搓衣服，架在一个古老的搓衣板上。姜越就这样答应下来，再说了，那个女孩子在绝望和赌气之下，把报价提到了两千块钱。

12 月 17 号茗茗来看她，是春节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学校封闭管理，但因为他的手在做木工时不小心伤了筋，她就想了一些办法出来，姜越没问茗茗想了什么办法，她总会有办法的，姜越知道。茗茗经过咆哮的藏獒，也看见了麦田，麦田萧索，风吹得麦秸往四下飘散。茗茗看见他新的房间，没有说什么，他们把那扇让人胆战心惊的门反锁，就在唯一一张单人床上做爱，做了又做，做了又做，姜越满腹委屈，但茗茗的手，茗茗的嘴唇，无穷无尽的身体，让他又觉得那些都过去了，他们依然阖家幸福，生活美满。茗茗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申请都下来了，我们明年把婚结了，你就能以我的配偶的身份一起去。他一时不敢相信，就这么简单？茗茗在被子里轻轻捏住他的指尖，就这么简单啊，我还有全奖呢，我们省一省就不用花钱。明年，等明年我把我妈的户口本偷出来。

被转移到地坛医院的第二天，茗茗就发来户口本的照片。等你出院就可以咯，茗茗说，我妈住院前把户口本给我保管。姜越想到八年以前，他在镇上网吧，郑重其事输入那个他怕忘记而反反复复默背千百次的十一位 QQ 号，他觉得自己运气好极了，他妈的命运根本不能拿他怎么办。



李静睿

以前是法律记者，现在写小说。出版有《慎余堂》《北方大道》《微小的命运》《小城：十二种人生》等。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Iham Fikri on Unsplash](#)

小说

红

庆宇 | 24 小时文学聚会

我把自己交付给这些可能，
如微尘细沙，停停走走。

我跟王晓莹私奔那天，是下午六点，驾校收了车我就过去了，她催得急。到她家的时候，她妈也在，是她给我开的门，磨磨蹭蹭好半天，门开了和之前一样，没见着脸，只扔给我一个后背。王晓莹说，来啦。我说，来了。王晓莹说，妈，孩子给我，你下楼买点菜。她妈兀自抱着孩子在地上晃悠，没搭理她。我说，我去吧。王晓莹横我一眼，跟她妈说，我好跟他谈事啊。她妈充耳不闻，但王晓莹上去抱孩子时她也就把孩子给了王晓莹，王晓莹说，等电话，谈完告诉你。她妈僵直着脖子，目不斜视从我身前走过，换鞋出门去了。王晓莹笑着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嗯了声，说也没什么好准备的。王晓莹点下头，侧身掏出奶子给孩子喂奶，一面拍着、晃着，说要把孩子哄睡再走。

没两分钟她就失去了耐心，往卧室去，跟着喊我进去，说，把箱子提出来，在柜子里。当时她正往孩子身边拦枕头，我站在门口，她回转身子边往脑后头发上套皮筋边甩下巴示意，去呀。衣柜就在床边，推拉门，我等着不去是预计到箱子会很大很沉，指不定有几个，毕竟是准备了一周。这使我心生抵触，她兴许会把整个家装进去，女人很可能就是这样。事实证明这是我的偏见，那箱子中规中矩，只有一个，红色的，不大，提起来也不沉。我问王晓莹还有吗，王晓莹说走吧。

她笑着跟孩子说了声再见，孩子一下哭了，声挺尖利。那孩子三个月大，那会一直很乖，在床上骨碌着眼睛看，安安静静的。王晓莹双手撑在床边，捏着嗓子慈爱地哄一声别哭啦，乖，孩子哭声更甚，擦着劲往上窜，王晓莹起身朝他摆了手，向外走，我跟在后面说，给他找个玩具？王晓莹说，小呢，不懂。她边换鞋边打趣，把他也带上？我看她说，随你。王晓莹说，那还有什么意思啊，哭吧，小孩子火气大，哭哭下火。她没来由地问我，知道红孩儿吧。我看她，她脸上隐着笑，接着笑出声说，快走呀，哭急了可是要喷火的。

我跟王晓莹是要往红城去。这是我们之前就计划好了的。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后面的人生早已写就，所以离不开，到哪里去，都无所谓，随王晓莹心意。王晓莹起初表示，只要离开怀城，去哪都可以。但她又来问我目的地，我由远及近说了些大大小小的城市，她不置可否，直到听到红城，才确定下来。

在火车上，我与一位女孩换了座位，坐到王晓莹身边。车开了一会，我发觉她身体在颤，脸有点白，嘴唇湿湿的，像结了露水。问她怎么了，是不是冷，她摇头。我刚觉得自己问得愚蠢，七八月的晚上，车厢里闷热不减，她却说嗯，是有点冷。我问她箱子里有没有衣服，给她取一件来披，她看着我笑，说，插姐呀。又说，我没事，你，何东胜？谢谢你，东胜。说了会话，她面色红润了起来，让我去问列车员，看红城还要多久到站，她等不及了，要一睹为快。

红城是一座北方城市，距怀城不远，比怀城大得多，也发达得多，很现代。这不是它受王晓莹青睐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名字，王晓莹说，合她的心。

我跟王晓莹有个三个月大的孩子，是在王晓莹结婚前怀上的。婚后事情败露，她丈夫

要来兴师问罪。王晓莹打电话给我，要我与她口径一致，我不擅此道，王晓莹怪我太笨，给我打了稿子。我看后询问了几处细节，王晓莹不大耐烦，说是那个事就行，何必抠那么细。她不认真，我便只是大概记了记，后来也没用上，直到他们离了婚她丈夫也没找过我。他们离婚后，王晓莹带我去她家，主要是让她妈见见我。那时候孩子两个月大，进门后王晓莹她妈对我一句话也没有，眼神又锐又硬，并无半分避讳的意思，来来回回在我跟她怀里孩子间比照，没几番，脸一沉，孩子就哭了。她照孩子屁股拧两把，说，哭，就知道哭，哪来的回哪去。王晓莹朝我笑，说，去，抱抱你儿子。我不好推辞，就过去抱，但也是试探性，或者说做势，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她妈妈又是那个态度，我心里虚着呢。刚到近前，王晓莹她妈把背一转往卧室去，沉声吆喝，孩子饿了不知道？进来喂奶。王晓莹问我，会冲奶粉吗。我摇头。王晓莹说，三十毫升水，奶粉一平勺。奶粉，她用视线去寻，跟我示意，那。进来。王晓莹她妈在里面喊。王晓莹不予理会，跟我说，冲你的。我问用开水温水，冲多少，然后就看到王晓莹她妈奔出来又收住步，向着我定一定说，给我出去。我没敢看王晓莹，点了下头。想要说句客气话，比如阿姨注意身体，或是阿姨再见，您多保重，直到手落在门把手手上也没说出来，王晓莹一直没动静，我挺想看看她。转头看见她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剥橘子。我有些生自己的气。后来王晓莹又叫我过去她家几次，我没说什么，一样去了，每次她妈都在，对我的态度丝毫未改，最后一次，也就是出走那次，据王晓莹说，她妈妈是让她和我谈谈我们的婚事。可是她妈妈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把自己三个月大的婴儿扔给她，私奔了。

其实上面一些说法并不准确。真实的情况是，孩子不是我的，我和王晓莹在私奔前也从未发生过性关系，我们不是恋人，彼此间甚至都谈不上多熟悉。

我跟王晓莹相识于驾校，我是科目二教练，她是练车学员。总共十二次约车机会，每次四人一个车，均分两个小时的时长，她头几次约的教练并不是我，学员多，项目进度不同，我也并不是每次都跟在她车上，所以说接触，实在不多。但我对她的印象，将近一年半后她微信联系我的时候，我瞬间就记起了她。她找我帮忙，如果她老公问我她的孩子是不是和我有的，请我给予肯定回复。她问我肯不肯帮忙，在得到了我的肯定回复后，她说不好意思，这种事不怎么好听，不会影响你吧，我说不会，我还没结婚，再说也没什么不好听，这叫有本事，她说那谢谢你，你也别误会，是话赶话，两个人吵架，我说孩子不是他的，他认为孩子是我考驾照时有的，依据是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和平时不一样，开销也大，他问我是不是跟教练，我说是，说完我觉得挺得意，就唱了句歌，他气坏了，问我真是假，我说这种事怎么好开玩笑呢。

她说，孩子不是别人的，但凡事得有个交代，把力所能及的做好，你说是不是。就这么个事，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我想说，孩子多大？王晓莹说，快出满月了。我说，这样对不上。王晓莹说，什么？我说，你跟我练车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按理说该是在十一个月之前，假如孩子是我的话。王晓莹说，没事的，他们觉得合理就行了。我说，我知道了，我们在你学车时认识，孩子是后来才有，这样也说得通。王晓莹说，让你费心了，没问题的话，把你手机号给我，他如果需要，我给他。

在即将到站的去往红城的火车上，王晓莹问我为什么要帮她，乃至愿意陪她出走，是不是爱上了她。她说如果我想在她那里要个结果，她要让我失望了。我看她说，就是碰上了。她说，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她说，好，简单下去。

我和王晓莹到红城后，听从出租司机的建议，租了南城的房子，低配版拎包入住。那天晚上王晓莹又凶又媚，又疯又浪，我起初被她吓坏了，恍惚间惊觉自己中了她的陷阱，要形神俱灭。但很快，我就被她锻造出来，没有摸索与撩拨，我们互不相让，像一把镰刀收割另一把镰刀，这是开始，紧接着，就彼此缠绕，汇成一道，于快进闪退间割下一个个头颅。

事后王晓莹问我带不带劲，我说其实我不喜欢她在床上疯成这副样子。王晓莹怀疑我在装，或是老封建。我说，跟这没关系。王晓莹说，那跟什么有关系。我想了想，跟她说可能是我还没做好准备。她笑出声说，让我惊着了吧。又说，从没这样过，沸腾，并且急剧流逝，懂吧，像山洪爆发，你有过这种感受吗？

我看她，想起有一次去蹦迪，蹦多了，踩了身后一个青年的脚，他推我几把，质问我，我那时候没空理他，还把他的推力吸收到进步里，他出去转一圈回来，用酒瓶开了我的瓢，我知道流血了，还是不去理他，继续蹦，甩头的时候还想着撒个满地血花，当下更觉快意，简直要吼出一首岳飞的满江红，我没喝多，没嗑药，就一个愿望，蹦到天荒地老。天荒地老是不能的，这我清楚，令我迷醉的是疯狂的持续输出，我渴望力竭而死，像敢死队，像飞蛾，像救人于水火，因消亡而得以存在，在存在中消亡。我回王晓莹，有过，我能理解。王晓莹似乎不信，又跟我拉拉扯扯许多，可能是累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

初到红城，我和王晓莹逛了几天。红城与其它所有城市一样，逛不出多少滋味，陌生感一淡，只剩建筑树木街道车辆与人，这些东西，说到底同别处并无差别。要说一点显眼的不同，就是红城尽是斜街。我和王晓莹方向感都不怎么样，她喜欢用参照物作表述，我则是以左右论，好在我们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逛到晚上也不必非要回出租屋去，都是就近找了旅馆。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各自找了工作，她在一处电器城做销售，我在一家幼儿园当司机，俩人加起来挣得不多，将够吃喝，却也从没谈过钱上的事。事实上，我们一直不怎么聊天，白天各自上班极少联系，下班回到家也是各自消遣。我是个闷得住的人，对着手机能过一晚，王晓莹也是如此，我歪在床上，她坐在红皮转椅里，把两条胳膊各自搭向一面，背微微后仰，曲翘的腿弯往下是脚尖与地面之间的似点非点，像只人偶一样身无寸骨，娇小粉白。屋子只有一间，不大，我们相距不远，她比我有动静些，转椅会时不时转起，悠悠地，降下的车窗一般，我看过去，觉得屋子再大一些，她就未必有这样好看了。椅子转得快的时候，她会笑出声或是发出感叹，过来给我看短视频，门类较杂，有段子，奇人，也有美食，有的很无趣，我还是会给出好的反馈。偶尔一起出去，话会多一些，但也只是聊些目之所及的东西，街景，或路人，不通往过去，不连接未来，跟当下也没什么关系，散散漫漫，不过是随口一提。

又过了些日子，我到家时，王晓莹总是在。有时我会出去找她，陪她一会，更多时

候只是打个电话。她总觉得房子小，屋里的一切都黏腻到停滞，所以下班不愿回家，更乐意在外面待着。其实我们已经换了大房子，两室一厅，但换之前彼此都预见到，不会有作用。红城大，住久了倒也是小的，谁也没办法。开始时是我陪她到外面去，她到家比我早一些，愿意等我和她同去，我们乘车，逛得远一些，会说些热闹话，后来渐渐逛得近了，改为徒步，远近全在王晓莹，我只作陪，却也是干陪了，不论停走坐看，话都少得可怜。

我给王晓莹打电话更像是一种礼貌，简短，甚至敷衍，注意安全，早点回来。王晓莹会说让我先睡，不必等她。我虽不出去陪她，却习惯了等她回来再睡。那段时间，我和王晓莹各居一室，起因是我身上有香水味，是既庸俗又腻歪的那种，她闻了不舒服。她不舒服的表现是失眠，头几晚，还未分居时，我躺在她身边，根据她的气息小心地翻动身体，当她肢体有了动作，我会低声问她渴不渴，我不愿她睡去。我想着她能踹我几脚，或是同我发火，这样我就能从她的失眠里建立起别的内容，哪怕只有一小部分。

没有，整个失眠与整个的夜晚都属于她。她静着失眠，闭着眼或睁着，钩瞌睡虫发呆又或是想事情，也恼火地失眠，冷不丁捶床或是骂一句，然后起床去地上走几圈或坐一阵，不论哪种，都与我无关，这我感觉得到，也早就猜得出，她的对手从来都只是她自己。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希望虽然落空，倒也并不十分在意，由含混不明的思绪所促使出来的搅扰更像是一个恶作剧，为了解闷。

那段时间我确实在跟一个女人腻歪。之所以不说交往，是因为我们都有另一半，王晓莹算不算我的另一半有待商榷，杨红桃有另一半却是板上钉钉。杨红桃三十六岁，保定人，丈夫在保定鞋厂做普工，俩人一直没有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原因，试过偏方，没用，去医院查，丈夫不去，所以就成了她的问题。图耳根子清净，她独身来到红城，三年来做过导购员，发过传单，后来买了个营养师的证，做起了儿童餐，在我们幼儿园工作，负责餐食。我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中巴车上，她本不在接送之列，关系稍微熟了后问我下班能不能搭个便车，我问她住哪，她挺不好意思地笑笑，我知道不近，却也更不好拒绝。她这个人爱说爱笑，爱吃零食，关系更熟了些后，喜欢动手动脚，也经常塞给我一些薯片果冻之类的东西。或许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但难免不使我怀疑她对我有好感，一旦生出这样的念头，哪怕只是捕风捉影，接触时的状态和气氛仍是微妙了起来。俗世男女在这方面的感知力无需多言，一来二去，我们就腻歪在了一起。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她很紧张，甚至是自卑，我把她抱到后面横排座位上，她钳制住我的手，反复跟我说，她三十六岁了，不懂保养，身材走样了。我执意进取，她就闭上了眼睛，把脸转向一侧。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拿不出手了，甚至是亏待了我。发生关系后，她还怕自己耽误了我，叮嘱我不要把她当回事，让我跟女友好好相处，该结婚尽快结婚。或许她也发觉自己这些话很莫名其妙很愚蠢，又摆手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真的，我脑子很乱。

回家晚的那些天，我都跟杨红桃在一起。杨红桃喜欢在家做饭，她会拉着我去市场或超市购买食材，给我讲解它们的好坏及功效特点，不限于正在选购的，还有看到的、联想到的。也讲食材搭配、烹饪方法，她说食材要相辅相成，还说一个不会用糖和醋的厨师一定不是个好厨师，又说起几条做菜口诀，比如要想甜，加点盐，她说现在二把刀厨师太多，糖醋里脊梅子小排等酸甜口菜品里盐的底味没给够甚至是一点不给，出来的甜酸口很虚浮。有时说到得意处，她戛然而止，嘱咐我说，你听听就行，别跟别人显摆去，笑一笑说，我也是个二把刀，都是自己瞎琢磨的。接着又说，什么事都怕琢磨是不是，有的厨子他就不琢磨，那能行吗。就又来了兴致，我本来不是很喜欢听这些，但每到她讲起，也尽量不去扫她的兴。她说起过苦瓜，说它不但清火，还是菜中君子，与别的食材同炒，不会窜味，我觉得自己便是学了这苦瓜。她有时觉察出我对她所讲的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就跟我说，别不知福啊，幼儿园里的人问我我都嫌烦呢，不愿跟他们讲，包括做饭也是，杨红桃告诉我，我们在一起之前，她很少在家做饭，偶尔做也是对付一口，说在幼儿园天天给人家做，做烦了，到自己了哪还有那个心情。我从杨红桃家里离开时，她偶尔会说，把今天的菜回去给她做做。看上去跟闲聊一样，我不确定里面有沒有别的意思，也懒得去想，或许她也不清楚。她问起过王晓莹，没提到的，只是想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我给她看手机里的照片，是转椅里的王晓莹，杨红桃接过去凑近看了，又拉远些，抬眼问我，刚洗过澡？我说不记得了。杨红桃说肯定是要么就是喝了酒，红酒吧，应该是红酒，我没说话。她又看了一眼，点点头，把手机递回来说，皮肤真好，模样也好，能去演白雪公主了。就是胸有点小。她笑了说。那之后，我们在一起时，她总有意无意试图展现自己的胸部魅力，我故作不觉，等她问起，才夸上几句。我不喜欢大胸，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会坚定地认为天下所有男人都喜欢女人有一对大胸，在这点上她的得意是不加掩饰的，她总说，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你跟我在一起图什么啊。有时杨红桃问我。我答不出来，杨红桃就替我答，图个新鲜样子呗，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不知道我跟王晓莹具体怎么回事，还以为我们是恋人，顺利的话，将来会结婚。王晓莹闻见香水的事我跟她说过后，她有些慌，问我有没有事，怎么办，还说以后别在一起了，我说没事，应付过去了，你以后别喷香水就行，她说就喷了这么几天，可能喷多了，以后咱们可得小心。她即刻找齐那几天穿过的衣服，包括穿在身上的那一套，统统洗过后，仍感觉有残留的香水味，犹豫过后，还是把它们全扔了，连带着那瓶香水，回来后一跺脚，进去洗澡，出来又扔掉一套。杨红桃说，不能让这种事干扰到我们各自的生活，她认为自己天高皇帝远，问题不大，主要是我，一定要谨慎行事。她甚至要为我起草一份规则，包括约会频率，通联暗号等，但在我看来，该谨慎的是她。她丈夫总是打来电话查岗，不明着来，先嘘寒问暖，谈几句家事，后在生活和工作中反复穿插问询，以抽丝剥茧、探究脉络，再根据发现的疑点和矛盾之处进行委婉盘问，一天没事跟精神病似的，烦死人，这都是杨红桃总结出来的。有几次我们正做着，电话就来了，杨红桃让我不要出声，自己套了衣服，下床到卫生间或门口接电话，有一次我跟下床拦住她，被她挠了一把，我不松手，跟她磨蹭，让她到床上去接，她说，有病你。死活不肯。后来有一次，她在门口接了电话我跟出去，她眉头扭曲着向我示意，大概是要我离开或是不要胡闹，我跟她比划个嘘，把她拉进屋里，她边通话边格挡躲避，幅度和力量不是很大，可能由于分心，动作也时断时续，很快被我拖到床边坐下来，我跟她比划个嘘，半蹲在她身前，像在表演，或是示范，轻缓

地伸出手，去向她的胸，她把手护在那里，向我皱眉，我把住她的手腕，匀称着劲把她推仰在床，俯身上去，用另一只手去摸，我听到她跟她丈夫说要挂电话，那边像是不同意，杨红桃讲话声音变大了一些，我以此为掩护，动作大起来，野着揉了几大把，把手从薄毛衫下摆探进去，借助胳膊向上一撑，没防住她会有那样大的力气，突然坐挺起来，几乎将我掀翻，对着电话，她大声说，问啊，你问，是不是不相信我，怀疑我偷人，我就那么贼，是不是，是不是？那边说了什么，她又喊，不放心就把我锁起来，一辈子别让我见人。挂了电话，她看我一眼，喘着气即刻又拨过去说，对，偷了，我就是偷了，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现在我就偷着呢，有本事你就来捉奸，我等着你，不来你都是孙子。挂了电话，她把手机照我一扔，问，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手机打在左胳膊，靠近肌肉那里一跳一跳地疼，像在奏乐，渐渐我感觉它跟上了心脏的跳动，当这一点得到了确认，它又消失不见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又不能站在那，挪了挪脚，我去了趟卫生间，出来看她还在床上坐着，我说你说的都是气话，然后把手机捡起来放在桌上，离开了。

那之后有五六天我们没有联系，后来她又来搭便车，我们在车上做了一次，又恢复到从前。杨红桃主动说起那次的事，她说上次发过火后，她丈夫表示以后会相信她，最近收敛很多，不总来电话了，但不知怎么回事，她开始有点心疼他。她问我的看法，我说你丈夫只是嘴上信，她说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心疼他啊。我跟她说，你丈夫是个好人，你也是好人，我也是。她笑了说，咱俩不是，咱俩是一对快活的狗男女呀。

通常是在下班前，杨红桃会问我方不方便，她问了我就说方便，晚上便会跟她在一起，有时候回去得比王晓莹还要晚。自分居以来，我跟王晓莹好几天打不了一次照面，那次凌晨回去，客厅黑着灯，她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直到我打开灯出现在她面前，她都没有停下。我仔细去听，从她嘴里出来的那些既轻快又含混不清的话语是古诗词，大多我都听过。我叫她几声，在她眼前晃晃手，又打个响指，她还是没有停下，语调越来越急，声音越来越浊，她梗着脖子，脑袋前探，像要站起来，又似乎是倒下去，是在紧着一口气用，把它用尽。我知道她在发癔症，去推她，发现触碰不到她的身体，像是穿越了一道人影。终于，她把最后一丝气息耗竭，嘴巴张了几张，像岸上的鱼，也像干呕的人，紧接着上身升扩，气息回复。她呼出一口气说，你知道吗，小时候我一口气能背二十首。我说，你肺活量好，我就不行。她说，不是肺活量，是会背多少首。那时候没头脑，也没有自己的感受，都是附在别人身上的，谁夸你什么，你就把那个当方向，就想去那么做。不过快乐挺简单的，也真实。后来自己有了想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有了冲突了，知道吧，耗下去特别没意思。想来想去，人有时候要顾自己，就顾不了别人了，就这么回事，你说对吧。

那天王晓莹跟我说，她得离开红城了，我说我知道。我问她什么时候，去哪，她说还不知道，应该快了。我说什么时候走告诉我，我随时。王晓莹说你不是谈着恋爱呢吗，我说没有，是有夫之妇，王晓莹说那也不想再麻烦你了。她说本来这都是她一个人的事，只是她这个人胆小惯了，迈不出步，是我陪她开了头，挺感谢我的。我说别这么说，我也没做什么，她朝我笑笑，说有点困了，让我抱她上床睡觉。

头枕右臂，我横抱起她，比想象里得轻，但我发现失眠那段日子里她胖了，脸颊有点嘟，下巴圆润了些，嘴唇，一直没变，脖颈处有一颗痣，我一直记得，只是记不清在哪边，现在知道了，左边，那时的她，彻底与我记忆中的样子重叠了起来。

我在小学时就见过王晓莹，时常会去留意她，不过我们并不认识。她比我低一个年级，我是在五年级时注意到她，那时候王晓莹很文静，下课不常出来，偶尔出来也是安静地站在一旁看其他孩子们玩闹，我觉得她这么做很对，因为那会弄乱了她。她看上去像位小公主。吃相尤其雅气，我喜欢看她吃雪糕，嘴巴仿佛不是在进食，而是亲抚。后来在其他同学的称呼中，我知道了她的名字，王晓莹。

与她重名的人不少，我再次见到这个名字与她配在一起，是十八年后在驾校了。她属于最笨的那一类学员，学车就算不需要天分，也得敢开，她不敢，听她之前的教练形容，起步就跟要她的命一样。她才上了我指给她的教练车，教过她的教练就过来跟我打趣，说轮到她，你但凡能让她把车动一下，就是奇迹。这位教练后来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的指导下，奇迹有了，王晓莹不但敢起步，还爱上了踩油门，科目二不需要学员踩油门，但这已经不能满足王晓莹了，因为不踩油门碰撞力度不大，她那时迷上了驾车撞墙，成为场地破坏者。这是后面几次的事了，前面几次她还只沉浸在场地飞驰的快感当中。教过她的教练对我怎么把她调教出来很感兴趣，几次问我，我都说无师自通。确实如此。王晓莹第一次跟我学车时，很抱歉地请我不要催她，她说怎么操作她都已仔细背熟，只要做好心理准备就能开始，过了十分钟，她仍没有做好准备，同车里的三个学员已经窃笑了好几轮，我问王晓莹在怕什么，王晓莹说她也不知道，我说怕撞到人，怕出事故，还是怕人笑话，王晓莹说她真的不知道，我说你放心，都是来这里学车，谁也不用笑话谁，我这边有刹车，不论你开成什么样都不会出事，不要有负担，王晓莹说别说了你别说了，今天不行，我下次再来吧。她下车走了，第二天再来，她就告诉我，想清楚了，之所以怕，是还没有把车开起来，开起来就不怕了，到她上车，果然就把车开起来了。说王晓莹驾车在场地飞驰，其实是相对于，更像是一种错觉，因为别的车都很慢，但后来的撞墙却是真的，当然也不是那种车毁人亡的撞法，更像是一个游戏，称之为游戏，意思是就算再狂野，大多也还是有个度，总不至于自绝于世。王晓莹觉得这么做很美妙，她告诉我，做这些时血液在流动，平常时候，她的血液凝滞在体内，常感到自己是一坨冻，里面是血冻，血是暗的，黑紫黑紫，外面是肉冻，肉是白的，浮肿浮肿的白，最外面还裹着层将化未化的油脂，又黄又胶，黏腻得令人作呕。王晓莹这样练车当然是不合适的，尽管她每次认错态度良好，并主动承担所有维修费用，驾校方还是和王晓莹进行了交涉，退她学费，请她去其它驾校报考，可由我校负责报名费用。后来王晓莹再联系我，就是一年半以后的事了。

王晓莹离开红城之前是有预兆的，是指那天夜里的事，是那之后又过了大概半个月，她告诉我她认识了一位说唱歌手。王晓莹不再到街上独逛了，也不再失眠了，有几次还彻夜未归，她找到了她的药。那位歌手，后来我见过他，是位年轻人，很精神，很瘦，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他找到我，向我打探王晓莹的下落，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王晓莹离开了红城，她给我留下了一条短信，没有别的内容，只是说

她走了。说唱歌手气馁了一阵，向我询问关于王晓莹的更多消息，他反复强调自己不能没有她，持续向我哭诉，仿佛是我把王晓莹藏了起来，控制了起来，不让他们相见。他告诉我电器城做商演活动时，他本不是预定歌手，全因一位歌手朋友出了车祸，他临时被叫去顶位，这才认识了王晓莹，王晓莹很欣赏他，主动和他搭讪，他们相处得很愉快，而且已经约定好了，一路说唱，一路环游世界，他为她写了好几首歌，还没有唱给她听，假如找不到她，他活着将毫无意义。这些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无非是天意和缘分，以及痴情一片，带着那个年纪特有的真挚，倒不使人感到肉麻与反感，但我也无法帮助他，只有劝他接受现实。他告诉我，他不能接受，他会继续找下去，天涯海角，山南地北，终有一天，会把王晓莹找到，那时候王晓莹会跟他说，你怎么才来呀。对于他的美好愿景，我表达了祝福，我告诉他，王晓莹确实跟我提起过，在她离开红城的前三天，说要同他一起远行，但如今，她自己离开了，那就是不需要别人了，我们应该为她感到开心，也许有一天，也许会来得更快，她自己又回来了。他应该是把我认做了情敌，所以我的话使他产生了一些优越感，在对爱情的真诚与投入上面，他自认可以俯视我，神态里的不能苟同与嘲讽昭然若揭，仿佛这就是他自己理解的能够把王晓莹从我身边夺走的重要原因，而现在，王晓莹只是在和我们开一个玩笑，又或是一个考验，毫无疑问，他将是胜利者，就算那不是个玩笑，他的态度和行为也终将证明什么是情比金坚，不论怎样，他都将是远胜于我的存在，为了避免引起他的误解，我只在心里说，多好的年轻人啊。临走时，这位年轻人给我留下手机号码，让我有王晓莹的消息就告诉他，我说，一定，我又说，你给她写的歌，可以听听吗。他看着我，像要哭了样抽搐一下，把手一摆说，都什么时候了。就这么走了。王晓莹离开红城的事，杨红桃不知道，不是我有意隐瞒，是她没问，我也没必要提。后来等到杨红桃谈起，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她正在床上拆一袋薯片，问我每天回去那么晚王晓莹不会起疑心吧，我就告诉了她，说已经分手了，她把薯片放在一边，迟疑了下，又拿在手里，问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说没有，是三观不合，经两人友好协商，好聚好散。杨红桃哦了一声，干坐在那，好半天没说话。夜里我要走的时候，杨红桃留我，要给我做宵夜。那些天她已经不在家做饭了，我们大多出去吃，饭后随便在周边逛逛，不出去时就点外卖，买些零食，下一个电影看看，每天晚上我还是会回家，从没在她那里过夜，杨红桃没留过我，我也从没提过。那天吃过宵夜，杨红桃说，怎么说分就分呢，我是说，她有没有说因为什么。我有时候挺反感她那种隐约试探的心思，就说，不用多心，跟你没关系。她说，我就是问问，觉得可惜，你们在一起几年了啊。我说，分都分了，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杨红桃哦了声，就又不说话了。过了会她笑了说，你也不早说，我都不知道，就是我老公最近早上总爱打视频，要不然你晚上住这回去多方便。我说，不早了，我走了。她拉我一把，急什么啊，现在又不是早上，你，想不想？完了再走。我说，明天吧，今天有点累。她挽着我的胳膊把我送到楼下，楼梯并不很宽，又是第一次这样往下走，感觉有些费劲，好在只有三层，不然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够成全她。分开的时候她跟我说，没事，好姑娘多的是，你找着，我也给你留意留意。

第二天杨红桃没联系我，我也就没联系她。过了有一个多星期吧，她在微信给我发消息，问我在忙什么，我们就又在一起了。有时我会留在她那里过夜，她只有一床被子，一个枕头，因为她丈夫喜欢开视频的关系，不便再去置备，担心下次忘记收拾或收拾不及解释不清，所以我们都是睡在一个被窝里。有一次夜里，我睡熟了，无意间抢了她的被子，她将我踹醒，自己把被子全部卷走，那时候已经供暖，暖气烧得不好，夜里虽不至于很冷，但也绝不舒适，我重新穿起衣服睡了一晚。第二天醒来她问我睡觉怎么不脱衣服，我还没说话，她突然笑出声，笑了好一阵子，说她想起来了，卷走被子本来是想冻我一回再说，结果她很快就又睡着了。见她这样，我心里像是被鸟羽扫过一下，不是痒，是一种轻，不是轻盈的轻，是什么我说不好，只是觉得，我与这样的日子有了轻微的一个联动，在那一瞬间，我想，我愿意接受甚至是渴求它，接下来的日子未必会一直是现在这样，很大程度上要糟糕一些，但所有糟糕的样子，我都能想到，就算这样，我仍愿意与它发生联系。杨红桃问我怎么不说话，是不是生气了。我问杨红桃，你有没有想过离婚，嫁给我，咱们一起过日子。

杨红桃像是受到了惊吓，嘴巴张了张，冒出一个嗝，她看了看我，静默片刻，开始来开导我。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想说自己只是一时脑热，让她不必当真，又厌恶自己这样，最后我说，你想想吧。

后来杨红桃向我确认，问我那天的话是不是认真的，我那时已经没有了那份殷切的向往，当意识到自己是这样一种可有可无的心思后，我又觉得自己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应当给予她一个高程度的肯定，我那样做了，并告诉她我已申请了离职，等批下来，就回怀城去，希望离开之前她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离职当天，杨红桃约我去她那里，是傍晚。我过去的时候，她已经备好了食材，晚上连炖带焖做了一桌子菜。饭桌上她告诉我，过几天她老公要来红城看她。她一说老公这两个字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平常时候，她只是说他。晚饭后，杨红桃执意留我过夜，应她的要求，我们很早就上床了，她主动挑逗我，到我骑到她身上时，她跟我说，你轻点，别出声，说着看也不看，手臂回扣从枕头下面取出手机，朝我摇了摇说，千万别出声啊，我给他打电话，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说了句不用了，就下床穿衣服。杨红桃问怎么回事啊你，我说我也不知道，但你不用这样，就这样吧。

后半夜的火车，到怀城是清晨。夜里下过雪，车站外白茫茫一片，红色行李箱拖行其上，分外刺眼，仿佛蛇吐出的信子。早点铺外已有几分泥泞了，像搅浑了的老豆腐，我点了些东西，没怎么吃，坐了会，去往王晓莹家，准备把行李箱送过去。

这只红色行李箱，王晓莹离开红城时并没有把它带走，也没有做过任何交待，我打开了看，里面装着玩具，大小不一，样式不少，满满一箱，有小球汽车画板积木等，我仔细翻了，没什么特殊的，都挺普通常见，我想它们应该属于王晓莹她儿子。

五个月不见，王晓莹她妈妈变了些样子，门开了后，我见到了她的正面，脑袋不知怎么是歪起来的，我愿意把那理解成一种疑问或是敌对，但不是的，她试图将它摆正，因此显得更加怪异，像崖头梗着的斜松。她的态度依然不友善，朝我身后照几眼，干巴巴地问我来干什么，我表明了来意，她问我，她呢。我说，没有回来。她说，不回来她要干

什么，她在哪，你给她打电话，我要问问她。我说，不好意思阿姨，我现在也联系不到她。她说，联系不到？你们不是在一起吗。楼道下面有了一个男人和小孩说话的声音，她没好气地说，你先进来。进了屋她问，怎么回事，她人呢？我看了看她，试着跟她讲了我所认为的王晓莹，本以为她很难理解，没想到她听了只是点头，紧抿着嘴唇，一下一下，突然说，死在外面才好。她坐下，愣了会，抹起了泪，哭哭啼啼着跟我说，她觉得王晓莹是跟上了脏东西，因为她以前很懂事，根本不是这个样子。讲过几句，她利落地抹了脸，像在和我申诉了，从小到大都没亏待过她，我们条件还可以，就她一个孩子，都疼她，处处怕委屈了她。王晓莹的家庭，我多少了解一些，她妈妈是退休教师，她爸爸是骨科医生，很早就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主任，几年前劳累过度死在手术台上，当时还上了新闻，被立为楷模，要说家庭条件，确实还不错。说到了后面，她说，她是多好的日子，他们两口子，都在建设局，安安稳稳的，你说她怎么想的。她看看我，又说，她跟你，事是不光彩，但出了也就出了，我不是也答应了吗，她还有什么不满呢？说走就走，走就走，可她就不回来了吗？你说，她是不是鬼迷心窍？我看了看她，迟疑一下，点了点头。她说，让你见笑了。你说的我都明白，她跟我说过的，让我当没生养过她，这话一点道理都没有，但王晓莹这孩子的脾气我清楚，话出口了就是通知，不是商量，没得办法。

她摇了摇头，表示不说了。喝茶吗，她起身说。我说不喝了，这就走了。别急，你过来了怎么也得见见孩子，她看我一眼，说，跟你越长越像，我也不好再去解释。

她告诉我，前些日子感冒了，怕传染给孩子，就送到自己妹妹家里帮忙带着，感冒才好又开始头疼，知道不该吹凉风，可供暖后总觉得心里燥得慌，夜里睡觉窗子留了条缝，醒来脖子就成了那样。她觉得是中风，医生说是落枕，两种都治了治，还没见好。

她去接孩子，让我在家里等一会，我想说不用麻烦了，话到嘴边又改了口，说改天吧。

她说你不想看看你儿子吗，都会爬了，大样着呢，我笑着说，好，看看。

孩子回来就在王晓莹她妈妈怀里哭，王晓莹她妈妈哄他说，不哭了不哭了，你看谁来啦，我就上去逗逗他，没一点用，小孩子哭起来挤着眼谁也不看，哄了一阵哄不依，她说那边一定没给孩子按时喂奶，到底不是自己的。她去冲奶粉，让我照看孩子，刚放下，哭声就大起来，两条小腿乱蹬，接下来把我吓坏了，像哭断了气，小腿绷得紧紧的，脸皮似乎也紫了，急得我连忙喊她。她到底是比我经验多些，过来时孩子已经接上了哭声，知道怎么回事后，她说，孩子淘，没事，我却不敢再让她去冲奶粉了。

按她告诉我的方法和比例冲好了奶粉，孩子却不吃，仍是哭，我以为自己冲得不对，就说再去冲一次，她说，玩具呢，你不是带了玩具吗，拿出来。

玩具拿过来真就不哭了。她得意地跟我说，什么都知道，你瞧，他什么都知道。又跟孩子说，知道是妈妈买的玩具，是不是呀，是不是呀。她用自己的脸去亲昵孩子的脸，一老一嫩两张面孔蹭在一起，嫩的那张仿佛斜松上抽出的新枝，娇弱但是蓬勃，老的那张由于脖子的歪，显出一些别扭和勉强，似乎在这一途中受到什么阻拦，虽勉力抵达，仍随时有被中断的风险。她跟我说，你抱抱他，我抱过了他，并不哭。她说，像吧。我说，像。然后去看，并不像。待到细看，又有些像了。

抱了一会，把他放到床上，嘿，嘿，我拿着玩具朝他吆喝，他笑了，胳膊腿乱蹬。嘿，嘿，我又吆喝，他就又笑了，翻过身来，爬蹭着。王晓莹她妈也笑了。我看看她，她说，叫名字，有小名的。她说了两个叠字，我说，辉辉？她说，不是辉，又摆了手说，叫吧，怎么叫都行，我瞎起的。

一直玩到了下午两点，他都没有再闹脾气，也没有睡觉的意思，奶瓶总是叼几嘴就放了去，一心顾着去玩。追着哄着总算喂完了奶，王晓莹她妈竖抱起他，鼓着手轻叩他的背，到他打出几个嗝，她放下他，说玩去吧，又跟我说，今天可是玩好了。我觉得这都是玩具的功劳，王晓莹她妈说主要还是跟你亲，他知道你是谁，不信你问问他。我笑了笑，见她仍在示意，我朝他张手，他笑着撑起两臂，昂了下头，随即低下去，加速向我爬来，到近前时我顺势将他抱起，在地上兜了一个圈，再用脸去蹭他的脸，他笑得更欢了。口水笑出很多，蹭在我脸上，凉凉的，滑滑的，一点都不惹人厌。我跟王晓莹她妈说，孩子我带着吧。

也没多说什么，她看了看我，像是要叹气又像是要说话，接着把头转向窗外，手里摆弄着一辆小摩托车，最后说，也好。

你是他爸爸。她又说。她担心我不能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我笑了笑，请她放心，我说，我是他爸爸。我答应她会经常带孩子过来，她点点头，伸出手来接孩子，双臂颤着，像得了病。刚抱过去了看，又交给我，说要去收拾东西。哽咽着去了。

抱着孩子下楼时，雪正在消融，地面显出的泥泞让我感到踏实。什么结果都不重要了。之前我想过，王晓莹也许不久就会回来，杨红桃也许很快就会给我打电话，我把自己交付给这些可能，如微尘细沙，停停走走，风来了便随它的意，或东或西，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也将开始，我虽不是巨石，但至少是颗小石头了，可以稳稳地落在地上。看着怀里的孩子，红孩儿，我想，不错的名字。



庆宇

写东西的人。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Kristaps Ungurs](#) on Unsplash

小说

滑坡体

森目 | 24 小时文学聚会

只要扇子坡不滑落，
我的痛苦就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

新世纪已过去十年，我才在长江边认识了女人。那时我刚到贵州县没几天，住在码头边叫“临江仙”的小破旅馆里，没事就看向窗外，望着雨雾笼罩的江面出神。港口没什么好耍的，消落带上荒草没膝，只要下雨，平台就泥泞不堪。出港航大楼，马路斜对面，铁艺墙圈着个海盗船，孤零零的，彩漆剥落露出斑斑锈迹，像上世纪遗物，缓慢地摇上去，又摇落来。转过身，伴随着嘎吱声，我和女人开始用彼此的身体做梦：我梦见一尾粘腻，潮湿，丰满的鱼，她梦见毕剥作响，看似坚硬炽热，实际脆弱的火炭，都想把对方包裹，却都被对方缠住……

待沸水平静下来，忽然醒起，等等，我到这做什么来着？当然不是为眼前这女人，这微微响着鼾声的丰白女人，而是为了沙美，为了多见她一面。她是导师的女儿，小我几岁，工业设计大三生，手脚修长，眉眼细细的，留着俏皮的短发，看上去和我差不多高。某天傍晚，在学校草坪上，她曲起腿，说别看她瘦却有肉，让我捏她大腿下侧的“赘肉”。起先我有一丝犹豫，后来，天光黯淡下去，行人渐少，便伸手去捏了，软软的，从此就喜欢上她。可她总说忘不掉前男友，让我不要着急，等她忘掉再说。到时就跟我谈朋友？我问。说咯到时再说，莫急撤。我说我到底什么不好？沙美说，也没什么不好，就感觉差别有点大。说完沙美站起身来，扯扯热裤上的褶皱，向远处模糊的灯光走去。之后有半年，我都没法进一步缩短两人的距离，几次尝试之后，感到有点疲乏。我本不想来这长江边上的小码头，但听说她求了她爸，要跟来玩几天，游游白帝城、神女峰，便鼓起余勇，央求同门和我换了项目，跟师兄到了这鬼地方。

师兄讲，我们是来打桩的。看到了吗，他眯缝着眼，望向旁边一栋毛坯大楼顶部说，这些建筑，还有那些小民房，跟你说，全在这扇子坡滑体上，520 万方，大吧？三峡水库不要蓄水吗，蓄到平台这个 175m 黄海高程，这反复升降、长期浸泡作用下，滑体上建筑的桩基还顶得住？我说，难怪要搞两根试桩，原来是评估承载力。师兄说，我们现在就在滑体上。我用力跺跺脚，试图撼动脚下的滑体——它当然纹丝不动。我又问，520 万方好像很大，你去过这滑坡体的边缘吗？师兄说，没去过，改天带你去。我说，这些楼房新崭新的，他们不怕死？师兄说，我们只管弄个结论丢给港航局，管其他干什么？我想想也是，便不再追问。

后来，我听说半个贵州都在扇子坡上，本来坡大人稀，经一期整治后，地方误以为地质大灾害已解决，不等二期整治开始，就悄悄摸摸引资，大搞项目，三年不到，建筑面积翻了一番，居民竟由一千不到增至五千多。没等师兄带我去滑坡体的边缘，我就走出临江仙找了起来。在一小片马刀林的提示下，我发现了路面翻修的痕迹。我知道自己找到了滑体边缘，一道无限延展的裂隙，尽管看不见这道狭长的伤口（它已经被掩藏起来，也肯定灌了水泥砂浆让它愈合），可我知道它就在我的脚下，在湿漉漉的黑色沥青路面以下，热烘烘地散发腥味。夜晚，我爬上临江仙的天台，轻

松地拉开门（插销的锁形同虚设，扣眼根本没上螺丝），置身在湿润的凉风中，身前江水奔腾，身后密集着几个被灯光涂亮的窗户。五千多人和我一起站在这个巨型滑块上，我想，如果我们同时跳起来，再猛烈地撞击地面，会发生什么？当然什么也不会发生，尽管我希望它发生。

你讲我们在半个贵州县辣么大的土块块上，而且这土块块还可以滑动？女人睁开了眼睛。我说，差不多吧。女人吸吸鼻子，神了个大奇。又问，那啷个办？我摇摇头，不好办，我们抓紧多见几次，说不定哪日就塌落去了。你个哈瓜，女人盯着我说，不就想多弄几次嘛。我笑了起来。才两次，和女人就十分熟了，原先拘谨着，捏腔拿调讲普通话，现在不自觉放出贵州口音。我幸亏在成都已呆足六年，贵州话属于川渝话语系，听懂不成问题。嗯，你怎么不肯讲你叫什么？我一边问，一边拿起床头柜上的束发带，递给正坐床边穿鞋的她。有么子好讲，她低垂着头，拉上白色运动鞋的后跟，抬起头来，一边接过带子扎头发，一边说，野女子一个。我说，不讲也行，我随便给你起一个。别，她刮我一眼，叫我，叫我秦——娜拉就好。我问，真名？她说，不信就算了哈。我又问她要刚才给我看的照片，那上面她抱着一个小孩，小孩正把圆乎乎的手整个吞进口里，她告诉我那是她女儿。

我送女人去坐“麻木”，师傅是个满脸胡渣的黑瘦老头，狐疑地盯住我们。秦娜拉不由低下头去。她已经三十出头，而我读书早，虽已研一，也不过二十一岁，又长了张娃娃脸，两人走在一起，活像中学老师跟学生。秦娜拉坐了进去，我也想钻上三轮，却被她推了出来，不送了你哦。我笑笑，好好好。等“麻木”噔噔噔地开起走，我下意识地跟跑了一小段，直到秦娜拉掀开帘子，探头出来，狠狠地剜了我几眼。我转过身，朝码头走去，经过港航二号楼时，周围已经暗了下来，我看到窗玻璃都被拆走了，才想起，师兄提到过，水位提升到 175m 高程，这栋楼会被淹没。我和秦娜拉就是在这栋楼的门洞里遇见的，当时她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倚靠在墙上，行人路过，她偶尔投以一瞥，嘴里叼着一根未燃的烟。我不抽烟，但兜里常备一个火机，便掏了出来给她点上，就那样搭上了话。现在，我慢慢转过每一个拐角，目光穿过空荡荡的房间，然后上到顶楼，在那里寻到个发霉的劣质床垫，当中有凹陷，左长右短，像两个人躺上去留下的，永远也弹不回去了。两个皱巴巴的纸杯，几只过滤嘴，还有大罐可乐空瓶，走到床垫前，我俯身吹去落尘浮土，拿一小半屁股坐上去，望着眼前烟雾四起的三峡，峡谷里似传来熟悉的呼唤声，遥远而微弱，我眼眶忽然酸热。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晃过秦娜拉白皙冰凉的身子，还有那已堆积些许脂肪的柔腹。我站起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手机响起，是师兄叫我去吃饭，他说，沙美来了，你还不快点。我“哦”了一声，下了楼，向临江仙走去。沙美已经在二楼餐厅落座，靠着暗绿色铝合金窗，正徒劳地从肮脏的玻璃后面捕捉风景。我没有立时走近，定在门口默默观察。师兄从另一侧出现，边走边用纸擦手，沙美扭头看到他，马上站起来喊，师兄快来，上个厕所都那么久哦。师兄说，你不晓得，这厕所好隐蔽的。沙美招手，我好像看到三峡，雾蒙蒙的，你快来看是不是。师兄摇头，这个角度看不到。沙美说，不管，你今晚要陪我吃好吃的，还要看三峡。这时我手肘被猛碰了一下，回头看是送菜进来的小哥，我忙不迭地说不好意思，然后在沙美和师兄的注视中走过去。总算见到你了，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我答应着，说刚有点事，才来晚了。师兄说，什么事，该不会见哪个女孩去了吧。沙美含笑直视我，就是就是，快交待。我脸上发烫，嘴里却不认，没有的事，到这小城才几天，哪认得什么人。沙美说，以前听毕了业的师兄说，有些民工坏得很，你搞不好已经被带坏了。师兄说，好了，不说算了，罚他喝三杯再说。

预算有限，没点长江白鲢，只点了竹园腊子鸡，腊肉炒蒜薹，还有溜肥肠，洋芋粑粑等，几乎都是家常菜。饭后三人江边散步，看对岸层叠的山影上接滚滚的黑云，偶尔，归航的轮渡鸣响汽笛。沙美说，谁要听这个，我想听猿声。师兄说，不急，过两天我们去白帝城听。我忽然感到脸一凉，粘稠的雨丝飘落下来了。我们开始不紧不慢地往回走。沙美和师兄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试图走近他们，两人中间却没得缝隙可让我容身，又不想绕到旁边。沙美往前轻盈走着，双腿高光部位夜色中晃动。沙美不停地笑，偶尔拍打两下师兄。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笑得像雨水一样凉凉的。忽然，她转过头来说，啊呀这雨真讨厌，像要渗到身子里面去似的。目光仿佛穿过了我的身体，仿佛我是透明物般，一直投向了遥远的黑暗深处。

要开始准备打桩了，师兄说。已经是早晨，山林里咕嘟嘟涌出烟气，像谁在那里撒了巨量干冰。我应着，和他一起走向平台，踩着牛筋草、莎草进去，抵达一块泥泞的空地。那是几位工人开辟出来的，他们正蹲地上抽烟。师兄说，师傅，工具齐备了就开干吧，完成得越早越好，灌浆的晚上，就原地搭个棚子睡吧。为首的站起来答应着。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短发竖起，脸挺白，穿着 T 恤，和另几位麻木的师傅不同，那几位像随便从港口的棒棒堆里拉来的。我们要搞的是两根人工挖孔灌注桩，直径 0.9 米，长 18 米，打算一根不泡水，另一根泡水。我暗暗算了下，从挖孔、灌注成桩到强度达至实验要求，共要二十天左右。我想这很好，我可以多跟秦娜拉见几面。

秦娜拉发消息说，她在临江仙等我。原本，我跟师兄住一间房，我借口师兄打呼噜，要另开一间，师兄很纳闷，我从来不打呼噜。那似乎可看穿一切的锐利目光从镜片后射了过来。过了片刻，他脸露笑容，去加了一间房。工人已经干了很久，不管是阴天，汗水还是湿透了衣服，有几个已经解下了衣衫丢在一侧，工头却仍然装着齐整。我跟师兄说，想回去一趟，下午再来替他，午饭自己解决，不跟他们在工地吃盒饭了，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女人却不在，我找了一圈，连浴室的门口也看了——顺便洗了个澡躺在床上，想着沙美不知道起床没，但愿不会过来找我，不过她知道我们要去工地的——万一来找，我也假装不在。想着想着，睡意沿着四肢爬上脑袋。斯拉拉滴。门响，有人进来了，关上门，慢慢走近我。秦娜拉的声音响起，大白天的睡么子？我眯着眼，循着声，伸手去抓她，却抓了个空。我的爪子在空中凝了半天，突然挤入一个鼓胀的肉包。

好了，我走了哦，改日再来找你打桩。秦娜拉留下这一句就不见了。窗外，雨下了起来。

我躺着没动，好像还处于悠长的贤者时间。我想起刚刚的自己，不晓得为什么说了那么多话。那两瓶“青岛”我平日喝水一样喝，今天不知为什么灌进去就有点儿飘。我说起了滑坡体。扇子坡，好大，快要滑下来了，你要多来见我。我说起小时候，被我爹拿煤气罐的胶管，抽光溜溜的屁股。我说我好想陷进你的身体里。我还说起了上个工地，也是在水边，在湖南叫“星尘河”的河流底下，我有个朋友碰上隧道塌方，挂掉了。之前还有个同学，去中土海外公司，支援非洲高铁建设，不小心染疫也没了。我说，真搞不懂，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挂掉了，我不相信，我没去他们的丧礼。我摇着头，有时候盯着以前的合照，感觉他们没死，还活在某个地方，而死去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可笑吗？天啊你那里好白。我说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还说高考的时候，本来可以上华科大，后来不敢报，就来了四川的交大。我说我其实他妈的根本不喜欢这个破专业，谁要整天浑身泥巴钻工地啊。我说我喜欢了一个女孩，可是她不理我，于是我又喜欢另一个来代替她，可另一个还是不理我，于是我就知道怎么办了，你告诉我怎么办嘛，我最好的哥们儿死了，他在隧道底下很暗的，他又怕暗，好家伙我哭不出来，堵在喉咙里吐不出来样难受。我说啊说啊，言语流淌成河，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大概说得太多，秦娜拉有些尴尬，又有些不耐烦，却不忍心打断，所以赶快说要走，安慰我说下次再“打桩”。

你说的，我好多都不信。秦娜拉发来信息说。不，是一句也不信。她又加了一条。我翻身下床，凑去窗前寻她的身影，却没找到。把手机往被子一丢，穿了衣服，下去接替师兄。刚出宾馆门，雨就变大了，砸在水泥路上四处飞溅。秦娜拉好像没带伞，她怎么走的？她怎么能走得那么快。为什么她每次来都要下雨，像个雨神似的。想起来，我对她所知很少，只知道她有个娃儿丢给乡下公婆养，和老公出来讨生活——但这可能是编的，就好像她的名字可能是编的一样。秦——娜——拉，一个小地方的女人，不太会叫这种风格的名字，应该会叫“秦娜”，顶多是“秦娜娜”，但说不准，凡事都有例外嘛，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连日来同我做爱的，是一个雪白云朵般的女人。

半途撞到回来的师兄。雨太大了，还干个球。师兄说着，抹抹脸上的雨珠。工头和那几个“棒棒”也在后面跟着。一起往回走时，远远地，我好像看见秦娜拉的身影，在新港航楼的门洞底下，似乎在等什么人。师兄拍拍我肩膀，喂，看什么，沙美在叫我们呢。我转过头，看到沙美正坐在临江仙二楼餐厅，拍着窗户叫我们。正好饿了，我们就又上去和她吃了点。她却不怎么说话，一直低头划拉新买的iphone 4，好像是在做去白帝城的攻略。师兄和我说起他正在写小论文，针对扇子坡滑坡体的二期整治，准备翻译成英文投SCI。他拿筷子敲着白瓷茶杯说，这一期抛了那么多石头去江底压脚，效果不很明显，二期如果继续原方案，水下抛石加护坡加排水，那势必不可……我根本不想听他讲这些，我只是想，刚才秦娜拉看向我的目光，怎么好像不认得我。我又想，沙美要是知道，我和一个少妇这不同寻常的关系，会怎么看我。其实也无所谓，她原本也不怎么睬我，而且我什么都不在乎，赶紧让我毕业，混份工作，安稳地老死，“算球”。

我叹了口气，哎，这个月又快没钱了。沙美说，怎么会，国家不是每月都有补助吗，项目上每人每月一千五呢。师兄尴尬地咳嗽一下。我说，这钱到不了我们手。沙美说，那不是要你们学生卡去领的吗。我摇摇头，算了不说了。沙美说，我爸这么差劲？我说，哪有！沙老师经常请我们吃饭，去游玩也可找他报账，将来毕业还包推荐，还从不叫我们干家务，简直是绝顶好教授。沙美撅起嘴，改天我跟我爸说声，多发点钱，不能老这么剥削你们。我干笑两声，你千万别提。沙美说，不，要提，特别要提到你，说给你多发点。见我不作声，沙美又说，明天去白帝城吧。师兄说，明天下雨就去，不下雨要继续监工，看他们挖洞呢。第二日清晨，天虽然阴着脸，却到底没再往下淌水，于是我和师兄继续监工。沙美正好也有几篇课程论文要做，跟师兄伴闹了几下子，就躲房里敲键盘了。

秦娜拉又来找我“打桩”了。先前我几次叫她，她都不理，晾她几天，她却自己找来了。有次弄到一半，她忽然要走，挣不得脱，我死死箍住她，将那身丰满白肉压得扁扁的，从两侧溢出来。她哭，爪子嘛，用老娘身子手淫嗦。我大叫几声，瘫倒在旁边，喘着粗气。隔一会儿，她翻身坐上来，左右扇我两巴掌，扇得我舒服极了，我不由地赫赫赫地笑，笑声难听极了。她叫，给老娘硬起！我继续笑，我说，你不也一个球样嘛。她说，再笑老娘就拗断你。我说，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些事，其实我没感到多难过。我觉得都过去了。秦娜拉说，十七岁我就嫁人喽，没曾见你这样男娃，人不大，故事就有一筐筐。我说，我常常觉得自己狼心狗肺，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像朵云飘来荡去。她摸摸我的脸，碰到我你就下起雨了吧。我把手臂搁在额头上，哭了。她低声说，你以为你还是个细娃哦。我说不出话来，我想起前一夜，和工人喝酒，醉了，通体发热，出来乱走，不知怎么来到扇子坡边缘，就是上次发现的地方，可是水泥掩盖了裂缝。我不死心，找来找去，眼睛花糊了，终于在海盗船边找到一处裸露出来的缝隙，好奇怪，之前并未在这找到，倒好像特地为我张开似的。我趴下去，往那道长长的裂缝里呕吐，把我所有的心事和痛苦，腥臭不可闻的，黑绿黑绿的，稀里哗啦地吐进去，让他们渗落到最深处，埋藏起来。只要扇子坡不滑落，我的痛苦就永远不会大于天下。而这一夜，我似乎在秦娜拉身上也找见了这样一道缝隙，于是我也拼命往那道缝里灌注粘稠的痛苦，直到我突然感到反胃。我冲到马桶吐了。秦娜拉拿水给我漱口，我跟她说，秦姐，娜拉姐，对不起，让你看见我这么脏。秦娜拉说，瓜西西啊你。她拉我坐下，在冰凉的瓷砖上，她说起她十七岁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十六岁高一她爸就不让她念了，出去做纺织女工，不到半年给她找了婆家。她说，喏，就是现在这位，对我还不错，长得也算俊，只可惜我还想念书，拼了命地想，便不肯生娃，扛了好多年，一直盯着他做措施的嘛，不晓得被他耍了么子手段，愣是中招了，生了小毛头，我气得慌，丢回乡下养，跑出来跟他到处做工，其实也不做工，就闲在屋头抽烟看闲书，偶尔去茶馆书店耍耍，有几年我偷偷自考，过了三门了，最后一门被他发现，拦住我，说怕我学好了飞了，这鬼男人……

后悔吗？当然咯。她应着，下床，一脚站立，另一脚穿过黑色内裤的洞。可是得办法。她捡起床头柜的乳罩穿上，双手背过去系好搭扣。不过，也没法子认命啊。

她走到梳妆台，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却不再扎起来。她转过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说，你是不是一直想要离开这儿？她不言语，从床上起身，顺势拉上裙子。当然想咯。等到她穿好黑上衣，我识趣地递给她一根烟，帮着燃上，她凝望着窗外。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那群正在打桩的光膀子贵州男人们。我问，怎么了。秦娜拉说，那个年轻点的，穿“桩桩儿裤”的，就是我男人了。

第二天她也来了，接着又过了一天，平台上的桩孔挖得三分之一了，师傅们都说是土很软很好挖。这天夜里，秦娜拉来的时候不准我亮灯，但是后来我碰到她的嘴，她叫了下，开灯才见她嘴边青了一团，玉白大腿内侧也有瘀伤。我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你怕了？在我用棉签涂她的嘴唇时，她问我。我摇摇头，丢了棉签，手心捂住深色小瓶的口子，倒了点跌打药酒，整个摸上她腿，轻轻揉了起来。随着浓郁得刺鼻的气味散发出来，我们两人都似乎得了某种抚慰。我想跟你一起走，可以吗。忽然，她抓住我揉搓的手说道，用的普通话。我带着笑着她眼睛，然后慢慢地收起自己的笑容。那你孩子怎么办？她哼了一声，算喽，当我没提这事。我说，你要跟我走也可以，只是我项目还没做完，你要撑到那时候。秦娜拉说，算球啦，娃子，我们要学清白（懂事）点。过了会儿她起来穿衣要走，我说你不怕你老公再对付你？她噗嗤笑，逗你的，他还没发现，是他挖泥完没洗就强来，被我甩了一巴，他还手才弄的，他顶多有些疑心，绝对没发现。

日头总算蒸干了那些肉肉的乌云，沙美拉着师兄非要去游江听猿声，师兄又非要拉上我。我不想，可那穿“桩桩儿裤”的年青工头，似不经意地瞥了我几眼，我就赶紧答应了师兄。三人买票上了游艇，站在甲板上被风灌得说不出话，两岸的猿声也被刮跑，也可能猴子毛长怕热都去睡了。沙美指着两岸峭壁，喊这是什么地方，那又是什么地方。师兄在手机上打字给她看。其实沙美做过攻略，肯定都知道的。我远远地、静静地瞧着他们，偶尔师兄叫我的时候，我就挤出一丝笑容答应着，却并不挪动自己的双腿。到白帝城，发现城很小，当不起一个“城”的称号。导游说原来很大，蓄水后水面上升，淹没了好大部分台阶，是牺牲了一些气势，不过更容易爬上来了不是？下午回程途中，师兄和沙美兀自对着江水指点不休。我坐在对面，对参与他们的谈话没半点兴趣，只记得他们说，好半个古城都沉到江里去咯，好可惜，几千年的古城。下了船，我借口肚子不饿，回了房间，发现卫生间有秦娜拉来过的痕迹——梳齿上纠缠着几根长发。打开床头柜，果然在那里发现她用铅笔写的便条，上面有十一位数字。是为了安全新买的手机号吧。我没有打电话，而是躺在床上，双手垫在脑后，斜眼看窗外那条江，想象着如果扇子坡整个滑落去，能不能把江截断……不知多久，我迷迷糊糊地醒转，周围已经浮动着大量暗暝，我起床去敲师兄的门，想找他吃夜宵，却静悄悄的，再去敲沙美的门，也没人应。他们一起不知去了哪里，也许还躲在这里的某扇门背后？我在长长的甬道里走来走去，踩着那些破洞的地毯，捕捉每扇门后的动静。偶尔，我确实听到一些不明的窃窃私语，可很快就消失了。我的汗水啪嗒掉在地上，吓自己一跳。最后我走到了尽头，站在弧形玻璃窗前，拿出那张纸条，按亮手机，一个一个地点那些通往另一个女人的数字。

秦娜拉在电话里说，不如去坐坐海盗船吧。我问，夜里也开吗？她说开的，走吧。但我不明白，明明大门开着，为什么她却要爬那锈蚀的铁艺围墙，害我上衣被挂了一下。而且不管怎么进入，上船总要买票的。当我们坐上那嘎吱嘎吱的海盗船时，她叫我闭上眼，或者喊出来。我既没有闭上眼，也没有喊出来。秦娜拉闭着眼大喊：我——要——离——开——我——离——不——开——。我对着一次次撞过来的夜空，感到心里一阵阵发紧。多少次，你以为你已经滑到了谷底，即将上升了，不想到了高点，又开始滑落下来，而且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感到五脏六腑都晃碎了。下来时秦娜拉笑我，看你个蜡枪头，脸都憋得紫黑紫黑的，你怎么不喊哇？我说，实在不知道喊什么。

洞快挖好了，师兄说，要治理滑坡，首先得正视它，知道实际的困难在哪里，又要有信心一定治服它。师兄说完这些话，我就知道师兄永远是师兄，操作是我，只会从如何刷方减载，或坡脚反压，又或做挡土墙，同时做好排水之类的谈起。师兄又说，一期抛石护坡现在看来效果不行，所以他们创新了一个什么“置换阻滑键”的技术，只在另一个长江小县城用过。我说，哦。师兄瞟了我一眼，面向滑坡体，伸出手指点了三下说，分三级台阶，横向打三个施工主洞，再打几十个平洞，定位滑带点位，打百多个竖井，洞并全部置换为钢筋水泥，最后回填主洞，形成一个整体的阻滑结构，牢牢地把滑坡体拦在原位……我说，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师兄说，我有个本科同学是长江院的，搞了这个施工图设计，我来之前跟他聊了好几次呢，放心，滑不下去了。我哦了一声，心中却知道，那些一期治理后，已经滑落的位移再也恢复不了，正如那些马刀树永远存在。我又问师兄，沙美呢，昨晚你们去了哪儿。师兄说，没去哪儿，就看了场电影。我说，什么电影？师兄笑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牙齿很白，但有几颗很尖。师兄说，就是普通爱情片。我狐疑地盯着师兄——这位导师跟前最红的弟子，倒在散发霉味的宿舍沙发上读金瓶梅的博士。有好些年，他脚上总是蹬着脏兮兮的球鞋，路过工地的野花丛会摘一大把下来，捆好了，带给女朋友。他会在电话里斥责学建筑的女朋友，为什么没写完小论文，就会成天玩泡泡堂是吗？像骂崽子一样地骂。骂了两年突然温柔起来，反过来一味地赔笑。最近女朋友却说这恋爱谈得有点腻，分开一阵仔细想想。来前师兄已经有好几周没联系上她。师兄什么也没说，沙美的身影就进入了他的世界。奇怪，怎么看沙美，也不像会喜欢上师兄这种读书人的。沙美学的是平面设计，并未接她父亲的衣钵，据说她从小就不怎么能让严格的父亲满意。有回导师生日，大家谈笑甚欢，沙美捧出个花瓶送给导师，不知为什么当场被掼碎了。师娘默默地扫掉碎片，我们学生默默地前后走掉。对于他们家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毕竟常被拉去干家务的，是忠心耿耿的师兄。自那天起，沙美就莫名其妙地迷恋上师兄，直到离开贵州时也是如此。趁师兄跟那位“桩桩儿裤”对账，我去沙美的房间找她。刚敲了两下门，就听见里面传出沙美的声音——谁？师兄吗？我的喉咙哽住了，想了一下，缩回了手，转身走掉。师兄好像什么也没发现，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个项目好好干，小伙子，多发文章，将来读博，或者进设计院，沙老师都会罩着你，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微笑、点头，却仿佛看到自己满身泥巴

掉在桩洞里，怎么也爬不上来。

傍晚，最后一筐土吊出，工人也拽着绳子重归地面。拍拍手掌，大家蹲着，围成一圈吃油水快刮出来的盒饭。回头望扇子坡顶上新簇簇的楼群，窗洞里陆续流出了灯光。师兄叫我回去吃饭，我不应，把心一横，抢过份盒饭，插进那圈中仅剩的缺口，蹲下来扒起麻婆豆腐。中途抬眼，冷不丁撞上“桩桩儿裤”的目光，在渐暗的暮色中灼灼互伤，一时竟都忘记了咀嚼，直到其中一人想起。师兄吃完饭，拉我到一旁，说今晚绑扎应变仪在钢筋笼主筋上，明早马上下钢筋笼，下好了就要赶工期灌浆做桩，白天好说，晚上为怕工人偷懒，哐哐往里扔石头，你和我各守半夜，一点钟交换。我想起了秦娜拉说过要来，便说要守下半夜。

那天晚上快十点了，她才过来。我们摸上了旧港航楼的天台。那张床垫还在，我们做了简单的清扫，铺了张临江仙里带出来的白床单，就坐上去聊天。刚好分坐在那两个弹不起来的坑上。她说她羡慕我，很快就会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瞟了眼远处工地上灯光，叫我来这你就不怕被你的“桩桩儿裤”撞见？她说，撞见了才好，撞见了就莫用藏咯，省得天天张花野实的。我说，该滑下来的，始终要滑下来。她剜我一眼，你在说么子糊话？我说我在说扇子坡。她说，你不是说治好了吗。我说，还早着呢，二期准备施工。她就不言语了，抽了几口烟，就把头从我肩膀上抬起，站起来走到天台边缘，目光投向那暗沉沉的江面。她的声音像从很迢遥的地方传来，到我这儿已经很弱，也很累，如果我的耳朵没接住，它会掉下去。她：我十七岁以前的家就在那儿，被江淹咯，虽然水淹之前已经爆破，可是不知为么子有一扇墙没倒，那上面有我爸，我妈，还有我的照片，还有我的奖状，我的涂鸦，我好多年都在做梦，梦到自己克捡些砖石，一块块地垒回克，经过那么久都快修好哒，昨天还差最后一块，怎么也寻不着，急得我嘴巴冒泡。如果可能，我还想修一下我邻居的屋，那里头住的男娃，是我的初恋，我十六岁跟他恋爱连书都不念了——对，不是我现在老公，对，睡了。当时我屋头不同意，说好容易供我念高中，成绩不得行还早恋，这样不如莫念算球。我说莫念就莫念，当老子想天天吃粉笔灰？哪知砍脑壳死滴男娃，没那么坚决，么有退学，和我这个校外人越来越远，后来就没再见咯。我爸不知在哪里听了消息回来说，过几年滨州要被淹了，没饭吃要饿死，又不舍得我跑去滨州做工。我就被我爹做主，找了那么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出来社会了。我现在还好想我家，我爸妈都不在咯，都走了，我想那扇墙，那时不清白（不懂事），赌气把他们照片都扔了，后来他们走的时候就没剩下么子照片。她说着，深吸了最后一口气，弹飞了，烟头在夜空划出红色的轨迹，像一道极细微的伤口。她扭头问我：你知道我墙上涂的是么子吗？是想象中我和他三十岁，也就是现在的样子。

我走过去，让她揽住我。突然，她把我的头扳低，我有点惊愕，但很快顺从了，将头垂靠在她的肩上。她摸摸我的头，我猜我肯定是有几分像她初恋，而且从一开始见到我，她就有这种感觉了。对我来说，她向来不过是一朵云，或者一阵雨，都是可以化成水汽蒸发掉的，此刻起才凝为实体。

要不，我们以后还是莫要见面了。在临江仙的床上时，她对我说。怎么，被发现了？她说，不清楚，有可能。我说，反正我回去以后，想见也难。她没再说什么，也许她打算不等我回去就不再来了吧，她不像我，就算身处滑体之上也矛盾地盼着滑坡。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种怪人？我说不清楚，没在她身体里时，心灵总是充斥着各种吼叫，那风暴能把我压到最深的海底。没错，我曾经跟她说，有两位同学在项目上死掉了，没了，甚至找不到尸体了，我还说其实我觉得都过去了，但根本上，这两人和我没什么交情，顶多算是朋友的朋友——甚至其中一位我连面都没见过话都没说过，我没理由为他们感到难受，难道为遥远的他们而悲伤是安全可控的？可这悲伤如此真实具体，甚至可以触摸到它锋利的刃面，我又怎能断定它不会划伤自己？窗帘后面又传来了雨声。忽然想起，今晚要去跟师兄换班的。刚要拿手机，就听见门禁响，紧接着，对流风把窗帘扬起，冷雨飘在我们脸上。是沙美，她僵在卫生间边，目光落在正躺在床的我们身上。在那目光之下，我们好像化作了两只赤条条的小婴儿。

秦娜拉坐起来穿衣服，似乎很平静。我却只觉得兴奋，甚至有一丝想笑。该滑下来的，总要滑下来，不管你以为，你做了多牢靠的措施。秦娜拉擦着她肩膀出去，到门边又回头说，这位妹妹……你就当什么也没看到……改天请你吃饭。沙美等我穿好衣服才说，我来找扑克，师兄说要打牌。师兄已经回来了吗？我掠过她的身旁，去洗手间抓两把水洗脸。她说，嗯，下雨就回来了，在旁边等着呢。我甩干手，出来盯着她看，看得她缩了缩身子。我说你就算告诉别人也没关系。她说，去去去，我没事乱说干什么。我拿了扑克，取了房卡，径直走出去，沙美跟在我的身后，忽然间，她快步走到我的身旁，奇怪地冲我笑了一下，就好像我们刚刚一起组队打赢了游戏，我们是神一般的队友关系。

于是我们打起了“拖拉机”。而雨居然很快又停了。等了半小时，师兄叫我我还是去工地守一下，我只好拿了手电筒走向湿漉漉的夜晚。工棚里只有“桩桩儿裤”在，他守着已经停转的机器，包括鼓着大肚的小型搅拌机，还有蓝色的注浆泵，他的鞋上沾满了水泥。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挪动双腿走过去，连挤出笑容的力气都没有。他已然晒黑几个度的脸上也很僵硬。我说，就你在？他吞了一口口水，嗯，刚才雨太大叫他们回去了，省得开钱。确实如此，我知道他们是论天算钱，一晚算半天，现在那些人大概已经睡死，叫都叫不回来了。他见我坐下，就站起身来，打开搅拌机，轰鸣声立即充斥了整个夜空，就算想对他说什么也不可能了，话声出口就会被搅碎。他一铲一铲地往大肚子里填水泥和骨料的混合物，脸上因为用力而青筋暴凸，在焦黄的灯下滴落汗水。我知道他在用余光观察我，但是我忍不住慢慢地躺倒在散发着汗臭的草席上，头下是布满黄渍的枕。我放任自己睡着了。长江的水声侵入了我的梦。我在梦中如愿发现自己被塞在那个不停转动的大肚子里，堵住圆孔的正是“桩桩儿裤”那张无比紧绷的油脸。他手里握着控制器，盯着我，好像很伤心的样子，我因此竟笑出声来。他咬咬牙，用力一按，我就欢欢喜喜地飞旋起来，就好像很小的时候，被放进洗衣机的那种感觉。

好几天过去，桩到底是打完了，技术成熟，安全措施到位，没有死人。如果挖一根

小小的桩也会死人那就叫笑话。我当然没有粉身碎骨，这无趣得很，秦娜拉也不来找，只好跟着师兄开始做实验。守着那根桩，加载，读数，周而复始。在不断重复中，感觉自己已经呆了一辈子，来到此处之前的生活不过是幻梦，滔滔江水似已将它淹没。师兄是唯一能将我从幻觉中拉回来的人，他身上存在着一种“现实力场”，他总是充满干劲，在等待间隙，也手捧打印成A4的论文修改。他坚信再发几篇小论文，导师就放他毕业，他已经延毕两年了。导师觉得他太好，舍不得让他走。今年开题报告，他完全听老师的，收起自己的锋芒，全盘接受导师的观点。他坚信，老师不会再拿学术观点相左做理由，不通过他的毕业论文了。他坚信，自己会回到家乡的省会，拿到八万块安家费，找个人（最好是原来那位）结婚生子，幸福地老死在讲台上。他学着贵州话对我说，你个瓜娃子，相信我，扇子坡滑体不会再滑动咯。我用力地点头，眼睛眯缝起来。

连续几天暴雨，好不容易消停了一会儿。我忍不住给秦娜拉发信息，就在沙美哭着从师兄房间里跑出来的时候。那天师兄告诉我，两根桩的数据收集得差不多了，晚上再弄一下，弄完要马上回去，下一个项目，武广高铁桥墩沉降检测还在等着呢。沙美跟师兄闹，不行，我们多玩两天好不？师兄摇头，不好，老师会知道的。沙美说，你就报告下雨延误了几天没做实验，你不说，我不说，他不说，我爸哪里会晓得。师兄还是摇头，沙美跟着他进了他房间，我听到最后一句话是，你不对劲，你非常不对劲。过了一会儿，门砰地打开，沙美捂着嘴跑了出去，我跟在后面跑了一阵子。后来她脚步慢了下来，我也慢了下来，但我不知道要不要靠近。我们已经跑到了海盗船旁边。我猛然想起海盗船正好在滑坡体边缘，心就一下子提了起来。沙美回头，目光仿佛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落在我身上，她喃喃说，师兄说他回去要跟他女朋友复合，我问他那么我算什么，他说对不起，他只是不敢得罪导师，他说就算跟我在一起，毕业也会分开的，可是他受不了了，他不想再骗我……我静静听着，想起导师和一位陌生女孩（年轻的女老师或另一所大学的女生）从学术论坛会场走回酒店时，师娘远远跟着，后来掉头出来，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的场景。

秦娜拉回我，来江边吧，我带你看看古城，你带我看滑坡。我正好也想去看，因为一想到要撇下她离开，我就有种想死一样的难受。海盗船边除了已经停摆的船，什么都没有，那道热烘烘的血红大缝更是不见，我曾经呕吐出来的秘密痛苦，大概也顺着滑面渗到滑体的前缘去了吧，说不定已散入江水。我牙根酸痒，眼睛灼热，视野一片朦胧，我仿佛看见死者，我那位只说过几句话的同学，还有那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两道淡淡的影子，在水汽里穿过马路，他们用没有五官的脸部朝我致意，冰冷的雨滴把他们的身体打得轻颤。我害怕那闪动的身影熄灭，招呼沙美一下，就跟着越来越模糊的他们走下台阶，穿新港航楼，穿旧港航楼，经过重新被荒草覆盖的试桩工地，沿着几乎无尽的台阶来到水陆交界的地方，港口消失了，船只消失了，等在那儿的只有那个雪白云朵般的女人。她告诉我，她的孩子，早在她十六那年就已经出生，不久后死去，那照片上的，其实是她的外甥女，为了能挣脱这地方，她再也生孩子。但没想到，到头来也未能离开。我马上就全然相信了她，并好像看到一个发着微光的雪白云朵般的婴儿在黝黑水体里浮游。秦娜拉往下又走了几级，那台阶延伸到江底，必定通往她记忆中曾经的家。她的双脚浸没在水中，我赶紧走过去拉住她手，指给她看滑坡体的边缘，指给她看海盗船，指给她看那些挨挨挤挤的楼宇。沙美也跟了过来，站在上几级台阶，雨滴又凶猛坠落，不久，她的鞋子就被水浸没了。我们三人有一刻陷入了沉默，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同情心泛滥的恶人，我廉价地贩卖同情，并且曾和其中一位，交换了彼此的肉体。我廉价地安慰她们，滑坡体永远牢靠了，正如你们的过去永远过去了，被牢牢地钉在往昔了。我们所担心的，就是暴雨夜，那么多人沉睡，那么多人做梦，从梦的缝隙中穿越过来的痛苦，给滑坡体凭空增加那么多荷载，它会承受不住，沿着被雨水充分湿润的滑面滑下来。仿佛为了印证我的猜想，扇子坡上的千百盏灯闪动了几下，我们似被四面八方赶来的呼啸声包围了，身不由己地翻滚，把自己丢失在亿万只奔腾的马中……

我们好像一下子就被冲到了十年之后。和沙美见面时我说，我好像还困在长江边上，一直没有回来，你所见到的我，不过是幻影。

森目

广西北海人，从事工程设计业，业余进行小说创作。有小说散见于《青年文学》《广西文学》《特区文学》以及ONE·一个app等。

24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24小时文学聚会。每

周六见。





图片来自 [Giuseppe Mondi](#) on Unsplash

小说

惯性原理

高桑 | 第二回

倘若周围尽是虚空，
一样东西仍能保留的性质才叫惯性。

没有办法，我就是一个相当无趣的人。我常常在想，如果要把我的人生写进史书里（虽然我没有这样的地位，但想想无妨），无外乎有两种方式，一个司马迁所使用的纪传体，那么属于我的一章大概只有生卒年月，最多补加一句，当了一辈子公司职员。另一个是司马光用的编年体，那我生命中的绝大多数年份，大约就和古时候最为太平无事的一年类似。总之，想来想去，这两种方法是殊途同归的，能写下来的只有寥寥几行。但即便像我一样无趣，也总有些聊以自慰的爱好，就比如说我喜欢听摇滚乐，而且音乐的躁动程度越高越是合我心意，好像爱好天生就要和生活的平淡成反比似的，以到达某种中和。另外，每个周末，我都要散步去河边的一家旧唱片店逛逛，那里之所以吸引我，除了杂乱无章的氛围之外，更重要的是店面西南角落的黑胶唱片区。看不出来吧，就我这样一个形容举止规整平淡的人，居然还在卧室里窝藏着一台黑胶唱片机，像是窝藏一个令我深感得意，却又不敢张扬的秘密。我仿佛知道自己此生已经难以惊世骇俗了，所以内心深处的这份渴望颇为油滑地转移到了这台唱片机上，就好像在自我安慰道：“怎么样？我听音乐的手段总还是相当卓越的吧。”

话归正题，几周前，我在那家店里买下了一张皇后乐队的唱片，回来之后，发现包装唱片的牛皮纸袋竟还分为两层，外层里夹着几张A4纸，纸上写着一个关于伽利略的故事。这件事情的疑点颇多，首先，纸张已有些旧了，可见它存在的时间不短。其次，那篇文章既无从考证，也不是什么奇人异士的手稿，相反，它用规整的宋体打印，平添了诸多神秘。我后来去网上查阅了伽利略的生平，和文章的叙述完全对不上号，文中又有诸多关于历史的纰漏，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它有点疯言疯语。可不管怎么说吧，我喜欢那个故事，因为它总是带我回到初中温黄色的回忆之中，那时候，伽利略是物理课的一道分界线，在他之后的牛顿创造出的知识，我就难以掌握了，那么他不正是我智力所能触及的极限吗。如今，我把它从牛皮纸中取出来，小心地放在蓝色的文件夹里，期盼有好友做客的时候，可以博他一笑，但我的朋友恰巧又是那样少。我就决心把全文抄写如下，公之于众。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意大利比萨附近的A村，神父一听到下午三点走进教堂的脚步声就会警觉地睁开双眼，周身陷入震悚之中。十六世纪，午后的阳光清澈明晰，透过教堂以深蓝色为基调且有些斑驳的玻璃，层次分明地落在木椅上，这个粗糙的小教堂便犹如笼罩在蓝色的梦幻之中。可以想见，这样的环境是很有些缱绻的，神父年纪也大了，不免要睡个午觉。可这个时候，偏有人从正门开始，踩过整个教堂的木地板，发出裂缝般的脆响，仿佛这些地板是深冬的枯枝，在脚步声中逐渐瓦解，随后，那人就拨开帘布，进入告解室里。整个教堂再一次陷入沉寂，但沉寂之中又多了一份紧迫感，就好像此人在暗处盯着神父，催促他上班。这些步点是如此急促，进入告解室的态度又如此坚决，那么，除了刚刚放学的伽利略不会再是别人。

一想到在外面等他的人是伽利略，神父就猝然清醒了，他开始胆战心惊地盘算，这个活到底还接不接。自然，神父不应该拒绝任何人的忏悔，生出这样的犹疑，让他老人家由衷地惭愧。但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伽利略一来，就要把自己的罪孽陈述上几个小时。告解室相当狭长，酷似一个立过来的棺材盒，这个形状对老人本就很不友好，加之神父要站几个小时，经常觉得难以支持，因为血液在脚后跟处淤积，他感到脚掌肿大，额头、指甲盖等边远部位都因供血不足而呈青紫色，轻微颤抖。这还不算最难熬的，伽利略这小子，也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口音，说话一字一顿，匀速前行，丝毫没有抑扬顿挫的人类情感在其中，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机器人，最近，语速还呈现一种加快的趋势。老人身处这样的背景音中，难免生出些幽闭恐惧症，脑心发出一绺一绺的汗来，这些汗从脸颊顺流而下，伴着轻微的颤抖，流出一道道“Z”字型的痕迹。实在是难熬啊。神父想，反正伽利略犯下的那些罪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已经听到伽利略说，自己折断了同桌安东尼的十来只羽毛笔，偷吃了庄稼汉亚当的五六个西瓜……总之，目前还无伤大雅，何不推却说自己病了，或者不做答复，假装不在呢。可是，我们永远不能低估一个神父身上的良知，纵使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披上衣服起身，他觉得伽利略万一哪天真的干出杀人越货的事情来，那责任就有他的一份。

现在，他和伽利略隔着一层木板相对，互相看不见彼此。伽利略开始忏悔道：“尊敬的神父大人，我要忏悔。”一如既往，他说话的语调像是齿轮一样，一格一格地前进，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立马将神父包裹。“刚才放学的时候，天气实在太热了，热得我全身是汗，您知道，我家离学校又是那样的远，远得我一走起来就失去耐心。您说，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的，亚当叔叔家和他的农田就恰好在学校和我家的中间位置，几乎就是正中间，不多也不少，因为我数过，从我家到亚当叔叔家正好要走一千三百五十步，从亚当叔叔家再走到学校，又是一千三百五十步，可不就在中间嘛。这么热的天，对走路的人来说，一千三百五十步是一个关键结点……”接下来，和往日的叙述格式几乎相同，伽利略开始大谈亚当的西瓜田是怎样的格局，某一个圆乎乎的西瓜又对他产生了何等的诱惑，最后，他还要事无巨细地告诉神父，他如何偷吃一个西瓜。总之，他所忏悔的罪孽就是偷了一个西瓜，但伽利略总有无穷的方法把它叙述一个小时。

这又有什么办法，忏悔本就要秉持一种详细的原则，因为教义相信，人在对罪恶的细节进行剖析之时，最有可能感到羞愧，从而在根本上杜绝这类罪行。所以，神父没有理由斥责伽利略，可是他总觉得，伽利略叙述起这些东西的时候，怀着一种使坏的心境，把它当成了一场游戏，而这场游戏胜利的判据就是他能不能拖延出足够长的时间。等伽利略说完了偷西瓜的事，神父照例要对这桩罪行进行评述，当他聚焦最后的精神，说出：“你不该……”的时候，伽利略也照例对他不理不睬，似乎很怕有人打断他似的，立马加强音量，继续下一桩罪行的叙述：“另外，神父大人，我还……”没有办法，神父只能用手扶着告解室的墙壁，继续坚持下去，等他说完他如何把女佣的一块抹布扔进井里。整场忏悔，似乎都被伽利略诡谲的语调所支配着，神父只能做一个配角，或者说，他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煎熬地呆在告解室里，等待伽利略说出：“上帝会原谅我吗？”他再用体内最后一缕生命的游丝回答：“会的，上帝原谅所有人。”那段时间，神父半夜都会被带有伽利略的梦魔吓醒，心中感叹，这算是哪门子忏悔。

神父不知道，倘若他在伽利略忏悔的时候能够走出告解室，往伽利略的那个小黑屋看看，他就能看到伽利略正鬼鬼祟祟地猫着身子，拨开门上的一点帘布，探出一只蓝色的眼睛，一边说话一边朝教堂的正厅看，眼神落在耶稣的白色雕像上头，那一盏大吊灯上。

事情是这样的，伽利略初次被这个吊灯吸引要追溯到几个月前的一个礼拜天，他被带着来唱歌。伽利略有点儿小儿多动症，唱歌的时候手贴着裤缝，只能让眼睛瞟来瞟去，但教堂没什么意思，也只有那一盏吊灯能供他长久地注视。可能A村地势平坦，教堂的通风系统也很不错，整个空间都沉浸在微风之中，故而吊灯总是在晃动。伽利略也对这盏灯日久生情了，他觉得吊灯结构精美，还能晃来晃去，实在是A村最有趣的东西，从那以后，他觉得去教堂这件事从无聊变得趣味盎然。可能天才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异乎常人的直觉，普通的小孩看吊灯无非图个新鲜，伽利略却看出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灯的运动模式和荡秋千有些相仿，都是在某根中轴线的两边摆来摆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秋千的劲道自然会变小，其结果就是摆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小。既然摆动的幅度变小了，相比刚开始的时候，划过的距离就要短一些，直观来说，完成一次摆动的时间也该变短才对。可是伽利略觉得时间的差别似乎没有这么大，甚至看上去是一样的。既然有了这样的猜想，他就开始千方百计寻找去教堂的机会，验证自己是对的。但对于孩子，去教堂的机会并不多，想来想去，只有常来忏悔才行。

正如历史上所说的，伽利略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于一个教徒，犯点错倒没什么，去忏悔就行了，但说谎可是要进地狱的。所以，年少的伽利略掂量再三，决定去找点错误来犯，也不该忏悔的时候无中生有。就这样，他开始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恶不作，其中包括了欺负他在学校的同桌安东尼和各类同学，回家的路上去亚当的田里偷农作物，回家后捉弄他的女佣。村里人应该庆幸，伽利略的能力范围非常之小，否则，A村早晚要被他建设成黑手党的发祥地。

可是，他很快就不满足于忏悔的时候光能看到吊灯摆动，人自然是有着对时间的感知的，但这份感知太过朦胧，不够准确，想要证明自己的猜想，得有精确的测量才行。吊灯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可以成熟地供人观摩，但此时伽利略需要的东西是一个秒表，秒表是他死后几百年才被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他自然一时想不出如何描述这等需求。但如果用一句话来定义科学家，那就是超越同时代的人，伽利略冥思苦想之后，就构思出了秒表的雏形，并且不惜把自己的声带贡献出来，制造一个人体计时器。每天早上，他都从抽屉里取出同一块石头，让它从自己眼睛的高度自由落体，在接触地面之前，伽利略努力让自己恰好说三个字，日复一日的练习之后，伽利略说起话来就是神父听到的效果，每个字花的时间都是一样的，神父以为他在忏悔，其实他

心不在焉，正在给大吊灯计时。测量进行得相当顺利，伽利略已经得出了初步结论，吊灯从最高点摆到最低点，总是用掉他说三个字的时间。只是那段时间，每当他的同桌安东尼有一只新的羽毛笔，他总要战战兢兢却又假装狠辣地把它举起来，一折两半，然后撒娇似的跑出去，跑进阳光与阴翳交错的树林里，确保身后没有人再追打他了。等心跳平息下来，他不禁质问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呢。而且村里人见了他就躲，私下里称他为“恶霸伽利略”。这时，他站在夏日的微风中，体味着又一个午后悄然而逝，感到无比的孤独，如果说灯摆动的时间可以用人体计时器测量，那么世界上还有一种更宏大的时间，无法可得。

既然已经踏上了一种他不喜欢的生活，就再也没有归路了，伽利略只好把实验彻底地进行下去。现在，他觉得自己的语调还是有些慢，就好比一只计时器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而不是以秒为单位跳动，对时间的分辨率显然就不足。伽利略开始了第二轮的练习，在石头落地之前要说出六个字来，之后还要说出十二个字，二十四个字……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父最近总觉得伽利略越来越不对劲，说话越来越快，而且还不让人打断他，正是出于他测量精度的提高。直到后来，伽利略在同等的时间里能说出九十六个字，可想而知，神父再怎么集中精神，听到的都是“嗡嗡嗡”的一片，听久了就会神志不清，陷入一片恍惚。正是那几天，神父的视力、记忆力、生命力急速下降，就好像住在板块断裂带的人被地震的次声波攻击了一样。伽利略倒颇为得意，因为他说话的速度越快，灯摆一次的时间中说出的单词总是精准地成比例增加，这意味着他的猜想总是可以得到验证。

伽利略很快乐，见到男人就说：“叔，我证明了吊灯摆一次的时间总是一样的。”见到女人就说：“姨，我证明了吊灯摆一次的时间总是一样的。”但所有人对待他的态度都很相仿，大抵上是立马用身体护住身边值钱的东西，唯恐它们遭遇毒手。更伤伽利略心的，是他们不相信他，谁会相信一个恶霸说的话呢。这件事他以后会习以为常，就像他在比萨斜塔上扔石头之前，也没人相信他说的“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时间相同”。可十六岁的伽利略很不解，他知道自己虽然作恶多端，但没有说谎，怎么能不相信他呢。

那天放学后，他照例拐进亚当的西瓜田里，想着，今天忏悔该说些新的内容，不如偷吃两个西瓜好了。就这样，他挑了两个最宏大浑圆的西瓜，砸在地上坐吃。因为吃得太快，西瓜产生的饱腹感在他的大脑皮层有些滞后，在他吃完的片刻后，他发现自己只能躺在地上，无法起身。再过了一会，粉红色的西瓜瓢终于从食道里漫游而出，慢慢地占据他的内脏，把伽利略的肚子撑得硕大，肚皮因为拉伸作用而薄得晶莹剔透，一碰就破，以至于外人可以透过肚皮看进他的体内。倘若远看，肚皮里就是一片瓜肉的粉红，伽利略就像是一个粉红色的气球系在田野里。近看则有些骇人，能清晰地看到，血管密布的胃和大小肠被红色的瓜瓢充满，其间，还疏松地分布着一些黑色的西瓜子儿。伽利略就这样躺在田里，看远方田埂上的人三三两两的人走过，他们一边用手指着自己，一边捂着嘴巴议论躺在田里，样子滑稽的恶霸。甚至有一次，亚当叔叔从他身边走过，对他也视若不见。夜晚降临，伽利略终于把西瓜消化了，起身行走，身体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他说，既然这样，倒不如走吧。

十六岁那年，伽利略离开比萨去往罗马，他以一身“恶霸”的臭名和一口诡异的意大利语为代价，证明了后世所谓的钟摆定律。等重新回到A村的时候，伽利略已经五十岁了。我们得承认，伽利略年轻的时候虽然行为不端，但总体上而言鬼灵精怪，是个科学家胚子。但步入老年之后，他就看上去木讷了很多。那时，伽利略因为思虑过多而头顶微秃，但为了维持脑袋上毛发的总量，他把络腮胡留得很长。同时，他总是套着一件黑色且宽松的连体衣，脖子那里翻出一朵白色领子，像是考究的母亲给婴儿戴上的围兜。除此之外，他就终日坐在自己制造的硕大装置旁边。该装置的起点是一个玻璃斜坡，斜坡的低端则顺滑地联结着一段玻璃轨道，轨道的长度极尽了房间的整个斜对角。这玻璃的材质也有些来头，是伽利略在罗马时托人做的，光滑无比，人在这样的平面上是无法移动的，因为无处借力。伽利略在自己的凳子上装了一个按钮，一摁就有一个玻璃球从斜坡上滑下来，顺着轨道滑到尽头。直到轨道消失，玻璃球无处可滑，便落进一个篮中。这时，他又可以转动滑轮，用一条传送带把那篮子里的小球转回来，周而复始。伽利略整天就坐在凳子上，放下一个又一个小球，眼珠子顺着球滚动的方向撇过去细细观察。从形态学上来说，五十岁的他像是一个被裹缚在襁褓里的，胡子拉碴的婴儿，只有眼珠子随着玩具滴溜转动。从行为学上来说，他仿佛是个老年痴呆患者，正醉心于某种奇怪的游戏。

当年初到罗马，伽利略决定去上个大学，因为他觉得没有文化的人想证明个东西实在很费劲，光是吃这么多西瓜就让人受不了。这自然是很有远见的想法，倘若不是在大学里学了点数学，他也不会发现自己是何等亏本，在A村折腾了这么久，证明的钟摆定律无非只是一个定律。原来真理也是分等级的，定律有点儿低级，就好比是班干部里的小组长，军队里的下士，上不了台面。但是原理就不同了，原理则对应于班主任和将军。伽利略暗下决心，早晚要弄一个原理给大家看看。

在罗马的三十多年，他的成果不可谓不丰。比方说，伽利略开展的第一项研究就是自由落体，因为这件事他有基础，在训练语速的时候，他就让石头自由落体，而且其本身又是一台绝好的计时器，所以水到渠成，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石头越重落得越快”的说法。另外，一到晚上，伽利略就开始观察天上的诸多星体，同时也辅以草稿纸上的密密麻麻的推演。推演得越多，结果也就越是确凿，地球压根就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亦是错的。但这件事伽利略却不大敢声张，布鲁诺因此被烧死的消息是隐约有些耳闻的。但顺藤摸瓜，他发现亚里士多德很不靠谱，自创了这样那样的科学，没有一个是对的。其中，最扯淡的又当属惯性原理，他说：“东西要有人推着才会动。”这怎么可能呢，伽利略随便从一个斜坡上滚下一个玻璃球，玻璃球就自由地漫游开去，全然不似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需要人推着。从那时候开始，伽利略就觉得惯性原理大有可为。可是想把一个原理据为己有，得破而又立，伽利略并不知道，小球跑开之后会怎么样。诚然，因为地面总有些阻力作用，导致小球跑一段距离之后会停下来。但知道这些还远不够，原理之所以难以证明，因为它象征着一种绝对理想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栖居在万物之灵上的，伽利

略要做的，是把自己的意识附着在玻璃球上，去感知这颗球的本性，倘若周围尽是虚空，一样东西仍能保留的性质才叫惯性。

在罗马，伽利略终于没有把这件事想明白。他觉得原因在于罗马是个大城市，诱惑太多，俗事缠身，况且公寓里的地板又过分毛糙，小球滑一会就停下来了，很影响他思考的流畅性。于是，他便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故居，怀着对答案近乎走火入魔的渴望制造了世界上最光滑的玻璃，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自己和小球都摆脱任何一丝阻力的干扰。同时，他在装置面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直到视网膜上一直有个小球在滚来滚去才上床睡觉。但久坐终究是于健康很不利的，一天傍晚，伽利略的晚饭多吃了一些，就继续在书房里摁按钮，转滑轮。但很快，他觉得胃部在缓缓扩大，同时，也清晰地感受到有食物正踊跃地一股一股地推进到自己的肠子里，整个躯体正自上而下地撑起。这一回伽利略很警觉，立马起身出去散步，以防自己又被圈困于座位上。在殷红的夕阳下，伽利略意识到自己回来许多日，这才第一次出门。在田埂上行走了一段时间，他看到不远处有一块斑斓的田地，细看时，是毛绒状的绿色枝叶下，掩盖着一圈圈光滑的绿色，四围镶嵌着些许野花。伽利略长久严肃的脸部肌肉重又舒展开来，他想，这不就是西瓜田吗。顺着这份亲切的感觉，关于过去的浮想就产生出来，一发不可遏制。很快，教室里折成两段的羽毛笔，放学路上的西瓜田，教室里的染着淡蓝色的阳光，一下子都连成一片了。要知道，一个终日都在思考的人仿佛是活在时间之外的，世俗的岁月在他那里凝结起来，年龄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所以伽利略猛然回首的时候，觉得过往无比清晰，如同午睡过后，睁开惺忪睡眼所看到的第一帧画面。这时，他的腹中也正有些饱胀，生命仿佛回到从前那个通体涨红而躺在西瓜田里的少年一般。

回到书房里，伽利略仍未从遐想中抽身。回忆里，首先出现的往往是抽象的、美的大概，其次，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琐碎的细节。这时，重叠的“恶霸伽利略”的声音，安东尼和女佣愤怒而惊恐的面庞，神父疲累的背影也一一再现，伽利略回忆着回忆着，就满面赤红。晚上，妻子到书房里给伽利略端茶，一开门，看到以窗户为背景的一轮红盘，以为东方日晓。实则是伽利略想到以往偷吃了亚当那么多西瓜，羞愧难当，面部红得覆盖了五官。他没想到，以前为了区区一个钟摆定律，自己做了那么多违心之事，而当时的忏悔又是如此敷衍了事，现在应该一一偿还才对。

接下来的几天，无论伽利略怎么坐在玻璃球前一动不动，他的精神也再无法集中了，那份迟来的愧疚像一只嗡嗡的苍蝇，时不时停在他的脑门上。他觉得过去的生活仿佛豁开了一条口子，是不完整的，需要现在的自己来填平。想来想去，他决定准备些礼物，对那些他欺凌过的人道个歉。以下是他颇费周章准备的礼物的清单：给安东尼准备的三只羽毛笔，材质上乘；给女佣准备的几件衣服，都是时尚之都米兰出产的最新款式；给亚当准备的一袋西瓜种子，每一颗都能结出一藤三人环抱的，皮薄得颤巍隐现的西瓜；最后，是给神父准备的一笔巨额善款。

他拜访的第一个人是亚当叔叔，这是伽利略第一次穿过绿色的西瓜田去到亚当的小木屋之中。只是这一次，田野里并没有浑圆的西瓜的踪迹，伽利略疑心是因为时节还没有到。推门而入后，他看到屋内一片漆黑，散发着潮湿的木头的气息，而亚当则坐在一个角落里，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被，唯有眼睛处散出一丝活气。伽利略定睛看了许久，认定这确乎是亚当叔叔，只是昔日田野中那副金黄色的有力的肉体像风干的葡萄一样萎缩，投影到眼前的老人身上了。当他自我介绍后，亚当立马充满敬意地称呼他“伽利略先生”。这时候，他隐约明白了，A村已经没有人记得那个“恶霸伽利略”了，他们所记得的只是那个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两块石头的科学家“伽利略先生”。但伽利略仍然不放弃，他仿佛从前忏悔似的，向亚当绵密地阐述自己如何偷他的西瓜吃，其中，不免加入了诸多夸张手法，来彰显自己罪大恶极。说完之后，他毕恭毕敬地把那一袋西瓜种子双手呈上，作为对往日罪孽的弥补。但是亚当说，他老了，已经不种西瓜了，田也不再属于他了，说着，把那一袋西瓜种子往脚下一放，落在夜壶的旁边，似乎已经疲惫得无法做出其他多余的动作。直到伽利略临行之前，亚当才又叫住了他，有些不太好意思地问道，伽利略先生，你觉得以前我家的西瓜口感怎么样。伽利略点点头，说，好。亚当又问，那甜度呢？伽利略又点点头，说，很好。亚当便长舒一口气，仿佛动作也舒展开了，面上映出黄粉色的神光，从被子里伸出一根大拇指，翘向伽利略，说伽利略到底是大城市里读过书的人，见识多，吃得出好坏，以前A村的人还说他的西瓜不好哩。

接着，伽利略又陆续拜访了安东尼和往日的女佣。安东尼的说法和亚当差不多，见了面也是叫他“伽利略先生”。不同的是，现在他长得很高大粗犷，胸部、腋下、肚脐的周边均生出淡黄色的，绒状的体毛，总之早已不是伽利略之流可以欺负的了。在这样的汉子身边，伽利略生出了怯意，很怕自己一旦坦白当年的罪行，会引来强有力的报复。最后，他只是很不好意思地把三只羽毛笔拿出来递给安东尼，并不说说明来意，也不知道安东尼是否明白什么意思，只见他波澜不惊地把羽毛笔放在柜子里，插在一个黏糊糊的蜂蜜罐中。说，他已经不再读书，羽毛笔大约是用不上了，如今包了一块田种西瓜。女佣则太老了一些，可能神志也不清澈了，总之咿咿呀呀地，没和伽利略说出什么头脑来，更不必说那几件时装对她能有什么用处。只有她那刚上学的外孙简单地接待了一下他。

走过这些往日的地方，伽利略觉得自己没有道成什么歉，反倒徒增了许多悲伤。如前所述，一个终日思考的人已经渐渐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在伽利略那里，所有东西的年龄都封存在小球的滚动之中。但现实并非如此，与故人相接触后，他仿佛被拉回到这个实在的世界，照了照镜子，伽利略发现不光是他们，原来自己也老了。也正是因此，他准备的礼物才那样不合时宜。当然，倘若他拜访的顺序可以倒过来，兴许还可以把羽毛笔送给女佣的外孙，西瓜种子送给安东尼，可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送都送完了。

也许是出于事不过三的原则，经历了三回的失落，伽利略对于探望神父一事的信心就淡薄了起来。他痴痴地回到书房之中，想入非非，没有心情思考惯性，便胡乱地摆弄起他的装置来。大约因为那段时间总是和过去联结在一起，伽利略开始重新回味起钟摆定律。他在玻璃斜坡旁立马连上一个对称的斜坡，那小球滚下之后便可

以顺势冲上去，这个动作会如同镜像重演一般往复不停，模拟了钟摆的运动。倘若把两个斜坡之间的距离扩大一些，也不打紧，似乎斜坡之间的平面并不会消耗球的力气，它还是可以循环往复地下落、攀爬。就这样，伽利略无意识地把两个斜坡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看小球克服中间的平地，在两个山包上来回滚动，直到距离过大房间的对角线，小球无处可去为止。

大概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要受到非人的启发，就像诗人在月亮的周期中悟出人事的圆缺一般，伽利略看着小球不辞辛苦地滚上滚下，也颇受到这个非生命的鼓舞。他可以想见，也许在故人们心中，对那个“恶霸伽利略”所犯下的罪孽早就已经释然，只是他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抚平心底的羞愧。这么说来，道歉就本是一件利己的事情，因为对于受害的人，大多的伤痕总在时间的冲刷下平整如退潮后的沙滩，所以道歉更像是一种仪式，让还残存良知的犯错者给自己一种终于可以撇清过去的安慰。伽利略本想找到这份安慰，但他发觉自己正像是从斜坡上滚下来的玻璃球，在时空中迷茫地滑动，想找到一个可以顺势而上的斜坡，但这个斜坡似乎很渺远，还没有找到，他就很窘迫地钻进房间的角落里去了。但在理想的世界之中，这个玻璃导轨的长度可以不受房间狭隘的限制，球也还能接着寻下去。

既然这样，那么还是应该和从前被他折磨的神父相见才对，说来可笑，伽利略想找神父做的事情还是忏悔。因为倘若要说还有什么理想的境地，足以多少摆脱些现实的枷锁，那也只剩下他一生笃信的上帝了。少年的时候，他以为在寻找真理的途中犯点错误没什么，忏悔就行了，现在他才体会到，这件事居然久久都无法释怀，不仅是因为偷吃了许多西瓜，损坏了许多别人的东西，这些还只是小而具象的错误，更要紧的，是当他把忏悔和道歉都作为一种自我抚慰的手段时，便撒了自欺欺人的谎言，到头来，发现那份羞愧是抹不平的。这一次，他想找神父忏悔的东西似乎很多，也不太确信能否组织好语言，但他觉得，上帝还是会原谅他。

故事的结束，或者说伽利略的结尾，和绝大多数令人伤怀的悲剧类似，从前扶着墙壁听伽利略发出机器人声音的神父已经去世了。伽利略在一个清晨走进 A 村的墓园，那天细雨霏霏，石板路和大理石墓碑都有些潮湿，黏滑。伽利略站在神父的墓前，做了一次忏悔，只是那个时候伽利略已经五十岁了，如果说他在拜访故人时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肉体的老去。那么，站在神父墓前的伽利略，看到自己的心迹终于无法表白，则感到生命的某个部分溘然长逝。他不能再像少年时一样，“呱呱呱呱”地用均匀的语速和神父述说自己的罪孽，他能做的就是站在那里，在心中冥想自己的一生。想着想着，他庄周梦蝶般把自己幻化成了一颗玻璃球，仿佛看到那个肚皮圆滚，一片粉红的小伽利略躺在田野里，下定决心要走出比萨，因为他想和证明钟摆定律一样，证明无数的真理。那个瞬间，他的生命蕴藏着无限的青春和能量，从斜坡俯冲而下。从前，他没有想明白的，是玻璃球在一片虚无之中到底会滑向哪里，现在，自己有点儿老了，这个老家伙终其一生都想触碰真理，想弥补少年时的错误。也和玻璃球没什么两样，永远在寻找另一个对称的斜坡，然后冲上去。倘若这个斜坡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又当如何呢，恐怕也就和伽利略往后平淡的生活一样，继续若有似无地找寻下去罢。

五十岁那年，伽利略想明白了什么是惯性原理，他在自己的著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写道，如果他家里的玻璃滑轨当真是无限长的，那小球也会无限地漫游下去。只是这一次，他觉得想明白一个道理的代价前所未有的大，是一个自己永远无法填补的缺口。

其实，关于这个打印版故事，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一张皇后乐队的唱片里。不过，这一点在我听完唱片之后基本可以解决，其中有一首歌，在最后的副歌阶段，主唱疯也似地大喊了几声“伽利略，伽利略”。大概这就是有人要给它配上一个伽利略的故事的原因吧。只是我有所疑心，主唱所喊的伽利略和这个物理学家伽利略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最近，我还在无聊的生活中生出了一些病态，总是把这个蓝色文件夹随身携带。就拿今天来说，上班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仔细端详了我的办公桌，除去正中间的台式电脑和左侧的一些杂物，右侧还有一摞文件，我小心地把这个文件夹溶解于那摞文件之上。午休时分，有一个同事来找我聊天，这种事情很少见，我就抓住机会，在说话的间隙把文件夹取在手中，翻一翻，翻阅的时候将其摆出一个与地面近乎平行的角度，似乎在引诱对方的目光落在纸面上，可他终究没有对它产生兴趣。我不死心，晚饭我照例去了一家平价的菜馆，等菜的间隙，我感受到周围人口稠密，他们好像时不时看向我，似乎在看我一个人吃饭能吃出什么名堂来。那我自然也不能服输，就把伽利略的故事拿出来翻一翻，因为环境嘈杂，我的动作也自然要夸张且喧哗些，可终于没有人注意到它。没有办法，吃完后我只能将其夹在腋下匆匆回去。某一刻，我突然羞愧地意识到，之所以我对于这份文件的态度如此暧昧不清，是因为我企图在某个瞬间将其据为己有，就像一个人在路上捡到了什么东西，就先是忐忑不安，而后浅浅地招摇一下，以示众人这东西本来就是他的。对于一个故事，这份占有就得进行得更彻底些，我希望它干脆是我写的。

可事实上它不是，就算是我写的，于我也没什么好处，只是我喜欢这个故事喜欢得有点过了头，才生出坚强的占有欲来。它不仅把我带回到初中温黄色的记忆之中，更让我隐约体味到，那段记忆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其间蕴藏的巨大的力量，那份力量现在也难以名状，但我知道，那时也许因为一点儿理想，也可能是犯过什么伟大的错误，总之，我也曾俯冲而下。诚然，我掉下去的高度远不及伽利略那么高，我也很快认了命，开始在光滑的平面上滑来滑去，并决定以此态度度过余生。但人总还是有些尊严的吧，总还是要渴望些冲上小山包的快感的吧。这些山包，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摇滚乐里的那几句嘶吼，或者偶然遇到的一个神秘故事，让我把它精心地包装在蓝色文件夹里自欺欺人。还好，我们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不必找人原谅，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高桑

年生人，毕业于吉林大学，上海交大理论物理博士在读。写小说，出版有《火速逃离平江路》。

第二回

这是“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 Louise Pilgaard on Unsplash

小说

杀死一个孩子

斯蒂格·达格曼 | 故事群岛

这一整天，以及后面的好多天，
那条船都将停在原地。

这是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阳光斜斜地照在平原上。很快教堂的钟就要响了，因为今天是星期日。在两块黑麦田的中间，两个孩子发现了一条他们从未走过的小路。平原上的三个村庄里，一扇扇窗户玻璃在阳光中闪闪发亮。男人们在餐桌镜子前刮着胡须；女人们一边哼歌，一边切为咖啡配的面包；孩子们坐在地上，扣着他们紧身内衣的扣子。这是一个属于不幸日子的幸福的早晨，因为这一天，第三个村庄里的一个孩子将被一个幸福的男人杀死。此刻这个孩子仍然坐在地板上扣着他的紧身衣扣子；刮胡子的男人说，今天他们要去溪里划船；女人哼着歌，把新切好的面包放到一个蓝色的盘子里。

此刻阴影还没有笼罩到厨房里，那个将要杀死这个孩子的男人还站在第一个村庄的红色汽油泵旁边。这是一个幸福的男人，他看着照相机，从屏幕上可以看见一辆蓝色的小汽车，车旁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笑。男人对着大笑的姑娘拍下一张好看的照片，这时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拧好油箱盖子，说祝愿他们拥有美好的一天。女孩坐进车里，将要杀死一个孩子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钱包，说他们要去海边，要在那借一条船，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透过摇下来的车窗，前排座位上的女孩听到了他的话，她闭上了眼睛。闭着眼的时候，她仿佛看见大海，还有坐在船上她身边的这个男人。他不是什么坏人，他快乐又幸福，在坐进车之前，他在车前站了片刻，发动机散热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很享受这种光芒，还有汽油和稠李树的香气。没有影子落在汽车上，闪亮的保险杠上没有凹痕，也没有血液的红色印记。

可就在来自第一个村庄的这个男人坐进车里，从左侧关上车门发动汽车的时候，在第三个村庄，厨房里的那个女人打开她的柜子，没有找到方糖。已经扣好了紧身衣扣子、系好了鞋带的孩子跪在沙发上，看见桦木林间弯弯曲曲的小溪，还有草地上拔地而起的那棵黑色橡树。即将失去孩子的那个男人刮好了胡子，正把镜子折起来。餐桌上放着咖啡杯、面包和奶油，还有苍蝇在飞舞。唯独少了方糖，母亲让孩子去拉尔松家借几块。孩子开门的时候，男人在他身后大喊着让他快点儿，因为船在岸边等着，他们要划船去很远的地方，会比以往去得都远。孩子跑过院子的时候，他心里只想着小溪、船和水里噼噼啪啪跳跃的鱼，没有小声告诉他，他只有八分钟好活了。这一整天，以及后面的好多天，那条船都将停在原地。拉尔松家离得不远，只要过个马路就到了。孩子跑过马路的时候，那辆蓝色的小汽车开进了第二个村庄。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子，里面有几栋红色的小房子，刚刚睡醒的人们坐在厨房里端着咖啡杯，看见那辆汽车从树篱后面飞快地驶过，屁股后面扬起一大团尘土。车开得飞快，车里的男人看见苹果树和新涂过焦油的电线杆如同一个个灰色的影子在车窗外闪过。

夏天的风拂过挡风玻璃，他们飞快地驶出村子。他们开在马路中央，惬意又安全。路上只有他们一辆车——至少此刻是这样的。独自开在柔软宽阔的道路上是多么美妙，到了平原地带就更爽了。这个男人幸福又强壮，他右手的肘部碰到了女人的身体。他不是什么坏人，他只是急着要去海边。

他没有想伤害任何人，然而不出一会儿，他将杀死一个孩子。当他们冲向第三个村庄的时候，女孩又闭上了眼睛，她开玩笑说，要等到能看见大海了她才把眼睛睁开。她的思绪跟随着汽车左摇右晃的柔软节奏，想象着大海是多么地闪亮。生活是如此无情，在一个幸福的男人杀死一个孩子的前一分钟，他仍然是那么幸福；在一个女人因为恐惧而发出尖叫之前，她仍然可以梦想大海的样子；在这个孩子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的父母仍然可以坐在厨房里等待方糖，谈论他们孩子洁白的牙齿，谈论他们的划船计划。这个孩子自己可以关上邻居家的门，右手拿着用白纸包的几块方糖开始穿马路。在这最后的一分钟里，他脑海里想的只有一条长长的波光粼粼的小溪，里面有很多大鱼，还有安安静静的桨声引起的辽远的回响。

在这之后一切都晚了。在这之后一辆蓝色的汽车横停在路上，一个女人尖叫着，用流着血的手捂住了嘴。在这之后一个男人打开车门想要站起来，可是在他心里有一个恐惧的黑洞。在这之后几块白色的方糖毫无意义地散落在血泊和碎石中，一个孩子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脸紧紧地贴在地上。在这之后两个还没喝上咖啡、脸色惨白的人从一扇门里跑了出来，看见了马路上这让他们此生都忘不了的一幕。时间能够治愈所有伤口，这不是真的。时间无法治愈一个被杀死的孩子的伤口，无法治愈一个忘了买方糖而让自己孩子穿过马路去邻居家借的母亲心中的痛苦，时间也无法治愈一个杀死了这个孩子的、曾经非常幸福的男人心里的悔恨。

杀死了孩子的这个人没有去海边。杀死了孩子的这个人一言不发地慢慢地开车回了家，在他身边坐着一个手上缠着绷带、失了声的女人。在他们经过的所有村庄里，见不到一个快乐的人。所有的影子都是那么灰暗。他们分别的时候仍然一言不发。杀死了孩子的这个男人知道，这种沉默是他的敌人，他需要大声地喊出这不是他的错，有生之年他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战胜这个敌人。可他知道这是谎言。夜晚在他的梦里，他只希望能让他生命中短短的一分钟倒退回去，好让这一分钟发生改变。可是生活对这个杀死了孩子的人就是这么无情，在那之后，一切都晚了。



斯蒂格·达格曼

瑞典作家、记者，生于 1923 年，在二战结束后的短短五年间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关于战后德国的文集以及诗歌、戏剧等，成为当时瑞典文坛最耀眼的年轻作家，但又突然陷入沉寂。1954 年，达格曼自杀，年仅 31 岁。数十年来，他的作品启发了无数作家、音乐家、电影人，影响至今，被称为“北欧的加缪”。《杀死一个孩子》(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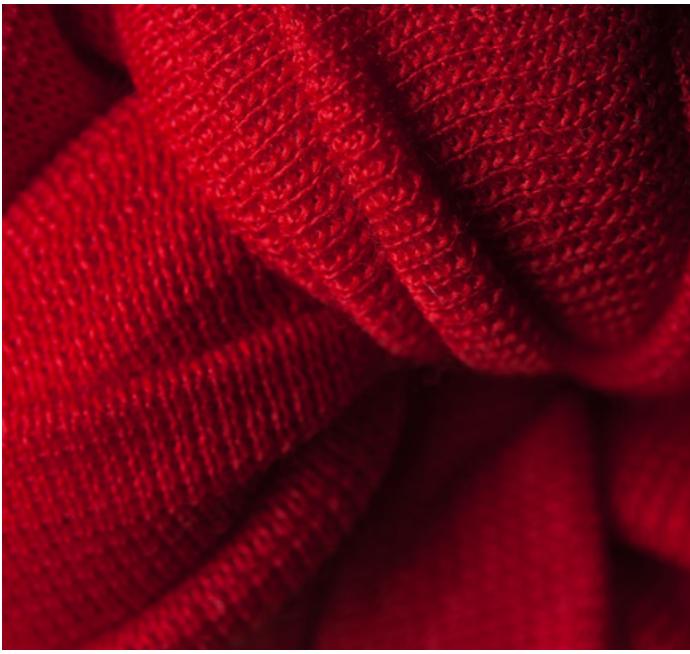
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译者：徐昕

2010 年开始从事瑞典文学翻译，出版的译著主要有《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密室》《把孩子抱回家》《鳗鱼的旅行》等，现居北京。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engin akurt](#) on Unsplash

小说

母亲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 | 故事群岛

两个孩子想到自己是她生的， 总觉得不可思议。

母亲身材瘦小，有些佝偻，经常穿一条蓝色衬裙和一件红色羊毛上衣。一头黑发短而躁，她总给头发抹油，这样会服帖些。她每天都要修眉毛，把眉修得像两条游向鬓角的黑色小鱼，她还往脸上抹一种黄色粉脂。那时她很年轻，两个儿子都不知道她的年纪，但她似乎比同学的母亲年轻许多，两个孩子看见其他同学的母亲总是很吃惊，觉得她们又老又胖。母亲烟瘾很大，指头都被烟熏黄了。她晚上睡觉前在床上也抽，他们仨睡在一张大床上，盖一床黄色的棉被，母亲睡在靠门的那侧，床头柜上摆了盏红色布罩的台灯，晚上她要抽烟看书。有时她回家很晚，两个孩子听见她回来，醒了问她去了哪儿。她总是回答“去了电影院”或“去了某个朋友那儿”。两个孩子不知道她的朋友是谁，也从不见他们登门拜访。她告诉两个孩子，她换衣服时他们头得扭过去，他们听到母亲急促换衣服的声音，看见影子在墙上摇曳。她躺在他们旁边，瘦小的身子穿着冰冷的丝绸睡衣。他们会刻意和她保持距离，因为她总抱怨他们会睡梦中踢她，或压在她身上。有时她关上灯，在黑暗中默默点上根烟，怕惊醒他们。

母亲在家里无足轻重。外公外婆，还有住在乡下时不时带着栗子和黄面粉来的克莱门蒂娜姨妈才重要，女仆迪奥米拉很重要，做草椅、患痨病的搬运工乔万尼也很重要。对两个孩子而言，这些人都很重要，都是可以信任的人，他们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而且做什么都很能干，聪明又厉害：能抵挡暴风雨，也能防御妖魔鬼怪。两个孩子和母亲单独在家时会很害怕，就像家里没大人一样。至于定规矩，她从不禁止或允许孩子做什么事，顶多用疲惫的声音抱怨：“小点声，吵得我头疼。”孩子们问她能不能做某事，或是问她问题，她会马上回答说：“找外婆去。”或者先拒绝，然后同意，最后又拒绝，摸不清她的态度。和母亲单独出门时，他们会惴惴不安，因为她总认错路，总要找交警问路。她进店买东西时也很可笑、羞涩。她总是丢三落四，把东西落在店里：手套、提包或是围巾，又得回头去找，弄得两个孩子很羞愧。母亲总把抽屉翻得乱七八糟，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早上迪奥米拉打扫房间时总数落她，还把外婆叫来看，然后一起收拾袜子、衣服，打扫四处的灰。早上母亲去买菜：到家便把网袋甩在厨房的大理石桌上，骑自行车赶去上班。迪奥米拉会检查袋里的东西，挨个捏捏橘子，摸摸买来的肉，把外婆唤来看，嫌弃母亲买肉有多不上心。母亲两点回家，那时所有人已经吃过午饭，她把报纸放在杯子上，一边读报一边匆忙吃饭，尔后匆匆骑车赶回办公室，晚饭时才能再见她一小会儿，但饭后她就又走了。两个孩子在卧室写作业，床头挂了张父亲的照片，很大。父亲留着方方正正的黑胡须，秃头，戴着玳瑁边的眼镜。桌上摆了张他的小照片，小儿子搂着他脖子。父亲在他们很小时就去世了，他们对他没什么印象。所幸大儿子还依稀有些记忆，一个遥远的下午，在乡下克莱门蒂娜姨妈家：父亲用辆绿色推车推着他在草坪上跑。哥哥之前还在姨妈家阁楼上找到了那辆推车的零件，一个扶手和一个车轮。得到那辆

漂亮的新车，他很开心；父亲推着他跑，长长的胡子在空中飞舞。他们对父亲一无所知，但猜想父亲肯定是那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人，聪明又厉害；外公和姨妈对母亲发火时，外婆常说，应当可怜母亲，她太惨了，如果孩子的父亲欧亨尼奥活着，她不可能是现在这样子。她太可怜了，年轻轻轻就失去丈夫。奶奶也来过一段时间，他们之前从未见过她。她常年住在法国，但时常给他们写信，圣诞节不忘寄来些礼物，后来因年事过高去世了。

下午茶他们常吃栗子，或就着油醋汁吃面包，吃完作业就能下楼去广场，或去轰炸后的公共浴室废墟玩耍。广场上有很多鸽子，他们会喂鸽子一些面包或是迪奥米拉给的一袋剩饭。在那儿能碰到附近所有的小孩、同学，还有周日儿童活动中心的其他小朋友。有时，他们和维格利亚尼神甫来场足球比赛，神甫会提起黑色袍子踢球。他们有时在广场上踢球，或是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外婆会时不时从阳台探出身子，冲他们喊注意安全。天色低沉时，从黑黢黢的广场往上瞧，能看到三楼家里窗子透出的光，心想：等会儿他们就能回家围着炉子取暖，不用惧怕黑夜的来袭，真好。外婆和迪奥米拉坐在厨房里补床单：外公在饭厅戴着帽子抽烟斗。外婆很胖，穿着黑色衣服，胸前戴着装有奥雷士舅舅画像的纪念项链，舅舅是位烈士；外婆做披萨很好吃，做别的饭菜也不赖。她会把两个孩子抱在腿上，即便当时他们已经不小了；她很胖，胸部丰满柔软；从她黑色裙子领口下，能看到她自己做的花边白色厚织羊毛衣。她把两个孩子抱在腿上，有些心疼地用方言哄他们；从发髻上摘下一根长长的铁簪，给他们掏耳朵，两个孩子尖叫着想逃跑，这时外公会拿着烟斗堵在门口。外公从前是中学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退休后编了本希腊语语法书。他教过的学生会时不时上门拜访，为此迪奥米拉三天两头就得煮咖啡；厕所里总有练习本的纸，上面写着拉丁文和希腊文，还有外公用红笔蓝笔做的批改。外公的胡须又短又白，像山羊一样，家人不能太吵，因为多年在学校的工作使他心力交瘁，日益上涨的物价让他精神恐慌。外婆早上总会和他吵一架，因为他总会惊讶家里开销这么高。外公说，迪奥米拉可能偷了家里的糖，背着他们煮咖啡。迪奥米拉听了这话跑到他面前大喊大叫，说咖啡是给常来家里的学生喝的。这些小事很快会平息，孩子们不怕。他们怕的是外公和母亲吵架，母亲有时很晚回家，外公穿着睡衣，披着大衣，光着脚从房间出来，俩人便大吵起来。外公说：“我知道你去哪儿了，我知道你去哪儿鬼混了，我晓得你是什么货色。”母亲说：“随你怎么想！”又说，“你看，你把孩子吵醒了。”他说：“现在倒是关心孩子了？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你就是个婊子，像个婊子一样晚上到处乱搞。”这时外婆和穿着睡衣的迪奥米拉出来，把外公拉回房间，劝他：“别嚷嚷。”这时母亲会爬上床，蒙着床单大声抽泣，哭声在黑暗的房间里回响。两个孩子觉得外公当然是对的，母亲晚上不该和朋友去看电影。他们很伤心，害怕又难过，他们陷在温暖柔软的床里，挨得很近，蜷缩着。睡在中间的大儿子往旁边缩，生怕挨到母亲。对他而言，母亲的哭声、湿漉漉的枕头里，似乎藏着让人厌恶的东西。他觉得：“一位母亲哭泣时，真会让儿子很讨厌。”两个孩子从不提起母亲和外公的争吵，小心翼翼避免谈及此事。他们俩感情很好，晚上母亲哭时，兄弟俩会紧紧相拥。他们为了获得安全感而紧紧相拥，早上会有点不好意思，也因那件他们避讳的事儿。但他们很快就忘记这些不愉快，新的一天开始，他们就要去上学了。路上他们会遇到同学，结伴在校门口玩一会儿。

在灰蒙蒙的晨光里，母亲起床了。她把内衣卷到腰间，给脖子和胳膊打上肥皂，在脸盆前弯下腰。她尽量避着孩子，但她骨瘦如柴的小麦色肩膀，小巧的乳房在镜中一览无余，她的乳头因寒冷而发暗挺起。她抬起胳膊往腋下扑粉，腋毛浓密卷曲。穿戴好后开始拔眉毛，挨着镜子，盯着镜中的自己，抿着嘴唇。她用面霜拍拍脸，抖抖亮粉色的鹅毛粉扑开始扑粉，她的脸就变白了。有时早上她心情不错，想和孩子聊聊天，问问学校同学的事儿，讲讲她上学的故事。她有个老师叫“迪尔切小姐”，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处女，但自以为是小姑娘。准备就绪后，母亲披上大衣，拿起购物网袋，弯下腰亲亲孩子，把围巾围好，化好妆抹好粉匆匆忙忙离开。

两个孩子想到自己是她生的，总觉得不可思议。说是外婆或迪奥米拉生的，还合理些，她们庞大温暖的身躯给他们安全感，保护他们免受风吹雨打和妖魔鬼怪的袭击。想到自己的母亲竟是那个女人，自己竟在她小小的肚子里待过一段时间，他们就感到奇怪。自从他们知道，小孩在出生前都待在妈妈肚子里，他们就对自己在那个女人肚子里待过一段时间感到既惊异又羞愧。她竟然还喂过他们奶，这更不可思议。现在，她再也没有孩子需要喂奶照顾，他们每天看着她买完菜后，骑着自行车离开的身影，她无拘无束，一溜烟跑走。她当然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指望不了她，没法儿要求她做任何事。有些母亲，比如班上同学的母亲，显而易见，她们愿意把整个世界捧到孩子面前。放学后，同学们飞奔到母亲跟前，找母亲要星星要月亮，让妈妈帮忙擤鼻子、扣纽扣，给她们展示自己的作业和儿童画报。那些母亲都上了年纪，戴着帽子、蒙着面纱，或是戴着皮毛翻领，几乎每天都找老师聊几句。她们同外婆和迪奥米拉是一类人：守规矩，做事麻利，从不犯错，从不丢东西，从不把抽屉弄得一团糟，从不深夜归家。但俩孩子的母亲买完菜便拍拍屁股走人，买菜也不用心，被卖肉的骗了，甚至有时找的钱也不对。她就这样走了，追不上她，找不到她。其实他们很羡慕她走得那么干脆，没人知道她办公室在哪儿，她很少提及。只知道她的工作是在机器上打字，用法语和英文写信，说不准她在工作上很出色，很可靠。一天，他们和维格利亚尼神甫，还有儿童活动中心的小朋友一起散步，回家路上在郊区的咖啡馆里看见母亲。他们透过玻璃看见她坐在咖啡馆里，旁边坐着一个男人。母亲把她的格子围巾和旧鳄鱼钱包放在桌上，那两样物件化成灰他们都认识。男人穿着宽大的浅色外套，留着褐色胡子，笑着和她说话。母亲很幸福，开心又放松，她在家里从不这样。她注视着男人，两人手牵着手。她没有发现两个孩子：他们继续在神甫身边走，神甫说要抓紧时间赶电车。赶上车后，弟弟凑近哥哥说：“你看到妈妈了。”哥哥说：“没，我没看见。”弟弟轻笑着说：“你就是看见了，那就是妈妈，她还和一个男人一起。”哥哥把头转开，他是个大孩子了，差不多十三岁。弟弟惹他生气了，因为弟弟可怜他，虽然琢磨不透原因，但弟弟就是可怜他，他也可怜自己。他不愿再回忆看到的那一幕，宁可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他们什么也没给外婆说。早上母亲换衣服时，弟弟说：“昨天和维格利亚尼神甫散步时，我和哥哥看到你了，还有个男人和你一起。”母亲猛地转过身，神色低沉，额头上两条小黑鱼游动着汇集在一起。她说：“那不是我。你在说什么。我得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你知道的，一定是你们看错了。”哥哥接过话，声音疲惫而平静：“对，那不是你。只是一个和你很像的人。”两个孩子心领神会，他们必须删除这段记忆。他们大口吸气，企图让呼吸把这段记忆排除出去。

但那个穿浅色大衣的男人来家里做过客。那时正值夏季，他没穿大衣，戴副蓝色眼镜，穿件浅色布衣，吃午饭时，询问大家他能不能脱掉外套。那时外公外婆去米兰见几个亲戚，迪奥米拉回乡了，他们和母亲单独在一起，那个男人来了。午餐相当丰盛，菜几乎都是母亲在熟食店买的：鸡肉配炸土豆。母亲做了“番茄酱拌面”，很好吃，只是酱有点糊了，还有酒。母亲很激动，想同大家分享许多事儿：想给男人讲两个孩子的事，也想给两个孩子讲男人的事儿。他叫马克斯，曾去过非洲，收藏了很多非洲的照片。他把照片拿给孩子们看，有张拍的是他的猴子，两个孩子问了他许多关于这只猴子的事儿。它特别聪明，男人很喜欢它，它想吃甜食时会做出一些可爱好笑的举动。但他把猴子留在了非洲，因为它病了，他怕猴子病死在船上。两个男孩和男人成了朋友，他承诺会带他们去看电影。两个孩子给男人看了他们的书，其实也没几本：他问他们有没有读过《萨托尼诺·法兰杜拉》，孩子们说没有，他说下次送一本给他们，后来提到《草原上的鲁滨逊》很好看，下次也送他们一本。午餐后，母亲让他们去儿童活动中心玩，但他们还想和马克斯待在一起。他们抗议了一会儿，但母亲和马克斯强制他们去。晚上回家时，马克斯已经离开了。母亲匆匆忙忙做好晚饭，有牛奶咖啡和土豆沙拉：他们很开心，他们想讲非洲和猴子的事儿，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异常开心。母亲似乎也很开心，给他们讲故事，说她见过猴子在手风琴上跳舞。饭后她让两个孩子先去睡觉，她要出去一会儿，安抚孩子们不要害怕，说没什么好怕的，还弯腰亲了亲孩子，说没必要和外公外婆提马克斯，因为外公外婆从不喜欢邀请别人来家里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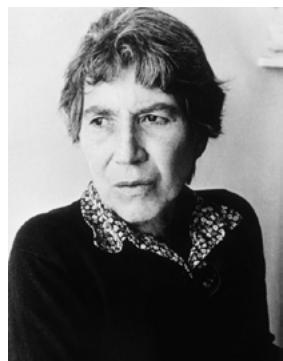
他们和母亲单独待了几天，吃了平日不常吃的东西：火腿、果酱、牛奶咖啡和熟食店的油炸食品，因为母亲懒得做饭，饭后大家一起洗碗。但当外公外婆回来时，孩子们终于松了口气。午餐时餐桌上重新铺上桌布，摆好杯子，他们怀念的东西也都回来了。外婆带着让人安心的身体和气息又坐回摇椅上：外婆不会逃离他们身边，她又老又胖，家里有个永远不会离开的人真好。

关于马克斯的事，孩子们对外婆只字未提。他们期待着《萨托尼诺·法兰杜拉》，期待着马克斯带他们去看电影、给他们看猴子的照片。他们问过母亲几次，问什么时候能和马克斯一起去电影院，母亲说马克斯已经离开了。弟弟问他是不是回非洲了，母亲没有接茬。弟弟想当然认为，马克斯去非洲抓猴子了。在他的想象里，总有一天，马克斯会带着黑佣，肩膀上坐着他的猴子，接他们去上学。学校开学了，克莱门蒂娜姨妈也来待了一段时间，带了一袋梨和苹果，用马沙拉酒和糖烤了水果甜点。母亲心情很差，总和外公吵架。很晚才回房间，不睡觉，抽烟。她瘦了很多，什么也不吃。她的脸越来越消瘦，变得蜡黄。她现在开始画睫毛，先对着一个小罐子吐口水，然后用小刷子蘸取掺了口水的睫毛膏。她粉底涂得很厚，外婆想用手帕帮她擦掉，她却把脸移开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即便开口说话，也看起来很费劲似的，声音十分虚弱。一天下午六点她就到家了，有些不寻常，一般她回得更晚。她用钥匙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小儿子来敲门，他要一个笔记本，房间里传来母亲发怒的声音，说安静点，她想睡觉。孩子怯生生地解释，他要拿笔记本。于是母亲把门打开了，她的脸浮肿，挂满泪水。孩子明白她在哭，于是跑到外婆那儿说：“妈妈哭了。”外婆和姨妈说了会儿悄悄话，她们在谈母亲的事儿，但孩子不知道她们具体聊了什么。一天晚上，母亲没有回家。外公光着脚，睡衣外披着大衣到孩子们的房间看过好几次。外婆也来看了几眼，孩子们睡得很不安稳，听见外公外婆在家里走来走去，开窗又关窗。孩子们很害怕。早上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有人发现母亲死在一间酒店房间，她服毒自杀了，并留下了一封信。外公和克莱门蒂娜姨妈去了警局，外婆在尖叫，孩子们被一位老妇人送下楼，她不住念叨着“真无情，丢下两个骨肉就走了。”他们把母亲带回家。两个孩子看到她时，她平躺在床上，迪奥米拉给她穿上了漆皮皮鞋和她结婚时穿的红绸裙子：她很瘦小，像个没有灵魂的娃娃。

平日的房间摆着鲜花蜡烛，让人有些不习惯。迪奥米拉、姨妈和外婆跪着祈祷。家里人宣称她是误服毒药身亡，牧师如果知道她是故意服毒，会不愿为她祷告。迪奥米拉让两个孩子亲吻她，他们十分不好意思地挨个上前亲吻她的脸颊。而后是漫长的葬礼，他们走遍整个小镇，疲惫至极。维格利亚尼神甫到场了，还有许多同学和儿童活动中心的玩伴也来了。墓地很冷，风很大。他们到家时，外婆对着过道里的自行车哭喊。自行车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母亲下一秒要骑车离开，无拘无束，围巾在空中飞舞。神甫说此刻她上了天堂，他这么说，或许是因为他不知晓母亲是自杀的，又或许他假装不知道。两个孩子不知道天堂是否真的存在，因为外公说没有天堂，但外婆说有。母亲以前说没有，世界上没有天使和美妙的圣乐，人死后会去一个不好不坏的地方，在那里人会无欲无求。无所欲求，人便得以安息。

两个孩子在乡下待了一段时间，和克莱门蒂娜姨妈在一起。所有人都待他们很好，亲吻他们，照顾他们，他们有些不好意思。他们私下从不谈母亲或马克斯；他们在姨妈的阁楼上找到《萨托尼诺·法兰杜拉》，读后很喜欢。但哥哥总想到母亲，比如在咖啡厅看到她的那天，马克斯握着她的手，她的神色松弛而快乐。他又想到或许因为马克斯去了非洲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母亲服毒自杀。孩子们和姨妈家一只叫布比的漂亮小狗一起玩，学着爬树，他们本来不会爬的。还去河里游泳，晚上去姨妈家和大家一起玩填词游戏。两个孩子在姨妈家的每一分钟都很快乐，最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外婆那儿。外婆坐在摇椅上，想用簪子帮他们掏耳朵。周日迪奥米拉和他们一同去了墓地，买了些花，回家路上在咖啡馆坐了会儿，喝了杯混了果汁、茶、香料的热酒。在墓地时，外婆在坟前祈祷、大哭，但看到十字架和坟墓，孩子们还是有些难以置信。墓里怎么会是那个买肉被骗、拍拍屁股骑车走人、抽烟、迷路、半夜抽泣的母亲。她离开了，那张床于他们而言太大了，他们一人枕一个枕头。他

们不常想起母亲，因为想到她，痛苦和羞耻感就会袭来。有时他们试图还原记忆里她的样子，他们各自默默回忆，拼凑出她卷曲的短发，额上的两条小黑鱼一样的眉毛，还有她的嘴唇，这个过程越来越吃力。他们记得很清楚，她总涂很多黄色的粉，渐渐地那张脸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黄点，再也无法还原出母亲的面容和轮廓。但他们现在明白了，他们并没很爱她，或许她也不怎么爱他们，如果爱，她怎么忍心服毒自杀呢？他们听到艾奥米兰、门房、楼下的太太和其他很多人所说的话。后来年复一年，两个孩子长大了，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可他们不曾深爱过的那张脸永远消失了。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1916–1991），意大利著名作家，因其独特的文风和其小说中对混乱社会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描写而受到好评。她最知名的作品包括小说《昔日我们种种》《城市与家》《夜晚的声音》《家庭絮语》等。其中《家庭絮语》曾获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

王晗序 译 陈英 校

王晗序，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大四学生。

陈英，语言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意大利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译有“那不勒斯四部曲”、《愤怒的城堡》《碎片》《拳头》《威尼斯是一条鱼》《迫害》《鞋带》等。

《母亲》（*Mio marito*）选自娜塔丽亚·金兹伯格短篇小说集 *Cinque romanzi brevi e altri racconti*。

Copyright © 1993, 2013 and 2014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Estate of Natalia Ginzburg c/o Giulio Einaudi Editore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Jamie Kern on Unsplash](#)

小说

当老鼠没能来时

杰拉尔德·默南 | 故事群岛

他之所以告诉我这些事，
是因为他知道我也有一部分是老鼠，
并且将永远如此。

曾有几年时间，妻子外出工作，我则在家照顾儿子、女儿，并做些家务。某天下午，儿子在外遇上了雷暴天气。风暴在三点半时向我们所在的市郊袭来，那正是放学的时候。

那天上午八点半孩子们去上学后我便独自在家。整个下午我都在观察窗外积聚的乌云，我想起自己五到十岁时生活的城市，那里到了夏季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场风暴袭来。那里距离后来我和妻儿生活的墨尔本市郊要再靠近内陆一百英里。自搬离那座内陆城市的三十三年来，每当看见天色骤暗，我都会回想起一九四零年代，教室窗外的风暴蓄势待发的场景。

那些年的风暴总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到来。风暴来袭时，教室会变暗，老师不得不把灯打开。我会在第一道闪电落下之前，尽可能离教室的窗户远点。要是在家，我会躺到床底下以躲避闪电。但在学校我只能把脸贴在桌上，祈求上帝不要让窗外的闪电击中我。我从未想过闪电会击中一整群孩子。我脑海浮现的画面，是一道金色闪电从乌云中猛劈下来，打穿被命运做上记号要在那个下午死去的孩子的心脏或大脑。

当我想到自己被闪电杀死时，我很担心这会引发的混乱局面。父亲见我没能按时回家，会沿着我回家的路找我。我答应过他每天下午都会按固定的路线回家。（第一天上学前，我就承诺过绝不会偏离麦克雷街、巴克斯特街和麦基弗路。在极少数下午，我会偏离大街，沿着溪边走上一小段路。这时我会设想，当我走在芦苇丛中时，父亲正走在麦基弗路上。我会设想他是从家里赶来找我的，他要来告诉我，我们的房子被烧毁了，或者我母亲遇害了。但我们在路上不小心错过了对方。在那样的下午，我几乎要从溪边转身往回走，以确保父亲不是正在我身后与我渐行渐远。而就在我犹豫是否要往回走时，我又想到父亲可能已经到了学校，现在正回头往家里走，但这次他决定从大街上下来，沿着溪边走上一小段路，因为他觉得我可能正在溪边游荡，而我则正沿着大街走回学校，并再次与父亲错过。）当父亲在平时的街道上找不到我时，他首先会想，我应该是绕路去看风暴过后湍急的溪水了。他会往溪岸边走去，而正当他在芦苇丛中找我时，一位来自我学校边上的长老会的牧师正骑着自行车沿麦克雷街、巴克斯特街和麦基弗路往我家赶去，要去告诉并不在家的父亲，他唯一的儿子已经被闪电击中身亡了。

我祈祷自己不会在风暴中死去，父亲也不会陷入混乱和不知所措的境地，此时乌云会突然往东边散去，原本似乎已要陷入黑暗的黄昏转眼成了明媚的午后，潮湿的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屋顶上升腾起阵阵水汽。我总祈祷，并总能逃过一劫。当我走回家时，排水沟正哗啦啦地流着，最后的几片乌云正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隆隆作响。排水沟哗啦啦地流，潮湿的树叶闪闪发亮，铁皮屋顶上升腾起阵阵水汽，我虽然知

道自己已逃过一劫，但也只是暂时安全两天。本可以杀死我的闪电此时已越过阿克斯戴尔[1]和希思科特[2]，正劈向远方暗绿色的林间树梢。到了午夜，金色的闪电将射入太平洋，不会再造成危害。再过几天，甚至几周，乌云将悄无声息地消散在新西兰或南美的山脉之中。但就在我往东边走去，往我家走去时，在我身后的某个地方，一场风暴很快又会再次诞生。

我想象中，每年夏天的风暴都诞生于遥远的圣阿诺[3]附近荒芜的牧场上，那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就在刚才，我看了一眼维多利亚州地图，发现自己一辈子没去过本迪戈[4]以东的乡村地区。我刚刚用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接近三角形的形状，从本迪戈开始，往西北到斯旺希尔[5]，接着往西南到霍舍姆[6]，再往东到卡索曼[7]，最后往北回到本迪戈，这是一片超过五千平方英里的区域，而我从未踏足。在接近这片准三角区域中心的位置，便是圣阿诺城。小时候每次听到“圣阿诺”这个名字，我都感觉仿佛听到了打雷前天空的低吼。）

当我想到风暴诞生的场景，我会想象一团乌云从地上升起，就像我曾老爱盯着看的《天方夜谭》里的某幅插图上的邪恶精灵，从困了他数百年的罐子里升腾而出的样子。

父亲一辈子没买过书——不管是给自己买，还是作为礼物送人。但偶尔会有几本书落到他手上。其中一本便是我们称为《天方夜谭》的书。一直到我十三岁之前，这本书都是我读过的最大也最古老的书。小时候我会一直盯着插图看：又矮又胖的男人总蓄着胡子、戴着头巾；又高又壮的黑人们总佩着弯刀；悲惨的驴子总是不堪重负。还有那些年轻的女人，我明白插图是想把她们画得很美，但她们却令我感到厌恶。她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就像娟姗奶牛[8]，而她们的鼻子就像是直接从额头往下长出来的。在这些人生活的城市，街道狭小而昏暗；而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则遍地岩石，荒无人烟；那里的天空不管晴天还是多云，总是灰蒙蒙的。

我想《天方夜谭》里的插图可能是从某些石头或金属雕刻上拓印出来的版画。但直到今天，我对于那些从石头、金属或木头雕刻上拓印出来的画的了解，并不比当年初看这本书时更多。那时我觉得这些阿拉伯人，我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全都生活在风暴的威胁之下。如今，要是我在一本书里刚好看到那种被我称为版画的插图，不管我这么称呼是否准确，我都会想起自己曾为那个被统称为阿拉伯的民族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的女人长得都不好看，而且他们那里的天气看上去总像是风暴来袭的午后。或者我会想起，在盯着驴子和精灵看累了以后，我曾把目光转去寻找阿拉伯万物上空总笼罩着一片灰暗的原因，那时我就会看见无数条细线开始组成一道无法穿越的网格，我在网格的这边，而那些戴头巾的阿拉伯人和他们长着奶牛脸的年轻女人们则在网格的另一边。

我刚开始学认字，便想去读《天方夜谭》的完整故事。我想深入探索阿拉伯世界的怪异和灰暗。有一天下午，那时我还只能零散地阅读一些单词和短语，父亲从我身后走来并向我告诫，说我绝不会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任何有益之事。他告诫我，阿拉伯人会毫不害臊地做那些他和我以及我们内陆城市的人认为罪大恶极并避而远之的事。

十岁时的某一天，我第一次完整地阅读了父亲那本《天方夜谭》里的一个故事。那时的我读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可以添加到我的梦里的情节。我会梦想自己长大后住在一栋大房子里（每根烟囱上都装有避雷针），那房子位于本迪戈和希思科特之间的原始林区里，周围环绕着高大、坚固且紧密交织的铁丝网。其中有一个房间将被配置成私人影院。在那许许多多个炎热的午后，当我房子周边地区的人们正抬头望向耀眼的天空，寻找风暴到来前乌云的迹象时，我则会待在我的私人影院里。影院的百叶窗将会紧闭，防止外面的光线进来。新式电扇将摇晃着脑袋呼呼作响。当我在凉爽的暮光中休息时，我将观看我称为真正的电影的东西，在那些电影里，遥远国度的男人女人们会毫不害臊地做那些我房子周围地区的人们认为罪大恶极并避而远之的事。

我已忘了十岁那年读的那个故事里的大部分情节，唯有一个情节忘不了。我记得故事里有一个女人为了惩罚一个男人，命令她的奴隶把男人扒光，然后用公牛的阴茎对他进行鞭打。

在初次读到那个情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相信《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并非完全是幻想。我试图相信，在书中那些灰色的交叉影线的远端的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一个女人可能曾经没羞没臊地看过并叫出那个赤裸裸的粉色东西的名字，那是我在暑假和父亲一起看着他的兄弟给娟姗奶牛挤奶时，假装没有看到的那个东西，那个从呻吟着撞向院子周围高大的栅栏的公牛身下突出的东西。而就在我想到一个女人可能曾做过这样的事，并因为这个想法而感到一种美妙的颤栗时，我进而问自己，是否在某个我还未曾读过的故事里，当女人的奴隶手上拿着那东西时，女人可能曾将一根娇嫩的手指放在那东西上面，甚至可能将十指紧紧盘绕在那东西上，将它从奴隶手中取下然后——想到这里我可能会脸上一阵抽搐，也可能抱紧自己，或倒吸一口气——优雅地向那个一直赤裸着把双手盖在私处、背对着她直哆嗦的男人走去，接着把那个微微颤抖的长长的东西放在他白花花的臀部上。

我想，如果在书中插图描绘的灰色世界的另一端，曾经上演过哪怕一次这样的事，那么也许有一天，我自己也能见到这些事上演——不仅仅是当我阅读某本古老的书时在我脑中上演，而是会在我的私人影院里上演，在我那被高大的铁丝网保护着的大房子里上演。

在父亲那本《天方夜谭》的灰色插图周围的空白处，有人曾用橡皮图章和印泥盖了一个黑色的圆章，章上写有如下字样：吉朗 H.M. 监狱图书馆 [9]。

在我出生前，父亲曾做了十二年的监狱守卫，在我出生后又接着做了两年。在那十四年里，他一共在四个监狱工作过，最后一个便是吉朗监狱。在我满两岁的那个月，父亲辞去了监狱守卫的工作，携妻儿从吉朗搬到了墨尔本。我记得在父亲十四年监狱守卫生涯的最后几天，我常常会看到一幅场景，那是我在吉朗生活的两年中唯一记得的场景，也是我一生中最早的记忆画面。

我记得自己站在一个房子后方高耸的两段木楼梯之间的平台上往下望，那房子是我父母当时在吉郎市一个叫贝尔蒙特的郊区租住的房子。我先是望向我们家院子末端的灰色木栅栏，接着望向隔壁院子里有着灰色外墙和白色屋顶的一排棚屋。每个棚屋前面都围着一道铁丝网。铁丝网后面是一片灰白色的模糊影像，那是几十只母鸡正在拥挤的鸡棚里四处走动。

我在看的同时，也在听。单就某时某刻而言，多数母鸡是安静的。那些发出声响的母鸡，发出的往往是母鸡在鸡群中会发出的那几种声音里的一种。但从我所站的高处，每时每刻都能听到下方鸡棚里传来连续不断的刺耳叫声，仿佛每个灰色的鸡棚里的每只母鸡无时无刻不在抱怨。

离开吉郎后，父亲住过很多地方，但每到一处，他都会养上至少十几只浅花苏塞克斯鸡[10]。父亲在他住过的每个房子后面，都会用栅栏隔出四分之三的院子来养鸡。按他的说法，这样是为了让他的鸡有地方伸展翅膀。母亲和我有时会抱怨那些鸡不仅把草地践踏坏了，还把院子弄得满是污泥，可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把他的鸡关在鸡棚里。

在父亲离开吉郎后度过的十九年里，他很少谈论自己做监狱看守的那十四年的事。有一次我问父亲，下雨天时他在后院会穿的那件奇怪的灰色雨衣是从哪里来的。他说那是他的油布披风，并说所有的监狱看守在雨天时都会穿这样的东西。他说他辞去看守工作时，忘了把油布披风还回去。

十三岁的一天晚上，我在广播节目里听到一个故事，说是在我出生前几年，有一个男人曾在墨尔本周边地区杀害了三名少女。我听的时候以为那个男人和那些少女都是虚构的，可就在节目快结束时，父亲告诉我，我听到的大部分都是真的。凶手的名字叫阿诺德·索德曼[11]，他是在位于墨尔本市郊的彭特里奇监狱被绞死的，而我后来就出生在那个郊区。索德曼被执行绞刑的那天早上，我父亲是当值的看守之一。我问父亲，索德曼在被绞死之前是什么样子，都做了什么。父亲告诉我，他从未在一个活人的脸上看到过像那天索德曼的脸上那样的灰色。

父亲有一根和他前臂差不多长的木棍，他把它和自己的鞋子一起放在衣柜底下，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那根木棍是黑色的，一头粗一头细。细的那头钻了一个孔，上面系着一圈结实的绳子。那根木棍是他在吉郎监狱执勤时配备的警棍。

就在父亲过世超过二十年后，我心想他大部分的朋友应该也已过世，我再也无法了解更多本就知之甚少的父亲的人生故事了，这时我在一本宣传册上读到了一小段关于我父亲的文字。

那本宣传册上印着各种各样关于西港[12]弗伦奇岛的历史。父亲过世差不多十年后，我留意到报纸上开始有文章把弗伦奇岛描绘成旅游胜地，可在那之前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岛上都运营着一座监狱，而那座监狱也是父亲十四年的看守生涯中曾工作过的四座监狱之一。

我在宣传册上读到这么一段，说是我父亲（他的姓被拼错了）最早把雉鸡引进到了弗伦奇岛，那大约是在我出生前十年的事，而在制作这本宣传册时，岛上的雉鸡仍很兴旺。父亲曾在监狱的笼子里培育雉鸡，然后把它们的幼崽放到岛上的灌木丛中去。

在读完我父亲与雉鸡的故事后，我想知道是谁把这个故事提供给了编撰宣传册的人。我从其中一位编撰者那里得知，这则故事来自一位住在墨尔本市郊的女士（据说她已年老体弱）。于是我把信给了那位女士。

那位女士用无可挑剔的笔迹给我回了封信，说她对我父亲了解不多。那则关于雉鸡的故事来自她的姐妹。她们的父母是弗伦奇岛上的农场主，当我父亲在岛上做监狱看守时，她的姐妹正和父母住在一起。她姐妹和我父亲当时是好朋友。那时，每当她回弗伦奇岛看望父母时，她都感觉我父亲在追求她的姐妹。不过她的姐妹后来离家做了修女。在她回信时，她的姐妹仍是修女。当她告诉她的姐妹，有人正在制作宣传册，要向游客介绍弗伦奇岛的历史时，她的姐妹让她务必向编撰宣传册的人转达，那个把雉鸡引进到岛上的男人的故事。

那位女士还在信中写了她姐妹加入的修女会的名字，以及她所在的修道院的地址。我对那个修女会的了解仅限于儿时所闻：据说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修女会，它的成员从不离开自己的修道院。那位曾与我父亲是好友的修女，自从1930年代离开弗伦奇岛（我父亲曾在那里把雉鸡幼崽放生到灌木丛中）后便一直生活在墨尔本市郊的一间修道院里。自那之后的许多年，那位在她姐妹看来曾被后来成为我父亲的那个人追求的修女，只能在修道院里接受自己最亲近的家人的探望。来访的人会坐在访客室里，而那位修女则要隔着嵌在墙上的铁栅栏和他们说话。

我记得风暴来临的那个下午，我在家门口见到了儿子，便接过他的书包，然后从布草柜里拿出一条毛巾，让他把脸和头发擦干。我记得当儿子在浴室里脱去湿衣服、擦干身体时，我给他煮了一杯热可可。之后我走进浴室，捡起湿衣服，把衬衫、背心和短裤放进洗衣篮里。当儿子穿着运动服在客厅的暖炉前喝着热可可时，我在他身前的晾衣架上整理他的套头衫和长裤。

儿子有时会指责我，说我把早年的一些重要细节给忘了，在那些年里，我会为他准备午餐，给他煮热可可、整理橱柜、洗衣服，还会在夜里给他读故事。就在不久前，我和他说，七年前的一个下午，他曾站在客厅的暖炉前一边喝着热可可，一边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但他却看着我，仿佛十二岁的他在外遭遇雷暴天气的那个昏暗下午，以及老鼠没能来的事，都是我做的一场梦。

我在写上面那段以“我记得”开头的段落时，我本该记得，我不会在儿子脱去湿衣服的时候就开始煮热可可。我会等他先把每天回家就要做的那件事做了。我会等听到他房间里传出“砰砰”和“嘶嘶”的声音时再开始煮可可。那声音是从被他称为“他的装备”的仪器里传来的。

我的儿子患有哮喘，每天隔几个小时就要用药。其中一种药是液体，需要汽化后吸入。儿子每天要在口鼻部戴上一个透明的塑料面罩，每次要坐着戴十分钟，一天需要戴三四次。他的药就装在面罩下方挂着的一个小塑料罐里。有一根橡胶管子把塑料罐

和一个电动泵连接在一起。电动泵会通过橡胶管把空气打到塑料罐里。接着，我可能永远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压缩空气就会把罐子里的药液变成水汽。大部分的水汽会悬浮在面罩里被我儿子吸收，但有一些水汽会跑到面罩的边缘，然后从通风孔跑出来。儿子第一次看见缭绕在他面部周围的那一缕缕水汽时，他便称之为“他的胡须”。

我儿子人生中的前五年经常住院。因为妻子要在外工作，在儿子住院的日子里，每天上午和下午我都会坐在他的床边陪他，女儿则交由邻居照顾。

医院建在陡峭的山坡上，儿子的病房在楼上。在病房的一侧，有一扇玻璃门通往外面的露台，在那里可以俯瞰雅拉河谷[13]。儿子住院时，往往是深秋或冬天，经常有雾或有雨，因此没什么人到露台上去。在那些日子里，我会坐在儿子的床边，透过窗户向露台外遥望，试着在雾色或细雨中望见坦普尔斯托[14]的丘陵或沃兰代特[15]周围的原始林。

在有雾或有雨的日子，我会给儿子念他最爱的书，念他姐姐的书，念我每天给他买的新书。我不断给他提供纸、水彩笔和铅笔，如果他觉得太累了，我就在他面前画画、做纸模型。每天我都会在去医院的路上买一个火柴盒小汽车玩具，加到他的收藏里。我们会把毛绒玩具放在他病床的绿色被单下面，把隆起的绿色被单称为“小山丘”，然后用玩具车在这片假想的风景中进行漫无边际的旅行。

在天气好、儿子呼吸也不困难时，我会把他带到外面的露台上去。

从我们露台的护栏到楼上露台的底部，立着一道坚固的铁丝网。儿子和我会把脸贴在铁丝网上。有时这孩子会站在我边上，有时他则会骑在我背上，把下巴枕在我肩上。向下遥望，我们能看見远处往来的汽车，从高架桥上穿过的火车，迦密山圣母学院的庭院里穿着蓝灰色校服的女学生，坦普尔斯托的翠绿丘陵，有时——如果天气足够晴朗——还能看到三十英里外唐娜布昂山[16]那连绵的深蓝色山岗，那是大山脉的起点。

在露台上时，儿子往往心情不错，会对出院满怀期待。他会和我说在铁丝网的另一头他都看到了什么。而我会等他问那两个问题，那是他每次想到未来时都会问的。我会等他问，为什么那么多孩子都可以自由呼吸，而他却要受哮喘的折磨，以及他什么时候才能永远摆脱哮喘。

对儿子的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很老套，但我并不只用语言回答。中学毕业后我受训做了小学老师。儿子出生前一年，我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但在那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我都在教九到十岁的男孩女孩。我在和儿子或女儿说话时，喜欢把自己的教师技能用上。

在医院的露台上，我会先和儿子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经受同样多的苦难。但是，我说，有一种人在小时候就经受了大部分的苦难。（这时我会用双手在儿子头顶上空比划出一个表示乌云的形状。接着我会猛地分开双手来表示乌云散开了，紧接着我便开始在儿子的头顶上空快速挥动十指，表示大雨落在了他身上。）另一种人，我说，小时候没经受过任何苦难。（这时我把身子稍稍压低，然后努力做出一个孩子无忧无虑、活蹦乱跳的样子。）几年过去了，我说，这两种人都长大了。第一种人，那个时候经受过苦难的人，现在身强体健。（我背起儿子往铁丝网冲去，假装要撕破它。）但是第二种人，他对苦难毫无准备。当苦难到来时，他只会逃跑、躲藏，并终日生活在对苦难的恐惧中。这时我会把儿子放下，向后退上两步，然后变成那个幼时并未学会经受苦难的人。我抬头向上望去，看到自己用一只手在头顶上方画了一个大圈，我知道那个圈代表着一片乌黑的雷雨云。接着我看到自己那只伸出食指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袋上空向下俯冲。我知道自己的四周正落下一道闪电，于是我逃跑了。

经年累月，儿童病房的露台已经变成了丢弃旧玩具和旧家具的地方。每当我回答儿子的问题时，都会留心站在某个特定的位置。当我扮演那个害怕苦难的人时，只需要几个箭步，便来到露台角落那张废弃的病床旁。接着我会钻到床底下去躲避闪电。但那张床上既没有床垫也没有被褥——我头顶只有用来做床垫底架的细钢架。哑剧表演的结局，往往是我坐在床底下对着儿子傻笑，就好像那个逃跑的人以为自己安全了，但同时在我视线外的头顶上方，我的一只食指正不断戳向那松垮的床垫底架的空隙处。

在回答儿子问的另一个问题时，我会尽量谨慎。医生只能对妻子和我说，有一定比例的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后，哮喘发作的次数会显著减少。但有时我会在报纸上读到某个跑步运动员、骑师或橄榄球运动员小时候也曾患有严重的哮喘。我会把那个人的照片贴在冰箱门上，让儿子每天都能看见。

在儿子七岁那年的冬天，他的哮喘比以往任何一个冬天都严重。可就在那个冬天之前的夏天，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他要从哮喘中康复的迹象。在他七岁那年住院时，他又问了我他总会问的第二个问题。但那一次，我变得鲁莽了。我和他说，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我和他说，往后的每一年，他都会越来越强壮，而他的哮喘则会逐年消退。我和他说，再过五年，我们的梦想就会实现：到时候他就能摆脱哮喘，自在地呼吸了。

在儿子七岁那一年的十四年前，每天下午，我都会独自待在百叶窗紧闭的客厅里。当时我住在一套租来的公寓里，按房产中介的说法，这套公寓装修豪华、家具齐全、设施完备，适合做生意或双职工的夫妇居住。当时我一个人住，这套公寓的租金占了我到手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但我还是选择了住在那里，因为我受够了五年前搬离父母家后就一直住在寄宿公寓和群租公寓里，和各种古怪的单身男女共用浴室、厕所和厨房的生活。

那套公寓位于一楼，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公寓楼前的石子车道以及一部分外面的大街和人行道。我始终将客厅的百叶窗紧闭，是因为我希望邻居和路过的人以为我不在家。

在儿子七岁那一年的十四年前，我在墨尔本东南远郊的一所小学当老师。那个郊区本是一处海滨胜地，与墨尔本原先的几个远郊（如今的近郊）还隔着牧场、湿地以及蔬菜农场。我是一九六几年在那里教书的，但直到一九五几年还有新婚夫妇选择

去那度蜜月。我那百叶窗紧闭的公寓位于郊区的老区，也是新婚夫妇度蜜月时曾徜徉的区域。我任教的小学位于郊区的边缘地带，在一座小山坡上，从山顶不仅能看到菲利普港湾[17]，往东南方还能远远望见一部分的西港，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看到蓝灰色的一个模糊影子，那是弗伦奇岛的一角。

我学校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住在离我住处超过两英里的地方。我刚搬进租来的公寓时，不希望任何孩子或家长知道我也住在他们的郊区。我不希望孩子或家长知道，我每天下午、每天晚上以及几乎每个周六和周日都独自待在公寓里。我尤其不希望家长们好奇，为什么我好像没有朋友，无论男女，或者好奇我一个人在租来的公寓里都干些什么。

我在租的公寓住了几个月后，班上有几个孩子知道了我住的地方。那是三个九岁大的女孩，她们在某个周六上午骑自行车经过我住的那条街时，我刚好买完为周末准备的东西，正往家里走。那三个女孩和我进行了礼貌的交谈，之后我以为我们就各走各路了。结果她们却骑着自行车，隔着大概二十步的距离跟着我。

我走进公寓后关上门，透过拉下的百叶窗看到那三个女孩正站在人行道上往我的公寓观望。几分钟后，当我正把购物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整理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我打开门，发现那三个女孩中的一个正站在我的门廊上。另外两个女孩和她们的三辆自行车仍旧在人行道上。门廊上的女孩礼貌地问我，能否允许她和她的朋友们给我的公寓做一些打扫的工作。

我谢过那女孩，告诉她我的公寓挺干净的（是真的）。接着又说我正准备出门，要出去一整天（并不是真的）。

我说话时把头低下靠近女孩，轻声与她交谈。我不希望住在隔壁的女人听到我说的话。我觉得她正透过拉下的百叶窗看着我和女孩。我一边说，一边高兴地看到女孩露出准备离开的表情。可这时我刚好抬头看到大街上有一个女人经过，她正带着严厉的表情看着一个独居男人在家门口对着一个小女孩说悄悄话。

那天以后不管谁来敲门，我都没有再应。我不希望我的邻居们或任何一个正从大街上走过的成年人以为我是那种会喜欢九岁女孩的独身男人。

事实上，班上确实有几个九岁女孩，以及两三个男孩，是我喜欢的。每天我都会透过余光去看那些女孩光滑细嫩的皮肤，以及那些男孩充满信任的眼睛。我绝不敢哪怕是用指尖去碰一下他们，或做任何可能显露我对他们抱有那种感觉的事。当我给最爱的孩子们上课时，我唯一想要的，不过是希望他们能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可当我远离他们的视线时，我常常会梦到他们。

在梦里，我和我最爱的孩子们一起住在一座大房子里，那房子四周被高大的铁丝网包围，坐落在维多利亚州东北部的原始林区里。那些孩子也不再是孩子，而是接近成年。他们可以随意在我那大到没有边际的房子里挑选一间套房来住。我绝不会勉强他们陪着我。我一个人住在房子一楼角落的一间设施完备的公寓里。但那些已不再是孩子的孩子们知道，我随时欢迎他们来敲我的门。我总是很高兴能把他们带进我的房间，在那个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在大多数下午和晚上，我会坐着观看黑白灰的电影，电影里那些位于世界另一头的遥远国度的男人女人们正没羞没臊地做着那些我希望我最爱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梦到的事。

在儿子七岁那一年的十四年前，我设计了各种项目来让班上的孩子通过写作表达自己。我想知道这些孩子的心里已经存储了怎样欢乐与悲伤的记忆。我想知道我最爱的那些孩子在对着空气发呆时，在做着怎样的梦。

有一天我向全班宣布，我给他们每个人在新西兰找了一个笔友。我宣布在接下来两周的英语课上，每个孩子都得准备一封要寄给笔友的长信。此外，每个人还要画几张画，可能还要准备一张自己与家人、朋友和宠物在一起时的照片，到时随信一起寄去新西兰。我还宣布，等班上四十八个孩子都把信和随信要寄的东西准备好了，我就把它们打包寄到新西兰一所很大的学校的一位老师那里。那位老师会把我们的信分给他们学校的孩子。再过几个星期，我会收到一个来自新西兰的包裹，到时班上每个孩子都将收到一封来自新西兰的孩子的信，以及他们画的画，可能还有照片。我和那位新西兰的老师是在两年前认识的，当时他通过一个教师交流项目来到了墨尔本。就在他离开墨尔本前，他把他在新西兰的地址给了我，并提议我们可以每年把各自班上的学生配对为笔友。那人回新西兰的第一年，我并未采纳他的提议。可第二年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告诉班上的学生，有一班新西兰的孩子在等着读他们的信，他们将会写出怎样的文字来描述自己呢？

我本该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先和那位新西兰的老师确认一下，可我太想让孩子们早点动笔了。在他们动笔一周后，我给那位新西兰的老师写了一封短信，想告诉他有一个装着孩子们来信的包裹很快就会寄到他那里。就在我准备要寄出那封短信时，我自己找不到那位新西兰老师的地址了。我在通讯录里找到了很多我根本不记得曾见过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可我就是找不到那位新西兰老师的地址，而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住在新西兰的人。

就算我不想告诉班上的孩子，自己找不到新西兰老师的地址了，也应该在第二天让他们把信和画的事暂时先放一放。接着我应该找出那些面向新西兰老师发行的期刊的地址，给每一个期刊的编辑写信，请他们在期刊上刊登一则为澳大利亚墨尔本远郊的一个学校的一班学生征集新西兰笔友的通知。可第二天当我看到孩子们在修改、重写他们的信时，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他们写的信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收到。

在那之后，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告诉孩子们我都做了什么。我甚至没法着手去给孩子们再找一个能收信的新西兰班级。接下来的五天，每天我都要通读孩子们的信，用浅色铅笔纠正他们的拼写和标点。每天我都要看着孩子们把写错的字重写一遍，补上标点，然后把纸上的浅色铅笔标记擦去。每天我都要看着孩子们用彩色铅笔给他们画的房子、自行车和度假地上色。每天我都要帮孩子们把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照片在信上固定好。接着，到了那周末，我便把孩子们的信全部装进包里，带回了我的公寓，然后把它们全部倒进卧室的嵌入式衣柜底下的一个纸板箱里。

在孩子们把信给我时，我曾提醒他们，接下来几周都不要期待回复。我告诉孩子们，他们应该忘掉自己寄出了这些信，这样等他们终于收到回信时才会更加惊喜。我甚

至还曾在班上说，但愿我那位教师朋友在把他位于新西兰的地址给我后，没有搬过家，或遭遇什么意外。

孩子们是在六月把信给我的，而学年要到十二月才结束。从那一年的六月直到十二月，我每天都在课上给孩子们提供新的活动，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希望能帮他们忘掉写去新西兰的信。有些孩子似乎只过了几周就忘了那些信。而有些孩子几乎每天都会惦记那些信，并且会提醒我，他们还没收到回复。

我在那年的九月份提交了转校申请，将转到墨尔本另一头的郊区去。那学年的最后一个教学日过后，第二天我就把衣物和书籍打包收拾好，准备叫出租车运到我的新家去。我把从六月份起就藏在衣柜底下的那个纸板箱也打包封好了。

在把纸板箱封好之前，我在箱子旁边的地板上跪了一个小时，把每个信封和信封里的每张纸都撕得粉碎。在撕的时候，我没有一次低头去看我的手在做什么。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孩子的名字，也不想看到他们写给陌生的新西兰孩子的任何一个字。就在我把所有的纸都撕成碎片并塞进纸板箱准备封起来时，我想起了八年前，自己也曾把纸撕碎，然后把碎纸片塞进一个小纸板箱里，那时我住在父母的房子里，那个纸箱是我用来作为老鼠的饲养箱藏在房子后面的棚屋里的。

我之所以把孩子们的信撕碎，是因为我想到，那箱信可能会在从孩子们所在的郊区到我的新家的路上，从出租车上掉下去。我想到有人会在街上捡到那箱信，看到信封上的名字，然后又把那些信寄回给我之前班上的孩子们，这时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就会明白这些信根本没被寄出去。

当我刚开始收拾行李时，我想过要在公寓后面的小院子里放一把火，把那些信全部烧掉。可接着我又想到，焚烧后的纸片可能会被风吹起，越过公寓楼外的围栏，被往东边吹去，吹向那些曾是我学生的孩子们的家。我在脑海中看见一片又一片被烧成灰色的纸片，上面黑色的笔迹在灰色背景下清晰可见，而所有这些灰色的纸片都飘向了那些曾在它们还是白纸时，在纸上写下信息的孩子们。

儿子喝着热可可，我则在晾衣架上整理他的湿衣服。我告诉他，现在不用担心了。他已经从风暴中平安回到了自己家，擦干了身体：“他的装备”已经帮他缓解了哮喘；他现在可以和我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着风暴的尾巴从我们家经过。

儿子告诉我，他这一天过得并不辛苦。他表示自己度过了相当愉快的一天。他们班度过了一个几乎完全自由的下午。先是他们中学里的一位老师生病没来，接着他们的科学老师又在最后一小时的课上让他们自由活动，因为老鼠没能送来。

儿子说，在过去的三四个星期里，科学课上的同学们一直在期待着老鼠的到来。科学老师告诉他们，她从某个实验室里预订了五十只老鼠。她事先和全班同学安排好了一系列的实验。老鼠们将被三三两两地装进不同的笼子里。有一些老鼠将被允许进行配种。班上的每个孩子都会负责饲养和观察其中一个笼子里的老鼠。

儿子告诉我，老鼠本该在那天早上送达学校的，但它们没有来。儿子都已经把他的鼠笼整理好了。他给老鼠们铺了一小堆碎纸片，用来垫在它们的纸板箱窝里。但科学老师在最后一节课开始时向全班宣布，供应老鼠的人让她失望了。老鼠没能送来，而这节课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要打电话搞清楚那些老鼠到底怎么了。老师说，她不在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可以自习。儿子告诉我，老师说完就离开了教室，而他则把那节课剩下的时间用来和朋友聊天，以及观看风暴来临的场景。

在听儿子说这些话时，我感到了一丝难过，说不清是因为谁，或因为什么。可能我是为儿子和他的朋友们难过，因为他们等了那么久的老鼠没能来。或者，可能我是为那位老师难过，因为她不得不让班上的同学们失望，又或者因为她不得不欺骗那些同学（因为她忘了预订老鼠，或者她好多天前就已知道老鼠没法送来，但她一直不敢告诉他们）。又或者我是为那些老鼠难过，因为运送它们来学校的出租车可能在风暴中翻车了，装着它们的箱子摔到马路上裂开了，于是它们只能在湿滑的灰色马路上乱窜，满身泥泞，不知所措，或者被排水沟里汹涌的雨水席卷而去。

每当儿子说到“老鼠”这个词时，他都会通过眼睛、嘴巴和肩膀做出一些不易察觉的动作。除了我，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些动作。他会把眼睛稍稍偏向一边，把嘴角稍稍向外伸展，并且把肩膀稍稍耸起。当我意识到儿子在做这些不易察觉的动作时，我也找机会说了“老鼠”这个词，并在说的同时做了这些不易察觉的动作。

这些不易察觉的动作是早些年儿子更年幼的时候，我们俩在聊到老鼠或其他毛茸茸的小动物时会向对方做的那些动作的残留痕迹。在那些年里，只要他或我在对方面前说到“老鼠”这个词，说的人就会把眼睛斜望向一边，把肩膀高耸到靠近头的位置，然后把嘴巴向外张大，把双手像爪子一样举到胸前。

早前的那些年里，我一直都明白，儿子的这些动作是在告诉我，他内心是一只老鼠。他是在告诉我，他比其他孩子要瘦小，并且因为哮喘而变得虚弱。那些年，当我也向他做那些动作时，我是在告诉儿子，我明白他的“鼠性”，并且我绝不会忘了每天在他的小碟子里放一小撮燕麦片，一小块涂有维吉麦[18]的面包以及一小片生菜，或者在夜晚转凉时，往他的笼子角落里放上一堆碎纸片。

当儿子在风暴来袭的那个下午向我做那些不易察觉的动作时，他似乎在说，他永远会有一部分是老鼠。他似乎在说，他没有忘记我在五年前曾和他说过，再过五年他就将摆脱哮喘；他虽然没忘，但他知道我当时和他说的话并不是真的。他似乎在说，他每天都记着我在五年前和他说过的话；当他气喘吁吁地在刚过境的风暴中往回家走时，他记得我说过的话；但他也知道，我之所以和他说那些话，只是为了让他在早前的那些年里相信，他有一天可以不再做老鼠。

在风暴来袭的那个下午，儿子似乎也在告诉我，他作为老鼠的生活并非不可忍受；当他冒雨走回家时，他并没有不开心；当他此时和我一起坐着看最后的几片乌云往墨尔本东北方向的丘陵地区飘去时，他也没有不开心。最后他似乎还在告诉我，他之所以告诉我这些事，是因为他知道我也有一部分是老鼠，并且将永远如此。

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墨尔本东南郊的一个房子里，当时我曾在房子后头一个用水泥板搭的棚屋里养老鼠。大部分老鼠不是白色、灰色就是浅褐色，但有一小部分是杂色的。我怀着只培育出杂色鼠的目的，对它们选择性地加以培育。

我把大约十二只老鼠放在一个大笼子里，并把四五只公鼠分别放在棚屋另一头远离母鼠的几个小笼子里。我还有两个小的配种笼，一公一母的两只老鼠将被关进同一个笼子，一直关到母鼠怀上幼崽，公鼠才会被放回自己的笼子。每窝我只会留下两只杂色鼠。我会把剩下的都淹死。我会把不想要的老鼠放入装着石子的旧袜子里，然后把它们浸入水桶中。当我把袜子浸入水中时，我没有一次低头去看我的手在做什么。

我每天至少会在棚屋里花一个小时和老鼠们单独在一起。我会给它们喂食，清理它们的笼子，并给它们的窝里铺上碎纸片。然后我会研究记录着这些老鼠血统的各种图表，以决定下一对要配种的公鼠和母鼠。

在观察老鼠的同时，我也在注意倾听棚屋的某面灰色墙壁的另一头，是否有声音传来。我这么做，是想知道隔壁的那个女人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她家后院。

那女人三十岁左右。她和自己的丈夫、母亲以及襁褓中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他们一家都是拉脱维亚人，彼此间用一种我想应该是拉脱维亚语的语言交流。每当我听到墙那边传来那个女人的声音，我都会把棚屋的门锁上，然后在鼠笼后面的墙角边蹲下。我在墙角做着一个想要繁殖的独身男性所能做的一切。我蹲在墙角时，没有一次低头去看我的手，但我会把一只耳朵紧贴在水泥墙板上，去听那个女人用她的语言说话的声音。当我听到她的声音时，我会假装她是在和我一个人说话，并且是说着没羞没臊的话。

到那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时，大部分孩子似乎都已忘了之前写信到新西兰的事。只有一个男孩还会隔几天就悄悄来问我觉得装着那些信的包裹可能去哪了。虽然那个男孩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之一，但他并不在我最爱的孩子之列，因为他经常躁动不安，而且很爱说话。之前教过他的一位老师告诉我，男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父亲太为他操心了。他父亲自己就是一位老师，并且对男孩管教很严。

在学年结束前的几周，当那个男孩又来问我信的事时，我有时会觉得，他可能已经怀疑我并没有把信寄去新西兰了。当我决定先把信撕碎再装进出租车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个男孩。

我搬去的地方是一套位于楼上的公寓，没有院子，不能焚烧大量的纸。不过我搬进新家后不久，就开始经常拜访一对住在墨尔本东北部丘陵地区的夫妇。某个周六，我去拜访他们时，包里塞满了那些本要寄去新西兰、但已被撕碎的信。

在一个多云的午后，吹拂着凉爽的清风，我把信烧了。那天的风，和墨尔本周边地区几乎所有的风一样，是从西往东吹的。在所有的纸片都烧完后，我又拿一根棍子去把灰烬捣碎。我不希望地上留有任何一片能看到黑色字迹的焦纸片。但我还是注意到，有一些灰色的纸片在烧的时候被风吹起，往最近的树梢上飘去了。

我当时身处墨尔本东北部的丘陵地区，靠近山脉地带，在我出生那年的夏天，那片山脉曾经遭遇了维多利亚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我曾读到，大火产生的浓烟一路飘过了塔斯曼海，把新西兰的天都变暗了。我还读到，有一些枝叶燃烧后的残片随着乌云飘落到了新西兰的一些城市，那些乌云是从很远的西边，从维多利亚州燃烧的森林里一路飘过去的。当看到我烧过的一些灰色纸片被吹向东边的树梢时，我想到，这些残片可能最终会飘落到新西兰，其中某块残片会刚好被一个九岁或十岁的男孩或女孩看见，而那个男孩或女孩将会认出残片上某个孩子曾写下的几个字。

在儿子遇上雷暴天气那一年的五年后，也就是我把孩子们的信烧毁近二十五年后，我在一份墨尔本的报纸上看到一小张男人的照片，那人就是当年我班上四十八个孩子里最后一个还会提醒我，他们写给新西兰的信没有收到回复的男孩。自从近二十五年前我搬离墨尔本的东南远郊后，我再未有过这个男孩的消息，但如今长大后的他，已经成了我读到的那份报纸的南太平洋地区通讯员。

在那个曾是我学生的男人的小小照片底下，是一篇他用报社记者的语言写的报道。我明白他在报道的是，新西兰有一些人担心一团包含有毒物质的云体正从东边向他们靠近。同时他还报道，澳大利亚也有一些人担心，这团云体在经过新西兰之后，会继续往澳大利亚靠近。那团云体是在新西兰以东很远的太平洋海域上的某个地方生成的，来自法国的科学家在那里引爆了一枚炸弹。

在读完那篇报道后，我却并不担心那团毒云。我想的是，毒云并非自东向西移动，而是自西向东移动，一如我小时候害怕的风暴，一如我儿子曾遇上的风暴，一如我出生那年的森林大火产生的浓烟，皆是如此。我在脑海中看见的是，毒云最终飘落进了南美洲附近的大洋里，正如每一个始于圣阿诺附近牧场上的风暴，那像《天方夜谭》里灰色的精灵那样诞生的风暴，最终都将云落于此，归于平静。

在我十五岁那年接近尾声时，父亲告诉我，我们很快就要搬离那个屋后有着灰色水泥板搭的棚屋的房子。我们要搬去的那个房子后头没有棚屋。

我明白搬到新的地方后，我就没法再养老鼠了。我也不可能再靠墙蹲着去听一个女人在墙的另一头用外语说话了。

在搬离那个后头有棚屋的房子前的最后几周，我准备把所有的老鼠都淹死，并将那个写着老鼠血统和交配记录的笔记本撕毁、烧掉。当我翻阅着那些记录时，我注意到有一只公鼠还从未被用来交配过。其他公鼠都至少有一次被从自己的笼子里挪到配种笼里，并在笼中和一只母鼠一起待到母鼠怀上幼崽为止。但有一只公鼠，在还没完全长大就被带离母亲和同窝的兄弟姐妹时起，始终保持着独身。

我看了一看那只一直被单独关在笼子里的老鼠。那只老鼠正站在笼子前端的一小块铁丝网纱窗面板附近。我想，当那只老鼠站在黑暗的笼子里隔着铁丝网纱窗向外望时，站在细铁丝网另一边昏暗的光线下看着它的我，在它眼中只是一个模糊的灰影。那只老鼠把鼻子贴在铁丝网上，嗅着空气。

我知道自从我把这只孤独的老鼠关进它的笼子后，它就再没见过其他老鼠，无论公母。但我想知道，这只老鼠是否曾偶尔嗅到过其他老鼠的气味，无论公母，或是否曾偶尔听到过其他老鼠的叫声，特别是当我刚把一只公鼠和一只母鼠一起关进配种笼时

从那里面传来的叫声。

当我站在笼子前时，我知道我可能会把那只孤独的老鼠独自留在它的笼中，一直到我把所有老鼠淹死的那天，甚至在我杀死它时，我也会让它孤独地死去。我知道，我也可以把它从笼中取出，然后放进那个同时关着十二只母鼠的笼子里，让这一只公鼠在十二只母鼠中一直待到我把它们全部淹死的那天。我还知道，我也可以把装着这只孤独的老鼠的笼子拿到棚屋的另一头去。我可以把这个笼子和那个装着十二只母鼠的笼子摆在一起，让它前端的铁丝网纱窗面板靠着母鼠笼子前端的铁丝网纱窗面板。我可以让那两个笼子一直以这样的姿势摆放，直到我把所有老鼠从它们各自的笼中取出来淹死的那一天。

[1] 阿克斯戴尔 (Axedale)，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距本迪戈以东约 23 公里，距墨尔本西北约 145 公里。以下注释地名，如无特殊说明，均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不再重复。

[2] 希思科特 (Heathcote)，距本迪戈东南约 40 公里，距墨尔本以北约 110 公里。

[3] 圣阿诺 (St Arnaud)，距本迪戈以西约 105 公里，距墨尔本西北约 244 公里。

[4] 本迪戈 (Bendigo)，距墨尔本西北约 150 公里。

[5] 斯旺希尔 (Swan Hill)，距本迪戈西北约 188 公里，距墨尔本西北约 340 公里。

[6] 霍舍姆 (Horsham)，距本迪戈以西约 215 公里，距墨尔本西北约 300 公里。

[7] 卡索曼 (Castlemaine)，距迪戈以南约 38 公里，距墨尔本西北约 130 公里。

[8] 娟姗牛乳 (Jersey cow)，原产于英吉利海峡南端泽西岛（旧译娟姗岛）的一种奶牛。

[9] 吉朗 (Geelong)，距墨尔本西南方向 70 多公里。H.M. 是女王陛下 (Her Majesty) 的缩写，常见于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监狱名。

[10] 浅花苏塞克斯鸡 (Light Sussex)，源自英国苏塞克斯郡的一种鸡。

[11] 阿诺德·索德曼 (Arnold Sodeman)，连环杀手，于 1936 年在位于墨尔本市郊科堡的彭特里奇 (Pentridge) 监狱被处以绞刑。

[12] 西港 (Western Port)，也称西港湾 (Western Port Bay)，位于墨尔本东南部，主要岛屿为弗伦奇岛 (French Island) 和菲利普岛 (Phillip Island)。

[13] 雅拉河谷 (Yarra Valley)，位于墨尔本东北方约 50 公里，盛产葡萄酒。

[14] 坦普尔斯托 (Templestowe)，墨尔本东北部的一个郊区，距墨尔本中央商务区约 16 公里。

[15] 沃兰代特 (Warrandyte)，墨尔本东北部的一个郊区，距墨尔本中央商务区约 16 公里。

[16] 唐娜布昂山 (Mount Donna Buang)，距墨尔本东部约 80 公里，是距其最近的雪原。

[17] 菲利普港湾 (Port Phillip Bay)，维多利亚州最大的海湾。墨尔本位于该海湾的东北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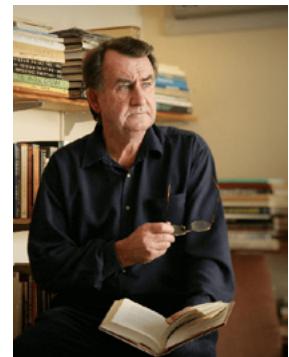
[18] 维吉麦 (Vegetime)，澳大利亚本国特色的一种咸味酱。

杰拉尔德·默南

澳大利亚作家，1939 年出生于墨尔本。默南迄今共出版了十余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平原》《内陆》《边境地区》等，还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回忆录等。《纽约时报》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刊登的评论称默南是“大部分人没听说过的当世最伟大的英文作家”。

译者：陈正宇

英文译者，香港城市大学翻译硕士，译有《骰子人生》《记忆残留》等多部长篇小说，及 J.D. 塞林格、威廉·戈尔丁等所作短篇数则。



《当老鼠没能来时》 (When the Mice Failed to Arrive) 选自《杰拉尔德·默南短篇小说选》 (Selected Short Fiction)。

Copyright © 2018 Giramondo Publishing Company.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Giramondo Publishing Company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Pawel Czerwinski on Unsplash](#)

小说

一抹蓝色

刘宇昆 | 故事群岛

冷却的火焰分叉、弯曲，显现出另外的颜色：
九月的靛蓝色、殉道者的血红色、
金盏花的黄色、龙息的蓝色……

四月

屏幕上的文字：缅因和马萨诸塞联邦曼纳波特镇，人口数量 28528。

【马萨诸塞湾海岸近郊社区的镜头剪辑。粗缆绳拉着一列火车停进通勤火车站；几家人围着武器商店旁的冰淇淋摊位；一片公房周围围绕着独栋住宅；一场高中橄榄球赛正在上演；人们参加国庆游行；居民在浏览院子里销售的旧货。这些场景由手机拍摄，滤镜和取景显得朴素简单，晃动的摄影画面让人觉得业余。】

画面切到结冰的大海以及泥泞的雪地，然后春天来临，漫长的寒冬过后，阳光羞怯柔和，然而孩子们试玩操场设备，发出快乐的喧嚣，没有人会把这听错；开放的连翘和杜鹃仿佛冬天过去后，灰色帆布上竞相绽放的耀眼烟花；窃窃私语的鸟儿、松鼠和臭鼬幼崽尽情地在绿草上沐浴和风。】

英格丽（七十岁，头发花白，甚至泛着亮光）

事情开始于几周之前……你瞧瞧我，什么都记不住喽——不，不是因为年龄。（笑。）我要把记性差归咎于镇上众多新居民带来的喧嚣。（她转向坐在旁边的外孙女。）你还记得哪一天吗？

佐伊（十六岁，表情紧张，沉默不言，蜷缩身体，仿佛要从这里消失）

我……我不确定。

英格丽

那就看一眼你视频上的日期——就是，最初的那条？（骄傲地面对镜头。）她是首位目击者！晚间新闻播出了她的视频。

佐伊

好吧。（摆弄电话，找出视频。）正好在三周之前，春分那天。

李（四十一岁，镇长）

我告诉大家：把这事办好，你们就保护了孩子的未来，以及孩子的孩子的未来。

你已经读过《波士顿环球报》的头条新闻，看过电视上的报道。接二连三的会议已经成了我的日常：总统、波音公司、联邦能源委员会、西屋公司、龙电网、卡特彼勒公司、海湾之星公司……所有人都想到曼纳波特分一杯羹！这很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大的热潮。

现在还什么都看不出来，等到十亿瓦级别的电厂出现——

英格丽

对，春分那天。

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么糟糕。我让罗恩——我的女婿——和佐伊在卧室挂上厚窗

帘来隔音，如今我几乎都听不到它们的存在。

佐伊

（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喜欢它们出现在周围。

晚上我把窗户开一条缝，倾听它们的声音。

英格丽

目前我们见到的所有品种都体型很小。（转向佐伊。）不同于你以前常画的那些。

佐伊

（目光从镜头上移开。）

亚历山大（三十五岁，目光如炬）

我希望它们滚开！要么把我关进监狱，要么别指望我忍受——

哈里文（五十三岁，自称“投资企业家”，头发上别着一个闪烁的 LED 标语：“免费能源不免费”）

没人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如何而来、为何而来。不过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甚至没有人想到点子上。

【晃动的手机视频剪辑：银色鳞片在停泊的船只间闪烁；一条蜿蜒的尾巴消失在茂密的丁香丛中；海边彤云中日出的画面被一声咆哮打断——爬行动物？鸟类？蜥蜴？——调转的镜头勉强捕捉到一对皮膜翅膀——像风筝一样突然从天而降——消失在沙丘背后；惊叫的人群从一块棒球场地四散奔逃，数十只低空飞行的生物一边追逐，一边厉声而鸣——蝙蝠？禽鸟？飞蜥？】

缅因和马萨诸塞联邦曼纳波特镇，龙族数量 7000（估）。

哈里文

【我们位于一间车库，这里仿佛达芬奇的现代工作间，只不过更乱、更脏、更吵，还没有那种古香古色的质感。滚轮和齿轮飞转，传送带辘辘作响，链条咔哒咔哒，曲柄和活塞列着队往复摇晃。】

这些是原型机，所以看起来有点粗糙。不过我向你保证，它们都是基于几个世纪前已经验证过的设计——比如这台，最初由埃蒂安·勒努瓦 [1] 制造——当然，我做了很多专利性改进，已经造出一些靠煤炭、汽油或天然气驱动的机器——内燃机需要纯酒精驱动的说法是能源集团传播的无耻谎言。假如我能获得资金——你还在拍摄吗？

算啦，我知道自己听起来什么样，即使你们拍下我所展示的一切，他们也会想办法抹黑我。就不能让公众知道取代龙电垄断的真正选择，是吗？

一个多世纪以前，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通力合作，让我们陷入了电能这种主导性能源的漩涡，从而夜以继日地用龙息发出更多电能。渐渐地，我们变得依赖那些生物，如今所有的政客都受制于龙电工业巨头，没有任何出路。

不，不，不用担心，我不会挑战龙族绝对安全的正统观念，我不会通过这次采访挑起争端。

那么……如何解释我对能源政策的反对，还不能提……？

这样说吧，人人都明白，空中航线和水中航线都沿着龙的迁徙路线规划，大都市的兴衰取决于那里龙的数量，国家之间无情地相互竞争，以吸引巨兽来推动他们的 GDP。我们谈论大学龙类研究基金和国家战略储备——不过那些话术是为了让我们好受，其实是误导。龙族来去自由，帝国的兴衰取决于那种生物的一念之差，我们却没有希望理解或驯化它们。你听说过《枪炮、细菌与龙》吗？书中提出假设，认为西方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好运气，喷火的龙出现欧洲。东亚在工业革命中落后是因为那里的龙不喷火，而是喷出冷雾和水。直到天津的龙汝元 [2] 受罗伯特·斯特灵 [3] 作品的启发，发明了火/雾龙息均可驱动的阴阳引擎，权力向欧洲的转移才停止。即使到了今天，城邦和小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依赖于龙，而不是文化或政治。

（一声沉重的叹息。）

我想解放沉迷于廉价龙电能源的人类。华约组织因为龙族全部离开而解体，虽然这值得庆祝，但我们怎么知道龙族以后不会因为同样的原因离开马萨诸塞和缅因联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因为我造成的麻烦，人们说我是疯子、傻瓜。

佐伊

【她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不完全是快乐，但也许是在尝试感受快乐。她仍然害羞、说话会有停顿，但是比之前健谈很多。】

画作？（紧张地笑。）不，我不觉得，只是幼稚的涂鸦。我甚至不清楚它们就在附近，也没有拯救它们。

我想谈谈真正的龙。

有人抱怨噪音和气味、以及到处都是的粪便，有人炮轰龙族在街头横冲直撞的危险。第一周，州立公园旁边的 17 号公路发生了大约二十起事故，他们不得不封闭整条道路。后来他们不得不疏散并关闭阿斯特罗夫小学，因为所有的龙都到操场上栖息，家长对此感到紧张。就在刚才，来路上的路上，我看见十几名类似律师的人聚在镇中心的停车场，就好像一群苍蝇围着一堆龙粪。我不知道他们打算起诉谁，反正龙族不怕律师。

我听过牢骚，“曼纳波特不是波士顿，我们没有应对它们的基础设施！”——我猜他们指的是围墙和栅栏。他们希望常设法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甚至希望派民兵来驱赶它们。

我一直在深入研究龙族大规模迁徙的历史……梗之百科有一段总结：大多数现代龙电城市至少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划过：波士顿专注于图书馆和大学，用学术吸引龙族；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用发明和艺术双管齐下，硅谷和好莱坞如今是全北美最大的龙族中心；说到纽约，他们坚守最老式的技术：在华尔街囤积黄金和财富，直到欧洲的旧世界龙族离开它们在巴哈马和英属维京群岛的天堂，到曼哈顿栖身，

每次蜷缩身体在建筑穹顶周围栖息几周，才到长岛的巨型发电厂定量完成工作。噢，最后这点标注了表示“需要引证”的问号标志。

不过对我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泰特斯维尔。早在 1853 年，一群自发聚集的龙突然从天而降在这座小村，所有人都涌向那里，想分得一杯羹。那个非常幸运的家伙名叫艾德文·德雷克，他成功造出第一座龙驱动井架，驾驭的是十六七米长的黑鳞龙，伊利湖至巴尔的摩间的龙拉火车也用同样的品种做动力。一时间，龙族繁荣使泰特斯维尔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小镇，人们沉醉于龙族经济，修建了更多的冷却池、龙驱动井和发电厂——直到后来有一天，龙族突然腾空而起，离他们而去。

艾德文·德里克是我曾曾曾外祖父。而我母亲——抱歉，我还没准备好谈论那件事。

从我很小时候起，人们就说我有一颗老灵魂。我喜欢阅读和独处。嘈杂的人群让我紧张，可我还是努力参加镇民大会，去看看成年人在谋划什么。

他们争论争用权和联邦救助、房产价值和税收抵免、隔离墙和安全区。他们想让镇长跟大公司做最有利的交易，让大公司保证就业并给每个人分一杯龙族经济的羹。

然而，似乎没人考虑龙来到这里的意义，以及如何防止曼纳波特成为下一个泰特斯维尔。

曼纳波特没有自然奇观，没有了不起的大学，没有资金，没有艺术。我们跟联邦其他很多小镇一样：金絮其外，败絮其内。因为人们的离开，我的高中空空荡荡，离开的人迫不得已才会回来。假如想留下，你很难找到好工作——只能想办法“打零工”。毒品也成问题，深夜里有时你会听见远处的啪啪声，我原以为那是喝醉的年轻人在放烟花，直到有一天，我看见警车闪烁着警灯冲过十七号公路，后来了解到他们发现了尸体。

【我们在一座山上，俯瞰下面的公园，龙正在那儿匍匐行走，仿佛五颜六色的野花点缀着草地。远远望去，它们就像蝴蝶、飞鸟，或是点点滴滴有了生命的色彩，从无形到有形。】

值得爬上来，对不对？我几乎每天都上来，只为看风景。警察告诉我们保持距离，可我无法想象它们会伤害任何人。它们看起来当然比每年秋天堵塞街道的火鸡更温顺。每次爬上山，我就不再担心高考、学校八卦、爸爸的唠叨和外婆等待修剪的草坪——我们永远无法理解龙族的顾虑，龙族也绝不关心我们的麻烦，然而知道世上有这些漂亮的生物存在就很美好，我觉得宇宙都因此而广博了一些，你知道吗？

我问自己：龙族为什么来？出于什么原因？

可是看到眼前这一幕，那些问题基本上都是无所谓的。

六月

英格丽

【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

镜头的焦点切到背景中高耸的紫树，树枝给人的感觉有些奇怪，仿佛树叶过于沉重，压弯了树枝。】

镇上居民的情绪绝对有所改观，远没那么多人谈论把土地卖给开发商的收入，也远没有那么多人害怕所有的改变。可以说，我们正在适应龙族。

【一颗棒球砸进那棵紫树，场面一下子爆发。片刻之前看似一簇簇树叶的存在转变成闪亮的鳞片、伸展的四肢、张开的翅膀、伸直的胡子和扑扇的翼膜。一群像变色龙一样藏身的飞龙受到惊扰，腾空而起，伪装的绿色让位于红色、金色以及靓丽的蓝色和靛蓝色斑块。这群飞龙中有北美麋角龙、西伯利亚兹米龙、美索美洲羽蛇龙、东亚无翼龙、南亚展尾眼镜蛇龙、欧洲丝翼龙和其他品种，没有任何一种的大小超过孔雀，而且大部分都要小得多。】

孩子们欣赏了一会儿空中的奇观，但很快又失去兴趣。一个女孩跑到树下，小心翼翼地走在龙粪之间，最后找回了棒球。孩子继续他们的游戏，受惊的飞龙一只接一只回到树上栖息，同时又重新披上了伪装。】

它们很可爱，不是吗？有些人感到失望，但是大多数人松了一口气。这些龙不同于在怀德纳图书馆 [4] 为波士顿提供能量的巨型品种，稍小些的龙驱动大型客机横穿大西洋和美洲大陆，但也不是我们的龙可以比拟的。

哦，我不想装成研究龙的专家，直到十八岁我才头一次亲眼所见，当时我作为一名新生，初到韦尔斯利学院 [5]，对一切都感到好奇。

【韦尔斯利学院的档案照片，呈现出肯·伯恩斯 [6] 的拍摄风格。】

当时韦尔斯利基金会只有五只龙：三只美国野牛角龙、一只威尔士双足飞龙和一只英格兰大海蛇，根本无法同优势强大的哈佛—雷德克里夫基金会的五百只龙相媲美，然而在我看来，韦尔斯利基金会已经富有和强大得难以想象了。

其他女生还在习惯新住所的时候，我绕着慰冰湖走了一圈，最小那只野牛角龙名为癫狂，就栖息在湖中。当时是晚上，我没指望会看见什么。我知道龙族都很忙碌，很少回巢。跟多数大学龙一样，尽管它们被图书馆和讲堂聚集的学识吸引而来，但是韦尔斯利跟联邦的合约意味着，大学得驯服龙喷火，为周围城镇的工厂和作坊提供能源。

可是教授们也明白，龙族需要时间返巢恢复。它们不单以粮食和肉类为食，还得浸淫在大学的学术氛围中，有时间独自思考，才能保持精神健康。我知道现代有些专家说这都是胡扯，可我当时深信不疑，现在也未曾改变看法。

对于大学生活而言，我觉得那也不算是蹩脚的隐喻。

湖边小径沉浸在雾霭之中，我继续向前漫步。远离父母和监护人的监督，开始独立生活，这令我兴奋得活力充沛。我把自己想象成古老歌谣中的英雄，徒步穿越山谷沟壑、泥塘沼泽，热情地走向一只巨龙守卫的财宝。浓雾已经完全遮住湖对岸，

湖面仿佛在扩张，最终变得跟海洋一样广阔。当时我不知道，失去空间感和判断力据说是接近飞龙时常有的心理效应。

突然之间，一声巨响刺破天空，让我误以为是喷气式飞机的噪声。我转过身，迎面看见湖水像火山一样喷发，水汽散了一会，露出一条弯曲的长颈，仿佛书中所画的雷龙，顶部是一颗长着巨角的毛茸茸的头颅。经过雾霭折射的阳光给那颗头颅罩上一圈光晕，我甚至无法命名其中未曾见过的无数种颜色。那颗头转向我，跟我对视，眼睛仿佛两颗蓝色的珠宝，从里向外闪着光芒。

然后，癫狂几乎是不经意地微微张嘴，轻轻呼气，仿佛是在低语。氤氲在它腹部的雾气似乎变成一座冰山，亮起淡淡的蓝色。我的心都快跳出了喉咙。

它移开目光，看向上方的天空，然后张开大嘴，喷出一股逐渐加粗的火舌，犹如在湖水中绽放出一朵火焰花。

我觉得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叹为观止的含义。我看过很多科学插图和照片，它们展现出龙蜷缩在发电厂里，喷火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旋转发电，建立起机械化世界的命脉线。可是插图刻画的龙似乎温良恭顺，变成了现代都市机械化运转的有机组成。

跟一只龙面对面的感觉与插图的刻画存在难以言喻的差别，浪漫主义诗人大概会用“庄严”来形容。顷刻之间，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上年纪的探险家和工程师，去挑战电闪雷鸣的暴风骤雨、冰雪覆盖的北极水域、白骨皑皑且没有通途的沙漠戈壁、以及毒气笼罩的湿地沼泽——他们只是为了有机会一睹那些庄严巨兽的风采。

时隔多年，我生下朱莉以后，那段经历成了她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她要我一遍又一遍讲述，成了一个迷恋龙的小姑娘。跟佐伊一样，她也常常把那些龙都描绘出来，不过总是把眼睛留到最后，用明亮的蓝色一笔笔涂画，靓丽的线条还会弥漫到画上朦胧的空气中，龙因此也显得活灵活现。

哈里文

所有现代生活对龙的依赖，大多数人一点都不明白。剥夺人们对现实能源政策的了解在最近几十年已日趋严重。正如在医院里对死亡视而不见，我们也在用混凝土墙和金属大门、遮遮掩掩的劳动合同和严格苛刻的保密协议把龙族挡在人们视线之外，维持着一种幻觉，即现代化是免费午餐的幻觉。

假如龙族真如政府和能源公司一再宣称的那样安全，那么为什么厚重的围栏把哈佛园围成监狱，戒备森严的隔离屏障让华尔街恰如其名 [7]？这不禁让人好奇，他们在向我们隐瞒什么，对不对？

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局限在缅甸和马萨诸塞联邦，而且出现在北美洲的其他国家。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从爱尔兰共和国到中华联盟的城邦，人民都不乐意去解疑团。

甚至在古迹中你能发现这种现代特征的印迹。

【动画展示旋转喷汽的汽转球。】

历史记载中驾驭龙能的第一人是亚历山德里亚的英雄。他造了一颗铜球，有两根弯管从中延伸出来，指向相反的方向，这颗球体可以绕着一根垂直于弯管的轴自由旋转。

英雄用琥珀衬满球体内部，琥珀上刻着错综复杂的神话故事，几只萤火虫被封在里边提供照明，仿佛是颗颗流星在这个天球内部旋转。英雄的目的显然是创造一件庙宇艺术品，它深藏的美丽只能由神灵欣赏，让崇拜者想象。

然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英雄的作品引起了本地埃及的兴趣，两只幼龙像毒蛇一样经由管道爬进这件装置，在里边因为发现雕刻艺术而感到愉悦，于是用热汽充满内部。滚烫的蒸气从弯管喷出，推动球体转动，仿佛赋予它生命，给观众带去了快乐和惊喜。

英雄继续制造越来越复杂精致的汽转球，然而年纪轻轻就说着疯话离开了人世。

在古代，很少有作者把他的工作和亡故联系起来。

李

我当然失望，我还以为那些小飞龙是主菜之前的开胃菜，而不是仅有的全部！

有一个好处就是“曼纳波特骑士”不再一直烦我去为城镇安全“尽一份力”。我猜就连他们在线观看的反龙族阴谋视频都不认为小型龙有多大威胁。

公司一个接一个停止电话联系。

于是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我们的工程师已经做过可行性研究，利用你们的小型飞龙根本不经济。”他们会这样告诉我，然后大谈兆瓦和千兆瓦、投资回报率、资本额、公共事业费率以及资产折旧。

原来曼纳波特地区的飞龙仅达千瓦级别。当初詹姆斯·瓦特给一只毛驴大小的尼斯湖水怪绑上万花筒眼镜并称之为蒸汽机，在那个时代如此低输出功率的设备也许会在商业上被大家接受。可是如今呢？没多少受众。

“小龙会长成大家伙，是吗？”

“不一定。”他们说。成年龙的体型大小各异，甚至同一品种都有不同。根据他们派来的生物学家的说法，我们的迷你龙已经停止生长。

“可是我们拥有的数量如此之多！”我说，“你就不能把它们大量赶到一起做点有用的工作？”

他们教导我龙族的生理学和习性，指明我们缺少合格的龙语者以及“过度管理”的危险。

原来龙族很少顺利地协同工作，它们只能在诱惑下而不是被胁迫去工作。上次有人试图强迫一群小型龙协同工作还是在切尔诺贝尔，结果发生了没人愿意重蹈覆辙的灾难。

“我听说有地方生产小型龙驱动的单人车辆和家庭电厂，”我抛出理由，“肯定有办

法实现。”

“值得那么做的地方只有集体农场和炫富者所在的密集大都会，”他们说，“记得吧，龙族喜欢待在老地方，或者在自己挑选的固定地点之间迁徙。”

“不过龙族也许已经开始迁徙，可为我们的交通所用。”

“可是如果除了你们当地人，有谁想去曼纳波特生活呢？”

然后他们就再也不接我的电话了。

不过我没有放弃。有人曾告诉我，在日本那边，他们已经在我们梦寐以求的小型化技术上取得大幅进展。肯定存在一个办法让我们从迷你龙族身上获利，肯定的。

亚历山大

我告诉大家尽量躲远，龙族看似可爱无害，但我知道实情。

乔伊在家里比较聪明，念了一所专业技术学校，凭他的操行和考试成绩，他可以离开曼纳波特，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可我弟弟只想当龙语者，跟龙在一起近距离工作，而不是“远远地沉浸在它们的劳动成果之中”——对这就是他的原话，仿佛出自学校逼你阅读的古典小说，常常听得我想要揍他，好好说话，你个蠢货！

“律师、银行家、程序员——他们都是寄生虫，无异于水蛭，”他过去常说，“除了操纵符号产生更多符号，他们还做了什么？可是龙语者是哄骗龙族吐出生命气息、让文明的存在成为可能的人。”

一到十八岁，他就离开家，去了波士顿湾的龙网发电站。他们给龙语者的薪水很高，可那是因为工作特别危险，有天赋的人不多。

乔伊告诉我，你不能强迫一只龙工作，你得哄骗它。他告诉我，为了诱使龙喷火，一位沙皇皇后曾经在圣彼得堡用整块琥珀造出一个房间——我认为她在模仿亚历山德里亚？——结果自己被严重烧伤。这给童年时代的我带来了噩梦。

我找找，妈妈把乔伊的奖学金申请书放在这里……找到了。“霍华德·休斯[8]最后留在拉斯维加斯，因为他觉得，明亮的灯光和无尽的诱惑会让维持他航空帝国运转的龙驱航班更具娱乐性。在冷战备期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大东亚洲际联盟[9]都秘密资助艺术家，试图诱使华约组织的龙叛逃，但是在纽科门[10]和瓦特去世数百年之后，驯龙还是更接近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我打算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

龙族喜怒无常、懒惰易厌。就算你用财富、书籍或新鲜感诱使它们定居在一座城市，它们也宁愿在吸引自己的东西附近打瞌睡，而不去工作。最后一步，让龙在保持温顺的同时喷火，才是需要龙语者的地方。

没人知道龙语者怎么回事，龙语者不约而同保持沉默，一个秘密的工会把他们的智慧一代代口头传授。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和乔伊常做游戏。我扮演龙，他说服我干活——通常是答应奖励我使用他自制的游戏手柄。

也许那真是他们驯龙的方法，早期西部铁路工程师不就给他们的牵引带戴上万花筒吗？如今即使他们给龙带上虚拟现实头盔，我也不会感到惊奇。在电台听众热线节目上，泰迪·派崔厄特说，他们让龙语者在电厂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轻抚，像做爱一样唤起龙的兴趣。我不知道是否信他那一套，在学校里，他们还在教孩子龙族喜欢音乐、文学和艺术，乔伊总是嘲笑这种看法是“龙族的山鲁佐德理论[11]”。我永远不会知晓真相。假如龙语者没有在工作时被烧成碳，那他们也只能在脑子被烧坏时退休，这样的结局似乎更糟。

乔伊三十岁时归家，可看上去却老得像五十岁，也认不出我和妈妈；他不笑亦不哭，食物喂到嘴里他就吃，否则就不吃。他的思维就像竹篮打水，不论我给他看多少次家人的旧照片，妈妈做多少次他最喜欢的菜肴，他的眼神都是一片茫然，嘴里只有胡言乱语。回到家八个月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过在那之前很久他就已经死去。

我不知道他承受了怎样的恐惧，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无法摆脱的画面。

当然，退休金很丰厚，但是没法让夺走他生命的龙和公司真正付出代价，合同和法律无懈可击，自己承担风险，自愿终止权利。

攻击龙族是犯罪行为，违法的事我绝不会干，但是除此之外呢？

七月

佐伊

【镜头并行跟随她行走，我们不时发现游客们聚在某一块空地周围，伸着脖子，准备用手机拍摄。便衣警察站在警戒线后，让人群保持距离。】

游客想再次近距离见证。因为我们镇上有了真正的旅游景点，行政委员都被吓坏了，希望总统派驻民兵。（摇头。）

不，我仍然不知道龙族为什么来曼纳波特。

不过我觉得自己交了一位新朋友，或者两位。

事情开始于国庆节之前，镇长和行政委员仍在想办法利用扰乱生活的无用龙族收敛，最后决定发展旅游业。他们派一名摄影师到处拍照，雇佣一家咨询公司推广“海湾乐园”的城镇品牌。从波士顿和波特兰过来的观光巴士每天都有两趟，还有传言说跟大型游轮公司亦有合作。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害怕游客会把龙吓坏。大多数龙栖息在废弃土地和止赎房屋周围，以昆虫和植物为食，有些甚至已经学会在固定地点排便，环卫公司可以每周去清洁一次。我当时觉得龙族和镇上居民正在实现和平共处，不希望这样的进程被打断。

然而存在一个威胁甚至比游客还要大。

一个反龙族组织日益建立起来：担心孩子的头脑受龙族侵蚀的家长、无事生非的闲人和受够了各种混乱的业主，他们自称曼纳波特骑士，在网上出谋划策，要赶走龙族。

我用一个假名潜入他们的论坛，当他们决定在国庆日庆典上开展“圣乔治[12]行动”时，我也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临近落日十分，众多家庭前往斯凯里球场观赏烟火表演时，骑士们开上皮卡或迷你货车，从城镇各处前往汉考克那块废弃的野地，最大一群小型龙就栖息在那里。我刚好在日落前赶到那里，野地覆盖着茂密繁盛的野草，足有我胸口那么高，一栋房子静静坐落在那里，独自衰败，半片屋顶已经不见，三面墙上都出现了裂口。几十只小型龙已经栖息在房屋的废墟或着地上，我靠近时，有几只拍起翅膀，睁开眼睛，对着我咕咕直叫，其他的大多数都还在继续休息。

我在草丛中猫下腰，隐藏起来。泥土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有别于野猫的聚居地。暮色渐渐褪去，更多鸟类大小的龙觅食归来，找到地方栖息。它们把头埋在翼下或草丛中，进入梦乡。

我能听见最近处的龙发出微弱平稳的气息，仿佛在打鼾一样。一阵凉风拂过我额头的汗水，给凝滞的夏日空气带来一丝凉爽。几年前，这栋房子里曾有人在失败的鸦片交易中丧生，一起这件事我就不由自主地颤抖。沿街而来的警笛声和蓝色闪光又把我拉回现实。

痛苦让我揪心，我无法呼吸，竭力抑制心中就要醒来的黑暗，我曾把它封在心灵的墓穴之中，此刻它正威胁要打破枷锁，掀开压在身上的精神碎片。

我不能回想妈妈，不行，绝对不行。

明亮的光束刺破夜晚的黑暗，像发光的长矛扫过我的上方。电机的嗡嗡声渐渐停止，灯光熄灭，接着传来车门声、脚步声和急迫的低语。骑士们到了。

我听到有沉重的东西从车上卸下来，汽车上装满了额外的电池、线轴和家用电器。他们的计划是用一张铁丝电网覆盖这块场地，然后用一些放在合适位置的爆竹惊醒飞龙。

有人在论坛发帖说，这些恶心的生物被电死得越多越好。

用龙电杀死龙族也算恶有恶报！

我的表哥是律师，他认为我们这样做，可以对法官辩称是龙自己飞进铁丝网，所以这不算袭击。

我从茂密的草丛中站起。

“你们不能这么做。”我说。恐惧和愤怒令我的声音跟身体一起颤抖。

受到惊吓的骑士们停下来，只有远处的一盏街灯照在他们身上。困惑了片刻之后，一个男人走出人群，我根据论坛上的照片认出了他：亚历山大。

“你要干什么？”他问。

“阻止你们犯错。”我说。

“龙族不属于这里，”他说着朝我走近一点，把脸上的悲伤和愤怒展现给我，“它们伤害人，你不明白。”

“这些龙没伤害。”我努力让声音保持镇定。

“伤害了。”我听出他声音里的痛苦、无助的失落和无法言说的辩解。

我也同样感到无助，不知如何描述临近傍晚时看见龙在公园上方觅食的心情，不知如何解释夜里听见龙叽喳时为什么想笑又想哭。

于是我拿起脖子上挂的哨子，用尽全力吹响。哨声之大，我以为它会永远充斥于耳中，仿佛噩梦中响起的警笛。

在我周围，野地和房屋废墟裂解后形成一个漩涡，小型飞龙被我尖锐的哨声惊醒，冲天而起，翅膀遮蔽群星，利爪踩踏草地，嘈杂的合鸣汇入我的哨声，不受约束的尿液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弥漫在周遭的空气中。

片刻之后，喧嚣散尽，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飞龙消失，我从口中掏出哨子，深深吸一口气。亚历山大目瞪口呆地定在原地。

我的脚边沙沙作响，我们同时低头去看。

一只动物在荒草中挣扎，我跪下观察，它只有小狗那么大，不过更纤瘦，也更修长，头部类似年幼的野兽，长着一对迷你弯角，胡子仿佛来自一只缅因州的龙虾，颈部围着一圈五颜六色的漂亮羽毛，后背上盖着银色的鳞片，腹部覆有皮革，四只利爪跟鸟类类似，身后拖着长长的蛇形尾巴——这是一只混种飞龙，祖先是随人类至此并适应在这块大陆上生活的不同龙族。

然而它扯伤了类似蝙蝠的翅膀，无法起飞。我轻轻捡起它，把它像小猫一样抱在怀里，它紧贴着我的皮肤颤抖，仿佛一台正在运转的小发电机。

它犹豫不决地睁开眼睛，闪现出明亮的蓝色。我浑身一颤，差点扔下这只幼龙。这是我最不愿看见的颜色。

“放下它！”亚历山大喊道。我抬起头，看见他正举着一根电棍，仿佛只需一击就能杀死家园的入侵者。

我转身用后背替幼龙挡住他的袭击，“嘘，没事儿的，我不会抛弃你。”

幼龙仿佛一只受伤的兔子，发出一声尖利的哀鸣，似乎痛苦令它难以承受。它在我的怀抱中颤抖得更加厉害，我试着像爱抚猫咪一样轻抚它的后背，亦如小时候我的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发哄我入睡。鳞片摸上去既温暖又柔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听那叫声！”亚历山大说，他举起电棍时声音也随之恐怖起来，“它要喷火啦！你得立即放下它，否则就会被烧死！”

“不！它哀鸣只因为你让它感到害怕。”镇上没人见过小型龙喷火——我确信它们不能。我试图用一只手罩住这只飞龙的眼睛，希望不让它看见迫近的亚历山大，希望那摄人心魄的亮丽蓝色不会夺走我的勇气。

他跌跌撞撞地又走了几步，用身体罩住我说，“你杀死了乔伊！你杀死了乔伊！”

我抬头跟他四目相对，他目光疯狂，失去理智，目中无人。我从噩梦中醒来时也是这般模样？需要外祖母把我按在床上？

“不！与它没有任何关系！”我竭尽全力喊道，“你错怪了这只龙！错——”

亚历山大举起他的电棍。如果他打定主意要杀死这只龙，那我毫不怀疑他就要戳在我身上。

幼龙在我怀中突然一窜，我努力要抱住它。可是这只幼龙比我有劲，迅捷地一晃

脑袋，就摆脱了按在上面的手。我本能地向后仰，同时感受到一股突如其来的热浪。时间似乎慢了下来，视野变得模糊不清。

只见幼龙张开双颌，电棍的一端悬在空中，离它只有十几厘米远，它的目光锁定在亚历山大身上。我能诠释在这非人类的艳蓝色眼球中看见了什么吗？

接着它看向别处，似乎迫近的死亡威胁还不如远方的一道流星更重要。这只幼龙笨拙地移动，仿佛是有史以来被证实为最大的那只龙，三峡。它凝视着星星，一团炫目的火光从张开的大口中喷射出来。

我好像是在欣赏一条流淌着液态金黄的河流，一群在迁徙中不停翻飞的蝴蝶，仿佛有一大片占满露水的蛛网和点缀着珍珠的薄纱极速飞向天空。在过热离子束的顶端，冷却的火焰分叉、弯曲，显现出另外的颜色：九月的靛蓝色、殉道者的血红色、金盏花的黄色、龙息的蓝色……

我张大嘴巴，无意识地模仿着幼龙的下颌，这是我欣赏过的最好看的焰火。

我再次变成六岁的小姑娘，回到美术材料商店的走廊里。我母亲和我转圈追逐，一边笑，一边把管装颜料和水彩扔进购物车。我们不喜欢制造商给颜色起的名字，于是就提出来自己的想法。我们整天不做别的，只是一起画画，画下祖母曾经见过的那只龙。

“你会一直陪我，对不对，妈妈？”

“当然，德雷克家的龙宝，你永远也甩不掉我。”

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睛，视野变得一片模糊，我已经有好几年不敢回忆这件往事。

在我身旁，亚历山大仰起的脸沐浴在头顶华丽壮观的流光溢彩之中。电棍掉在地上，“我从没想到……”我听见他喃喃低语，“这就是你曾目睹的……”

幼龙又哀鸣了一声，喷射出一股火花飞溅的奇观。

热量传递到我脸上——更确切地说是扑面而来，我其实不知如何描述，只是觉得有一只手在轻抚我的意识，舒缓痛苦，疏通滞塞，就像是紧贴着水面之下有一块石头。一瞬间，黑暗、坚硬、棱角锋利的一群鱼威胁要跃出宁静的水面，可是后来，那只看不见的手再次抚摸我的意识，鱼群解散解体，被流动的光和热带走。

【我们位于那块废弃的野地，佐伊伸出一只手，示意摄影师别打扰到伪装在草地里栖息的龙。她掏出手机给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

我一直尝试把见到的情形画下来，但不是很成功。

看我指的方向，就在围栏上那块破败的板条旁边，你看见了吗？对，草地里那团绿色的突起。它是叶公，不过我觉得，附近有这么多人，它不会出来。

妈妈给我讲过一个古代的神话故事，我用其中的一个人物给它命名。知道吗，这有点玩笑的意味，因为在故事里，那个人自以为一直都喜欢龙，还画龙。可是后来有一天真龙现身，他极为害怕。你明白——还是算了吧。

它恢复得很好。一位来自韦尔斯利学院的龙学博士——当然，这只是我对她的称呼，她真正的头衔类似捐赠基金维护专员——告诉我，叶公翅膀上撕裂的伤口再过一周就会自行痊愈。我给它带了覆盆子，叶公非常喜欢吃。

骑士们还在论坛上发帖抱怨龙族，但是我没见亚历山大再参与其中。

十一月

李

我一直在跟佐伊交谈。

龙喷射焰火的视频走红之后，你都不会相信有多少游客涌入这里。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解决安保问题，为了防止伤亡事故，我们支付了不少警员的加班费。大量的关注也吸引了几家公司，他们有意雇佣佐伊担任龙语者，都被她断然拒绝。

我就要想好如何充分利用曼纳波特新建立的声誉，这时小型龙开始在联邦的其它城镇出现：布罗克顿、普利茅斯、洛厄尔、法尔茅斯……没人知道还有多少龙要涌入这里。

一夜之间，我们失去了竞争优势。

不过那也引发我的思考，我们还有佐伊。

我正考虑雇用她运营一个培训项目，教人学会在龙身边的行为举止，或许为其它城镇做些示范——我会让联邦政府为这个项目买单。佐伊至少愿意接受这个主意，但也告诉我她不会再让龙进行焰火表演。“一件好事做太多次就会变成坏事。”她说。她告诉我，小型龙如果得到正确对待，就能给人带来欢乐。我到处打电话联系，发现一些专家想跟她谈谈用“龙疗”治疗成人和儿童抑郁症的可行性。她似乎非常热衷于这个想法。

这不是我曾设想的摇钱树，但我们还是会为曼纳波特争取些什么，你等着瞧。

英格丽

【大家在准备感恩节晚餐：兄弟姐妹和配偶们挤在狭小的厨房，盘勺不停碰撞，姻亲们对孙辈孩子大惊小怪，表亲们笑着争论问题，电视大声播放着节目。

亚历山大也在屋里，想要帮忙却笨手笨脚，但是其他人都在努力帮他融入。

佐伊在手机上放了几段视频，看到大家都被吸引住，她也笑了起来。】

佐伊现在是大明星，我听说她和叶公的视频播放了数百万次，不过她再没让叶公喷火——说那很危险。

亚历山大作为摄影师帮了佐伊大忙，之前他告诉我，佐伊、哈里文和他计划合作提高公众对龙语者困境的认知，筹款照顾他们。

看到她快乐我真的很开心，自从那个晚上她发现朱莉以来，我就没见她那样笑过。

哈里文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龙怎么喷火。

回想一下中学物理和生物课，你可能学过龙电厂的精髓就是一种热机，把龙息热能转换成机械能做有用功。你可能还学过龙跟其他生物一样，通过化学过程分解

食物产生能量。不过你的老师或许略过了数学原理，一只龙吃下的浆果、昆虫、大块牛肉和大量玉米绝对不够产生喷火释放的热量。

如果你的老师特别认真负责，他可能还会提到麦克斯韦妖。

1867年，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构想热力学定律的过程中发现，龙息之谜并非无法解答。麦克斯韦妖是他提出的思想实验，可以解释龙族如何看似违背物理学定律，凭空产生能量。

想象一个容器里充满特定温度的气体，被绝热挡板分隔成两半。在这个挡板的中间有一个无摩擦的微型门，由一个非常狡猾的妖怪控制。因为温度代表容器里气体分子碰撞运动的平均动能，那么可以想象某些分子比平均速度更快，其他的则更慢。妖怪观察分子的运动，适时地打开门，让运动速度更快的分子得以从右侧进入左侧，让运动速度更慢的分子得以从左侧进入右侧。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改变左右两侧的平均动能，右侧温度会降低，左侧温度会升高。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个温度差驱动传统的热机，直到两边温度达到平衡，到那时妖怪可以再次启动这个过程。

麦克斯韦妖在没有引起熵增的情况下，把气体分子运动的相关信息转换成“免费”的能量，如同用阴阳符上互相追逐的两条龙创造出一台永动机，即一种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完美热机。

一个多世纪以来，理论家和实验工作者倾力寻找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法，来统一麦克斯韦妖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说，关键在于麦克斯韦妖掌握的信息。

麦克斯韦妖和容器这个系统的熵一定会增加，因为麦克斯韦妖为了记录新信息，必须得擦除旧信息。

假如龙族真是把信息变成热能的麦克斯韦妖，那么可以推论出，它们释放能量，必定会擦除信息。

没人说被擦除的信息一定属于龙族自己的头脑。

你是否曾好奇为什么有那么多龙语者年纪轻轻就因为痴呆而退休？为什么他们的头脑像瑞士奶酪一样千疮百孔？为什么龙族总是被吸引到人多、书多、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多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利用龙能的每项重大进展都伴随着一次革命，一次对传统、民俗和历史的重大遗忘？

我认为驱动龙息的是大众失忆症、是记忆的清除，这有苦也有乐。在我们由龙能驱动的庞大都会中，书籍腐朽，集体记忆丧失。最靠近飞龙的龙语者也承受着这种伤害的影响。

我懂，我懂，此刻你想递我一顶锡箔帽，安排我参加泰迪·派崔厄特秀。不过你试想一下，就一下：有没有一丁点可能被我说中？

自从我们沉醉于龙能难以自拔，战争变得没那么频繁，原本的仇敌很快让往事都随风。遗忘不等于原谅，但也很有帮助。

随着我们的文明变得愈加复杂，我们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痛苦？对于遗忘的诉求是否也变得更加复杂？或许这就是小型龙出现的原因，为了响应像熵一样成倍增长的繁盛欲望丛林，而形成的一种适应性扩散。

如果说龙族是在毁灭，那它们也是假以创造之名。

朋友们告诉我说，过去一年里我已经变得颇为成熟达观。我倒没觉得……不过小型龙的确更可爱了。

英格丽

我女儿是一位好妈妈，或者说，她曾经朝那个方向努力过。可她总是有点不切实际，难以制定和执行计划。她在加州高中毕业后打算成为艺术家，可是运气不佳——据说听力赶上龙族的评论家似乎从没对她的任何作品产生反响——她不得不回到这里。跟罗恩生下佐伊之后，生活更加艰难，可是大家都能看出他们相亲相爱。

【镜头移进楼上的走廊，绕过转角，来到一个很少被外人看见的地方。画框中的龙排列在墙壁上：水彩画、油画、蜡笔画、马克笔画和铅笔画。有些展现出成熟的风格，签着朱莉的名字，其他的更稚嫩，签着佐伊的名字。有一幅画上以火柴人的形象画着一对母女同骑一只长翅膀的大龙。这只龙有明亮的蓝色眼睛，仿佛警车顶上旋转的警灯。】

罗恩和朱莉遇到财务问题后分手，我每次去，他们家都乱作一团。朱莉开始用酒精获得快乐，当这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她便转投更强劲的药物去疗伤止痛。

佐伊当时只有七岁，在半夜里醒来。吵醒她的可能是警笛，沿街发生了杀人案——死者是朱莉的毒贩。佐伊走进她妈妈的房间，发现朱莉不再动弹，身体已经僵硬。

佐伊打电话给我，啜泣中，她只能说，“妈妈的嘴唇是蓝色！蓝色！”我拨打了911，当他们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

佐伊跟我生活期间，总是做噩梦，可是她不会谈起。有一阵子，她像妈妈和自己以前那样画龙，但是绝不会使用蓝色。我努力为她争取帮助，可她不愿去做心理治疗。“心理医生想逼我遗忘，”她常说，“可我不愿意。”

上瘾有很多种形式，最险恶的一种是无助地陷入痛苦的回忆，自我强加惩罚，把自己困在一个由时间片段构成的嶙峋浅滩之上。她对朱莉在那晚的记忆——悲痛、背叛、愤怒、内疚——主导了她的生活，那是一道吞噬一切的伤口，她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挑开。

遗忘不会带来慰藉，不过有时候，疗伤确实需要清除记忆，原谅也是一样。

佐伊

亚历山大认为龙族先来到曼纳波特是因为我们的伤痛。

我觉得不是。如我所说，曼纳波特并无特殊之处，我们的心痛和悲伤、抛弃和背叛都只有平均水平，不多也不少。

然而小型龙很特别，我们没法驾驭它们去做有用功，至少没法做大人们需要的那种。可是手术刀不能用来伐木不代表它一无是处。

我为叶公做了这碗蔓越莓酱，随后给它送去。看到我是如何加入蓝莓的吗？跟它眼睛的色调不太一致，但我已经尽力了。蓝色可真漂亮啊。

作者注：进一步了解麦克斯韦妖和信息擦除的热力学特征，参见查尔斯·H. 班尼特发表在《国际理论物理杂志》21.12 (1982): 905-940 的《计算热力学研究》。

[1] 埃蒂安·勒努瓦 (1822 – 1900)，法国、比利时工程师。1850 年代在巴黎定居，对电镀术产生兴趣。后来他对电报做了改良。他最出名的贡献是发明内燃机，这种内燃机以瓦斯作燃料。

[2] 龙汝元 (?-1859)：清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均属北京市）人，字春舫。行伍出身，曾从河南巡抚英桂镇压太平军，历任游击、参将。咸丰八年（1858）升大沽协副将，助僧格林沁加强天津海防。次年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大沽之战，他坚守北岸前炮台，手燃巨炮，重创敌舰，卒中炮阵亡。

[3] 罗伯特·斯特灵 (1790-1878)，苏格兰工程师，以发明闭循环活塞式热机而闻名。后世将此类型发动机以其名字命名为“斯特灵发动机”。

[4] 怀德纳图书馆位于美国哈佛大学。

[5] 韦尔斯利学院是美国著名的“七姐妹女子学院”之首，美国最优秀的女子及文理学院之一，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近郊韦尔斯利镇，传统上只招收女生而不招收男生。2015 年起，该校也招收跨性别学生。

[6] 肯尼斯·劳伦·伯恩斯 (1953—)，常被称为肯·伯恩斯，美国制片人，以在纪录片中使用档案片段和照片的风格而闻名。

[7] 华尔街的英文名 Wall 本身有“墙”的意思。

[8] 小霍华德·洛巴德·休斯 (1905 – 1976)，美国著名企业家、飞行员、航空工程师、电影制片人、慈善家，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9] 这是作者虚构的国际组织。

[10] 汤玛斯·纽科门 (1664 – 1729)，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曾发明纽科门蒸气引擎，后来被运用在矿区与油田，节省大量人力。

[11] 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新娘，每天晚上给苏丹讲故事而幸免一死，此处借以讽刺人类和龙的关系。

[12] 圣乔治是基督教圣人，经常以屠龙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雕塑、绘画等领域。



刘宇昆

美国著名华裔科幻作家、译者、程序员、律师。1976 年出生于中国兰州，11 岁随家人移居美国。自 2002 年发表《迦太基的玫瑰》后，刘宇昆迅速受到欧美文坛的关注，成为第一位获得星云奖和雨果奖的华裔作家，此后更荣获轨迹奖、银河奖、华语星云奖等多项科幻奇幻奖。他翻译的刘慈欣《三体》和郝景芳《北京折叠》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6 年荣获“雨果奖”。

译者：耿辉

幻想文学译者，代表作有特德·姜的《呼吸》、刘宇昆的《奇点遗民》和安迪·威尔的《挽救计划》等。《一抹蓝色》(A Whisper of Blue)，原载于短篇小说合集 The Book of Dragons。Copyright © 2021 by Ken Liu.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Felipe Labate](#) on Unsplash

小说

一曲微茫

保罗·鲍尔斯 | 故事群岛

一名法国土兵看到了他。
“是你啊，”他自言自语道，
“一个大疯子。”

九月里夕阳最红的那一周，教授决定去位于温暖国度的艾恩塔杜特[1]走一趟。傍晚，他带着装满地图、防晒霜和药品的小旅行包，坐巴士从高原地区下来。十年前，他在这个小镇住过三天；不过，三天时间足够他与一个咖啡馆老板建立起相当牢固的友谊。在他离开后的第一年里，这个老板给他写过几封信，从那以后就断了音讯。“哈桑·拉马尼。”教授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巴士颠簸着向下穿过越来越暖和的气层。现在面对着西边火红的天空，然后是大山的尖峰，汽车就这样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一路向下。进入峡谷后，空气中除了高地无尽的臭氧外，可以闻到其他的味道了：橙花、胡椒、被太阳晒过的粪便、燃烧的橄榄油、腐烂的水果。他愉快地闭上眼睛，那一瞬间，他就生活在一个纯粹的嗅觉世界里。遥远的过去又回来了——不过是哪一段过去，他无法断定。

司机眼睛没有离开道路，问他：“你是地质学家吗？”教授就坐在司机身旁。

“地质学家？啊，不是！我是个语言学家。”

“这里没有语言，只有土话。”

“没错，我正在调查马格里布语[2]的变体。”

司机一脸不屑。“接着往南走吧，”他说，“你会发现一些你从没听说过语言。”

当他们驶过镇子大门时，一群顽童从尘土中冒出来，跟着巴士奔跑，尖叫。教授折起墨镜，放进口袋。车子一停稳，他就跳下车，推开那些愤怒的男孩，任他们徒劳地抓着他的行李，快步走进萨哈林大饭店。饭店的八个房间中只有两间空着，一间面向市场，另一间较小，也较便宜，通向一个堆满垃圾和木桶的小院子，两只瞪羚在那里徘徊。他选了较小的那间，他将整壶水倒入锡盆，开始清洗脸上和耳朵里的砂子。天空中的余晖差不多不见了，几乎是在他的注视下，物体上的粉红色也在慢慢消失。他点燃电石灯，灯发出的气味让他皱起眉头。

晚饭后，教授慢慢穿过街道，来到哈桑·拉马尼的咖啡馆。咖啡馆的里屋危险地悬在河面上，入口处极低矮，他不得不稍微弯下腰才能进去。一个男人正在烧火。有个客人在喝茶。卡瓦吉[3]想安排他在前厅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教授却旁若无人地走进里屋。月亮透过芦苇格栅照进来，外面阒静无声，远处偶尔传来一声狗叫。为了看河水，他换了张桌子。可是河水干涸了，只有这儿那儿一小滩水，倒映着明亮的夜空。卡瓦吉走进来，擦了擦桌子。

“这家咖啡馆的老板还是哈桑·拉马尼吗？”教授用花了四年时间学习的马格里布语问他。那人用糟糕的法语回答说：“他已经逝世了。”

“逝世了？教授重复道，没有注意到他使用的这个字眼有多突兀，“真的吗？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卡瓦吉说，“一杯茶？”

“是的，可我不明白……”

那人已经走出房间，扇起了火。教授静静地坐着，感到很孤独，心中说自己这样做有点可笑。很快，卡瓦吉端着茶回来了。教授付了茶钱，还给了他很多小费，为此他得到一个恭恭敬敬的鞠躬。

“告诉我，”对方正要走时，他问，“现在还能买到那些用母骆驼乳房做的小盒子吗？”那人看起来很生气。“有时雷吉巴特人[4]带这些东西来，但我们这儿的人不买。”然后他不客气地用阿拉伯语说，“为什么要买用母骆驼乳房做的盒子？”

“因为我喜欢，”教授不客气地回道，觉得自己有点高高在上，他又说：“我太喜欢它们了，我想收集它们，你每帮我弄到一个我就给你十法郎。”

“十五，”卡瓦吉说，左手飞快地一合一合了三次。

“不行。十法郎。”

“办不到啊。不过你等一会儿，我带你去。你想给多少给多少吧。如果那儿有的话，你就能买到骆驼乳房盒子了。”

他到前厅去了，留下教授独自喝茶，听着远处的狗此起彼伏的吠叫咆哮，像一曲大合唱，月亮现在升得更高了。一群顾客走进来，在前厅坐着聊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离开后，卡瓦吉熄灭了火，站在门口穿上长袍。他说：“走吧。”

外面的街道上悄无声息，小贩们全都收摊了，唯一的光线就是月光。偶尔有行人经过，咕哝着跟卡瓦吉简短地打个招呼。

“大家都认识你呀。”为了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教授说道。

“是的。”

“我希望人人都认识我。”教授说。可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这种话听起来多么幼稚。

“没人认识你。”他的同伴没好气地说。

他们来到小镇的另一边。在沙漠中一片高耸的岩石上，通过石壁上的一个大裂缝，教授看到前方无边无际的白色里嵌进几块暗黑的绿洲。他们穿过裂口，沿着岩石间蜿蜒的道路，向最近的小棕榈树林走去。教授想：“他可能割断我的喉咙。但是他的咖啡馆——他肯定会被发现的。”

“很远吗？”他漫不经心地问。

“你累了？”卡瓦吉反问道。

“有人在萨哈林大饭店等我回去。”他撒谎了。

“你不可能兼顾两头。”卡瓦吉说。

教授笑了起来。他不知道对方是否觉得这笑声有点不自然。

“你当拉马尼咖啡馆的老板很久了吗？”

“我在那里是为一个朋友干活。”这个回答让教授十分不快，其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哦，那你明天要上班吗？”

“我也不知道。”

教授被一块石头绊倒，摔了一跤，手擦破了。卡瓦吉说：“小心点。”

空气中突然有股腐肉的腥臭气味。

“啊！”教授几乎被呛到，他问，“这是什么味道？”

卡瓦吉用他的长袍遮住脸，没有回答。臭味很快就被抛到身后，他们来到平地上。前面的路两边是高高的泥土墙。一丝风也没有，棕榈树静静地立在那里，但是墙后传来流水声。另外，当他们走在两墙之间时，人类排泄物的气味几乎一直萦绕不去。教授直等到他觉得问这个问题合理时，才略带恼怒地问道，“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快到了。”这位向导说着停下来，在沟里捡了一些石头。

“你也捡几块石头，”他建议道，“这里有些狗很凶。”

“哪里？”教授问道，但他弯下腰，捡了三块边缘尖锐的大石头。

他们继续静静地朝前走。围墙走到了尽头，前面是明亮的沙漠。附近有一座废墟，它的小圆顶只剩下一半，前墙完全被毁。后面是一丛发育不良、毫无用处的棕榈树。一条只有三条腿的狗疯狂地朝他们冲过来。直到它靠得很近了，教授才听到它不停地低吼。卡瓦吉朝它扔了一块大石头，正中它的口鼻部。那条狗嘴里发出奇怪的咔嗒声，朝另一个方向跑去，跌跌撞撞摔落在岩石上，又像一只受伤的昆虫一样胡乱挣扎着想爬上来。

他们拐下大路，走在铺满碎石的地面上，经过小废墟，穿过树林，这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地面在他们面前陡然下降。

教授说：“这里看起来像个采石场。”采石场这个词他说的是法语，因为一时想不起阿拉伯语里这个词该怎么说。卡瓦吉没有回答。相反，他站着不动，转过头去，似乎在听什么。的确，从下面某个地方，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微弱的短笛声。卡瓦吉慢慢地点了几下头，然后说，“这条路从这里开始。这一路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岩石都是白色的，月光很亮，所以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现在要回去睡觉了，很晚了。你想给多少给多少吧。”

站在深渊的边缘，感觉深渊每时每刻都在加深，月光下卡瓦吉的黑脸被长袍裹住，离自己的脸很近。教授问自己此时到底是何感觉。愤怒、好奇、也许还有恐惧，但最重要的是解脱，还希望这不是一个骗局，希望卡瓦吉真的会离开他，自个儿回去。他从边缘退后一点，在口袋里摸索想找一张零钞，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的钱包。所幸口袋里有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他掏出来递给那个人。他知道卡瓦吉很满意，所以当他听到卡瓦吉说“不够啊，我还得走很长的路才能回家，路上还有狗……”他没有理会。

“谢谢你，晚安。”教授说着盘腿坐下，点了一支烟。他几乎高兴起来。

“给我一根烟吧，一根就行。”那人恳求道。

“没问题。”他冷冰冰地说，举起那包烟。

卡瓦吉在他身边蹲下，脸色很不好看。“怎么回事？”教授想，再度害怕起来，他朝卡瓦吉伸出点燃的香烟。

那人眯缝起眼睛。在教授看来，这显然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当第二支烟点燃时，他壮起胆子对仍旧蹲着的阿拉伯人说：

“你在想什么？”

对方故意吸了一口烟，似乎要说话，又换上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却还是没有说话。一阵凉风吹过来，教授打了个寒颤。笛声不时从下面的深处传来，有时还夹杂着附近的棕榈树叶相互刮擦的声音。“这些人不是原始人。”教授发现自己在心里说。“好了，”卡瓦吉说，慢慢站起来，“留着你的钱吧，五十法郎足够了。这是我的荣幸。”然后他又说起了法语：“你就径直往下走吧。”他朝地上啐了一口，暗里笑笑（这也许是教授过于兴奋所致的幻觉？），然后大步流星地走了。

教授紧张起来。他又点燃一支烟，发现嘴唇自己在动。它们在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正常还是糟糕？太荒唐了。”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等着回到现实中来。他在坚硬、冰冷的地面上躺下，伸展开身子，抬头看了看月亮。这简直就像在直视着太阳。如果他每次都把目光移开一点，他可以看到天空中有一连串更微弱的月亮。“不可思议。”他低声说，迅速坐起来，四处张望，很难说卡瓦吉真的已经回镇上去了。他站起身来，向悬崖边看去。月光下，崖底似乎有几英里远，而且无法估量，四周连一棵树、一所房子都没有，甚至一个人也没有……他想再听听笛声，耳边却只有风声。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跑回那条路去，他转过身来，看着卡瓦吉离去的方向。同时，他轻轻地摸了摸胸前口袋里的钱包，向悬崖边上吐了一口唾沫，又对着那儿撒了泡尿，还像个孩子般热切地倾听那声音。他又有了动力，开始沿着小路走下深渊。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头晕。但他很谨慎，克制自己不看右边边缘。这是一条陡峭的下坡路，他不急不忙地往下走着。单调的环境使他进入了一种与坐巴士时差不多的心境。他又开始喃喃自语“哈桑·拉马尼”，反复地、有节奏地说。他住了口，为这个名字现在暗含的危险，生自己的气。他认为这趟行程让自己筋疲力尽。“还有这段步行。”他补充道。

他现在来到了巨大的悬崖下，月亮正在头顶上，还像在上面时那样明亮。只有风留在了身后，留在了上面，在树丛中徘徊，吹过艾恩塔杜特尘土飞扬的街道，吹进萨哈林大酒店的大厅，吹到他的小房间的门下。

他想，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做这种不可理喻的事，还好他够聪明，知道既然正在做这种事，这个时候寻求解释就没什么必要。

突然，他脚下的地平坦起来，他比预期的更快到达了底部。他仍然不放心地一步一步往前迈步，似乎准备着还会有另一个险恶的落差，可是在这均匀而昏暗的光线中很难看清楚。他还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条狗已经扑向了他，一团沉重的皮毛想把他往后扑倒，锋利的指甲在他的胸口摩擦，紧绷的肌肉顶着他，那牙齿只想咬进他的脖子。教授心道：“我拒绝以这种方式死去。”那条狗向后倒下，它看起来像一条爱斯基摩犬。当它再次窜起时，教授叫起来，非常大声。“啊！”它扑倒在他身上。教授说不清是什么感觉，身体某处感到疼痛。有一些人的声音离他很近，但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就在那一瞬间，就在那条狗的牙齿还咬着他的衣服，或许还有他的肉之时，一个冰冷的金属物件残酷地顶在他的后背上。教授知道那是一把枪，他举起双手，用马格里布语喊道：“把狗带走！”但是枪只把他往前推，既然狗回到地上，也没有再度跃起，他就往前走了一步。枪一直在推，他一直往前迈步。他再次听到人声，但他身后的那人一言不发。人们似乎在奔跑；至少听起来是那样。他这时才发现，刚才由于狗的袭击，他一直紧闭着眼睛。于是他睁开眼睛，看到一群人迎面走向他。他们穿着雷吉巴特人的黑色衣服。“雷吉巴特人是遮挡太阳的一片云。”“当雷吉巴特人出现时，正直的人就会转身离开。”在许多商店和集市上，他都听到过朋友之间开玩笑地说过这些传言。千万别对雷吉巴特人说这种话，真的，这些人倒也不怎么来镇上。他们会派一个人乔装打扮，与镇上的不良分子安排处理赃物。“这是一个机会，”他飞快想到，“一个检验这种说法是否准确的机会。”那一刻，他丝毫不怀疑这次冒险将证明这是对他这种愚蠢行为的一种警告——日后回想起来，这种警告将会一半邪恶，一半搞笑。

两只咆哮的狗从迎面而来的人身后窜出来，扑向他的腿。他十分愤慨地注意到，根本没有理会这种失礼的行为。当他试图避开两条叫嚷着的狗的攻击时，背后那把枪更加用劲地推他。他再次喊道，“狗！把它们带走！”枪使劲把他往前推，他摔倒了，几乎倒在对面那群人的脚下。两条狗撕扯着他的手和胳膊。一只靴子把它们踢到一边，狗疼得尖叫，然后那只靴子更用力地踢向教授的屁股，然后四面八方来了一阵猛踢，他在地上翻来滚去好一阵子。在这期间，他意识到有一双手伸进他的口袋，拿走了里面所有的东西。他想说：“你们拿了我所有的钱，别再踢我了！”但他青肿的脸部肌肉不听使唤：他感到自己只是撅了撅嘴，如此而已。有人往他的头上狠命一击，他想：“现在我总算要失去知觉了，谢天谢地。”但是他仍然听得到那些他听不懂的叽里咕噜声，意识到他的脚踝和胸部被紧紧捆住。接下来是黑色的寂静，它像一个伤口不时打开，他听到短笛一次又一次地演奏着同一段柔和、深沉的曲调。突然间，他感到浑身极度疼痛——又痛又冷。他想：“这么说我刚才一直没有知觉。”尽管如此，眼下似乎不过是之前的直接延续。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他躺的附近有骆驼；他能听到它们的咕噜声和沉重的呼吸。他下了决心睁开眼睛，害怕眼睛再也睁不开了。然而，当他听到有人走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轻而易举地就看到了。

那个人在灰色的晨光中冷静地看着他。他用一只手捏住教授的鼻子。当教授张嘴呼吸时，那人迅速抓住他的舌头，用大力往外扯。教授不停地作呕，喘不过气来；他不明白这是在做什么。他无法区分野蛮拉扯的疼痛和锋利尖刃的疼痛。然后是无休止的咳嗽和呕吐，这些都是无意识自动进行的，仿佛他没有参与其中。他的脑海中不断出现“手术”这个词；当他重新陷入黑暗时，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他的恐惧情绪。

驼队在上午的某个时候启程出发了。教授并没有失去意识，但完全处于恍惚的状态，仍在不停地作呕，流着血水，他被折起来扔进一个麻袋，麻袋绑在一头骆驼的一侧。在巨大的圆形剧场般的斜坡下端的岩石上有一个天然门洞。骆驼，敏捷的骆驼，在这次旅行中负载很轻。它们排成一行，慢慢穿过这个门，爬上缓坡，从这里进入了沙漠。那天晚上，驼队在一些低矮的山丘后面停下，男人们把教授取出来，他仍然处于无法思考的状态。他身上那些灰扑扑的破布，依稀还看得出是他以前的衣服，

他们在破布之上系上一串串用锡罐底串起来的奇怪的带子。这些明晃晃的带子一条接一条地绑在他的躯干、胳膊和腿上，甚至穿过他的脸，直到他完全被圆形金属鳞片覆盖住，像套进了一副盔甲里。在装扮教授的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欢笑声。有人拿出一支笛子，一个年轻人模仿乌列奈尔人^[5]跳起了手杖舞，不算太下流。教授已经不再有意识了；确切地说，他存在于这些人的动作之中，他任由他们摆布。当他们把他打扮停当后，塞了一些食物到挂在他脸上的锡片下面。尽管他机械地咀嚼着，但大部分食物最终还是掉在了地上。他们把他放回麻袋里，就让他待在那里面。两天后，他们来到自己的一个营地。这儿的帐篷里是妇女和儿童，男人们不得不赶走留在那里看守的咆哮着的狗。当他们把教授从麻袋里掏出来时，人们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花了几个小时才让所有女人相信他是无害的。不过，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怀疑他是一笔宝贵的财产。几天后，他们再度出发，带上所有的东西，只在夜间行进，因为地势越来越暖和。

即使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不再感到疼痛，教授也没有开始思考：他吃东西，他排便，吩咐他跳舞他就跳舞，毫无意义地跳上跳下，让孩子们很高兴，主要是因为它发出美妙的叮当声。白天天热时，他一般都在骆驼群中睡觉。

驼队一路向东南前行，避开了所有开化的定居点。几周后，他们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地，这里一片荒芜，植被稀疏。他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待下来。骆驼被散放出来吃草，在这里人都很高兴。天气比较凉爽，沿着一条人迹稀少的小路走几小时后有一口水井。就是在这里，他们萌生了把教授带到福加拉并把他卖给图阿雷格人^[6]的想法。整整一年后，他们才开始行动。这时，教授已经训练得很好了。他会翻斤斗，发出一连串可怕的咆哮声，不过，那声音听上去有些好笑。当雷吉巴特人从他的脸上取下锡皮时，他们发现他跳舞时还可以扮得妙的鬼脸。他们又教他做一些基本的淫秽姿势，这些姿势总是能引得妇女们愉快地尖叫。现在，只有在特别丰盛的饭菜之后，在有音乐和欢乐的气氛时，他才被带出来。他轻易就顺应了他们的仪式感，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基本“节目”，当他被叫到的时候他就会表演：跳舞、在地上打滚、模仿某些动物，最后假装生气地冲向人群，看着由此带来的混乱和欢笑。

三个人带着他出发去福加拉，他们带了四匹骆驼，而他很自然地骑在驼背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看守他，只是让他走在他们中间，有个人总是待在队伍最后面。他们在黎明时分进入看得见城墙的区域，但他们在岩石丛中等待了一整天。黄昏时，三人中最年轻的那个动身进城，三个小时后，他带着一个手拿粗大手杖的朋友一起回来了。他们想让教授就在那里表演他的那一套节目，但那个来自福加拉的人急着要回镇里去，所以他们都骑上了骆驼。

到了镇上，他们直接去了那个村民家。在院子里，他们坐骆驼中间喝咖啡。教授在这里又开始了他的表演，这一次，人们长时间地欢笑，不停地握手。买卖成交，那人支付了一笔钱，雷吉巴特人走了，教授留在了那个拿手杖的人家里，那人毫不犹豫地把他锁进院子边的一个小围栏里。

第二天在教授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就是在那天，痛苦重新在他的生命中涌动。一群人来到这个村民家里，其中有一位可敬的绅士，他的衣着比其他人要好，其他人极力奉承他，热切地亲吻他的手和衣摆。这个人时不时说一些经典的阿拉伯语，让那些没有学过《古兰经》的人十分敬佩。因此，他的谈话多少会有如下内容：“也许在因萨拉赫^[7]。那里的法国人很愚蠢。天堂的复仇即将来临。我们不要催促它。赞美至高无上的主，憎恶其他偶像。他的脸上涂着颜料，以防警察看个仔细。”其他人听了之后表示同意，缓慢而庄重地点头。教授躺在他们旁边的围栏里，也在听。就是说，他意识到了老人说的阿拉伯语的声音。这么多个个月来，这些话第一次穿透了他。一堆噪音后，他听到“天国的复仇即将来临”。接着是：“这是种荣幸。五十法郎足够了。留着你的钱吧。很好。”还有那个蹲在悬崖边上的卡瓦吉。然后是“把诅咒投向偶像”和更多的胡言乱语。他气喘吁吁地在沙地上翻了个身，忘了这件事。但是痛苦已经开始，它以一种谵妄的方式运作，因为他已经恢复了意识。当那个人打开围栏门，用手杖戳他的时候，他愤怒地叫了起来，大家都笑了。

他们让他站起来，可他不愿意跳舞。他站在他们面前，盯着地面，顽固地一动不动。主人很生气，对其他人的笑声很恼火，又不敢在长者面前表现出他的恼怒。他觉得只有把他们全都赶走，说他要等待一个更好的场合再来展示他的财产，然而，等客人们走后，他拿手杖狠狠揍了一顿教授，还用各种下流话骂他，然后气冲冲地摔上门，走到街上。他径直走向乌列奈尔人所在的那条巷子，因为他确信会在那些姑娘中找到雷吉巴特人，他们准是在那里花钱快活。果然在那儿的一个帐篷里，他找到三个男人中的一个，他还在床上，一个乌列奈尔姑娘正在洗茶杯。村民走进去，那个男人还没来得及坐起来，头就几乎被斩断，然后他把剃刀扔在床上，跑了出去。

乌列奈尔姑娘看到鲜血，尖叫起来，从她的帐篷跑到隔壁帐篷里，很快地和四个姑娘从帐篷里跑出来，她们冲进咖啡馆，告诉老板谁杀了那个雷吉巴特人。仅仅过去了一小时，法国宪兵就在村民一个朋友家里抓住了他，把他拖到军营。那天晚上，教授没有吃任何东西，第二天下午，越来越强的饥饿感令他的意识慢慢清晰起来，他在院子里和与院子相连的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房间的墙上挂着一本日历。教授紧张地看着，就像一条狗看着鼻子前的一只苍蝇。白纸黑字，它们在他脑海中发出声音。他听到了这些声音。“萨贝尔杂货店。六月。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那些微小墨迹可能是很久以前就有的，但是它们组成了一曲交响乐，当它们以声音展现出来时，它们近在咫尺且无比巨大。于是，一曲感觉之音开始在教授的脑海中响起，当他看着泥墙的时候，那音量越来越大，他有一种感觉，他正在演奏很久以前为他写的东西。他想哭；他想在小房子里咆哮狂笑，掀翻和打碎为数不多的可碎物品。他的情绪除了这一个压倒性的愿望之外，别无他途发泄。于是，他拼命大声吼叫，在屋子里一顿打砸，损毁家具物品。然后，他又去砸临街的大门，门抵抗了一阵子，最后破了。他钻过被他掀扯掉木板造成的口子，仍然大吼大叫，在空中挥舞手臂，弄得叮玲当啷直响，他沿着安静的街道向镇子大门飞奔而去。有几个人非常好奇地看着他。他经过车库，那是高高的泥土拱门前的最后一座建筑，拱门外是

沙漠。一名法国士兵看到了他。“是你啊，”他自言自语道，“一个大疯子。”又是夕阳西下之时。教授跑到拱门下面，面向彤红的天空，开始沿着因萨拉赫小道一路小跑，直奔夕阳而去。在他身后，车库那里，士兵向他乱开一枪，祝他好运。子弹擦着教授的头呼啸而过，危险极了。他的叫喊声上升为愤怒的哀号，他更加疯狂地挥舞着手臂，由于恐惧，每走几步就高高一跳。士兵微笑着看了一会儿，在即将来临的夜幕下，那个跳动的身影越来越小，锡皮的叮当声融入大门外无边的寂静里。士兵靠在车库上，车库外墙上仍然散发着太阳的余热，但是，即使在那时，在空气中，月亮的寒意也越来越浓。

[1] 艾恩塔杜特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北非小镇。

[2] 马格里布语，即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是指在马格里布等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亚）使用的阿拉伯语变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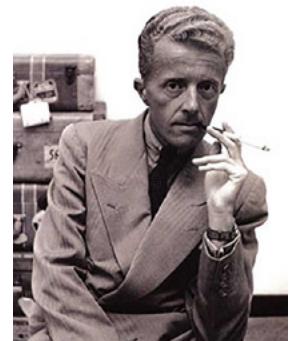
[3] 卡瓦吉 (Qaouaji)，马格里布阿拉伯语中“咖啡馆主人”的意思，本文统一音译为卡瓦吉。

[4] 雷吉巴特人 (Reguibat)，属于阿拉伯撒哈拉威部落，语言为哈桑尼亞語，信仰伊斯兰教。

[5] 乌列奈尔人 (Ouled Nail)，生活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的部落，女子因生活所迫常常当肚皮舞女或妓女为生。

[6] 图阿雷格人 (Tuareg)，主要分布于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带的游牧民族。

[7] 因萨拉赫 (In Salah)，阿尔及利亚中部的绿洲小镇，位于撒哈拉地区干旱的塔德马伊特高原南部边缘。



保罗·鲍尔斯

美国作家、作曲家、翻译家。生于纽约，大学毕业后在巴黎游历，很早就展现音乐和写作才能。1947 年起定居摩洛哥北部海滨城市丹吉尔，直到去世。1949 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遮蔽的天空》被视为二十世纪文学经典。鲍尔斯是美国海外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长短篇小说、诗歌、旅行文学、音乐等全方位的创作，长期旅居摩洛哥的生平，对北非文学、法语、西语文学的翻译（包括萨特、博尔赫斯等人作品），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一曲微茫》发表于 1947 年，是保罗·鲍尔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译者：陈新宇

女，湖南长沙人，现居加拿大。图书译者，主要翻译作品有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年轻的心在哭泣》、约翰厄普代克《父亲的眼泪》、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岛》等。在《译林》《外国文艺》等杂志上发表过翻译作品及文学评论。

《一曲微茫》"A Distant Episode" by Paul Bowlers. Copyright © 2001, Rodrigo Rey Rosa,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Wylie Agency (UK) Limited.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非虚构

两个做咖啡的人

杨樱 | 长乐路百业指南

上海最密集的咖啡街区，我们这算一个。
但这不重要。

01

卷哥一直是传说。

小顾说他是“真的猛士”。只卖手冲！

卷哥不以为然，卷哥对开店这事有一种波希米亚的态度，特别是在五月份我们刚到长乐路的时候，可能春风让他沉醉了，人壶合一，眼中再无市口概念，任何地方都不在话下。

你看，烧烤店里可以，精酿啤酒店里可以，他最健谈的时候就是在襄阳北路的精酿啤酒店里，夕阳打过来，他眯着眼回忆往事。

“什么，你还在别人的咖啡店里卖咖啡？这也行？”

“他不做手冲。他愿意，我也愿意，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

02

天热起来的时候，卷哥消失在路口。他在朋友圈里说找他可以去长乐邨。那是他做培训的地方。

西晒太严重了。卷哥跟我说。那时候已经七月初了。

卷哥关店简单。我们说过的：一台磨豆机，两台秤，四袋咖啡豆，两把手冲壶，两个耐热量杯，若干一次性纸杯……放入一个纸箱，抱到后备箱中，跟每天下班一样。

卷哥贯彻专业主义那种“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路线。Marshall 音箱、操作台、白色房间。

03

那段时间里，要找卷哥就得在微信上约，去长乐邨里的咖啡教室。长乐邨是陕西南路和长乐路口的东南角的一大片联排住宅，建在 1930 年代。金宇澄有回忆父辈的一本书，《回望》，其中讲他的外公因为老东家裁员而失业，“迫不得已”做起自己的金店生意，没想到做得很有些章法，就此离开大自鸣钟曹家渡那一带工厂区，在长乐邨买了房子。当年，这是个有身份的人的选择。

先问他今日在不在店里，回复也快，午饭几点结束，在那个时间之后去比较好。Dripers，还是这个名字，还是一张 A4 纸做店招，和之前 Tap That 门口贴的歇业通知一样，四角用黑胶带粘在赤豆色油漆风化的木门上，圆圆字体打在纸中央。店在长乐邨深处，某幢底楼的朝南房间，拐过晒着的内衣棉被，各家种的大小盆栽，看见一扇常年敞着的木门，右手便是。只能按照门牌寻去，除了那张 A4 纸没有别的标识。去的那天，木门把手手上挂着一塑料袋长生果。

一间大堂屋。进来的左侧是三排椅子，摆法像教堂，南面窗子那一侧是个长操作台，摆着卷哥的所有工具，窗户上有彩色玻璃纸（还是彩色玻璃？），光从操作者背后打进来，阳光好的时候，可能会有光环加持在身后，几乎有宗教氛围。

中午刚过，外面阳光也好。两个姑娘——虔诚的女学员一边一个站在卷哥身边，拿着最传统的笔记本和笔（不是手机），凑过去很仔细地记录卷哥操作过程中每个小数据。豆磨成粉之后，要举到鼻子前面扇一扇，类似闻香的手势，在第一轮水下去之后（还是再之后？）也要凑上去扇那么几下。演示者和学习者都是极为庄重的，轻声轻语，提问和回答的时候时不时礼貌地笑一笑……他们不断地用眼神、用手势交流这一次手冲咖啡的感受和收获，卷哥会在试喝的时候发出异常响亮“哎”的一声，像夹着一大口水同时倒抽一口气，激烈地吸进口腔，然后平静地、郑重地对身边的姑娘说，可以。

见惯了卷哥在襄阳路口孤身一人冲咖啡的样子，我问，这是同事？啊，同事。嗯，其中一个姑娘后来出现在南昌路的新店里。

那天的音乐是帕格尼尼的《24 首随想曲》。光线里细窗框像十字架一样，卷哥神态肃穆。我都不敢说话。

看到他第三次把一粒豆子扔到磨豆机里，然后近似于空转……我终于忍不住，这是干吗？

洗一洗磨豆机。

哦。

郑重地把咖啡交到我的手上。

我郑重地喝完了它。

“门上有一个二维码，你随便给就好了。”卷哥说。

“随便给吗？”

“对的，想给多少都可以。”

扫了码，想了想，40 吧。好像在襄阳路口的时候就是这个价。

04

虽然对钱表现出一种很游离的感觉，但卷哥也有“积分卡”这样的噱头。第一次在襄阳北路的时候，他递过来一张硬纸片，敲上“不想上班”的印章。10 个印章就可以免费喝一杯手冲。

那次他指着马路对面的粉色小咖啡店，看到没有，这也是一家咖啡馆。这是上海咖啡店最密集的十字路口，“方圆 50 米之内能有 20 家。”他可能是想暗示我这行竞争太激烈了。

这些店各有各的竞争手段。与“不想上班”很对仗的小顾的“周休七日”，一周中某一天买一赠一，某一天任意三样八折，每天饮料加三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很大的贝果，或者其它优惠。Doublewin 和 Manner 就是连锁店风格的价格战。Doublewin 新人券、打气券、放松券之类的七七八八的优惠，每天只花 6.93 元就可以喝一杯咖啡。已经比便利店还便宜了！

当然，这不在卷哥的视野范围内。他是手冲。

后来，再去襄阳北路的档口，忘了带积分卡，错过。去长乐邨的教室，他问积分卡带了吗，原来这里也可以继续用，没带，再后来，到南昌路，他还是要问一下，积分卡？啊，原来还可以用！感觉错过了很多。

05

卷哥有以下几种可能，决定了他以高冷的姿态来面对客人：

一是他的客人大部分是同行，只要是同行，显然有偷师学艺的重大嫌疑，瓜田李下，彼此都相忘乎江湖比较好。

二是如果是同行且学艺，你应该走学员路径，不应该在这里东问西问。

三是如果是外行，就是瞎聊天，难免还要有假充内行的，我也犯不上跟你讲太多啊。我写东西，如果有人跑过来热情地问你都是怎么写出来的啊？什么时间写有灵感？是喜欢边听音乐边写吗？要戴耳机吗？吃饱了写还是饿着肚子写，我还真是无从谈起。卷哥大体上应该也是这样。

我在卷哥那里，大体上就是跑过来东说西的白痴，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以为自己爱好者的身份就已经很给专业人士以尊重了，却忽略了专业人士最感觉尴尬的就是爱好者盲目的热情。

06

但是我在北京遇到的 Tiger 的老板就不是这样，她对谁都热情，也特别喜欢跟人聊口味，聊豆子，聊上海和北京咖啡店的区别……

“上海的公共厕所太少了。都上哪儿去上厕所呢？”

Tiger 在旧鼓楼大街，现在北京胡同里的公共厕所真是太多了。

“上海老阿姨啊也会喝咖啡的，不像北京，都是年轻人。”

卷哥说他喜欢泰国，也是因为老阿姨。

“曼谷的客人好，不需要教育，从小就开始喝。以前在曼谷经常有个老太太提着热水瓶来打咖啡，六点半来，要求很高但是不需要听太多解释，就指着一个豆说这个给我来五杯，都放在这里面。她就打回家给孙子儿子吃早饭，然后自己烤面包。”

那天还有一个诡异的收获。上午我在安定门内的老马稍麦吃饭，隔壁桌的一个男人埋头猛吃羊肉烧麦，猛喝羊杂碎汤。过会儿到了 Tiger，这男人居然也跟来了，跟 Tiger 老板喊喊嚓嚓说了半天。我们问老板，这人是谁，她说这是转店的。

“什么是转店？”

“就是成天在街上喝咖啡，做点评，自己也做咖啡的那些人。”

“你们顾客这样的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

我想起来小顾说的路易·欠蹬。他的另一个带路大哥。这个待会儿再说。

07

卷哥是个害羞的人。他看到眼熟的客人进来，眼神里可能会有一点高兴，但我怀疑

他可能也是脸盲，只是凭经验大部分朝着他笑的客人都应该算做熟客。
不管是害羞，还是脸盲，卷哥的开场白都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
“我先给你介绍今天的几支豆吧。”
又专业又回避尴尬。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
人民坊，就是后来南昌路那个店里，进来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冲锋衣的大个子男人。
“我先给你介绍……”卷哥温柔开场。
“这些我都喝过。”硬汉扫视桌面上的咖啡豆。有一点战场感觉了。
“那我给你 92 度的水冲一个……”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有点怀疑自己听到的东西，听不太清，也听不太懂。
两人低语飞快结束。高手切磋。
卷哥继续一脸肃穆。冲锋衣垂手而立，双肩包放在脚边，期待。
两人都很平静。有一说一，卷哥并不会因为有切磋在，就更肃穆。在专业的稳定性上，卷哥的情绪、手法、态度一如既往，没有波澜。

08

卷哥这样的手冲咖啡店有三种客人。一种是我这种，没有标准和爱好，偶尔会像买香水一样被咖啡包装上不切实际的关键词吸引，“香茅、柑橘、朗姆酒”之类。在我要去喝咖啡的时候，就只是去喝咖啡。我觉得咖啡不好喝的时候，通常就是形容为“不好喝”。
第二种是在点评网站上特别爱说话爱发笔记的客人。他们总是出现在各种熟人咖啡店，带着长镜头，只拍咖啡不拍人。熟人是喝出来的，这一家的咖啡师独立出去开了自己的店，便值得首评道贺，写得也亲昵，让你觉得是多年的朋友有朝一日创业成功，其实不过只认识了三五回。在别的店里，他们分享附近买来的面包、时令的吃食，寄放自己常用的杯子，跟店主的狗拥抱。但是在卷哥这里，这些都没了着落，这些客人也有办法，点评上会写“祝贺老板第五家店开业哈哈哈哈”。
第三种客人就是冲锋衣，他们点单的时候带着一种华山论剑或者质检车间主任的严肃，可能是来切磋的同行，也可能就是好这口儿的，我跟卷哥探讨过这个问题，“非同行一般都问这是什么牌子的手冲壶”，那么同行呢？“咖啡粉细度是 15 还是 17，水温是 92 还是 90，分段冲水比例是 442 还是别的”。我有一次跟小顾说喝过一个手冲水味儿很大。小顾马上纠正：“你要说，这咖啡清澈度太高了。”

09

眯着眼迎着西晒的太阳，卷哥有很多话要讲的那个下午，卷哥暗示我这个生意太艰难了。但这不是他抱怨人生，是不想让人误入这个歧途。
“大学里就对咖啡感兴趣。当时坐火车来上海喝咖啡。2005、2006 年的时候，有一些日本人开的手冲咖啡店。一边喝一边看他们怎么做。也去兼职。”他说了好几个名字问我知不知道，我摇头。
“那时候去泰国要比国内先进多了。什么红外扫描咖啡粉的细度的机器，就算上海那些开得很早的店都不知道，我就带着设备回来，很多人就来看。”
“我杭州那家店开了 11 年，有很多上海客人周末会去。可能喝一天。早上喝一杯，中午出去吃午饭，下午再来喝一杯。”
“为什么不能专门坐高铁去喝咖啡呢？既然有人专门坐高铁来上海看展览或者跑马拉松。”
“我想做本地客人的生意，不必是上海本地人，只要是常住客人就好，不是拉着箱子带着相机的那种客人。”
“要寻找附近便宜的地方，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因为现在这个吧台一个月也要四万，杭州地方大一倍一年大约是七八万元的租金，而永康路上的铺面，一年 30 万还需要抢。你没有在上海开过店吗？”
他坚信我是一个打算开店的同行。我觉得他没好到阻止潜在同行误入歧途的地步，否则为什么要开咖啡培训课呢？

10

卷哥这一次开店，很认真。他在长乐邨说这事的时候，嘴里都要说，“我的新店”。也可能是旁边两位虔诚的女学员，看起来寄予希望。他不肯透露具体地址，只说在南昌路上，南昌路在淮海路的另一边，与长乐路一样算是淮海路的后街。卷哥在不肯说什么东西的时候，感觉不光是谨慎，还有点提防。可能天机不可泄露。

卷哥说新店可以做咖啡，不能做简餐，更不能做餐饮，这些牌照之间的价格差异很大。

11

又隔了一个多月，翻卷哥的朋友圈。新店已经开了。在人民坊，要从南昌路那里进。人民坊本来在淮海路也有门，但疫情以来，门锁上了。Drippers 离淮海路只差临街一排，但要从南昌路绕很大一圈才会到。
大众点评上已经有评价了。就是这种：“祝贺老板第五家店开业哈哈哈哈”。
记得那次问卷哥，你要在南昌路开的店，只卖手冲吗？
问完我很后悔，我觉得简直伤害到了他。他看了我一眼。
“当然。”
在这一点上，小顾会一百万次地把“真的猛士”送给卷哥。何止，简直是长乐路西西弗斯。

12

在卷哥的自述里，大学毕业之后他就不再国内了。他在曼谷做咖啡。不是流浪，不是波希米亚，是职业发展。在曼谷做咖啡相当于在硅谷做码农。这个过程据说顺利，他说他后来成了大型连锁咖啡馆母公司里做咖啡品控师，手下最多的时候管着 4000 个人——和租金一样，我对卷哥说出来的数字都有点将信将疑——这份工作结束之

后再续上另一份，这次是清迈。他本来想在清迈开自己的店，结果疫情了，于是把店改在上海。
卷哥是杭州人。他们家里真正的波希米亚是他的爸妈，有一次他说他在泰国不回家，父母想了想说那我们去找你吧。从此，父母爱在世界各地游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他说到这些话的时候，会感觉说得有点多，要把话题拉回到咖啡馆。
“杭州那家店很早就开了，很有名。”
“2010 年出国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偶尔回去在店里，老客人以为我是新来的客人，会让座给我。”
问他店在杭州哪里，说了地址。又补一句：“从现在这个店到杭州店，点对点一小时 20 分钟。”
卷哥是 1985 年出生，他让大家叫他拉斐尔。

13

小顾才不会上拉斐尔的当。我们都不要被卷哥骗了。

14

小顾也要开一个店。

从 6 年前他决定做咖啡师那天开始，这事就像一个结果一样在前面等着他。因为要结婚了，这事变成了“成家立业”的人生仪式感的一部分。

延庆路那家修车铺风格的新咖啡馆里，他摩挲着水泥工业风的咖啡凳，描述他未来那家店：

- (1) 不会在上海，房租太贵了，竞争激烈。
- (2) 咖啡店在当地应该已经有基础，是生活方式，不是赶时髦。
- (3) 装修不能太用力太刻意，最好是四两拨千斤，而且有风格（他看了看毛坯墙壁和房顶，还有几个钢管焊在一起的茶几）。

想象中，这个地方是苏州，成本可控。潜在的原因大概也包括这里离上海近，做不下去回上海的成本同样可控。

15

这只是有关咖啡馆生意很小的一部分。全部盘算下来，要想的事太多了。小顾有天听到一个十几岁姑娘说，她和她的干妈一起去报了一个咖啡培训班，两个人在周休七日里畅想未来辉煌，让他忍不住跑出来泼冷水：五万块钱干什么不好非要去开咖啡店？

轮到他自己，他不会这么问。

这东西有的时候会被归到宿命里，而大多被归到宿命里的东西都是强烈暗示自己的后果。

16

小顾打工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杨浦大学路，房租可能便宜，大学生也需要足够大的自习空间，所以，这家店一言以蔽之，大。当然，更重要原因可能在于那段时间里韩国漫咖啡是业界模范，漫咖啡凯觎星巴克全球翘楚地位，走的就是无以复加的大店路线。店大，卖咖啡不足以支撑收入，也卖简餐，服务员、固定投入、保洁，一律成倍增加。到最后跟星巴克几乎已经完全不同。

小顾的第一个老板就是在这种“大即是美”的风潮中拿下六百平方米的面积，白领的“咖啡 + 简餐 + 小型办公”不足以展现足够的竞争力，“女人和孩子的钱好赚啊”，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就加了儿童区，森林探险主题，而且用真花真草。打理真花真草，真花真草里还有各种小虫，时间久了飘散出来各种气味……

小顾像讲述一个经典失败案例一样讲述他的职业生涯见闻。“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他克扣物料。我们做了一点业绩，他觉得不够，就用更低质量的物料压缩成本，人家吃得感觉不如以前，不来了。这个老板没脑子，很没脑子很没脑子。”

17

第二家店在南京西路。这个店小，开在一个餐厅里。店主是一对女生情侣，一个在外面上班，一个在店里，外面上班的女生没有什么安全感，在店里安了监控。小顾是唯一店员兼咖啡师，创业启示接近于无，倒是有许多八卦记忆。

“那个监控哦，淘宝买的，看宝宝的，不能讲话，但是能放儿歌。它一感觉不对了，突然之间就开始放儿歌。就你聊着天聊着天，店里的音乐突然被儿歌盖过去了。她的儿歌是那种，小时候听还挺正常，现在听就瘆得慌。就看那种看小宝宝的监控。相当吓人。”

“她们是拉拉呀！我有女朋友的呀！天天盯，你跟老板聊天聊太多了，就有问题。本来包午饭，后来就不订了，你自己解决。她就这么表达的。最过分的，店里那个女老板出去吃饭，帮我买一份，她不让我吃，她说我给你钱你自己买一份，那个留着回来我吃。上班的女的不会做咖啡，她在学。我是周一到周五在，她周六周日在。”因为租在餐厅里，没有执照，也就没办法与外卖公司合作，那段时间小顾还负责送外卖。每天站在地铁口给人发店里的小卡片，上面印着店铺电话，有人电话下单，他就去送货。“那时候想，大家都是刚创业，一起用力，一起加油！开 3000 块一个月。4 年前。现在想想我大概昏了头。”

这是小顾在这个创业的小店里唯一记得跟创业有关的事。

18

到周休七日之前，小顾还经过了大公司的洗礼。资本有一阵子爱咖啡。小顾去的是麦隆，麦隆没什么故事，但是资本让小顾感受到了力量。

咖啡店有一阵子很讲空间——星巴克的“第三空间”被漫咖啡延续一阵子之后好像就

不怎么往下走了，有一阵子是室内设计风格很强烈的咖啡馆，Instagram 上的风格会被迅速复制过来，那时候建筑设计师好像都会拿小酒馆、咖啡馆和简餐店盘一盘自己的业务，小单子但是相当于在闹市有个作品展示。

不知从哪个时间开始，国际品牌和小咖啡店们的力量天平发生了变化。Manner 和 Seesaw 在街头巷尾占据不少地盘。Seesaw 开始讲自己的星巴克故事。拿自己的杯子买咖啡可以省 5 块钱这事变成了通行的一个规则。

还有以金融丑闻收场的瑞幸。和它应运而生的那段时间一样，概念、补贴和不断刷新的 KPI 数字以浪潮般的姿态在零售业冲来冲去，我只记得，在想喝一杯咖啡终于踏进某家瑞幸门店的时候，却被告知不下载 app 就无法点单。

疫情之后，Manner 的扩张不可小觑。街头巷尾倒闭的咖啡馆都被 Manner 接了盘。长乐路一直往西经过常熟路的那个路口，不过 50 米的地方挤着三家 Manner。它们原来各自叫什么名字，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

19

周休七日最红的时候是在疫情前一个月，也就是 2019 年 10 月。小顾见证了一个网红店的诞生和沉寂，以及为了抵抗沉寂作出的种种努力。在老板的盘算里，长乐路这个门店只不过是淘宝的线下体验店，同时也相当于在一个人流量不是很大的地方作实体店的试水，真正的目标是新天地这样的地方。为了导流，老板在淘宝买搜索曝光，“就跟上瘾一样，一停马上惨不忍睹。”

“当时做淘宝想的是网上销售没有库存压力，现在每天要花钱，它勾引你买，不买一天就成交几单，买了三四十单，怎么可能不买。买流量两三百块钱一天，也相当于租了一个铺子。所以，做零售很难很难。”

“我们的东西都是稍微能放一放。我们店最火的时候，早餐饼干一天可以卖一千多块钱，非常猛。现在新店太多了，都去打卡新店了。我们认识的博主也都去新店了。就是写大众点评和写小红书的博主呀。说是所谓的业余爱好，写得多了就有人联系说能不能帮我们拍拍我们的产品。”

小顾看着老板的整个算盘。他觉得自己可能也终将面对这些。

20

但新天地的店还是要开了。店面紧邻一个挺红的面包店，也卖咖啡，他们很紧张。店长专程跑了一趟长乐路，研究了价格，正式照会了老板：这样不行，你们得涨价，否则我们就打价格战。看谁打得过谁。

小顾想不出怎么办。长乐路哪里有涨价的空间。

21

长乐路的客人被惯坏了。小顾说本来大家都还平和，价格也差不多，疫情出来后 DoubleWin 和嘲鸫开始打价格战，Manner 就不说了，Manner 本来就很便宜，嘲鸫那个时候不管工作日自不自带杯，你来就减 5 块钱。DoubleWin 是你去那里买券，一杯拿铁 16.9，你再加 9 块钱又可以拿面包。就是这么恐怖。

“如果我们店不卖饼干，又坚持原来那个价格，老早就不行了，人家连锁店耗也能把你耗死。”

22

DoubleWin 有一个长乐路的福利群。周一和周五早上各有一次“打气券”和“放松券”，可以减 5 元，如果自带杯子，可以减 3 元，这样 15 块钱的美式打一个九九折，就到了我们前面说的 6.93 元。这只是福利群的一小部分功能，店员会圈起一人接龙试喝，被圈到的人都可以喝限定新品。群里一天次数不停地播报 DoubleWin 周年庆优惠，还有各种咖啡产品的打折。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由优惠券和新品维系起来的社区。虽然偶尔也有麻辣烫、毒鸡汤和跑步路线的照片跳出来，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店员和老顾客的表情包你来我往，店员在群里抓住每一个可能会下单的用户。比如每周一买一赠一的活动下午 4 点结束，有个用户说自己在浦东上班赶不过来，店员马上回复：您要喝什么可以现在提前付哦，等您下班过来我再帮您做，您看可以吗？我加您微信吧！

23

这个群就留在微信里了。一不注意它就会有几百条信息出现，总有人评价新品哪个最好喝，什么叫做“米奶油”，或者展示一下店员画在外带纸杯上的小人像。偶尔会打开看一看那些小红点里面到底都是什么人在说什么话。“打气券”出来的时候，抢到了就挺高兴，想着下午去用一用。

说到群，通讯录里还有个联华超市的群。那个群里也有几百人，但只有一个人在说话：4 块钱小面包到货。五常大明天到货。一个爷叔因为评论市容，被呵斥不要提出与本群无关的话题。然后就沉寂了。

DoubleWin 10 月份重新装修过，原来老老实实的原木风格变成了闪烁的不锈钢。群里晚上也变得热闹，因为现在 DoubleWin 也卖酒了。小方同学不会放弃夜里组织大家晒酒的机会。我每次去都暗自揣测总是出现的四个店员里哪个是小方同学。

24

咖啡店的顾客形形色色。

一男一女，下午两点多，坐在小顾店里对瓶吹威士忌，女的握住瓶颈喝一口，对男的说，真的入口柔。男的不说话。女的又说，你拿这个治溃疡是么？男的嘟哝了一句，不太重要。这两个人像是刚刚相处的情侣，说话有点讨好和客气，但身体语言要亲昵许多。男的突然抬起头摩挲着脑袋问小顾，这里附近的理发店有什么推荐吗，头发长了。小顾说，那我哪里知道，我只在杨浦剪头发。这里贵。男的愣了一下，大概不知杨浦是什么。走了。小顾说，这俩人北京来的，住在襄阳路口的全季，

只在附近玩，早晚各一瓶酒，一杯咖啡。

通常的客人没有这么戏剧化。中午饭后，大多是上班的女士，大都穿着随意，可能是附近小公司多，没有大公司那种科层感特别强烈的制服要求；从背部和臀部褶痕来看，一上午也不会起身几次。她们会买简单的咖啡，掌握所有的折扣信息。网红装扮的人一般在晴朗的下午出现。紧绷绷的吊带背心或者从头到尾都罩在大白袍子里却脚蹬一双高筒雨靴的女生。有时候你隔着马路看到穿得不太一样的女生朝这边眺望，多半是到周休七日来的客人。她们会问什么是“女巫汤美式”，像挑首饰一样翻看竹篮里的小饼干。

小孙的咖啡馆在位育中学对面，叫 TuTu，经常有老师来。她会说每天下午有一个美团外卖小哥会来，喝一杯拿铁，在这里歇个脚再走。小孙说小哥之前开自己的理发店，生意不好关了。

男性顾客分两种，一种是陪女性家属来的。他们会露出一种走进内衣店一般的紧张神情，或者在女生踌躇各种口味的司康时露空放的神色。

“周休七日”各色小点心的包装袋，会放上当天的小卡片，上面有不同的 Slogan。比如周五写“周五治大病！”有个周五，阿姨级别的，五十多岁，说不要给我贴这个东西！小顾问怎么了，她说不要治大病！没有大病！

DoubleWin 里，有天一个穿着花格子呢西装的爷叔教我怎么买才最实惠：拿自己的杯子过来打浓缩，买一赠一就是双份，回去自己加水，要浓要淡随便依呀！

一个穿夹克衫的中年男子，捏着一个装药盒的塑料袋，进门看了一圈决定买司康，问里面有没馅。又买了一个蛋糕，香草口味，问会不会很硬？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看起来好像是自家吃的。

小顾店里来了一个拍照的。还是夏末很热的那几天，穿着果绿色 T 恤冲进来，叫了一瓶饮料，特调酒，然后问能不能拍照，然后三两下抽出三脚架搭好，冲着墙脚的猫猫小布景，咔咔，咔咔咔，汗把一半 T 恤都浸湿成了深绿色。他过于投入，对店里除了小猫布景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拍完嗖嗖三两下收起三脚架，推门旋风般离去。

延平路口几个咖啡店时髦人最多。随便找个店坐就可以发现他们分为三类，目视前方径直走过的，在店外拍照的，和在店里拍照的。在店拍照的要很久。包包和大衣和咖啡丢在一起，人却在店里外各种角落跑来跑去，其实一共也没多大地方。

天气冷太阳好的时候，有几个咖啡店门口喜欢摆折叠户外野营椅。有些把矮窗台加宽木板变成户外座位的，老太太老爷叔们不客气，排排坐着聊天。

25

如果不是怕招小顾小孙小方同学他们烦，我可以坐一整天看他们那些进进出出的顾客。他们的店都很小，柜台和操作间占了三分之二以上，靠着窗或者墙有一排座椅，大都提供不超过六七个人的座位，如果都坐上人就要互相把腿偏来偏去让位置。

26

义无反顾走在开店路上的小顾，最新动向是找了一份兼职，在虹口，店长是以前的同事。这家店和卷哥的新店有相似之处：有一种不指望被你看到的气质。在四平路一个居委会后身。这样的选址在这个按点评索骥的时代自有一份妙处：凡是出现在店里的客人常常为自己的小众审美而暗自骄傲。这地方可不是那些拿着相机游街的小姐姐可以找来的。所以店里通常会出现两种客人：一种是熟门熟路，自信地踏进门里的，一种是手里拿着导航，走到门口还要退几步看看门头的。

对于小顾来说，他看到的是划算。一天 2000 块钱进账就有得赚，为什么呢？居委会的房子，办公室就在边上，有时候还会来开个会什么的，房租因此便宜到相当于没有。老板自己烘豆，所以豆子的成本也低。人工也不贵，全职咖啡师六七千，再请个兼职咖啡师 30 块钱一个小时。一杯美式咖啡卖 25 块，手冲 45 块，毛利基本上能有六七成。而且老板自己是抖音网红，自带流量。

房租是咖啡店（以及所有店）最大的问题。如果房租解决了，那么一切都好解决。长乐路上一万多元的房租是本地住户一本万利的小算盘（因为他们只交着每个月 20 多元的使用权租金），却是商户心中最沉重的压力。这是最尴尬的，旅游区的房租虽然更高——高得吓人——但是也有更集中的流量，长乐路以精打细算的附近住户和上班族为主要客流，房租却一点便宜不下来。

不过后来我想想，居委会那地方一天 2000 块钱进账——相当于 100 杯美式，或者 20 杯手冲——好像也是蛮难弄的。

27

对了，虹口那个店的网红老板就是前面提到的路易·欠蹬。

28

在南昌路上有一个看起来有年头的裁缝店，叫“路易·富贵”，路易作为前缀，感觉特别喜庆。

29

路易·欠蹬，在网上找到他的视频，30 多岁，一口北京话，穿着三件套正装拍视频，第一句一般是“今儿喝了么您内”。他的个人介绍是一串咖啡专业比赛战绩，又有点评上的咖啡博主为他写出简历：瑞幸咖啡学院的早期成员之一，如今出来自己创业。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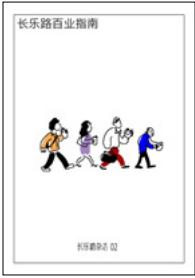
小顾的人生大计与这个蓬勃的行业捆绑在一起。有媒体那几天说上海在这一年成为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小顾如果把店开在上海，这个夏天，他有 6913 个同行 / 竞争对手。



31

威廉·怀特的这句话是在这样一个语境里的：“那些最受欢迎、人气最旺的广场及小公园都有许多共同点：有宜人的微环境，良好的可达性，有一些极具戏剧效果的小品，如一件雕塑或水景，并可以让人们舒适地坐下休息（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当代新城市空间中，‘其他人’更多指代的是声音、色彩、动作以及转瞬即逝的表情。人已经变成了精心设计的环境中的一个活力要素，而所谓的社会性仅仅是我们想成为特定环境中的‘一员’。



长乐路北段，
从东向西，
陕西南路到襄
阳北路这一段。
2021年6月
15日。

32

乍姐蛋饼。在长乐路和陕西南路路口。它可以很好地说明此地三区交界之复杂性：它坐落在静安区的地界上，铺面 L 型，朝东陕西南路的那面过马路就是黄浦区；朝南长乐路那面，变成专给外卖小哥等餐的窗口，过马路就是徐汇区。

它的生意始终很好。从早到晚。除了有次过台风停了一天业之外，没见它歇过业。卖的东西也多，甚至还有小馄饨。蛋饼和任何食物一样，卖的是气味，走过时总是觉得这么美味，真不应该错过，但吃起来都有如经历塑料花友谊：挺热闹，啥记忆点也没有，还有点不堪回首。

33

与它紧挨着的是叹柠手打柠檬茶。做百业指南的时候这家铺面正在装修，眼看着就出现一个正当流行的饮品，流行程度超过了奶茶。手打柠檬茶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涌现在各种街口，速度快过咖啡馆，核心关键词都是“打”，有的还会取名“暴打渣男”之类。

34

隔壁是个不明身份的 MOICEA，卖女装。隔壁也是女装店。说是买手店，也看不出来买手品味具体是什么，看着挺富贵，比普通的白领女装要更十指不沾阳春水。

35

再过去是一个老石库门的门，夹在这里有一种洗浴中心感觉。连续几个店面有的在装修，有的在招租，不大像很有章法的样子。

36

终于有了一个全家。人总是很多。相比于这个街区的住户、也算不少的商务办公人群和白天夜里不同的游客来说，便利店的数量有点少。不过它跟另外几家本地烟纸店出身的小便利店一样，做得更多的是一妇婴的生意。至少早晨我经过时，上早班的医生护士、还有孕妇和家属们挤挤挨挨地买包子玉米、关东煮、牛奶，当然还有豆浆和咖啡。

37

它的楼上，是一家日系美甲美睫店。“皮肤管理中心”，名字叫珑珑。粉红色霓虹灯闪闪烁烁。

美甲店理论上属于长乐路 500 弄这个弄堂。楼是红楼，不是太长乐路风格，与陕西南路那些新邨更接近，石库门建筑。原本以为这一带是最容易被一声令下拆迁的地区，三区交界，各有风头想出，各有政绩要完成——现在看来，它相对安全，而下一个襄阳路口却总是暗藏危机。

38

一个金属感很强的门脸，叫玖重盏，卖新中式燕窝。燕窝难道还有西式的？自动移门上有广告：一日三克燕窝，母婴两人滋补。Love & Fresh。还有一个粉色卡通告示：

孕产婴幼，无偿热水。离一妇婴越来越近了啊。“买正宗燕窝，认准国家溯源码”。

39

一家叫 Namero 的芭蕾舞蹈用品专卖店。已经歇业了。

40

Rose Valley。玫瑰谷，也是富贵女装。范冰冰那种。有的时候也出现旗袍。

41

Lauinda。新开的，还是女装，这个就要朴实不少。英文名上有很大的“鑫易贸易”。再之前是妈妈月嫂定制，中午还没有开门，看着生意不是很好做。现在这些业务也都是从线上来，在线上解决？守着一妇婴，没有什么道理不在上午工作。后来果然黄了。

42

隔壁 514 号，“妈妈咪呀”母婴用品，还坚持着在线下服务。不过妈妈咪呀下面还有一个小招牌，“上海新民食品综合经营部”，杂货店风格，这名字有历史感。网上看了一下，1990 年注册的公司，存续三十多年了，地址一直是在这个 514 号。老板名下还有洗染、宠物等几个小实业，也都快三十年了，都在开业状态。了不起。

43

516 弄大门边上，是立鸿房产。老中介了，门头的大红立体字看着都不是连锁标准化风格。一如本地惯例，直接贴上有竞争力的房子足够了。

44

大门边上是一个院子，看起来是 528 号的后院，528 号是街道地产，这里属于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一个显要位置的牌子上写满了字，上面弧形排列：上海南京西路社区长者照护之家，下面分两行稍小一点字横排：上海南京西路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邻居王老师的小学老师，另一个王老师，就住在我们办公室楼下，她白天的时候就来这里。

显眼的牌子下面还有一个牌子，中英双语：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for Elders. West Nanjing Road Community,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疫情不那么紧张的时候，它的门口总会有一个小白板的广告牌，说它还有多余的养老床位，欢迎惠顾。

【老龄化】

有一次坐 926 去徐家汇，一个老头儿颤微微地上车。有个不那么老的老头儿让了个位置给他。随口问了一句：

“您这是去哪儿啊？”

老一点的老头儿听力大约下降得厉害，但智力和人生经验都在，判断跟他说话的老头儿大概问的就是通常问的那些问题。

“九十啦！”

想起很喜欢的一个笑话。两个聋老头儿在街上遇着，逞强，各有一股狠劲。

——钓鱼去啊？

——不，我钓鱼去。

——噢，我还以为你钓鱼去呢。

但是，九十岁的老头儿还是吓了我一跳。蒲园对面蒲石邮新开进了“邻里汇”，65 岁以上住在这里的老人就可以搭伙吃饭。以前在湖南路的时候，邻里汇门口一到饭点儿长年排着队，不输网红阵仗，它们还有送饭小车，一家一家地送过去，包括湖南别墅那样的大宅院。可见不论口味和质量都强得很。邻里汇这名字属于徐汇区，到了杨浦可能叫睦邻小厨，在静安，可能就叫社区食堂。

早上上班的时候，经常看到有老人被轮椅推到这个服务中心，或者看有小送餐车中午出来，就会觉得很妥帖。相隔不远，富民路上古柏小区里也有一家。上海照顾老人的社区服务一向做得很好，似乎每个独居老人都被社区盯着照顾，早晚打招呼，吃饭生病这些问题都有人照看。

45

然后就是一妇婴了。它的全名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的一些老牌医院就躲在很窄小的街边，螺蛳壳里做道场。整个夏天外加整个秋天都在拓建装修，救护车和土方车交替着进进出出。重新路面的时候候诊大楼墙壁一直贴到人行道旁，来来回回房间里的患者家属看得清楚，直觉有点奇怪。

46

560 号是奇怪的神秘的院子。外墙都是翻修过的，有点太新了。

【道里官邸】

在这一带，叫道里官邸的院子我看过了。看起来应该是收了老房子之后重新整修之后上市的地产商的作品。我觉得总是有点多此一举。一是这样房子，打十几年前就说不超过几百套，客户和房源如果都不多的话，不用取名字正好；二是叫了官邸这样的名字，对卖房子有帮助吗？我们办公室以前的房东到处收房，恨不得把太庙都收了，为了打点这些房子，在华亭路搞了两幢老洋房专门用来做物业办公。但他

们似乎也没到给房子命名为官邸。

当然，有钱人总是有很多算盘是你想不到的。

没过多久，有一个上海 Top100 的房价排名出现在网上，我看排名第一的这个就是这簇新的道里官邸，单价好像是 594526 元，有零有整的。我看到的是外地一个房地产公众号写的文章，看错了小数点，言语中好像是说上海的房子也并没有想得这么贵，不到六万一个平方嘛。

47

道里官邸的隔壁是 Lucky 家，正式的名字是棉花田”买手店，衣服黑色为主，棉麻皮革，感觉是 2000 年之后很受追捧的自然系风格。这家店的注意力明星是只叫 Lucky 的鹦鹉，白色的，像只鸡那么大，每天 7 点被放在院子里的铁棍上，大喊大叫。Lucky 有几个小朋友，是麻雀，成天在 Lucky 的碗里吃小米，与 Lucky 相平相处。Lucky 家院子大，树大且多，看着自成一个气势不凡的小世界。好像这个楼也是 Lucky 主人的。按道里官邸的水准，我不知道为啥还要挣卖衣服的散碎小钱。当然，这个念头一跑出来，就马上要自我批评：你看你，眼睛里脑子里就只能想到钱，有钱人可能根本不在意钱的事！

48

570 弄 1 号，法国小餐馆，Le Saleya Bar。这是我们的邻居，它们的大厨和服务生就在我们院子里抽烟看手机，我们的窗子对着它的后厨。在法餐里，它们比较朴实，朴实到有时候我会觉得它是西班牙菜。

49

过了路边蓝色的可回收物垃圾桶，棕色的湿垃圾桶——它是上海最脏的湿垃圾桶之一，它的盖盖着的时候经常会摆着奶茶杯（还总是只喝了几口的）、垃圾袋以及其他不明物体，它的盖有时被不知道什么人打开了，里面就是汤汤水水的飘着一些奶茶杯、垃圾袋以及其它不明物体——过了这两个垃圾桶，顺着干垃圾房边上往里看，就是我们弄堂了。570 弄。

其实本弄堂还是挺干净的，除了一段开阔地——在太阳最猛的那几天，它与反光激烈的黄色拉毛墙、水泥路面和太阳一起营造出加缪式杀人现场感觉，虽然只有短短二三十米的路，足可以视为畏途。就前几天，刚出梅，晒被子的好天气。我的自行车摆在水泥路面上，自行车的轮胎晒化了，粘住了不少碎石子。

其它本弄堂都很好。有传统味道，生活五十年以上的老人也有，打工人也有，如我们这样的工作室也有，也有有钱人正在大张旗鼓装修，大家相处愉快。

50

我们弄堂是有名字的，叫蒲园。取自蒲石路。号称由中国第一代女设计师张玉泉设计，设计师也有一个独立的铭牌挂在弄堂口，和保护建筑铭牌一起，后者标注这组房子是西班牙风格。建筑物和曾经的住户貌似都有来历，以后有机会再谈。

【蒲园】

弄堂门口有两个字，敦实稳重，很沉得住气的样子。后来看到专门考据上海老房子的公众号写，弄名出自书法家谭泽闿，他另两组题字比这个弄堂名更蜚声中外：文汇报、招商局。

51

弄堂口西侧，还有一幢小楼，与 Lucky 家、道里官邸一样现在划在蒲园外面，在造房之初，它们都是蒲园的一部分。它有独立出入口，门厅处也更有气势一些，独立院子也更大，现在它属于一妇婴的某个部门。经常有穿白大褂的人出入。

我们弄堂的保安说，一妇婴买了几幢这一带的小洋楼，他们很灵活的。

52

这幢房子汽车间的位置，有一扇破旧的塑钢门，朝向长乐路，贴着告示和开放时间。经常有孕妇和他们的家属一脸绝望地在那里排队——现在这是一妇婴测核酸的地方。

53

核酸检测西边有个小弄堂，伸向里面几家和襄乐大厦的后面。这小弄堂小，进个助动车都费力，有一个横的警示牌此时竖在弄堂口，红底黄字，四个字，写着“禁止小便”。等你看到的时候，一股臊气已经快把你击倒了，这臊气不定期出现，上午发酵时间可能正好——前一天夜里的弄堂口光明乳业的牛奶箱和信箱上都贴着不干胶，是夜里那些促狭的人们随意贴上的。街道在这里存在感比较强，有好多个告示，比如有家庭医生的广告——看起来针对老年人的，街道对老年人最关注，这广告看起来是得到了足够多的来自街道的支持。还有禁止把电动车推到楼道里的通知。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有个给老房子装修的装潢公司，不知道是怎么混到这里的。

54

小弄堂到襄阳路之间，是很密的铺面。

乐燕服饰，经营得不太认真，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们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中午的经常挂着很厚的白窗帘，与世无争的样子。唯一露在外面的宣传语也透着一种萧条的不诚实：“全场 3 折，大特价”。它们总是这样。

55

它边上是一个奢侈品回收店，叫“奢广汇名品”主打“保养，寄售，鉴定，回收”——奢侈品，名表，钻石，黄金。它对生意很精心，店里的灯打得雪亮，还不是那种容易让人产

生疑惑的暖色系灯光，就是实打实白厉厉的。

56

边上的“南耕小筑”，是个面馆。主打的是手擀面米线粥小食——能把这些大众款同时做好挺不容易的，取了这种网红兮兮的名字，可能也是有自己想法吧。不太好吃。总有做过了孕检的孕妇来到这里，一个人吃碗面。扫码点餐，看手机，吃面，看手机，默默离开，看着手机。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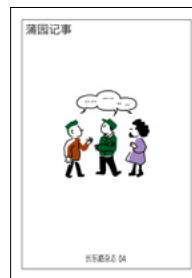
它的右手边是一个走廊一样窄的铺面，要走到里面去才会展开一个五金店，门面比门还窄，其实挺考验老板的运筹能力，我看它摆在门口的是下水软管、拖布、大大小小摞在一起的盆、还有贼亮的节能灯——这可能是居家生活最常见的需求？它的招牌上写着“灯具、电料、水泥、黄沙、油漆、木材”，感觉从这个小门进去，就能鼓捣出一座房子出来。可能也确实如此吧。

58

再右手边是“e 酒果园”，如题，卖酒和水果。水果多是鲜切，拿保鲜膜包着，估计做的也是一妇婴的生意。这条路上没有别的水果店了。

59

然后就是路口了。向北是襄阳北路上的襄乐大厦，向南是襄阳大楼。我们下一次说襄阳北路。



01

屁话

我们的百业指南里说长乐路，只是指 2021 年 6 月的长乐路。我们把时间定在这里。从概率上说，这一段长乐路，上百家店，从 6 月到我们刊出半年的时间里，有 10% 之内的变化也很正常，那意味着有七八家店可能都变化了。实际情况大概也确实如此。比如，南耕小筑换了店招，现在叫乔治很牛，还是孕妇（孕妇也换了大半了吧！）在这里吃牛腩。看菜单是个福建菜，店主是个严肃的留着小胡子的胖子，头发打理得很油，像个过气的发型师，他每天在店外逡巡，天降大任的样子。可能经常会搞些活动，人多的时候路边都挤满了人，人少的时候就是一些看手机的孕妇，与南耕小筑时相差不多。隔窗子看进去，装修风格也没有什么变化，有食客发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招贴画很显眼，判断出小胡子的政治光谱来，我不记得是不是南耕小筑的时候就有这画。但“乔治很牛”与“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两句话放在一起，都很励志很上进的感觉，是不是？

稻田里的月子服务机构也好久不开门了。624 的英姐告别了公路商店。公路商店的官方文章里说“尊重英姐的职业选择”，像极了外交界的屁话。

02

客气话

有几天疫情突然紧张了起来，因为浦东和松江有了中风险，门口的纸箱师傅保安早上突然就拦住我。

“来来来，登记！”

我说我天天早上七点钟就到这里，你怎么突然登起我来，这有点太形式主义了！

“唉呀，你看这镜头成天盯着我们，他们觉得我们查得不认真。”

我就想，这黑黑的镜头除了把所有人当作不法分子监视，同时还是检查他们工作的利器。

但我还是不高兴，一边留信息一边说形式主义。

“不在这里住的，要求都要登记。”他说。

我说你可以跟他们说我只是早上七点钟回家啊！

可能有这种解释工夫还不如登个记。他很感谢。中午我出去吃饭，再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还要不要登记，他很高兴，说不用了！

王老师说，这两个保安很多年了。没换过。“有二十年了，我来没几年就是他们俩。”

王老师对时间的认知不是很强，因为她在这里住也没有二十年。总之很长就是了。

被我们偷偷命名为纸箱师傅，因为他很爱收集纸箱卖废品，每次看我们下班的时候拿着快递纸箱出来，就高兴地迎上来。说真快啊，这一天又过去了。

后来他知道了我们反正要给他纸箱，没有纸箱的时候，也会说，真快啊，这一天又过去了。

另一位保安，对于说话和纸箱兴趣都没有那么大，更愿意指挥驻车，偶尔亲自上阵。他说话我们听不大懂，不知道哪里方言。有一天我们发现院子里突然有一只英短蓝猫鬼鬼祟祟地逡巡，就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只看起来很贵的猫在我们院子里做流浪猫。他讲了好多话，我听得云里雾里，只好点头表示噢，啊，怎么会这样，还有这种事，走远了互相问起他说的是啥，我们都还没有听懂。王老师说他以前也很爱说话，后来有一次院子里来了小偷，他勇斗歹徒，受了伤，然后就不那么爱讲话了。他们俩一个白天一个夜里，每半个月换一次班。换班的那天，连我们也会忍不住说：真快啊，这半个月又过去了！

03

什么是法语

给东京的吉井忍寄书，去环贸对面的小邮局。量了体温，出示了健康码，坐在那里。门口量体温的保安爷叔和一位看起来像大堂经理的麻利大姐分别问了两次，带身份证件了。很少到邮局。以前会买邮票和首日封，那算投资行为。这市场好像渐渐就消失了。小时候去得多的是寄取包裹，对象是“手拉手”活动里认识的结对子朋友，远在陕西，寄来的邮包是个白布袋子，圆珠笔或者毛笔写在布上，像纳鞋底一样用针线绞住了封口，里面装了大枣和核桃。陕西的手拉手朋友不说“寄”，说“邮”。“你邮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我们通信多年，沉寂一段时间后加上了QQ和微信，分享各自的人生轨迹，但现在也从来没见过面。保安爷叔说管寄东西的人吃饭去了，他们忙了一天刚刚去吃饭。那么什么时候回来呢？爷叔愣一愣，指指柜台后门，意思是就在里面。又让我坐下，不要遮住大堂里的摄像头。小邮局一共三两个窗口，左边最外面柜台上放了秤，想必是邮包窗口，右边是邮政储蓄的地盘——它们还是一个公司吗？如何分担成本呢？东想西想时，一位穿蓝衬衫的女士出来招呼我们，干什么，寄东西啊？国内还是国外？国外啊，哪里，日本？说罢朝里屋一扬嗓子：日本还可以寄吗日本？另一个略胖一点的女士坐在柜台前，来，到这里。寄什么，邮件还是印刷品？拿出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把书装进去，折好封口，来，上面写寄件人，下面写收件人。我掏出手机，地址填好，刚刚等人吃饭回来的时候查的，Ibaraki, Japan，是茨城。填好递过去，胖女士在信封口缝上带有中国邮政 logo 的透明胶带，两头各留一点余地，小心折好。信件还是印刷品？哪个便宜发哪个，不用空运，海运就可以，便宜。她操作着电脑，一会儿叫起来，哎你这个走水运太慢来，要三四个月。空运吧，也没有贵多少，10 块钱。空运要多久？一个月。好的。我问为什么现在不许寄包裹了，但是信件可以。胖女士不响。我自己回答：大概是疫情？好了，没有现金是吧？胖女士把一个二维码不干胶小条贴到信封上，一张小纸片从机器里吐出来，是我的存根，又贴了一个极细的不干胶小条上去，是我的单号。没有现金是伐？那你扫我吧。胖女士递过了她的手机屏幕。微信扫码，付给肉丸子 57.6 元。6 角是信封。我仔细看看那个用银行储蓄存根一般印刷体打印的纸片，发现上面有两种语言：简体中文和法语。为什么是法语？收寄人员签名：陈国兰。第二天，给台湾的莉雅寄书。填信封的时候，多嘴，我问：“呀！台湾前要写中国吗！”还是陈国兰在柜台里大笑，觉得我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你这个人太逗了！”我又问她：为什么你们的小单据上写的是法语啊？她说：以前都有，新印的就没有了。但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是法语的问题。隔了二十天，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到，是不是万国邮政联盟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啊？

04

咖啡店

城市街区士绅化标志：ABC（画廊、精品店和咖啡馆），在上海，AB 都不是那么明显，好像只有咖啡馆络绎不绝、此起彼伏地出现了上海的街头巷尾。它们的确是最灵活的业态之一。2017 年下半年开始的城市风貌区改造浪潮，让咖啡馆被房产租赁者们当作无害甚至有益的业态接受下来。在一本叫做《Hello, 中产》的书里，作者就说过一个观察：商业街倒闭的唯一优点就是咖啡馆数目的上升，你从一个咖啡馆的墙上反弹，就直接进入了另一个咖啡馆的门。咖啡馆门槛很低，成本可控，没有油烟，不会扰民，风格清新多样，可以迅速填补老市中心的小店铺。改造之后租金上涨，烟纸店水果店之类的市井零售让了位置，填补这些空位的主力之一，便是咖啡店。这势头就没停过。直到有媒体宣布上海成了全球第一。奇怪的是，这个塞满了咖啡馆的城市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让人产生过剩的担忧，反倒激励着更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好像就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静安的另一条街——康定路突然变了氛围，原来很市井的路边店，突然间咖啡店像夹心饼干一样夹花出现。从东向西按照店名排列节奏是这样的：Coffee Groupies 咖啡聚落、乐傲文具、Kicking Beane 踢豆豆咖啡所、逸刻便利店、（这里隔开绿杨邨小区的入口）、全国土特产商店、LAVI VILA 咖啡店、烁玉坊玉器店、上海泰昌老字号、0001 Espresso、珊瑚小笼。4 家店，一家是半年内开出来的，2 家是一个月内开出来的。又过了几天去奉贤路一家咖啡店，老板说起这家 0001，毫不意外地，他说：“我朋友！”

下期预告

我们的计划里，下一期可能有一篇“人物列传”，新乐路上神秘而张扬的人，以及与 Ta 相关或者类似的人。或者，我们还有一篇一直没有发出来的“货殖篇”——新晋酒吧街里的各种酒生意，不过，它的变化也太快了一点。我们先观察观察，沉住气。下一期百业指南，按计划走襄阳北路这一段。从巨鹿路到新乐路。蒲园记事，总是有一些事很急很急地就发生了，我们可能先在记事里 Mark 一下。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大的小的事情，形形色色的人。

题图来自 Chang-Yao Hsieh/EyeEm/Getty Creative via 视觉中国；内文插画作者：陆冉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唐明宝 | 定海桥往事②

路明 | 生活亲历者

1969年9月22日，
唐明宝离开上海，前往黑龙江。

唐明宝记得那山呼海啸，时间定格在1966年的夏秋之交。千万只手挥舞，一片红色的海洋。

那年他高一，被选入进京的队伍，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对一名革命小将来说，这是无上的荣光。他们被安排住在东直门外的接待站，等了十几天，终于传来消息，明天就接见。

凌晨两点钟，所有人都被叫起来了。先吃早饭。那顿早饭特别丰盛，有馒头、烙饼，还特意为南方学生蒸了米饭。吃完，坐上卡车出发。他记得凌晨三点的长安街，巨大的建筑隐没在黑暗中。他们等啊等，等到天亮，等到快中午，领袖终于出来了。领袖站在吉普车上，朝大家挥手。人群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唐明宝张着嘴，泪水止不住地流。巨大的幸福冲击他的心瓣和鼓膜，他什么都听不见了。

三年后，唐明宝坐在北上的知青专列上，回忆起这一幕。火车隆隆，驶向茫茫北大荒。他的心底泛起忧愁。要再过若干年，他才模模糊糊地品咂出，两次旅程间隐秘的关联。他不愿离开上海，部分的原因，是上次进京时，列车碾过华北平原，头一回，他见识到城市之外的穷困与荒芜。“上山下乡工作组天天上门动员，一大早就坐在他家门口，一直待到晚上九、十点。苦口婆心，动之以理，晓之以情。”“马老（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讲了嘛，上海的工矿二十年不招人”。他一声不吭，心里想的是，那就等到第二十一年。

渐渐的，语气发生变化，动不动搬出领袖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尚可抵挡；“抗拒上山下乡政策”，自己掂量。唐明宝听说，有同学死活不肯去插队，结果爹娘双双接到通知，明天不用来厂里上班了。夜里，老爹跪在儿子面前，求他放过一家人。他是班长、团支书，优秀学生代表。这一片的学生都知道，定海桥有个被领袖接见过的唐明宝。好几人异口同声，“唐明宝不走我也不走”。他苦笑，晓得“乃么这记逃不掉了”。

他本可以留在上海。65年初中毕业，同学大多读了技校，分配进本市工厂。他成绩好，一心要考大学，硬是读了高中。谁晓得，68届“一片红”，上海一个不留。许多年后，他听到一句话，叫作“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青年们面临三种选择：插队，兵团，国营农场。唐明宝仔细研究过。首先排除插队。插队计工分，农场和兵团拿工资；插队得自己做饭，农场和兵团有食堂。兵团每两年一次探亲假，农场年年有；兵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包括作息时间，以军号为令，农场相对宽松。可选择的农场主要分布在云南和黑龙江。云南更远，工资比黑龙江低。唐明宝填下志愿：黑龙江，国营农场。

不久通知下来。抬头是两句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唐明宝被光荣地告知，他将前往黑龙江省黑河市襄河种马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是殷切的期望，“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把边疆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落款“上海市杨浦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

当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是，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两根电线杆），被山洪吞没。后经报道宣传，《金训华之歌》传遍全国。金训华生前就读的吴淞第二中学，距离唐明宝在定海桥449弄的家，不过数公里。

1969年9月22日，唐明宝离开上海的日子。先去杨浦体育场集中，坐上几辆征调来的公交车。车子在杨浦区兜了一圈，接受革命群众的夹道欢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不知为何，他想起小人书里看过的，杀头前的游街。

公交车驶入上海北火车站，爹妈兄妹们早等着了，大包小包送上火车。哭。当然是哭。车上车下一起，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场。等列车开出嘉定，眼泪水基本上擦干了。零食拿出来，扑克牌拿出来，到底是年轻人，认识的同学开始有说有笑。在唐明宝的提议下，大家唱起了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上海还很热，不少男生只穿一件汗背心，一过南京就觉得冷。出山海关，棉衣棉裤都穿起来。窗外的景致愈发荒凉。列车在北安站停下，知青分两路，半数乘坐原列车，往西，去嫩江农场；唐明宝他们，换乘一辆运煤的货车，去襄河。大雪飘落。唐明宝穿着新发的棉衣，蜷缩在满是煤屑的敞篷车厢里，冻得瑟瑟发抖。又开了三个多小时，列车抵达终点站——龙镇火车站。车刚停稳，三名男生翻窗而下，赤手空拳，不顾一切地奔向对面的返程列车，行李都不要了。

龙镇火车站位于小兴安岭北麓，属黑河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北的客运列车站。69年后，龙镇站成为周边引龙河、襄河、龙门等农场，以及孙吴、逊克、黑河、呼玛等地知青的集散地。来自北安或哈尔滨方向的火车，到了龙镇，车头必须摘了钩，到三角形线路上来回倒一圈，才能再次出发。

在刺骨的北风中，知青们扛着行李铺盖，跳上各农场派来的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驶向各自的命运。

在当年黑龙江的报纸上，用大红标题迎接来自上海的战友：

三江平原披彩虹，万里东风传喜讯，山山水水齐欢呼，载歌载舞迎亲人！

去了之后才知道，襄河种马场原本是个劳改农场，全称“黑龙江省第五十八劳改支队”，知青来之前改的名字。种马场有大批服役犯人，以及刑满留场的“二劳改”。知青们傻了眼，不是说“接受再教育”吗，怎么跟“坏人”关在一起了？

没过几天就是中秋节。那天晚饭后，不少知青说，出去走走，看看月亮。当唐明宝走出土坯房，月光下，一片抽泣声。

建国初期，种马场从苏联引进一批欧洲血统的战马，苏高雪、卡巴金、顿河、阿尔登……由技师精心照料。每天干草里打一个鸡蛋，定期喂牛奶和椴树蜂蜜。据说一匹训练有素的种马，背上搁一个鸡蛋，奔跑时不会掉下。各军分区派了人，日夜驻守在种马场，争抢那些被淘汰下的马匹。一匹马能换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唐明宝的记忆中，两米多高的顿河大马，浑身乌黑，四蹄雪白，飞驰而过。穿一身破棉袄、佝偻着劳动的知青们，看得呆了。

有位肖姓技师，日本人时期便在种马场工作。技术精湛，全国闻名，每月工资四百多块。一次，徒弟给母马授精，他在边上指导。徒弟的橡胶手套意外破裂，导致母马内部感染，最终不治死亡。肖技师因此获罪，就地服刑。

种马场下属七个分场，最多时有三千多名知青，来自三个城市——穿绿棉袄的是上海知青，土黄色棉袄的是天津知青，黑棉袄的是哈尔滨知青。知青们被派到各分场的农业排、畜牧排、机耕排、后勤排，农业排人最多。刚来的知青不会干农活，就跟着二劳改学。

在襄河，上海男人是颠覆常识的存在。以定海桥为主力的上海杨浦知青，先是跟天津人打群架，打到血肉横飞。“津门虎”认输。接着又跟哈尔滨人干仗。哈尔滨汉子体格高大，场面占得上风。夜里，熄灯后，有个绰号“野猪猡”的上海知青，提一把雪亮镰刀，单枪匹马，摸进哈尔滨男知青的宿舍。大通铺上，三十多颗脑袋一溜排好。“野猪猡”高举镰刀，作势要砍下。哈尔滨人彻底服帖，太狠了，谁他妈还没个睡觉的时候。上海人，尿性。

唐明宝认识一个上海知青，父亲关在北安监狱。每隔几个月，他就扒火车去看望父亲。有一回扒的是快车，北安站不停。趁列车转弯减速时，他跳下车，类似铁道游击队的动作。顺势翻滚时，脑袋撞上路边的一块石头，当场死亡。身边散落的包裹里，装着带给父亲的吃食。

白露一过，地里就种不出蔬菜了。漫长的秋冬春三季，只能靠地窖里的白菜、土豆和萝卜度日。最难熬的是四五月份，地还没化冻，窖里的菜吃完了，顿顿盐水煮黄豆，加一点酱油，想改善伙食，就凑钱去买老乡家的大鹅。十几斤重一只鹅，售价十块钱，可以炖一脸盆。后来发展到偷鹅。有个449弄的男知青，从前踢球时当守门员，绰号“老狗”，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大鹅，突然一个鱼跃，标准的扑救动作。鹅懵了，还没来得及叫唤，嘴已被死死捏住。

老乡来场部告状，一屁股坐地上嚎，群众当中有坏人呐，“比国民党还坏”，“跟日本人一样坏”。纠察队迅速破案，锁定肇事人员，从工资中扣除买鹅钱。“老狗”大呼冤枉：吃炖鹅肉的时候可是大伙一块吃的，凭啥只扣我一个？

北大荒的严冬到来。几场“大烟泡”一刮，气温骤降，零下三四十度是家常便饭。北风刺骨，知青照样出工，喂马，劈柴，加工饲料。不能戴口罩，不然呼气往上走，霜会把眼睫毛黏住。夜里上厕所是个难题。茅房距宿舍有七十多米，男知青图方便，掀开一条门缝，对着缝往外尿（为防黑瞎子进屋，宿舍的门都朝外）。第二天早上，尿冻得结结实实，门都推不开。唐明宝宿舍有个“小炉匠”，打架一把好手，有天晚上要拉屎，直接拉在了宿舍地上。完事草木灰一盖，铁锹一铲，送进炕膛。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弥漫开来，好几天才消散。

大雪纷飞，遮盖万物，也意味着，离春节探亲的日子不远了。每年的腊月，是龙镇最热闹的时候。龙镇就火车站前的一条街像点模样，有邮局、新华书店、供销合作社。几家寒酸的小饮食店，门前挂一个幌子，掀起厚重的门帘，一股白气往外窜。店堂

里烟雾腾腾，昏黄的灯光下，一桌一桌等待归乡的知青，个个脸上洋溢着激动与兴奋。辛苦一年，不就为了这一趟吗？

除了第一次直达的知青专列，往后每次来回，都要在哈尔滨转车。龙镇站是四等小站，每天发出两班车：早上一班 7:45，晚上一班 8:45，经蔡家岗、讷漠尔、二龙山屯、二井、北安，到哈尔滨三棵树，用时十多个钟头。再换乘 58 次列车到上海，全程三天三夜，像穿越六道黑白相间的斑马线。票价 41.3 元（58 次列车是特快直达，包含 6.7 元的加快费）。

当时火车票的有效日期长达 11 天，有知青琢磨出“一票两用”的办法——一人先坐到上海，下车后直接把票寄回龙镇（火车上有邮政）；后一人收到票，还能再乘坐一次。数年后，车票有效期减少到 7 天，这才遏制了这股“挖社会主义墙角”的风气。

终于回到上海。知青们扛着整袋的东北大豆、木耳、榛蘑、番薯干、黄花菜、葵花籽，提着整桶的豆油，气味复杂，笑容灿烂。站台早有兄弟姐妹等候，一把抢过行李。那年头，谁家没几个“插兄”呢？等过完年，回东北时，带的东西就更多了。从酱菜、香烟、咸肉、糖果、鱼肝油、卷子面、麦乳精、醉蟹、鳗鲞、“梅林”午餐肉，到“扇牌”肥皂、卫生纸、枕套、被面、花露水、爽身粉、风油精、“老虎”万金油，甚至旱冰鞋、电吹风、熨斗、小提琴、单簧管、吉他、“白鹦鹉”手风琴……唐明宝吃不惯窝窝头大碴子饭，每次会带四十斤大米，都是阿哥阿姐从平时的口粮里省下的。行李再沉，也不能扛在肩上，须手拎进候车室，肘部略微弯曲，最好面带微笑，显得很轻松的样子。不然会被叫住称重，就得加钱了。

上海站始发，开往哈尔滨三棵树及乌鲁木齐的两班列车，素来被称为“强盗车”。送站的亲友，通常是兄弟，抢在检票前，各显神通，率先翻进车窗，大包小包抢占行李架。为争夺更多的空间，彼此谩骂，推搡，斗殴，屡见不鲜。经常发生的一幕，是知青本人上了车，遇见同学，相谈甚欢。两人的兄长鼻青眼肿立于一侧，刚刚大打出手过。

唐明宝是那种无论在哪里都能显山露水的人。第一年，他被任命为知青 1 连连长，兼 7 分场纠察队队长。有知青受不了苦，企图逃回家，唐明宝就带人骑着马去追，去火车站堵。抓住了，回去开会批斗、关禁闭。第二年春，他参与救援 11 囊陷入泥沟的种马，获个人二等功。也因此上调场部，任保卫科公安员，配五四式手枪，“神气得不得了”。

1971 年 1 月 3 日，襄河种马场革委会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加密信函。唐明宝被隔离审查了。

最初的几天，唐明宝整个人是懵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昨日还亲密无间的同志，为何一下子变得“严冬般冷酷无情”。他痛苦，委屈，无助，一次次表达自己的忠诚与热爱，得到的只是审查人员冰冷的面孔。前后审了八天，查不出什么东西。唐明宝被安排去一个菜园子“劳动反省”。一边干活，一边交代问题。

他交还了配枪，搬离集体宿舍，不再有资格参加集体活动与学习。除了几个熟悉的上海知青，周围的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当年十月，襄河种马场传达中央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唐明宝和劳改犯不能听。这尤其让他感到屈辱。

事情的原委，是几千公里之外的定海桥 449 弄，两个青年工人闲得发慌，于是打赌，敢不敢拉掉弄堂的电闸（闸门就在居委会边上）。赌注是一盒烟（也有说一頓老酒）。恰逢 449 弄召开公审大会，山呼领袖万岁时，话筒不响了。事情被定性为“破坏革命大会”，并迅速扩大化，抓了一批人，“按现行反革命处理”。唐明宝认得这两位青工（唐明宝：都是一条弄堂的，怎么不认识）。更要命的是，他们共同的朋友里，有个在崇明插队的，来吉林找几位“插兄”玩耍，后来又一道去了襄河。唐明宝接待了这些 449 弄的同乡，还一起喝了顿老酒。于是性质变了。

69 年珍宝岛事件后，“苏修”取代“美帝”，成为共和国的头号敌人。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哥，新仇旧恨算起来，比美帝更具体。黑龙江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反击“苏修”的前沿阵地。一度传闻苏军将发动进攻，军区下达十六字方针“死守龙镇，坚守北安，争取时间，等待后援”。种马场做好部署，一旦苏军逼近，那些未及疏散的劳改犯，刑期 7 年以上的，就地枪决。一位上海知青在家信中写，“要是打仗，我们这里就是战场。我们拿起锄来能种田，拿起枪来能打仗，我们要打到敌人老家，打到莫斯科去……”

在此语境下，一次普通不过的游玩，被解读成“叛逃苏联”前的“查看地形”；而唐明宝平时的积极表现，都成了“别有用心”，企图“混进无产阶级司令部”。

“劳动反省”期间，唐明宝夏天种菜，其余三个季节，他砍柴、修路、干杂活，跟着一帮二劳改做豆腐，做土豆粉条。土豆去皮，上大碾子磨，随即熬煮、点卤、灌包、挤压，沸水中成型。加白菜、五花肉一锅炖，是过节才能吃上的大餐。做豆腐最辛苦，隆冬时，半夜就起床，磨豆子、煮豆浆、点卤、压制，得赶在午饭前，把新鲜的大豆腐送去食堂。

一有机会，唐明宝就往上海跑。街道、派出所、杨浦区革委会……一趟又一趟，“讨个说法”。到后来，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见他烦了，故意晾着他。唐明宝的倔脾气上来，没关系，我可以等，你要下班吧。有一回，他拖住办公室主任，说今天不解决问题，我就走。主任大光火，电话一接，打到定海街道，你们怎么办事的……人家现在不放我走，我哪能办？

主任的话果然管用。过不久，定海街道通知唐明宝，“问题搞清楚了”，证明材料已寄往襄河。唐明宝欢天喜地，到种马场一问，压根没有。他当即乘坐返程列车，又赶回上海。一下火车，直奔街道办事处，拍着桌子吵，要么把我抓起来……这样一直拖，算什么名堂？

“拉闸事件”总共关了几十个人，由于缺乏证据，后陆续释放，但在档案上留下污点，成为异类。不少人一开始也鸣冤，也上访。碰了一次又一次壁，终于心灰意冷，放弃幻想，接受现实。只有唐明宝不屈不挠。到 1974 年夏天，证明材料终于送到襄河种马场。党委当即发文，承认“对待唐明宝同志，方式方法上存在错误”。从唐明宝的档案中抽取不实材料，同时补发工资，并报销历次上访路费。唐明宝结束“劳动反省”，回到工作岗位，任七分场公安员。

唐明宝悲喜交加。喜的是，蒙冤数年，一笔勾销，终于回归群众队伍。悲的是，招工、入党、推荐上大学，包括个人政治前途，全部完蛋。像那首歌里唱的，“曾经拥有过，曾经失去过”，到头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什么？”事件有了结论，其余涉及人员也一一平反。拉闸人绰号“小八子”（兄弟间排行第八），被关押进看守所，关了好几年。关到后来，无人过问，也就不了了之。“小八子”得了严重的黄疸肝炎，被批准保外就医。平反后，调入嘉定县国棉三十四厂工作。如今，每次 449 弄的老兄弟组织活动，他都要坐两小时的公交加地铁，横穿整个城市。活动结束，再一个人回家。

定海桥的风波不止一起。曾有几个青年工人在宿舍聚餐，电台播报“抗美援越”战报：昨日打下三百多架美国飞机，今日又打下四百多架，云云。某青工发牢骚说，他妈的，拍苍蝇也没有这么多。众人大笑。后被告发。恰逢聚餐为 10 月 10 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事件升级，抓了两百多人。其中有个技校学生，当天来找朋友，顺便吃了碗黄酒，也被“专政”。关押在工厂六楼仓库，一米五乘三米的隔间，放一只凳子、一只痰盂，铺一张草席，要求深挖思想，交代问题。关了三十多天，期间发动家人来信，督促坦白从宽。信中告知，他的爷爷为其日夜忧愁，竟一病不起，于前日去世。那天早晨，趁收痰盂时，技校生冲进过道，狂奔几十米，从厕所窗口跳了下去。中途被塑料棚阻挡，缓冲落地，居然没死成。满脸是血，牙齿尽碎，双臂粉碎性骨折。口袋里翻出遗书，一共两行字：

对不起家里人

我喜欢吃赤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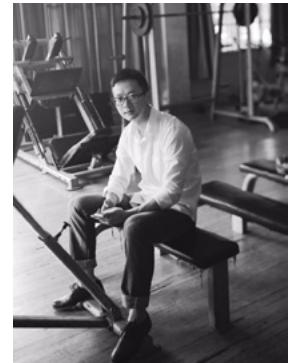
运动接近尾声，初来时才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逐渐长成为青年。不少知青开始谈恋爱（同住 449 弄的胖胖就谈了个牡丹江姑娘），唐明宝下定决心，坚决不恋爱。他说自己苦头吃足，绝不能让子女后代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受苦。油盐不进，任尔东南西北风。女知青们提起他，表情复杂，唐明宝啊，伊正宗来兮。

1978 年，唐明宝因病调回上海，分配在定海港路一家新办的街道化工厂。他是老高中生，文化程度相对高，厂里让他负责技术攻关。工厂的主打产品是聚丙烯酰胺，属于高分子材料，用途很广。比如周边的棉纺厂（国棉十七厂，国棉十九厂）用它做浆料，替代粮食浆，叫“代粮上浆”，可节省大量淀粉。传来传去，定海桥人讲，工厂生产的是“浆糊”，唐明宝也就成了“浆糊厂厂长”。

唐明宝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扑在科研上。一有空他就跑图书馆，跑研究所。工资一大半都用来买书买资料，天天钻研到深夜半夜。许多资料找不到，在国内属于空白，唐明宝就自己想办法、设计实验。台灯下，北大荒的风雪，长安街的呼喊，远了。眼前的图纸，是唯一的路。

“当时辛苦在哪里？这么复杂的产品，整个厂，从生产到研发，就我一个人懂。”渐渐的，这家不起眼的小厂站稳了脚跟，拿到“上海市优秀产品”，成为重点企业。唐明宝作为主要负责人，起草过国家标准。定海桥人讲，“浆糊厂厂长”，到底不捣浆糊的。如今他退休多年，搬离了 449 弄，住在附近的一幢高层里。老兄弟有什么事召唤，一个电话准到。他不太踢球，但喜欢看球，尤其欣赏球场上那种忘我的拼搏精神。449 弄成立足球协会，唐明宝是秘书长，忙前忙后，张罗了很多事情。

55 年前，北京的秋天。在等待领袖接见的日子里，革命小将们到处游荡。唐明宝最喜欢去大学。那些天，他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大学。他坐在草坪上，看那些戴着红袖标的大学生来来去去，心里说不出的羡慕。校园的气氛是热烈的，到处有锣鼓和游行的队伍。有时会突然安静下来。风吹过，树叶纷飞。彼时，上海的中小学已经停课，当年的高考也取消，想到未来，唐明宝有些茫然。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在作祟，要不得的。他定了定神，站起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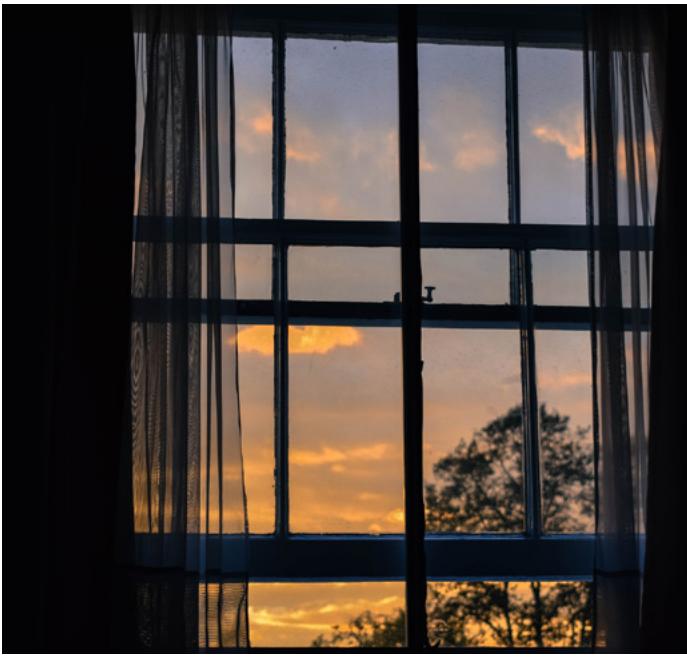


路明

大学教师，物理学博士，写作者。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Tarik Haiga](#) on Unsplash

非虚构

《英雄联盟》和不确定的治疗世界

饶一晨 | 田野中国

你会在这一篇田野里，发现网瘾之于不同个体的不同表现。

本文为作者“网瘾治疗基地故事”系列的第三篇，第一篇《被“绑架”到基地的少年》已在卷九刊出，第二篇《甜与权力》已在卷十刊出。

在前一篇，随着我和网瘾少年之间通过可乐达成的冒险契约，我走进了他们不让让人们知道的秘密世界，了解到了他们对甜和快乐的渴望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并观察到他们通过“基地杀”游戏达成的地下疗愈。

而在这一篇里，我们会更深入地走进三个学员的生活世界和治疗过程，了解网瘾对于不同个体的不同意义，以及在治疗中无法克服的焦虑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究竟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01

宇飞：从青训基地到网瘾基地

当我遇见宇飞的时候已是他完成治疗后的第七个月。2014年7月在来A市旅行的期间，作为“成功治愈”的模范个案，宇飞主动回到基地和主任以及张医生叙旧。主任顺便邀请他跟仍在治疗中的其他学员分享经验。我便是在这个情境下认识了宇飞，并主动邀请他聊一聊他的故事。

当时的宇飞16岁，正在读高中。来基地之前，他曾做过两年英雄联盟的职业玩家，暂时休学在海口的一个电竞训练基地作为青训生“工作”。他14岁时便在全国的电竞比赛中拿过优异的名次。

宇飞的家长很少陪伴他，更没有办法照料他的心理需求。他的父亲是高级干部，常年在外工作；母亲则是中学的优秀教师，大部分时间为了学生奉献。他的父亲时常告诫他不要去玩游戏，要好好学习：“没有好的文凭，以后你就会在社会上摔得很惨！”但叛逆的宇飞并不听从这个建议，他烦透了学校的生活，对于某些重要的科目和考试也并不擅长，他觉得，比起考试，他更擅长也更喜欢更刺激的竞技类竞争——“可以把握人性的那种”。他和同学们玩英雄联盟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超出同龄人的竞技意识，而且，他也很喜欢看那些职业选手的竞技视频，他认为自己只要努力也有成为明星职业玩家的实力。而只要他能够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选手，就可以自豪地向父亲证明，他所描绘的那种成功路径早已过时。

于是，14岁的暑假，受到感召的他，毅然地投身了职业战队。在战队里，他如鱼得水，并且非常享受那种做英雄的感觉，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救团队于水火。另外，在14

岁的年龄，他就可以实现月薪4000元，这相当于当时海口的平均工资。就这一点，就令他觉得已经战胜了父母，证明了自己。

宇飞的战队坐落在海口郊区的一幢别墅里，每名成员都在里面吃、住、训练——所处的环境和在基地的“军训”有着奇妙的相似：年轻的玩家们准时起床，从早上8点半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然后再准时睡觉。最大的不同当然是玩游戏比军训和心理咨询要快乐有趣得多，尤其是游戏中设计的心理学机制让玩家们每一秒的动作与决策都至关重要，使他们全情投入并很快进入一个强烈的“心流”（flow）状态，忘记了时间流逝。玩家们因为大大小小的挑战、竞争、和团队“胜利”而感觉到真实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比起他们被迫接受的学校考试竞争，他们在每天的游戏训练中的冲劲都是发自内心，他们认识到，原来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可以成为奋斗目标。然而，资本主导的重复性游戏训练让玩家的身体产生了变化。每天持续游戏14个小时的宇飞说他每晚都无法轻松入睡：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里会自动上演游戏里令人激动的场景，就好像有个自动播放的程序一样。只有当这些重复上演的程序逐渐令大脑疲惫不堪后，他才能够入眠。

此外，他感觉自己的右手也逐渐发生了奇特变化。他向我展示他右手手腕左侧凸起的一节骨骼，说道：“看到没，这就是我长时间使用鼠标打游戏造成的。神奇的是，我一开始是每次在‘撸啊撸’中玩嗨的时候、多巴胺开始分泌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段骨骼自动伸长在桌面上支撑我的右手。但后来，它就永久性地伸长，再也缩不回去了。”这种身体的变化过程——一种人机的“集合”——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那种资本机器对人身体的压迫和剥削，而是享乐资本机器与劳动主体玩乐欲望的无缝衔接。玩变成一种自发劳动。

多次教导未果后，宇飞的父亲在2013年通过关系了解到基地，打算将宇飞送来治疗。主任答应他亲自去接宇飞来基地。在和宇飞的父亲沟通后，主任骗宇飞说，他们正在A市做一个职业玩家的研究项目，请他过来参加交流。结果，兴奋的宇飞一下车便得知实情，还没来得及逃跑，就由教官“押送”去了二楼。

经常与父母斗、与玩家斗的宇飞，将他所擅长的竞技意识和斗争技能也带进了基地。首先，他觉得心理咨询对他完全没用。他认为作为一个职业玩家来说，自己有足够的自控力，他完全了解自己职业选择的意义，也不承认自己是脆弱的“网瘾少年”。

他甚至反过来去给他最初的咨询师李医生“做咨询”，甚至害得李医生在咨询过程中自己先哭了。从此，他便有了一个外号，叫做“医生杀手”。

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他得意于自己展现出的这种“读心”和操纵他人的能力，这是他赖以生存的资本。

对于这样一个“能力高强”的学员，他自己不承认的网瘾“症状”是如何被纳入治疗的呢？

02

阿斌：无声的能量

阿斌是黄医生小组的学员，我在给黄医生做实习助理的时候，经常会接触到他。在前一章我提到过他，他给所有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紧张和沉默。尤其是在团体治疗，轮到他说话时，他都要先沉默地酝酿几分钟，才会用蚊子一样的声音慢速说上寥寥几句。最夸张的一次，在家庭复合咨询里，所有家长和学员足足等了他十分钟，他才开始说话。

当他和我比较熟悉之后，私下交流时，并不会停顿或者害怕。但是，他说话的声音依然很小，速度比较慢，惜字如金，好像生怕说快了别人会打他一样。

最开始，这种沉默令我感到尴尬、焦虑与不适，我甚至很想跑过去拍拍他，说，“哥们儿，说话呀，大点声，你在怕什么呢？”

但当我看到黄医生在面对他的沉默时，那种温和的眼神和耐心的等待，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玄机。那个时候的我，并不清楚这个就是心理咨询中的“抱持”。很多时候，要理解和共情一个人并不一定需要语言，我们需要读懂语言之外的交流。

阿斌被送进来是因为他经常坐在电脑前打英雄联盟，一打就停下来，也不愿去写作业不愿意去上课。他的成绩不好，妈妈担心他这样下去考不上大学。作为A市这种大城市出生的孩子，考不上大学便意味着以后即便在自己的家乡也很难体面地立足。这导致妈妈无比焦虑，经常训斥阿斌。

不过，母亲的训斥早在阿斌的网瘾出现之前就已存在。黄医生认为，母亲从小到大的严厉训斥也正是阿斌的沉默性格与网瘾行为的重要成因。

在一次家长团体的治疗中，阿斌的妈妈红着眼眶向大家坦诚自己当年的错误：“他小的时候，我就老嫌他刷牙慢，走路慢，我就大声地责骂他，说你磨磨唧唧在那里干什么！像个男孩子吗？！我当时哪里意识到，这些一遍遍的训斥可能会如此影响他的性格。现在我真的觉得后悔莫及。”

当我知道这些之后，再去理解阿斌的沉默，会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用黄医生的话说，这些沉默背后蕴含着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强大到可以让整个房间的人都静下来耐心等他一个人说话。

而他的这种沉默究竟意味着怎样的症状？这对于黄医生，乃至整个心理组来说，都是一个谜团。

03

昌文：在游戏世界做国王

昌文和我一样，也是基地里的“实习教官”。不过他的身份更加特殊，几个月前，他还是这个基地的学员，也是极少数主动来基地寻求治疗的“网瘾少年”。

在来基地之前，昌文是一所著名重点大学的学生，因为每天通宵去网吧打游戏，不上课也不参加考试，结果被学校劝退了。劝退后，在家长支持下，昌文主动来基地接受治疗。

因为教官的身份，我和昌文很早就熟悉，他也带我认识了不少学员，讲解了很多基

地设置的规则。

有一天午休的时候，我们坐在窗边闲聊，他突然问我：“你觉得网瘾真的是家长的问题吗？”我当时愣住了。因为我在机构看到的更多是，孩子的网瘾很大程度上与家长相关。

然后，他便告诉了我他的故事：“我以前是我们那个县城高中的优等生，爸妈也很以我为骄傲，可以说是那种全村的希望。我高中的时候，一心只想着学习努力，为家里争气，考上好大学。所以，我没有接触过任何游戏。但后来，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后，我发现我选的工科专业并不是我最喜欢且擅长的，而且一下子跟那么多精英竞争，感觉自己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逐渐地，我丧失了以前那种出人头地的幻觉，失去了学习动力，不去上课，不去考试，每晚去网吧通宵玩游戏，白天就回寝室睡觉。”说完，昌文停顿了一下，问我一句：“你觉得玩游戏是一种什么感觉？或者，你说游戏是不是真的是一种毒品？”

我没有直接回应他，只是点点头，说道：“不同游戏对不同人应该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是怎么看的？”

“我不知道你啊，反正我第一次在网吧打游戏的时候就觉得，哇！感觉自己来到了宫殿，我就跟国王一样。在游戏的世界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比自由，有那么多游戏可以供我选择！特别是通宵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经常就是看一会儿电影，玩一会儿游戏，再看一会儿电影，玩一会儿游戏。我有时觉得网吧通宵营业是不是违法的，我真希望它是违法的，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强迫性地去通宵，通宵完了一次那种感觉，整个人都看上去很兴奋，第二天可能会继续通宵。我更喜欢一个人去网吧，这样感觉更加自由。我也不是那种喜欢去玩DOTA，撸啊撸那种的，我一开始是喜欢玩枪战类的游戏，像使命召唤这类，觉得特别过瘾。后来就最喜欢玩网页游戏。当然，页游真的纯属于浪费时间，但是玩页游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上瘾了。每次打到一个好的装备，就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心跳加快。砰砰的！”

他接着说，“这些游戏，设定比较自由，玩起来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可以让我在自由的世界里驰骋，扮演一个酷炫角色。反观我的现实生活，看似有自由——我努力学习，自己选择了学校和专业，但是实际上，我被脑海里那个完美的我给束缚住了。一旦我做不到那么完美，就会陷入恐惧。后来直到我挂科退学，学校给我父母打电话，他们才知道我一直都没去上课，而是在打游戏。”

昌文的父母并没有去“逼”昌文学习，所以，他认为网瘾不是父母的直接责任。他进而把自己的问题怪罪在了那些诱人的游戏身上，他们既是自由的皇宫，又是虚幻的陷阱。

他还有另外一个比喻：“玩游戏就好像你吃盐，虽然菜里面放盐觉得很好吃，但是你不能靠吃盐过活。游戏一旦市场化了，一切就变了味道。他们不惜一切地赚钱。他们开发了一个游戏就放在市场上，让他自动成为一个吸金石，人们把时间和金钱不断往里面投。那些所谓的防沉迷系统，绿色游戏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孩子们永远都会想办法绕过这些限制，那些监控系统根本比不过孩子的网络能力。就比如说防沉迷系统，一个人可以用假身份证注册，也可以申请多个号，这个号玩两个小时，那个号再玩两个小时。”

04

宇飞：在森田治疗中梦见英雄联盟

在宇飞被基地认定为“难搞”的个案之后，他便被转送给张主任小组接受治疗。张主任尤其擅长对付这些困难个案。他应对的方式就是“不理会”，有点像道家的“无为而治”。与其他咨询师对待宇飞的态度不同，张主任根本就不给他安排个体咨询，而是直接送他去做“森田治疗”。

森田治疗由日本心理学家森田正马于1930年代创立，用来治疗神经官能症，尤其是强迫症。这种治疗主要是个人将自己长期关在一个封闭的空无一物的房间里，做自我观察和反思，并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

由于历史原因，森田治疗强调的自然主义和禅宗式观念使其曾在中国1990年代盛行一时。而基地的特殊性也令这种疗法可以轻松得以尝试和实施。基地根据这套疗法进行了一些改良，使其成为一套促使学员反思机构生活和个人成长，并做出关键性和总结性改变的治疗策略。

咨询师一般安排学员在入院4个月左右的时候进入森田，因为此时的学员积累了一定的治疗体验，有更多反思素材。森田治疗一般持续一个月，而森田治疗的“成功”与否也决定学员是否进入最终的出院评估阶段——这就如同部落成年礼中的“通过仪式”。

所以在治疗的早期将宇飞送入森田治疗属于特例，是张主任针对宇飞的个人特点做出的一种即兴干预。

在森田治疗期间，学员脱离集体生活，被关在一个单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架空调。第一周，学员只能躺在床上或者在房间内四处走动，不可以有任何转移注意力的东西，例如书籍、电视和游戏，不可以和任何人交谈，除了给他送饭的护士。这种基于机构的违禁品设置之上，对感官体验的进一步剥夺，使得学员被迫更加充分面对自己的身心——“沉下心来”。

第二周开始，咨询师会让教官交给学员笔和本子，让他写下所思所想。有些学员也会自由发挥，创作一些诗歌和故事。对于一些表达欲望和能力比较弱的学员，咨询师偶尔也会送一本书给学员让他阅读，然后写读后感。总之，咨询师们相信这种疗法可以帮助学员与自我对话，在自我中找到平衡和宁静，并培养出内在能量，而非借助游戏或其他外物去解决自己内心的需求。

宇飞回忆说，在基地时，自己其实混得很不错，他和学员中的头头们打成一片，培养了一些跟着他混的小弟。在森田期间，他用纸片做成盒子丢下去，就有学员给他送牛奶、送卡片。

“我每天都要喝两三包奶，都快蛋白质中毒了。”他说自己在森田期间过得并没有那

么惨。

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禁闭式境遇中，宇飞的“治疗”悄然发生。

一天晚上，宇飞做了一场梦。梦中他坐在电脑前玩英雄联盟——就如同以前电竞青训基地里的场景重现。

他感觉自己在激烈游戏竞争中对敌方的英雄“大杀特杀”，这带给他一种全身心的极度快感。这是他来到基地后没有体验和回味过的。

“当那种兴奋感逐渐加强时，我就从梦里醒了过来。醒来时我甚至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在做梦。后来，这个快感逐渐消退，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但那个时候我只想赶紧回到梦里去，继续体验那份久违的快乐。”宇飞说。

和其他学员不同，宇飞从一开始就不承认自己有网瘾，他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自控且自知的人，且非常自豪于职业玩家的身份，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不受控制的病态成瘾。这也是他不断挑战咨询师权威的原因。

于是，当宇飞醒来后回味这场梦时，他说，“我感觉到的不再是一种兴奋和渴望，而是有一些震惊——我震惊于人脑的神奇，潜意识的力量，可以让我重新感受到那种我渴望但压抑着的兴奋记忆。而之后慢慢反思时，我开始害怕起来。因为我意识到，即便我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网瘾少年，我的神经系统就好像是被诡异地‘刷机’了一样，会自动重复我玩游戏的渴望，提醒我自己的本质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成瘾者。”

这些来自电竞训练基地的情感记忆，在宇飞来到基地之后被压抑住了。但那些对竞争和挑战的欲望则通过其他方式发泄出来，例如挑战咨询师和机构。可是当他被送进森田治疗之后，他被压抑的这些欲望无处发泄，梦境则成为唯一出口。

宇飞说：“从那以后，我就像打开了水龙头，文思泉涌，开始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下对自己的反思。我的森田日记写了一本又一本。后来主任他们还把我的日记要走了，说是拿去做研究，看看到底是什么促成了我的改变。”

“你具体都反思了一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我当时想到了我爸爸对我说的，不要不务正业，好好学习，别做这些低端工作。我以前听他这句话时，觉得他很庸俗，做电竞玩家怎么就低端了？但从那个梦之后我就开始在想，我爸也许是正确的。这种以打游戏为生的职业，可能真的跟农民工没什么两样。”

“为什么？电竞选手不也是在聚光灯下受人追捧，也有不错的收入吗？”我接着问。

宇飞摇了摇头，严肃地说：“你有没有看过他们打游戏时的眼神？他们的眼里空无一物，生活没有目标和意义，赚的钱其实很少，只有头部职业玩家赚得多一些，大部分人就好像农民工一样，没啥收入，以后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而且，这一行就跟运动员一样，吃的是青春饭，上了20多岁反应力就大不如前，要面临被新人淘汰。那时，他们又没学历又没其他本领，拿什么找工作？”

然后他指了指我，说：“但你就不一样，像你这种好学生，即便你去玩游戏也没关系！因为你是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前提下去玩游戏的。他们则不一样，所以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

我听完这句话有些震惊。这种拿我和职业玩家进行的对比，让我突然意识到宇飞的网瘾“治疗”的本质——一种社会控制与权力通过“沉下心来”的基地设置渗透。这种渗透并不以一种强迫教育的方式出现——他父亲之前那种传统儒家式的训导与惩戒并没有直接起作用，而是以一种个体化的“自由”的“自我”反思所引发的身体上的福柯式权力渗透。

当宇飞在森田期间被限制行动时，梦境成为他的身体对抗感官压抑的唯一方式，而正是通过对抗式的梦境，他短暂地成为了一个“自由行动”的主体，并为权力打开了发挥作用的大门。而当他有了一支笔和一张纸时，他变得更加“自由”——他可以书写、反思、探索和自我审视。

05

阿斌：在游戏中呐喊

有一天，黄医生让我去喊阿斌来做咨询。我来到二楼没看到他，找其他学员一打听，发现原来他们班的学员在操场上打篮球。我前往操场找到了阿斌。

我看向正在奔跑的阿斌，向他挥了挥手，他满头大汗，喘着气跑过来，然后问我说，“咋了？有什么事情吗？”

我顿时愣住了，因为那个声音无比洪亮，感觉是他平时音量的十倍。不夸张地说，我感觉像是一个加了麦克风和音响的阿斌在我面前说话。

我回来跟黄医生说了这件事情，当时阿斌的妈妈也在现场，她跟我说，阿斌打英雄联盟的时候也是这样，和朋友聊天的声音会突然变得非常大，而且说话也很流利，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但是只要一离开游戏状态，一去到学校，或者跟妈妈在平时聊天，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语速缓慢，音量很小，而且经常沉默不语。

仿佛游戏和运动暂时地将他的某个阀门给打开，之前一层层的无意识门锁被竞技中的投入感暂时卸了下来。他无暇使用庞大而沉默的能量防御自己的语言可能带来的后果。

游戏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自我的无意识疗愈。他借助游戏，令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情绪可以被呐喊出来，即便那些声音并没能被直接听到，那些情绪也无法被命名。在一种模糊状态里，它们的存在被他人看到。

06

昌文：剩下的百分之一

回顾自己的治疗经历，昌文觉得森田还是挺有用的，他曾经做过38天的森田治疗，感觉好像经历了一场断瘾实验。

“我整个人完全与外部隔绝，不用参加集体活动，不可以看书，不可以接触外界信息，这一切让我重新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不需要依赖外物。”

而在这之前，他形容自己玩网游时就好像在坐地铁：“你不走别人也会推着你往前走，根本没有可以停下来的感觉。因为你身边所有一切都是不停更新，那种快感源源不断地向你袭来，感觉永远都没有尽头。”

坐地铁的比喻，让我感受到昌文在面对瘾时的一种无力感。就好像是早高峰的一员，他失去了自我意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逆着庞大人群行走。瘾，就像是对某个想象人群连接的依赖。

这令他对于外面的世界感到一丝恐怖。

他说：“我觉得我出去之后完全戒掉网瘾的可能性只能说是99%，那剩下的百分之一我永远都不能确定。因为回去以后，你也明白大学那种环境，要说不玩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室友什么的晚上都不睡觉，都在玩。”

我问昌文：“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租房子住呢？”

他说：“也不是没考虑过，但我还是觉得要靠自己的努力控制住自己。可是我也知道没有一个外在监督和控制是不行的，因为玩游戏太容易了，没有什么硬件上的限制，花两三块钱就可以满足自己一个小时，买台电脑也不贵。而且，如果有一个课程project和一个游戏副本放在你面前，铁定是优先选择游戏副本，因为那个没有压力，很放松。习惯了不断的即时满足的人，对现实世界中的延时满足没有兴趣和毅力。我有时候自己也能感觉到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去户外运动的快乐，但就是不愿意去做。因为我习惯了坐在电脑前给大脑不断冲刷的快感。”

正是担心这百分之一的概率，昌文决心再多在基地里待一段时间，直到开学。于是，他向主任提出想要做实习教官，可以不拿工资，但是在不花钱的同时，在基地里一边帮助跟他一样的青少年，一边巩固自己的治疗效果。

我问昌文，做教官以后感觉有什么不同？

他说：“升级成教官之后，我的行动自由度提高了，可以出去了，但是会更辛苦一些。我昨天还跟队长一道出去送一个女学员去医院验血，晚上十一点才回来，困到不行。今晚还得加班。不过，我挺享受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得到别人对我这个人的认可。不像以前，别人认可的都是我的成绩，并不是我这个人的魅力。那些虚无的认可，更容易让我去追逐全能的幻象，陷入到游戏里面。”

所以，即便他的父母并没有对他拳打脚踢，逼迫他去学习。但父母和其他人对他的隐形期待，以及这些期待背后深刻的竞争意识，其实不停在营造一种自我的幻象，约束着昌文的人生，令他找不到内心真实的学习动力。一旦这种幻象支撑不住，他不得不将自己推进另一个幻象中，去维持自己的生存。

我想，这些幻象恐怕才是那剩下的百分之一背后的终极boss吧。

07

阿斌：块儿、金戒指与暗恋

令黄医生和我在当时感到难以理解的，不只是阿斌难以言语化的创伤以及无休止的沉默，还有他在后期呈现出的一些复杂的感情纠结。

阿斌在基地的第四个月，黄医生安排他去做森田治疗。在森田第二个星期的某个中午，黄医生让我送本子和笔给他，让他开始写一些自己的反思。我也通过此机会，多和他聊一聊。可能是好不容易逮着个能聊天的人，这次阿斌说的话还挺多的，虽然依然语速比较慢，说完一小句后，也经常会有一段沉默。我时常控制不住地主动接他的话茬，替他说出一些他没说出来，这样才能引导他多说一些。

他像往常在二楼跟我聊天时一样，喜欢一边用手紧紧拽住我的小臂一边说话，这让我想起了渴望安全感的孩童。我尽量还原当时的对话，让大家可以体会到他说话中破碎的部分。

我：你上午都做了些什么？

斌：就想了好多事情，感觉有些烦吧。

我：那你都想了些什么呢？

斌：（拉着我到窗户边）就是游戏的事情。

我：（点头）嗯，那挺好的，你想跟我说说这些事情吗？

斌：就是游戏的事儿吧……我觉得我出去以后可能就不玩游戏了吧，可是我又想到我游戏里那些朋友吧，感觉就挺烦的吧……（沉默）

我：你是觉得舍不得那些朋友吗？

斌：（点头）嗯。（沉默）

我：那你真的就一定不玩了吗？

斌：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某些事情就不玩了。

我：什么事情？

斌：我跟黄医生说过这事，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那你想跟我说说吗？

斌：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之前的一个学员……

我：是不是就是那个说要帮你打游戏的那个？

斌：你怎么知道？

我：你跟我说过的。

斌：（笑）我跟你说过？（明显放开了很多，声音也大了，语速也加快了）

我：是呀，你肯定忘了，他怎么了？

斌：他当时说……出去帮我打那个英雄联盟吧，你玩过英雄联盟吗？

我：玩过。

斌：是非常熟悉的那种吗？

我：不是，我就玩过一两次。

斌：那你知道游戏里面的会显示的那个块儿吗？

我：哪个块儿？

斌：就是你游戏开始的时候显示在角色上面的，需要你在这个赛季取得很好的成绩才可以拿到。我被送来的时候刚好上个赛季结束，所以我这个赛季就没有办法参加，

就没有那个块儿，之前我有块儿，我那两个同学都没有吧，可是我上次回去发现他们都有了，就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很想玩了吧。

我：你是觉得别人有你没有就不想跟他们玩了，还是你怕别人看你没有就不想跟你玩？

斌：应该不是吧，就是因为这个赛季要结束了，我也打不到那个块儿，我不知道之前那个人出院了以后有没有帮我打，我当时让他帮我打那个块儿，这样我回去就可以赶上别人了。

我：跟称号什么的很像是吗？

斌：有点类似。

我：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还想了什么？

斌：还想了另一个游戏吧。

我：什么游戏？

斌：就是那个QQ飞车，你玩过吗？

我：没玩过，但是玩过类似的，跑跑卡丁车。

斌：我就是想我在QQ飞车里面结的那个婚用不用离了？

我：结婚？那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你结婚的那个人吗？

斌：认识。

我：是你喜欢的女生？

斌：不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同学中的一个吧。

我：哦，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想要离婚？

斌：因为这个游戏里面的婚姻是可以升级的，什么“金婚”“银婚”，我现在就是金婚，然后手上就可以戴着金戒指，要是离了这金戒指就没有了。

我：那就是说要重新积累这个婚姻时间才可以拿金戒指吗？

斌：不是，也可以用人民币去买吧，但是这是我跟同学开道具开出来的吧，所以就挺那什么的吧……（沉默）

我：那你的同学是什么意思呢？

斌：其实他现在也不玩了把，这两个号都是我在控制。

我：也就是说，另外一个号只是一个马甲，你想结就结想离就离？

斌：啊。

我当时有试图去探寻阿斌说的游戏中的“块儿”和“金戒指”对于他而言的象征意义，但因为他能够给的反思很有限，我也只能联想，这背后的人际动力究竟是什么？“块儿”既是游戏里的称号，又代表着曾经一起在基地里的朋友对他的承诺，他期待着这个承诺可以实现，也可能意味着他害怕这个承诺被辜负，就如同他以前被父母辜负的那些承诺一样。而同样的，那个“戒指”既代表着一种游戏里的成就，又代表着一段“僵尸”化的友情，让他联想起曾在游戏里和他一起“结婚”的同学，也是他少有的朋友。他不确定自己从这里出去以后，这段友情还在不在了，这个戒指还值不值得他珍惜，他应不应该无用地保持和一个僵尸号的婚姻。

类似的与他人之间的纠结在之后的对话里也有出现。

斌：还有我有一个老师，我挺想去她家吃饭的吧。

我：什么老师？

斌：一个语文老师吧，她以前就说让我去她家吃饭，我开头以为她只是说着玩，后来有一次运动会的时候她真带我去她家吃饭。

我：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斌：说不上来吧

我：那，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斌：是，很好的感觉（沉默）

我：我明白了。

斌：我就是挺想再去一次，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去。

我：嗯，你可以把这些想法都好好存着，到时候给你纸笔了你可以全部都写出来。

斌：我就是不是太爱写，我更想说出来。

我：为什么觉得不想写？

斌：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用笔写很麻烦。

聊完之后，我回想起这段对话，感觉他好像既说了些什么，又隐藏了些什么。

我隐隐知道，这些对重获温暖的渴望背后也许隐藏着太多创伤，这些创伤痛苦到他还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更没准备好在我面前倾诉，甚至连用笔写下来都感到困难。他需要一个他感觉到安全的客体，一个暂时好的母亲，去接纳他觉得羞耻和痛苦的那个部分，可以容纳他轻声、慢速、破碎的表达。

但从他抓我手的力度，我能感觉到他渴望的强烈，也能感觉到他巨大的不安。

那些没有办法被语言化的渴望和不安，暂时被“块儿”和“金戒指”的符号给占据。

而同样纠结的渴望和分离的焦虑也出现在他之后的咨询中。

森田结束后，他不止一次地向黄医生提出，自己想转去佳明所在的闫医生小组。黄医生问他为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觉得闫医生看起来比较亲切。

私下里，黄医生苦笑地跟我说，这个阿斌，是在懵懂地“暗恋”人家闫医生。闫医生刚刚20出头，是基地里最年轻貌美的女性咨询师。他应该是把一些莫名的移情投射到了闫医生身上，他无意识中希望闫医生是一个更好的“母亲”。

第二天，我在二楼见到阿斌，他跟我表达了自己最近的一些纠结。他说，“在森田里，他很想要快点出院，因为想要出去玩英雄联盟，想要试新的皮肤。黄医生也跟他说，因为他和母亲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心理状态也比较稳定，其实是可以开始做出院评估。但是，他现在又有些不想出院了。”

他问我：“黄医生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我笑了笑，跟他说：“我想听听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说：“我就是挺舍不得在基地里认识的这些人的吧……我也挺想可以去闫医生那边尝试一下的吧。”

黄医生反而有些担心阿斌的这种表现，主要是害怕他已经产生了“疾病获益”，过于

适应机构里没有压力的生活，以及这种类似乌托邦的安全感。大家会因为他所呈现的问题，对他有更多耐心，照料他。而一旦他离开机构，他是否可以适应外面的世界？这也是一个未知。但是，再继续待下去，他可能会更难处理分离后的感受。

在下一章，我会从机构中成年人的角度，来呈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治疗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疗法”和治疗的智慧，游离在正规医学实践之外寻找空间。教官眼中的网瘾是怎样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咨询师针对那些“冥顽不灵”的家长和学员都想出了怎样的奇招？家长们在这里听到了什么样的课程？又是怎样一步步跟他们的孩子去实践他们所学？

(本文所有人物均使用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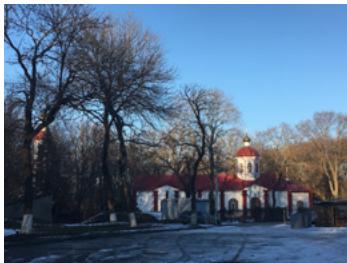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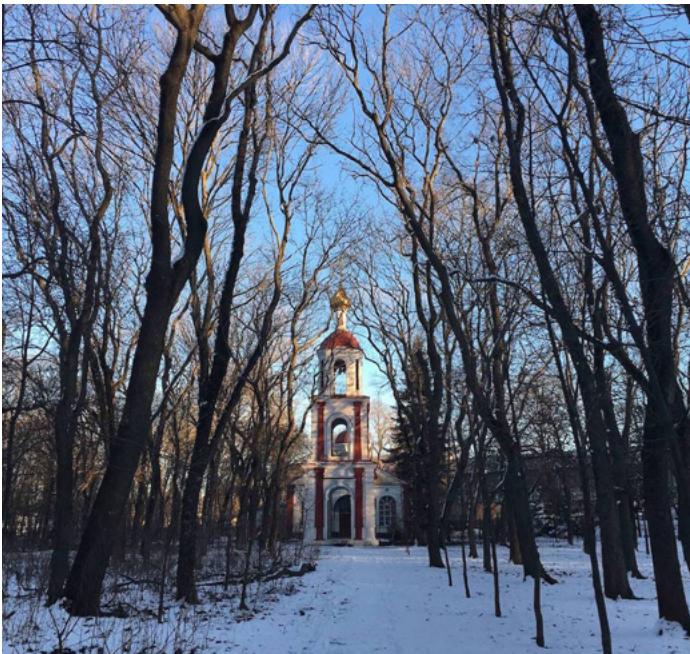


饶一晨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后研究员，香港大学人类学与科技研究博士，曾做过两个田野调查：一个是青少年网瘾治疗，另一个是“互联网金融”的兴衰。关注科技伦理、数字经济与文化。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历丰富的人，她的生活里有非常多的故事。

我与柳芭约好，下星期一下午五点见面。那天是 2016 年 2 月 8 日，正值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下午四点半，我到了教堂，时间尚早，天气很好，伴着夕阳我走进教堂旁的奥斯卡托夫斯基公园。在干枯老树的掩映下，教堂的钟楼上的金顶闪着耀眼的光芒。前一天的瑞雪还未消融，一对父女踩在雪上吱吱作响，他们在小心翼翼地撒着小米，让冬天难以觅食的麻雀饱餐一顿。麻雀显然比广场的鸽子胆小，见了小米，久久不敢过来，父女俩怕惊扰它们，就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快到五点的时候，我进了教堂，圣歌在教堂里回荡。今天来礼拜的人很少，也就三两个人。我的神甫朋友穿着蓝色的法袍在认真地讲经，空旷的教堂显得圣歌格外空灵、悠长。五点整，礼拜正式结束。柳芭从二楼的唱诗角走下来，两个年轻的姑娘随她一起下来，仿佛三位天使翩然而下。柳芭把我领到了神甫休息室，给我倒了一杯红茶，便开始了我们的访谈。

马强：您的声音非常优美，受过专业的训练么？

柳芭：我在来教堂之前是合唱团的团员，是业余的，不是专业的。

马强：中国人非常喜欢俄罗斯艺术，我们的父辈都会唱很多俄罗斯歌曲，读过很多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但好像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俄罗斯和苏联时代的日常生活。

柳芭：是的，俄罗斯介绍中国情况的报道也很少，很多时候要眼见为实。我到过你们中国，是广州。那是 1991 年的时候，赶上中国的春节，主办方请我们和中国演员一起演出。我们非常喜欢广州，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看见蛇放在酒里。

马强：我和你的感受一样，刚来俄罗斯的时候也是对你们的这里的一切都充满新鲜感和好奇。我也想把俄罗斯人的情况介绍给中国。听神甫说，您的阅历非常丰富，您能否讲讲您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在苏联时代和苏联解体以后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不了解和感兴趣的。

柳芭：我是 1958 年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生地是一个新的现代化小城市，有 15 万人。这座城市是为一座大型的联合化工厂而建，这个化工厂很大，在世界上排名第三。这个城市的居民都是这个化工厂的职工，其他职业的人也都是为了服务于化工厂的。为了方便化工厂的运输，这里又建了大型的火车站，城市里还有很多铁路上的职工。

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母亲就在这个化工厂上班，带着三个女儿生活。我的大姐有两个高等教育学位，文化学和法学。她一直在市政府工作，是幸福宫的负责人，负责结婚登记、婚礼。二姐毕业以后嫁给了军官，作为军官夫人随着丈夫到处漂泊，去过德国、西伯利亚，现在住在卡尔梅克共和国。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中学毕业以后进入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业学校，专业是热力工程学。按照当时的计划，在这个专业学成以后去车站工作。

马强：您当时家里生活条件如何？

柳芭：我们的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工作，工资非常少，还要拉扯三个孩子。厂里分给妈妈一套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厨房。但没有汽车，也没有达恰。当时单位会分给每家一块份地，这是公用的土地，我们在那里种一些菜，比如土豆、甜菜、向日葵。但到了第二年，份地就变成了其他地方，我们不能在份地上建房子，因为都是临时给你耕种的。

每年的收成都很好，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地下室，这成了我们的小储藏室，我们用玻璃罐子腌西瓜、西红柿、黄瓜，罐子堆满了整间屋子。为了这些冬储的食物，妈妈整个夏天都在忙活。当时我还很小，九岁、十岁的样子，但也要帮妈妈干活。我们储存的食物要够一个冬天使用。当时妈妈的工资很少，所以几乎不买东西。当时的衣服和鞋，都是给大姐买了之后，传给二姐，再传给我。

马强：您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柳芭：是我上了大学以后。上了大学，我马上就找了一个兼职工作。那是大学的第一个学年，刚开始一个半月我就去工作了，我和姐姐们一样，要自己照顾自己。当时，我们的宿舍在一个大学城里，每个宿舍楼都有食堂、阅览室，我就在阅览室找到了份兼职工作。从早上工作到中午一点，工作完再去上课。我用这个兼职工作的工资帮助妈妈和家里，还补贴了自己。1975 年的时候，当时的平均工资是 70 卢布，大学生的补贴是 40 卢布。有了这个兼职工作以后，我的工资加上补贴一共是 96 卢布。

马强：大学毕业以后您去了哪里工作？

柳芭：大学毕业以后，我到了电气火车站工作。当时是工程师，工资是 126 卢布，这是要高于当时的平均工资水平的。但在大学里学了五、六年，我觉得拿这点工资很少。工程师虽有高学历，但坐办公室，工资低。在车间工作的工人工资高，平均工资是 300 卢布。我干了一段工程师，就转行去当工人，学会了操作涡轮机（Турбина），每个月能挣 307 卢布。后来，我被党组织确定为预备干部，马上被派往莫斯科的一所大学学习英文。因为我已经有高等教育文凭，这是我的第二学位，就申请直接到二年级学习。

马强：为什么要学习英文？

柳芭：车站的领导想把我外派。因为当时政府在伊朗、伊拉克修很多电气车站，我

非虚构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 普通人的苏联口述史①

马强 | 田野中国

置身其中，碰触他们的心灵，
那是对美好社会和向往生活的炽烈追求。

2015 年底，我到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访学，并计划在这座城市进行调查，与五年前在黑土区乡村的田野调查相呼应，开始关注城市中的社会转型。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我很快认识了很多朋友。与这些朋友的交往中，我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这与在黑土区乡村做调查时的体验也极为相似。

因为我是中国人，在访谈过程中，他们总会有意无意地提及苏联时代，曾经共同的意识形态让我们建立了认同感。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曾经在苏联时期生活过的人特别喜欢将苏联解体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相比较，这成为了我们访谈的主要叙事结构。

基于此，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将我的报道人关于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的记忆、故事、经历整理出来，形成普通人关于苏联的口述史。

2021 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的演讲中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当然，普京用这句俗语是为论述其政治主张“温和的保守主义”作铺垫。但在我看来，这句话绝对是我访谈过的，那些历经了剧烈改革和转型的人们的心声。只有经历过乱世和危机，才能深切体会稳定和秩序的意义。正因此，这一代人对普京的“温和保守主义”思想深信不疑。这种情感深深地融入在他们关于苏联的口述史中。

普通人口述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在那段已经被官方、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充分表述的历史中，让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成为叙事主体。他们可能生活在城市，也可能是在农村；他们可能很富有，也可能还很清贫；他们的职业是五花八门的，有公务员、工人、农场主、工程师、运动员、商人、教师……他们讲述的是记忆中苏联时代塑造的社会生活，也许是主流历史叙述的注脚，也许是在历史中并不被注意、稍纵即逝的一瞬。

他们的口述史绝不是呆板的程式化的叙述，不是所谓科学的、客观的、严肃的历史研究，也不是那种猎奇的、满是冲突的、戏剧化的，甚至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描写。在这里呈现的苏联时代的人和事，具有个性化色彩、丰富情感和生活气息。置身其中，碰触他们的心灵，那是对美好社会和向往生活的炽烈追求。

顿河畔罗斯托夫城郊有一座教堂，我的一位报道人经常去祈祷。我也经常随着她去教堂听一些讲座，参加一些活动。久而久之就和教堂里的神甫熟识了，神甫听说我要找人讲述苏联时代的生活，便把唱诗班的柳芭介绍给我。神甫说，柳芭是一个经

他们的任务就是教当地的工人如何操作各种设备。作为预备干部，我是要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的。预备干部应该在各个岗位流转，熟练以后就到下一个，每次换工作岗位都是要考试。

马强：预备干部有什么条件吗？

柳芭：当然，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共产党员，我还当了车站党组织的支部书记。

马强：党支部要管哪些事情呢？

柳芭：事情很多，不仅是工作上的，生活上的也管。印象很深的是处理过私自买香芹菜（петрушка）的。刚才说了，我们每个家庭都有份地，地里都种香芹菜，这种东西种一点就会长出好多，我们把它放到罐子里腌起来。我们这里有人把自己种的香芹菜拿到出去卖了，这个在当时是被禁止的，因为这种事可以把他关进监狱，是非常严重的罪过。

马强：这是什么罪过呢？

柳芭：投机倒把（спекуляция）。当时已经（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了，有人把自己做的鞋啊什么拿出来换钱，如果被发现，马上就会被开除出党、出团、出队。有人觉得自己还有精力，想要有自己的产业，比如养奶牛。如果你养一头奶牛，为了自己喝牛奶，这个可以，如果去买卖牛奶，那么警察就会把你送进监狱。

党的特权（привилегия）无所不在，食物只能在商店购买，自己买卖是不行的，只能国家专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在郊外买了房子，那里屋后便是草场，还有小河，他们在那养了一些奶牛，原来是五头，后来发展到八头。养这么多奶牛很辛苦，从早上五点开始，早上、中午和晚上都有车来运牛奶。有一天，他的妻子挤完牛奶，把奶牛放到草场上以后，回家一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们都被抓到监狱里，罪名就是投机倒把。

马强：你们当时怎么看待投机倒把呢？

柳芭：我们从根上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这是不允许的，违法的。所有的人都不能有自己的产业，不能有自己的公司，不能成为农场主。不能为自己工作，而是要为国家工作。但国家只是给你一点工资作为报偿。我们车间里的年轻工人有家庭，有孩子，工资很少，他们买了车，下班以后晚上开黑车，这也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认为钱是有害的，钱是不好的，钱应该是由国家分配的。如果相互攀比谁赚得更多，谁家的房子更好，这都是不对的。

马强：在这样的氛围下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柳芭：我们当时信的是共产主义，作为党员，只要是党让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所有的东西都是党给的。我们工作了一周了，党号召我们每个星期六都要义务劳动，我们当时都不能想，能不能说不。当时，这个问题你想都不能想。我们当时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们就是按照教我们的那么想。我们都去参加义务劳动，把所有的劲儿都使了。

还有举行竞赛，没有人想过，这是休息日，我要休息。什么休息，你个人的时间是没有的。上头说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你不能思考，个人的想法是不能有的，没有抗辩权（рemonстрация）。当五一节、十月革命节的时候，上头要求打扫好院子，一根草都不能有，警察会来检查，告诉我们很多规定，我们就这样照办。

马强：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的，就没有想过另外的生活？

柳芭：另外的生活是什么，我们没想过。如果说现在不好，要出国什么的，那么大家会群起而攻之。我的一个朋友用收音机调出了英国BBC的频道，听到了BBC的新闻，后来我们聚会，他将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我们当时从心底里感到很震惊，义愤填膺，认为你是个敌人，你怎么能听BBC，那里的新闻都是骗人的，只能相信我们的国家、政府，相信我们的祖国。我们那时都是这么想的。

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一位朋友说，苏维埃时代对我们做了些什么啊，不能有个人的，穿的衣服都没有鲜艳的颜色。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乃至快到九十年代，街上看人们穿的衣服都是褐色的、灰色的和黑色的。在改革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有鲜艳颜色的鞋子。1990年代的时候，我去了德国，在商店里看到各种鲜艳颜色的衣服，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我当时就想，这些颜色的衣服怎么能穿在身上？

马强：那是你第一次出国吗？

柳芭：我第一次出国是去的保加利亚，1981年，保加利亚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到保加利亚的商店也是充满了惊喜，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裙子。当时出国很难的，不像现在，买一张票就可以出国。政府批准出国，只能是集体出行。出国一定要组团，不能随便走，还有克格勃监控。

我们到保加利亚一个月，每到一个城市，克格勃的人就会宣布须知，这里不能去，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做，什么时间集合。当时派团出国都是有目的的。1981年，两国的关系有点变化，我们不让他们爆发革命，不让两国关系破裂，我们艺术团体在保加利亚各个城市举行演出，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关系。但是，出国以后一点自由都没有，每个人只发21美元，再多不会给我们。

马强：你们会经常有这样的演出吗？

柳芭：我们都是业余的。全俄罗斯各地都有这样的合唱团，参与各种演出。我参加的合唱团都是唱哥萨克民歌的。那次去保加利亚是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利用假期去的，要领导批准才能去的。平时活动都是晚上。

马强：谈谈您的爱情吧。

柳芭：我是1985年结婚的。我和丈夫是在车站认识的，他是其他车间的后备干部。

马强：你们的婚礼能在教堂里举行吗？

柳芭：当然不是，当时教堂不在了，所有的人都无神论者。当时城里还有一座教堂，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这个教堂只有老太太去。因为我们受到的就是这种教育，当我们在小学学习的时候，学校会给我们洗脑，没有神的，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我们学校会请很多过去的神甫跟我们讲课，说教堂里都是骗人的。我们接受的就是无神论教育，人是猴子变来的，根本就没有神。

马强：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以后，你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柳芭：原来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我们认为国家领导人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的生活也就是那个样子，不能说，不能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商店里的东西是最低的保障，面包、糖、火柴、牛奶这些，如果想要再好的东西，比如好的糖果，就得去淘换，去特定的地方，或者去别的城市。还要认识一些商店的熟人，才能搞到糖果、香槟什么的。

勃列日涅夫以后，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上台，他们都是老人了，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从1983、1984年开始，就开始凭票供应了。每个月一公斤的香肠，多少克的油，都是有规定的。像现在这样，拿着钱想买啥就买啥，当时可没有这种情况。当时的商店是空的，当然也有黑市，但是需要有熟人才行。

记得商店里连荞麦米都没有，我儿子是1987年出生的，我需要荞麦米喂孩子，费了很大劲儿托了熟人从商店售货员那里弄到一公斤荞麦米。当时，我们都知道哪个商店卖什么。比如，听说明天某个商店卖牛肝，我要买300克的肝给孩子吃，我去那排队。我刚到那里排队的时候，就有人和我说，你是530号，把这个号码写在手上。下一个人来了，你就会跟他说，你是531号，也要写在手上，要凭着这个号才能排队买东西。

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你排了2-3个小时的队也买不上，因为卖完了。1990年代，我去德国的时候，在商店里，我惊讶地站在那里，差不多站了40多分钟，看到四面墙上挂着的都是香肠，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禁酒令又开始了。婚礼、生日的时候不能喝酒。在一些商店还卖酒，每个人能买两瓶伏特加，当然，这样的商店不多。

但是，要买到酒，得排5-6个小时的队。我出国的时候，朋友们都托我带俄罗斯伏特加和红酒回来。婚礼的时候，不能在桌子上放伏特加，警察会监督的，如果发现聚众饮酒就会根据禁酒令把喝酒的人关到监狱。人们就把伏特加倒到茶壶里，然后倒进茶杯。大家围坐在一起，说“喝茶！喝茶！”这就是当时的婚礼。

马强：戈尔巴乔夫改革几年以后，苏联就解体了，你当时有没有什么预感，或者听到苏联解体，你有什么感受？

柳芭：当宣布苏联解体的时候，我正在列宁格勒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当时远离家乡，看到电视上说政权更迭的时候，我觉得我回不去家了。谢天谢地，苏联解体没有流血、没有战争，就那么垮台了。为什么，诚实地说，在政权更迭之前，在叶利钦上台之前，苏共已经陷入困境了，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变革之前我就来到党委，把党证交了，说我退党了。

马强：为什么退党呢？

柳芭：（沉默许久）我现在也不记得了。我的朋友们也没有都退党，只是有一些。人们那时候感觉到政权已经没有了，没有力量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党了。领导人的更迭，让党和政权变弱。当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契尔年科上台，然后是安德罗波夫，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

在勃列日涅夫的三十年，我们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知道十年以后的样子。新的政府上来，整个社会都变了。安德罗波夫的时候，有一项法律，如果人白天不工作，被警察抓到会被送进监狱。戈尔巴乔夫时代，我们就更看不懂了，把集体农庄都解散了，出现了农庄主，当时我经常到各个村庄去，每个村庄都有怀旧的情绪。过去是很单调的生活，或好或坏，但是很稳定。

而在当时，去商店，今天去明天就不知道在不在，我需要的东西在哪里买，完全不知道了。明天怎么样不知道，可能明天就是新的法律了。所以，以前那个稳定的无所不在的党没有了。在变革之初，如果你不想去上班，那你就不去，心里窃窃私语，这个可以么？党变得没有那么强势了，你可以不交党费了。党就那么没了，没有流血，没有战争。

马强：苏联解体以后，能感受到新生活开始么？

柳芭：新的总统上台了。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生活没有确定性，原来的一切都打乱了，商店在哪，要去哪都不知道了，新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很难，叶利钦时代真的是很艰难。但最为重要的是，大家知道是有神的，人们建了教堂，去礼拜。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神的年代。新的有神的生活开始了，但人们都没有进教堂。

过去，人们的精神生活是神秘主义（оккультизм）的，而现在在电视上公布了国家正式的法律。宗教信仰开放，告诉大家神是存在的。人们认为这个国家走向神秘主义。当人们的生活处于艰难境地，受到损害以后，才慢慢感觉到神是存在的。

马强：你就在这时候成为信徒的么？

柳芭：不是的，当时我没有成为信徒，可能是神在当时没有召唤我。1993年，我和丈夫搬家到了顿河畔罗斯托夫。丈夫的爷爷和奶奶住在这里，他们去世了，留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我的丈夫是唯一继承人。我们来到这里生活，因为这个城市要大一些，可能性要多一些。当时，我的儿子上一年级，我就没去工作，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

1994年，我的丈夫被杀了。叶利钦时代，允许个人干自己的产业。过去，我说过的，如果自己种点东西、养一些奶牛，那么警察马上会把你送到监狱里去。叶利钦说，这些都是可以的，可以成立个人的公司。我们来到罗斯托夫，在市中心开了一间餐馆（кафе）。我们有正式的营业执照，但是开餐厅要和黑社会（mafia）搞好关系，为了能让他们保护我们餐厅。

当时犯罪案件很多，有的餐厅被砸，顾客被害。黑社会是有势力范围的，我们要和当地的黑社会达成协议，交给他们保护费，他们来保护我们，防止其他黑社会来闹事。每天晚上6点，都有一个小伙子来到我们的饭店，就在那里坐着，读书读报啊，我们给他吃的喝的，一直到打烊。实际上，他就是保镖，如果其他黑社会进来收保护费，看到他就知道这个餐厅已经有人保护，就会离开。他们自己有约定，我们不用参与。每个月我们交的保护费也很多，那个时候真是可怕。

1994年，丈夫被杀后，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那时开始，我才走向神。我说，可能神都不知道，那时我还不是一个信徒。丈夫死后，我和儿子的生活很悲惨。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城市，这里没有熟人，没有朋友。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去教堂，

并开始在神的面前祈祷。丈夫去世了以后，按照习俗，我连续四十天去教堂，教堂里的人教会我如何给亡灵祈祷。我给儿子送去上学，自己就去教堂。

就这样，我在教堂的第一个四十天结束以后，我就留在了教堂。我明白了，感觉到了，在教堂里是我生活的全部，这里很安静、很快乐。后来，我去当了老师，考了教师资格证。业余时间我在教堂唱赞美诗，也帮忙干一些活。后来，我参加了一个神学讲习班，那里边认识了很多人。这个教堂重建以后，我就从讲习班来到这里，已经20年了。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来教堂，走向神。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辛，面临着很多问题。我们很高兴，现在很多人都向神祈祷，教堂很多，信徒很多。

马强：现在俄罗斯的东正教复兴。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像您是从苏维埃时代走出的人，怎样成为信徒的，我想现在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当时政府没帮您吗？

柳芭：1994年到1995年的时候，政府发了一些补助，金额非常少。1995年，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发工资，也没有发退休金和补助。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有的人变卖了自己的财产，有的人出国打工赚钱，还有的人在自己的份地里种些蔬菜。当时，我和儿子两个人，生活很困难。我当时没有在这个城市登记，没办法找工作。说一件事你可能会笑话我，我们在去教堂的路上，看见路边有一根胡萝卜，是从别人的篮子里掉出来的，我把它捡了回来，这是神给我的。政府说度过困难时期以后，这些工资和退休金都会补上，但是什么时候补上，谁也不知道。

当时，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把自己城里的住宅卖了，在城郊买了一个平房，这样就会有菜园，自己在菜园里种菜，有土豆、胡萝卜、圆白菜，有了这些就能活下去。我也学他，把楼房的公寓卖了，买了一个平房，有12索特（1200平方米）的菜园。谢天谢地，我们就这样活了下来。我们的房子是在城郊，挨着一个小村，那里有一个学校，我在那个学校找到了工作，当老师，教数学。

马强：你身边的朋友和亲戚在当时和你也有相似的遭遇吗？

柳芭：苏联解体前后的变革时代，经济下滑得很厉害，很多工厂、公司都倒闭了。1994年到1996年，是最艰难的时期。工厂里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都失业了，很多人跑到市场上做买卖。苏联时代这是不允许的，被视为投机倒把。到那时就完全开放了，他们大包小包地从国外背很多东西回来卖。偷盗现象十分严重，因为很多人都没了工作。卢布贬值很厉害，1994年、1995年的时候，我们手里的钞票都是百万的面额，我们开玩笑，我们都是百万富翁。卢布的面值高得离谱，一百卢布、一千卢布、一千万卢布。

改革是两种经济制度交替，但没有成功。冷战结束了，铁幕不在了，但是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从西方传来，包括思想和思维。在苏联时代，我们没有自我，现在允许有自我了，但如何看待这个自由，怎么做，我们很不习惯。我看到的是，道德水平大幅度下降。在苏联时期，电影里很少有接吻的画面，而现在电影里到处都是这样的镜头，这让人很震惊。在街上女孩们公开抽烟，而在过去，如果谁要在街上抽烟，都是偷偷的，很怕别人看见。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在那个最艰难的时代，女人们都不想生孩子。走在街上，根本看不见怀孕的女人，也看不见带孩子推小车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我在学校工作，感受最深。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少，这几年出生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学校的一年级招不上学生，学校就不设一年级。等到下一年，一年级勉强招来几个孩子，二年级又没有了，二年级的老师们都放假了。

马强：您的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转的？

柳芭：普京来了。我们才知道，国家领导人可以是普通人。此前，在我们的印象中，国家领导人完全不是这样的，应该语惊四座，说的都是很智慧的话。普京上台以后，我们都会问，“这是总统？”他也像我们这样坐着，他也开玩笑，他的思维是正常的，不像一个领导，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和我们普通人可以平等地聊天。

普京时代，虽然开始很艰难，但是慢慢都在变好。谢天谢地，我还活着，我的家庭还在，这是最重要的。过去没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现在我们可以开心大笑，可以评论时政，我们已经不害怕。我们现在有选择的自由，只要你有想法和精力，就可以做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情。现在的自由和苏联解体之初不同，现在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变革时代我们很害怕道德沦丧，孩子不尊重父母，年轻人都抽烟……以后可怎么办？

后来真的慢慢就变了。普京非常注重家庭政策，生第二个孩子会提供45.3万卢布的补助，生第三个孩子，免费给你600平方米土地。有了这样的家庭政策，人们开始生孩子了。孩子多了，学校都爆满了。在变革时代，各行各业的专家都转行了，去学校或者去经商。新一代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去了工厂，没有师傅教，很多东西都不会。在2001、2002年，原来那些被迫去学校、市场的工程师们又被召了回来，我在学校的一位同事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信仰，有了信仰的自由。

马强：您已经在这座教堂20年了，来教堂的人越来越多吗？

柳芭：开始的时候人很少，后来逐渐多了。后来，来我们教堂的人又变少了。因为现在教堂建得多了，人们会选择离家近的、离单位近的教堂。过去，罗斯托夫只有五个教堂，人很多，礼拜的时候窗外都站满了人，我们把窗子都打开。现在罗斯托夫有将近40座教堂，现在人们已经有选择教堂的可能了。

马强：为什么现在来教堂的人越来越多？

柳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现在每个教堂都有讲座，电视上有宗教频道，有3个东正教频道。人们不来教堂，在家里就可以读圣经、念祷文。人们开始思考神，关注精神生活。比如说洗礼，孩子出生40天要来教堂洗礼，洗礼前要培训，父母、教父教母都要来，我们要进行4次培训，每次都要1个半小时。他们也有变化，孩子洗礼以后，他们就更为虔诚了。

马强：您儿子出生的时候，有没有洗礼？

柳芭：洗礼了。当时在农村找到了神甫，在一个小教堂洗礼的。

马强：那时也是苏联时期，允许给孩子洗礼吗？

柳芭：我的妈妈是受洗的，她要求给孩子洗礼的。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我还是共产党员，我是在儿子三岁的时候退党的。我出生以后没有受过洗，奶奶和妈妈说，应该给儿子洗礼，俄罗斯人怎么能不受洗呢？当时儿子睡觉不好，妈妈说，你给他

洗礼以后就安静了。这样，我也就同意了。我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即使在反宗教的年代，她也偷偷地画十字、祈祷。她这些都是躲着我的，我看不见就会教训她：“你这是在做什么！”后来，丈夫去世以后，我也成了信徒。

马强：来教堂有多少帮忙的人？

柳芭：这座教堂里有4个神职人员，4个教堂司事（пономарь）。有唱诗班，在礼拜的时候唱圣歌、读圣经，唱诗班有20多人。有2个卖蜡烛的，她们是轮换的，因为天天工作很辛苦。有一个保安，还有一个厨师，还有专门打扫卫生的，这些人是每天都在。

马强：你们在这里都像志愿者一样？

柳芭：我不是，我是拿工资的。我们这里也有志愿者。教堂里有很多社会工作，在教堂辖区之内的学校、幼儿园、大学、军队、监狱，神甫都要去讲座、宣讲，讲关于信仰、神、宗教节日这些内容。我们还举办音乐会，在节日的时候，我们会唱一些关于神的歌曲。如果谁要给孩子洗礼，之前我们要培训，为什么要洗礼，怎么洗礼。很多人带着孩子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怎么放蜡烛等等。每周我们都办这样公开的课堂，教大家这些。还要讲福音书，讲经，让人真正进入精神生活。我们还组织各种参观，比如去修道院，等等。

马强：（听到了钟声响起）你们马上要晚祷了吧？我想我们的谈话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在这里给我讲了您很多的故事。

柳芭：如果总结一下，比较三个时期（苏联时期、改革时期和现在），现在我是最满意的，我们正常地活着（мы живем）。我现在已经退休五年了。我的儿子已经长大，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在克里姆林宫里服了两年的兵役，现在在储蓄银行工作。他已经成婚，有两个女儿。我来到教堂以后，生活的品质变了很多。

马强：现在也是危机（当时正值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柳芭：危机？我不知道，这是上头想出的叫法，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今年2月，我们的退休金还涨了。我的退休金不多，9500卢布（当时的美元和卢布汇率约为1:70），平均退休金水平为13000卢布。这些钱可以让我们活着。我们这些退休的人，家具都有了，衣服也都有，交一些水电煤气费、物业费，就是吃饭，足够了。我现在再做一份工作，就是因为我还有劲儿，还能帮孩子们做一些事情。

为什么感觉到危机？工作没有丢，工资没有减，能够按时领到工资。而过去，我们曾经有半年都没领到工资。当时我们确实感到了危机，现在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车还能跑，我的儿子有两台车，车里加满了油，它不会停。现在有很多自由，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或者自己种地、养牛，如果你还有力气，还不是很好，那就去干，人们都会帮助你。

而过去，你看，卖点野芹菜都会被抓到监狱里。现在是自由的，只要你有钱和时间，你就能出国。而在苏联时期，只能在克格勃的监视之下。在变革时期，生活真的是很艰难，没有工作，没有钱。现在，最好的就是有信仰、有教会，每天我坐着公共汽车来到教堂，心里是很平静的。

马强：您觉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哪个更重要？

柳芭：当然是精神生活。

马强：如果您的工资变少了，但是还有精神生活，您认为这是好的生活吗？

柳芭：如果没有了工作、工资，来到这里（教堂），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那个只是胃不舒服，感到饥饿，但是心里舒服。我看到，有一些没有信仰的人哭着来到这里，想要获得帮助，他们什么都有，有钱，有车，有房子，国外哪里都去过，但是就是这里（指心里）不好，心理抑郁；胃是饱的，吃的都是红鱼籽、黑鱼籽，但是没有安稳平静的心灵。所以，精神生活是更重要的。

马强：大多数人都和您一样，认为精神生活更重要？

柳芭：不是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物质生活对自己更为重要。像我们这样的人少。教堂正在努力地做这些事情，电视台、书籍、讲经班、各种活动都在宣扬这些，我们要走进民众，去学校、监狱、大学宣讲什么是东正教，什么是幸福的生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如果所有的人都虔诚的信徒，我们就不用做这些工作。很遗憾，现在超过一半的人并不是这么想的。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我们有信心，东正教是整个俄罗斯的。

马强：（钟声再次响起）这次是要真的告别了，感谢您的分享。

柳芭：再见，神会保佑你。

题图及文内图片均由作者摄于采访当日

马强

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海外民族志、政治人类学、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东正教等方面的研究。

曾于2007年至2010年、2015年至2016年在俄罗斯黑土区乡村和南部城市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关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转型与秩序重建。著有《“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图片来自 [Yiran Ding on Unsplash](#)

01 徐家汇

我生平头一次坐地铁，是在北京。七岁的夏天，跟着爸爸妈妈和奶奶，一起上北京旅游。硬卧车票买不到，在硬座上歪斜着睡了一晚，北京到了。第一天就去坐地铁。从南礼士路站上车，到天安门下车。我穿一身动物图案的汗衫短裤，梳两个小辫，在站台上留影。最强烈的印象，一是高敞，像宫殿那样高敞，二是阴凉，像午夜那样阴凉。大理石的墙面、地面和立柱，墙上还镶嵌着古铜色浮雕。我过去从没到过这么空旷的空间，我觉得它庄严、华丽，走在里头，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能生出许多遐想。那一刻我认为北京真了不起，“有地铁。”

之后的几天，去了故宫，去了长城，去了十三陵，去了颐和园，都不如地铁那么来的震撼。

一九九三年，上海地铁一号线通车。这年秋游，学校组织我们到市里去坐地铁。没错，市区学生秋游到郊区，郊区学生秋游就到市区。我们乘坐大巴，经由沪嘉高速公路，抵达徐家汇。

当时的徐家汇只开了一家东方商厦。进去逛了一圈，没有任何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我们在大门一侧找了个坐的地方，掏出随身带的干粮吃午饭。阳光是很好的，四下开阔，我们很高兴，因为不用上课，因为可以坐在外头晒太阳、聊彼此身上穿的衣服。至于徐家汇本身有什么好玩，我们不明白，也不太感兴趣。吃完午饭，老师就带领大家排好队，进站坐地铁到人民广场去。非高峰时间，站台和车厢都很空，但没有北京地铁那种经年的庄重感。一到站，男同学们一哄而散，说，要到新世界百货楼上去打游戏。这一整天，除了这件事，他们别的什么也没想。

秋游就这样草草结束，而回去还要写作文。作文里也不能写真正让我觉得好玩的事情。这是我第二次坐地铁。两次都是专程前往，又不去什么地方——地铁就是目的地。作为郊区的学生，此后也很少坐地铁。真正利用轨道交通出行，要到念大学时，地铁2号线、3号线相继开通，尚未延伸到青浦的2号线，永远有座位。始发站在中山公园，站厅冷冷清清，空气中有一股金属味。3号线建在空中，不能叫地铁，要叫轻轨了。出了校门，往东边走几步，发现凭空多出一条凯旋北路，像是把绵延的房屋生生劈开，露出格外白净的新路，路上风也格外大些。这是专门为轻轨造的路。对1号线反而生疏，搭不上。去徐家汇，学校后门有一部44路，是直达的，停在天钥桥路。一下车，立即被路边的炸里脊和糖炒栗子包围。东方商厦一别，十年间，徐家汇开出最大的商场、最大的电脑城，日渐嘈杂，令人不喜。1号线运营了七八年，也旧了。

地铁的数字一路往上走，开通到11号线。起初，始发站停留在江苏路，算算也有三年。这三年中，11号线就像一切初出茅庐的线路一样，带着世外高人的闲散气息，空空荡荡地行驶在市郊之间。直到有一天，站牌上出现了“终点站 迪士尼”的字样，嘭的一声，车厢塞满了。

今天的11号线，从上海的东边出发，往西北开去，越过上海界，开到昆山。它是全世界现有最长的贯通运营的地铁线路。在早晚高峰时段，它也应该能跻身上海所有地铁线路中的拥挤之最。因为路线太长，有一个时期，许多人会携带折叠凳上车，后来经过集中治理，带凳子的乘客逐渐销声匿迹。其实在拥挤的车厢里，坐凳子也不见得舒服，不但憋闷，还要长时间凝视周围人的屁股。其最大好处，恐怕是一种心理优势——管他人来人往，我总是无须抢位子的。

早晨八点半的11号线，从第三站起，开门即满。车厢里每个站着的人都认为自己站在不恰当的地方。唯有耐心等待沿线的三个换乘大站。停靠曹杨路站，车上的人就能顺畅呼吸了。停靠江苏路站，一大半人有了座位。停靠徐家汇站，关门时，那里那里像掉牙一般，露出了座位的空隙。

徐家汇，11号线的对折点。不下车的人，大都打算一路坐到迪士尼去。

下一站上海游泳馆。车厢不复拥挤，气氛一变，从沉闷转为松散。过了江，越往南，乘客脸上的神情越舒展。到末尾距离特别长的几站，早前下车的人恐怕已经认不出这节车厢了。车厢是这么宽敞明亮，小商贩在稀稀拉拉的乘客间穿梭，兜售冒牌的迪士尼周边，带来一阵徐徐骚动。

自然，那些在徐家汇下车的人，一心赶去上班，绝对无暇关心这部地铁的动向。譬如我。

我在徐家汇上班，至今已有四年多。工作日上，我常走15号口和19号口。15号口一上去，是妇幼保健院，花坛边上，往往站着大肚子的年轻女人。再往前走，就是太平洋百货。这曾经不可一世的连锁百货公司，如今全上海只剩了一家。一个冬日早晨，我拐过它的大门口，看到工作人员穿戴整齐，在门前广场上站成方阵，听一位经理模样的西装客讲话。旁边摆着大花篮，花篮上缠了周年庆字样的锦旗。我这才意识到，是太平洋百货的周年庆了。过去无异于双十一的日子，现在看起来像内部团建似的。

19号口，靠着港汇广场。骑共享单车的人往往选择这个口，因为路边好停车。等中午一过，上班的人把单车都骑走了，地铁口那块地方就空出来，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填补上去。他们会聚在这里休息、抽烟、聊天、等订单。这的确是个好位置，周边所有商户都近在咫尺，而且地方宽敞，你横七竖八地把车一停，也不妨碍交通。

有时我也会走14号口。这个口上去，过条马路是徐家汇公园。斜穿过公园，公司差不多就到了。这公园一年四季都很好看，中央是整饬的花园，一边有缤纷的大树，另一边有池塘、芦苇、凉亭、水桥。前两年，池畔出了一起偷盗黑天鹅蛋的治安案件，想来那天鹅身为徐家汇地区最高贵的动物，不料竟有人敢冒犯它们到这地步，也是气苦。我特别喜欢徐家汇公园，尤其喜欢它的景观天桥——一年四季，在桥上可以拥有松鼠和鸟的视角，去近距离查看树冠，可以伸手够松果。但我上下班不轻易走这条路线，因为必须取道14号口。从11号线的站厅，得上楼，穿过那条令人不愉快的换乘通道，才得到了14号口。

作为交通枢纽，徐家汇是一个无聊的地方。在地面上，以三条大路的交叉口为中心，

非虚构 11号线 许佳 | 到上海去

每一天，我走进地铁车厢，
经过一个个熟悉的站点，
到上海去。

徐家汇地铁站。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它有足足二十个出入口，不喜欢人们在走向不同站厅时互相闪避，不喜欢换乘通道里那家西点店，店里的面包在货柜上摞成一座座连绵的小山，经过的人们会被那种情形吸引，着迷般地走进去，开始转山。我尤其不喜欢那条带坡度的、幽暗的换乘通道，天花板、地板和墙壁上投影、蹿动着巨大的卡通人和文字，压得人抬不起头，唯有随无数陌生同行者一道，辛苦地在二次元世界爬行。

江苏路地铁站。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贯穿各处的隔离栏，它强迫人绕路。我不喜欢连接两条线路的直达电梯，它太方便，却太狭窄，迫得人流一出车厢就往那边涌。我不喜欢那又长，又空白的换乘通道，不明不暗，回响着散乱的脚步声。江苏路地铁站是一条不规则跑道，人们总是在里头互相追赶。他们累了，所以着急。

曹杨路地铁站。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它上上下下，错综复杂，一道扶梯接一道扶梯。我不喜欢仅两步宽的轻轨站台，即便背贴墙壁立等，仍旧觉得危险。我不喜欢带塑料遮阳篷的地上通道，它令人联想起长途旅行中最不好的那一部分。

地铁，挤挤挨挨、推推搡搡，集中了人类全部的劳累和漠然。

但它也有令人可喜之处。夏季晌午的晴空、秋季傍晚的云霞——11号线往远郊开，在南翔上了地面，越开越高，行驶在空中，透过车窗四望，天地连成一片，下面的建筑，像彩色石子平铺在池底，高空的风吹动云波，巨大的影子就在屋顶上荡漾——米色灰色是居民楼，天蓝屋顶是厂房，茸茸的绿色是空地，这里那里，商业大楼的玻璃幕墙发出反光。这一段晶莹闪耀的长路，让车厢里的人忍不住熄灭了手机屏幕，只想把脸紧紧贴住车窗。

如果车窗有记忆，它应当积攒了无数面貌、亿万呼吸，大小不一的指痕、额头和后脑勺印子，重重叠叠，组成一幅意味深长的图画，像文具店里让客人试笔的纸。

“多好的天气啊！”一个人靠在车门边想，“如果可以不去上班……”

“今天要做报销……”另一个人想。

“中午的油爆虾……”提便当包的人一边琢磨，一边用眼光抚摸包上的维希格纹。

“最优存货量的确定公式……”戴着眼镜的手捧教辅书默念。书太厚了，又大，在车厢里看，很不方便。但再不看就来不及了。

“你为什么离婚？”“我前夫家暴我。”“你现在找了吗？”“我找过两个，是上海人。第一个是做质检工作的。”“上海人挺适合你的。他房子有吗？”两个女人，在站台上搭讪起来，到车厢里，很快聊得热火朝天。“我到了。”离过婚那个人说，“再见哦！再见！”她下了车。

这是我每天乘坐的地铁11号线。从嘉定新城，到徐家汇，四十五分钟。上海就到了。

它呈放射状向外铺开，大商场分布在每个路口。美罗城的大玻璃球，协同对角线上港汇的绿穹顶，组成一幅繁华而呆板的风景。在地下，换乘通道和大厅组成了四通八达的小城市。重要建筑的名字都标上数字，排列在指示牌上，譬如把人直接传送到目的地去。没有可让人停留的地方，你一到徐家汇，就得赶紧离开徐家汇。但只要离开这个叫做徐家汇的巨大路口，徐家汇地区就呈现出更多样的面貌。一个方向有一个方向的意思。

往南，体育馆方向，路是宽的，路两边的建筑都大，天主堂缩在大建筑的中间，看上去是小巧玲珑的了。再往下，上影厂斜对面，是全市最早的高层小区，建于1976年的漕溪大楼。因为它的存在，这个地区无论如何改建，都始终保留有一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貌，好像我小时候语文书上的马路。

往北，拓宽的华山路，竖着交大的中国式校门。往西，虹桥路新簇簇的，高档小区竖立在两旁。这两条大马路就像栅栏，把幽静怡人的小马路，把遛狗的人、接小孩上下学的人、买菜的人圈在里面。

往东，马路渐渐收窄，完全被悬铃木的树荫盖住了。这里就是上海最为人熟知的地方，所谓旧法租界。也是我常走的方向。顺广元路下去，先是一带新里建筑，路边开了早餐店、熟食店、面馆、菜场、花店，整个上午，停在街沿旁买东西的私家车要占去一半车道。再往前，过一条横马路，街道忽然安静下来，高高的围墙，遮住了神秘风景。我觉得，这种神秘性是旧法租界令人神往的原因之一。我时常望着大门紧闭的车库、二三楼阳台上晾出来的衣服、低矮房檐下糊了油烟的小窗，猜测那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临街天井的门老是不开的，也不知他们究竟什么时候进出。但是，衡山路、建国西路、宛平路、广元路的大交叉口，六面贯通，又打破了神秘宁静的氛围。路不熟的人站在路口，都不知道应该看哪个红绿灯。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徐家汇公园外面，衡山路口的大喷水池旁，碰到两个阿婆问路，问我15路怎么走。两副都是细弱嗓音，说着客客气气的上海话：“我们要去南京西路。”我给指了指方向，她俩四面一望，还是有点迟疑。矮个子穿绿两用衫的阿婆，指着马路对面车站说：“那么那个是到哪里的？”我说：“那个是另一个方向，好象到万体馆。”戴金耳环大变色眼镜的阿婆说：“不要紧，我可以看天上的电线。”转头对同伴解释：“15路是电车，有小辫子。我们沿着电线找。”于是我告别了老年版的汉赛尔与格莱特。走出一段，过了马路回头看，只见她俩正相携在路口仰脖四望，像八音盒中的小人偶似的缓缓转圈。我退回去又指：“往斜里头这条路走。”金耳环阿婆笑说：“哦哦，怪不得，我们想电线怎么没了呢！”又对绿两用衫的小姊妹说：“15路是小辫子车呀。”

大城市有种很微小的体贴，比如，即便一度熟悉的道路变得陌生，15路总还是拖着条小辫子。天上的电线，断断续续，就像汉赛尔和格莱特撒在森林里的小白石子。

02

江苏路

江苏路延安西路，是我博客的名字，也是我曾经住过小十年的地点。

上海市内的方位地点，多以交叉的两条路定位。具体所指，不止于一个路口，而是一个街区。假如是像江苏路延安西路这样的大路口，那么它可以囊括周边的好几个街区。公交车站点，报出来往往是一长串路名。坐出租车时，也常嘱咐司机：师傅，我到江苏路延安西路。

司机师傅不太喜欢这个路口，因为红绿灯设置复杂，常常莫名其妙地堵车。这时如果你抱怨一句：怎么一直不动……司机在前座就唠叨起来了，说来说去，是怪你在此地上车。你心想，那你干嘛在此地拉客呢？敢怒不敢言，想想也就算了。

毕业之后，我在江苏路延安西路附近住过两三年工夫，后来搬走，过了两年，又再搬回，换了四五个住所、三四条马路，始终围绕着江苏路地铁站。这地方散落着我的诸多回忆。比如，我每月有一两次，会拿着汇款单去江苏路宣化路路口的邮局取稿费。那邮局占据着有利市口，本来很宽敞，但最好的柜台都给了邮政储蓄，汇兑业务窗口设在边门一间狭小的地下室。负责汇兑的大叔，有一对忧愁的大眼睛，面容呆板。在打了五六次交道之后，有一天，他先是带着同样呆板的面容替我办理了业务，接着，我看他的脸垂下去，再抬起头来，脸上忽然现出痉挛的笑容。他有点讨好地问我：你要不要订报纸？

如果不是他问得那么突然，如果换了现在，我不再那么容易尴尬，我大概会向他讨一份征订单看看的。

我喜欢江苏路延安西路，是日久生情，但除此而外，也是因为它确有好处。具体说来，交通快捷，此为第一，生活便利，此为第二，但还有更其重要的因素，是不那么显著，也难以因为所有首肯的。对地点的感情，与对人的依恋共通。你喜欢一个人，也许关乎他的外貌、财产、学历，但占决定性地位的，却是他的脾气，他这脾气里，有可爱处，也有可恶处，可爱可恶，都吸引着你。

江苏路延安西路这一区域，正如路名本身给人的印象一样朴实无华。它处于长宁和徐汇两个区的交界，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往南去，是历史悠久的兴国宾馆，四周缠绕着一条条蜿蜒、幽静的林荫道。往北去，是苏州河，河的北岸铺开了大片工人新村。旧法租界和工人新村之间的这个过渡带，就糅合了南面的矜持与北面的简朴，老建筑的典雅有之，旧公房的粗陋有之，公交站的嘈杂有之，小弄堂的僻静有之，甚至连棚户区的破败脏乱，也像肚肠似的折叠起来，包藏在纵横的小马路中间。

两条路均为主干道，车流日夜穿梭。路口四角建了商务楼，路边的店招都很普通——苹果园西点、快客便利店、连锁药房、价格实惠的川湘馆子之类，以实用为主。但与之交错的小路，一条与一条，风格迥然相异。其中有隐藏着许多历史保护建筑的愚园路和武夷路——不消说，先前就很漂亮，如今有了马路的精品咖啡店加持，变得相当时髦了。但如果单有它们，细说起来，无非是旅游指南上的那种上海。赋予这一地块丰富性的，反而是两条奇特的小马路：安化路和安西路。

这两条路极为狭窄，容两辆普通小轿车交错，亦感勉强。路过者，如果不是特意寻找，极易将它们忽略，因它们本身那种简陋的样子，就像存心要人忽略似的。

安化路与江苏路相交，路口旁有个很大的公交站，站上停靠十余条线路。候车的人闲来无事，站在路口一望，会拿不准这条路究竟通不通。看得分明的，是近路口处的几家小商贩，卖山东煎饼、糖炒栗子之类，门面狭小低矮，一望而知是违章建筑。稍往里几步，似乎有一带两三层楼的私房，零零散散地也墙破开出几个很小的窗口。什么生意呢？有一家修表的。像一切修表店一样，从窗口望进去，只见满墙的挂钟，时间浓度很高。一般修表的，以戴鸭舌帽的老伯伯居多。这一家却有一个圆脸的年轻女人，像老伯伯似的戴着袖套。另有一家，是专营小孩的零食玩具的小卖部，窗口挂满大大卷、小包装饼干、霓虹色风火轮之类。走到这里，就已经深入安化路二十多米了，再要往前走？一般人看看，只觉得里面越发破旧，没有什么意思。其实这条路是通的，一直通到西边的定西路，可算一条捷径。而且它奇特的地方，尚在深处。

我身为安化路上的一个居民，前后约有两年，在这条路上来回走动过几百次。所住的房子，紧贴那一带私房，在它们西边，是一个仅有三排楼房、绝无一方绿化的小区。小区对面开有一扇大铁门，看样子是座规模不太大的厂子，似乎早已停止生产，从门面上，也看不出过去生产什么东西。只有一年的中秋前后，厂门前摆出几张折叠长桌，上面摆得花花绿绿，销售各色月饼、饼干。也许是其他厂子拿来抵债的资产吧。厂子贴隔壁开设了一家菜场——说不定场地正是该厂出借的。这种卖菜者坐在地上、卖鱼者踩在水里的菜市场，在当今的上海已很少看得到。十几年前倒算常见，但像此地这样带有马路菜场遗风者，我第一次前往，也吓了一跳。只见遍地肮脏流动，无从下脚，凉丝丝的肉腥气弥漫四周。我既然没有什么买菜经验，一吓，从此就很少光顾了。

旁边有家小餐馆，不知是不是直接从菜场进菜。他们烧出来的家常菜——糖醋排条、椒盐排条、蚝油牛肉、酱爆猪肝、糟溜鱼片，味道都很不错。家里放着他们的外卖单，一个星期吃三次，很快吃顺了。

到目前为止，安化路是一派乱哄哄的贫民气象。更新奇者，在菜场和老公房之间，还嵌有一条弄堂，是被动迁大潮落下的一个棚户区。这里道路破碎，天井拥挤，露天里的水龙头都上了锁，屋顶经过重重叠叠的修补，覆盖着不同颜色的纤维板和铁皮板。住家们成天大门洞开，客堂却还是黑洞洞的。他们——大部分年纪都很大了，就在那灰棕的底色中，探出一张白脸，向外望着。

回到安化路，再往前去，道路却见出不同气质。路的两旁仍是多层住宅，房龄不小。路北的小区，绿意森森，光照不进，在最晴朗的天气也显得寂寥。路南的一排房子中间，有一幢五层楼房，比邻居都矮一头，因其青苔斑驳的外墙、大面积的茶色玻璃装饰，带上一种老电影的年代感，经过时看它一眼，总是觉得阴森。据说这一带就有不少老洋房，我知道，南面相邻那条利西路上——更狭窄、更蜿蜒，几乎只能算作一条弄堂——是看得见个别老建筑的窗棂和屋檐的。但安化路上是否真有洋房，我不得见。不过在这短短的一百米间，能感知到一种陈旧。是东西保存得不好，所造成那种潮湿、粘手的陈旧，带点不详。

可是再往前呢，又是毗邻的好几家叫不出名字的杂货店、小超市、理发店。安化路在这里与安西路交叉起来。

安西路南端顶着武夷路。一转进路口，两边红砖洋房侧墙就显得不如正脸那样整洁。越往北，越不修边幅，终于爆发成为一排小商品店，塑料凳子、塑料脸盆、塑料水桶摆在街边，贴邻的门面上则铺满了干香菇、黄花菜和腊肉。我觉得安西路脾气随和，没有什么主张，而极愿意配合与之相交的马路。靠近武夷路，它就带点幽静，靠近安化路，它就变得粗鄙。可是，一过了安化路，路边出现一座新建的高档小区，它又整洁起来了。行进至愚园路附近，它也遍地绿荫，表现出很有内涵的样子。

我喜欢这两条小马路的丰富多变，喜欢它们丝毫不造作，丝毫不怀旧。这一格局杂乱的街区，你说不出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老公房吗？是停产的工厂吗？是棚户区吗？总之，它赋予愚园路和武夷路——这两条美丽的马路——一种家常的、贴肉的生活性。而在短短几百米的跨度之间，因为住着不同的房子，我相信，居民们对街区的看法也会有明显区别。不过马路是这么窄，又是这么四通八达，不同房子里的人一下楼，就混在一起了。我喜欢这一点。

其实这只是我的私人想法，放在实际生活中，他们走在一起，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不会交谈，互相没有任何影响。但想法停留在想法层面，往往已经起到了它的作用。好几年间，我就在这几条路上，和其他行人一道走到江苏路地铁站去。后来，我结束租房生涯，搬离了江苏路延安西路。11号线开通，江苏路地铁站便从我的始发站，变成了目的地站。

03

曹杨路

念大学时常坐的44路公交车，是沿曹杨路开，开到相接的江苏路，再一拔直往前。窗外的景色，由成片的工人新村，渐渐变为大楼、大库房。有一幢楼，我印象很深，来来去去，总能看到。它几乎占去半个街区，墙壁高耸，投下永恒的阴影。楼下整排的玻璃门已经破旧，门厅黑乎乎的，二楼外墙挂着旱冰场的大招牌——这过时的娱乐场所，就像江宁路上的烈火游戏厅，在艰难运作中保留了一批常客，故而尚未被彻底扫除。

这条路线，自始至终透着这种平静的寂寞，像公司里上了点年纪的员工。“没什么花头了，”他说，“等退休。”

44路始发站在师大后门的杨柳青路上。后门那几条路，名字都是春光旖旎。杨柳青之外，还有花溪、兰溪、杏山、桂巷、枫桥、棠浦、桐柏、梅岭，活像一座大花山。这一大片居民区，属于曹杨新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建设起来，资历很老。到千禧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房子老旧了，道路则葱茏了。同学中，有一位家住附近，我去她家串过一次门。那是我见过的最有年代感的一种公房，比我家从前住的房子更老。总高三层的房子，排列得横平竖直。屋前屋后，都有小花圃，栽种月季、凤仙、鸡

冠花之类。楼梯和过道均为木地板，红漆暗淡了，墙壁下半部涂了绿漆。住家里头也是同样装潢，公私统一。同学家收拾得很整齐。家什是增添到一种拥挤的程度了，但还是坚持很整齐地在各处码起来。

每周日，我吃过中午饭，就乘坐一部名叫“沪钱线”的车子，从家里返回学校。这部车走沪嘉高速，终点站在静安寺附近。下了高速，它会在曹杨路靠近中山北路的位置停一停。这站名叫“三汽公司”。下车以后，我有两个换乘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往前走到中山北路，坐一站公交车，到大学正门口。第二个方案，是转弯到兰溪路，坐 44 路到终点站，再走一小段路，就是大学后门。第一个方案显然更快捷，但我更喜欢第二个方案，因为一路上街景温馨，到了后街，还可以去罗森买关东煮。再说宿舍离后门近，穿过篮球场就到了。走正门的话，又是过草地，又是过大河，虽然风景好，仍旧有点不耐烦。

周五下午没有课了，就收拾东西回家。还是坐 44 路。到站了，穿过曹杨路去等车。那时节，在 44 路车站前开有一家白玉兰小吃店。当时还没有网红店一说。冷馄饨、肉包子、桃酥饼、冷面，都冷冰冰地展示在斜面玻璃柜台后的不锈钢餐盘里，看上去油腻腻的，没有大家今天说的那么美味。

回家方向的“沪钱线”，停靠站点也是“三汽公司”。这三汽公司，不偏不倚，大门就设在车站一旁，是名副其实的三汽公司——上海巴士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大门里头，只看到一片空旷的停车场。你在站牌底下，望着一辆辆公交车进出大门，望了一会儿，就会认为这是一家以汽车为主要成员的公司，汽车进去，就是办公，出来，就是出外勤，也有上班下班。于是汽车在你眼里有了表情。出来的车，里外冲洗过了，是精神抖擞的。它们同进场的车打招呼：第几圈啦？进场的车，大前窗上蒙一层疲惫，不太往左右看，只顾朝里开。还有那些经过三汽公司站，却并不到站的车——你不禁要揣测它们的心情。也许会像学校里经过其他班的学生，一边走，一边朝窗户里看两眼，羡慕他们刚上完体育课，可以休息一会儿。

曹杨路，在我心目中是很能代表普陀区特质的一条路。它既有城郊结合部的荒凉，又留着大工业时代的粗鄙。上大学的头几年，在曹杨路边常能看到一两幢房子，窗户镶着蓝色反光玻璃，从来不见灯光，显已人去楼空。夜间行车，长而阔的路边，也只有星星点点灯光，不时闪过一两家昏暗的店铺，是那种公路饭店。它太长了，空地太多，顾不上从头到尾共同繁华。加之，它是一条内环外的公路，似乎还没资格拥有繁华。它从上海西站出发，经过真如寺，穿过喧闹的铜川路海鲜市场——坐在车上，看到两幢巨大的，没有窗的建筑，墙面上什么都没有，呈现一大块平滑的灰白色，屋顶上竖起几个红色大字：大闸蟹交易中心，我就想：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去交易螃蟹呢？那得有多少螃蟹啊！

没想到，几年以后，铜川路海鲜市场就拆迁了。曹杨路上已陆续建成了新的高层住宅小区，也有商场在规划中，铜川路的一股腥气，务必完全抹去。它拆迁之前，我只去吃过一次。同行的是一位修行的朋友。他请求我说，他不能指点杀生，可否请我全权代理，我点什么，他吃什么。于是我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在一个个红色大盆里胡乱指点了一阵。饭店里点菜的人，手拿小写字板，将塑料袋拉开一条缝，斜眼一看，就满有把握地问：要怎么烧？红烧？清蒸？酱爆？蒜蓉？每一样都是这四个选项。要是你沉吟超过三秒，他就自己代你决定：要么清蒸吧，清蒸就可以了。要么红烧吧，红烧好吃。

今天，曹杨路地铁站是一个交通枢纽，连接着地上的 3、4 号线，和地下的 11 号线。我总是尽量避免在曹杨路站换乘，原因还是烦人的换乘通道。由于 3 号线可达上海站，通道里就常常响彻行李箱的滑轮声。不远行的人置身其中，没有出远门的期待，却沾上了出远门的慌乱。

曹杨路站还通往全上海最大的商场之一——环球港。环球港的两座尖顶闪闪发光，在高架上很远处就能看见。这商场，因其庞大，因其豪华的巴洛克风格装饰，因其内部人造的河流和蓝天，构成一种可喜的荒诞气氛，仿佛在同不远处那座酷似巴黎亚历山大三世桥的武宁路桥互相唱和。

在三汽公司上班的公交车们，夜里十一点下工之后，也许侧耳静听凯旋北路上列车开过的嗡嗡声，在好闻的汽油味中，缓缓谈论些夜宵车时代的奇闻逸事。

04

嘉定新城

写到这里，我想有人也许会说：你怎么这么难弄，这不喜欢，那不喜欢，有本事你坐出租车，不要坐地铁。但话说回来，我格外喜欢公共交通。我喜欢有好多人陪着我一同在路上，我看看他们，听听他们，偶尔不情愿地跟他们碰碰。人们在通勤路上表现得松弛、惺忪、不加防备，独行的人皱起眉头翻着手机，情侣肩碰肩、头碰头挤在一处，发呆、睡觉，自成一体。坐公交车时，一般只能看到前面人的脑袋。如果后座的人在讲有意思的话题，也只能悄悄竖起耳朵偷听，不方便特意扭头去看。像沪嘉线、沪钱线这样的准长途汽车，椅背格外高耸，前后排之间几乎是连男女都看不清的。地铁就不同了，你前后左右都是人。你站在座位前面，可以从左到右，缓缓打量每个坐着的人的膝头、前胸、头顶心。我讨厌喧闹拥挤，而且常常讨厌陌生人，但是，发现人有时候是这么讨厌，讨厌得这么有趣，又带给我无穷的兴致。

自从有了地铁 11 号线，嘉定本地人也渐渐改口，将“上海”改称“市区”。“你出去啊？”“对，到市区去。”但间或也有个别年长者，仍保持着旧的认识。“你在哪里上班？”“在徐家汇那边。”“啊唷，在上海啊……那每天都要到上海去？”

十多年前，一个凌晨，我乘坐头班的 11 号线，从市区来到嘉定新城，准备认筹购房。坐进销售中心的大玻璃屋，天空还是一片漆黑。不远处，地铁开动，窗口亮如白昼。我感到周身无力，只想赶紧办完手续，好回家睡觉。没想到，签完所有的字，离开时已近中午。我回到爸妈家，发觉自己发烧了。

七年前，我搬进了嘉定新城的新家。从此，我的通勤就是在地铁 11 号线上往返。我一度以为，自己到了上海，就会一直住在上海。然而最终，嘉定把我喊了回去。现在，

我要每天“到上海去”了。

我多次读到过一种理论，宣称通勤路途一长，人的幸福感就会减低。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往返的两个小时，是最好的独处时间。在独处中，四周又有这么多可观赏的人物。我有时在微博上偷偷记录他们。我有一个 tag，叫做“谁坐在我旁边”。有一次，当我记完一条，邻座那位记录对象，一个穿戴朴素，好像半个世纪前的老教师的年轻人，用温和的声音问我：你写完了吗？

这段长路上，又常有令人心折的风景。无论你置身多高的楼层，都只有一个远眺的角度。只有在行驶的列车上，你才能脱离地面，看天空和大地在眼前奔跑。有时车厢里人太多，就只有透过两颗头颅之间的空隙看向窗外，这样一来，好比在电影院里看风光片。

清明、冬至前后，11 号线在上午会有两拨高峰。九点一过，上班族走得差不多，扫完墓的叔叔阿姨兴冲冲地跑了进来。首先是抢位子。抢到位子之后，就相互呼唤、推让。车厢里顿时热闹非凡。大约花去一站路的时间，大局初定，坐的坐好，站的站好了，坐得远的，招呼也打好了。于是开始聊天，交换朋友的讯息、子女的近况，一直聊到其中某人到站。“你调几号线？”“我 4 号线。”“你呢？”“我 9 号线。”问清楚了，热热闹闹地再会。

车厢里的其他人默默看着、听着他们。他们是多么有活力啊，大家心里也许略有一丝羡慕。

近两年来，我开始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当然不认为自己老，互相之间，更有这种认同。他们是他们二十几岁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的年轻人，从二十几岁起，就一边说着怕老，一边自以为年轻，像这样往后面活下去。我也一样。爷爷奶奶在浦东的房子卖掉了。倚仗这笔钱的帮助，我买了新的大房子。爸爸妈妈在老家的房子也卖掉了。他们换到新城，来住在我附近。童年的回忆将无从寄托，攒满的乡愁流走了。

这时我又庆幸自己回到了嘉定。尽管这里变得越来越像一座崭新的城市，却仍有纵横的河道、缭绕的乡音，把过去网住。每一天，我走进地铁车厢，经过一个个熟悉的站点，到上海去。

清明，爸爸折了元宝，妈妈按照一向的习惯，准备了鸡鸭鱼肉。奶奶生前使用的祭器——对烛台、一盏香炉、几个酒杯，都拿出来了。爸爸就开了门，到电梯间里去叫：姆妈，爹爹，来吃饭吧！叫得并不如何虔诚，是人云亦云的一种口气。但如此一叫，旁人也就当真有所感应，以为是叫得应的。回头看看桌椅，心想也许已经来了。于是照例的磕头，祝祷，化纸。

但这饭，又像在快餐厅里似的，吃了一炷香时间，据说就差不多，要收拾碗筷了。我想亲人久别，本该笃定地把盏言欢，为什么却做得那么匆忙？转念一想，灵魂的境界，许是要比我们有肉身的人高。吃喝上节制，团聚上，也是节制的。毕竟不属于自己岸的世界，看一眼，就轻轻松松地回去了吧。

如果问他们到哪里去，我想，奶奶大概会遵照过去的习惯，回答说：到上海去。

但我却不会如奶奶从前那样，站在门口嘱咐说：来哦！还进一步问：啥时候来？

当时我心里总是为难：啥时候来，这时间怎么能说得准呢？

转眼冬至到了，爷爷奶奶又该来了。

我忽然愉快地醒悟：爷爷奶奶的房子、爸爸妈妈的房子——我从小长大的这些地方，并没有沉入过去，而是换了个形式，和现在的我一起了。

（写完了。感谢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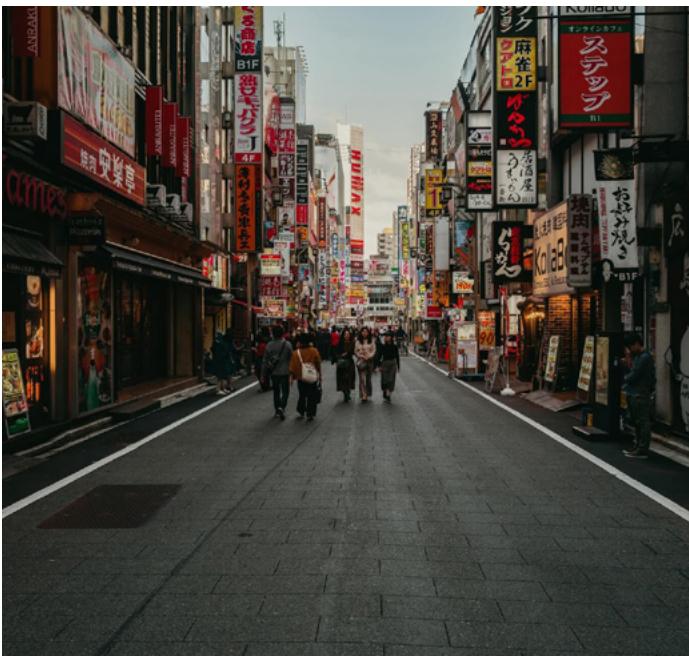


许佳

作家，三明治写作学院联合创始人。著有长篇小说《我爱阳光》《最有意义的生活》《青春雨》，小说集《只在梅雨天爱你》等作品八部。译有《傲慢与偏见》。

到上海去

在我小时候，住在上海郊区的人，管进城叫“到上海去”。今天，当我回顾过去，我发现，自己一直在重复这个“到上海去”的过程。



非虚构

“民族城”里的日本人 吉井忍 | 吉井忍的二次会

“新大久保”到底会不会是日本社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版本？

在东京的一个周末，若要举出客流最密集的地方，那应该不是涩谷、银座、六本木或歌舞伎町，而是位于新宿区的“新大久保（Shin-Ōkubo）”。实际上“新大久保”是JR山手线新大久保站附近（新宿区百人町1~2丁目以及大久保1~2丁目）的统称，从新宿站只有一站路程，走路也二十分钟不到，穿过歌舞伎町、过一条马路即可到达。这个地理优势条件也是这一带发展的原动力，新大久保站前的一条街“大久保通（Ōkubo Street）”人流最多，目测平均年龄明显比上述几个地方要低，足以让人暂时忘记人口高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

但这里的活跃氛围，是靠“外国人”营造出来的。新大久保站只有一个出口，沿着大久保大街过铁路高架往东走，就是号称东京都市圈最大、拥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韩国城。马路边上餐馆、化妆品专卖店和韩国明星周边店铺天盖地，约有两百多家，也有人说至少有三百。不过离车站越远，这些小店越少，走过大约四百米就和其他东京街道没有太大区别。看见一条通南北的大街“明治通”就算是走到了韩国城的尽头，从这里往北走几百米，即可到达早稻田大学理工部校园。新大久保站的西边又是另一个“民族城”，沿路而行即闻到扑鼻而来的各种“异国”调料香气。这里的商铺和餐厅主要是为满足来自中东、中国、印度、尼泊尔或泰国的“老乡”生活需求，在很多小店铺销售的食品、茶叶或香料都没有日文标签，随处可见的房租中介都挂出“欢迎外国人”的招牌。宗教机构也体现出这里的海外因素含量，最醒目的是五百多年历史的“皆中稻荷神社”，过去在射击能力领域特别灵验，现在说是能提高“抽签运势”，走进小路还能找到东京首座妈祖庙、用四种语言（日中韩英）进行礼拜的教堂、供奉湿婆的印度教寺庙以及清真寺。

“新大久保”所在的东京都新宿区，是这些年来首都常住外国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截至2021年10月1日，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数约有53万，超过八成在中心地带23区，其中居住于新宿区的外国人有34572人（中国人和韩国人最多，占外国人总数的六成），仅次于江户川区的35424人。但新宿区的面积才18平方公里，江户川区的一半都不到，从人口比来看，新宿区的外国人比例超过10%，远超整个东京的平均值3.8%[1]，可谓是目前首都外国人占比最高的一块地。这个趋势按年龄来分析更加明显，据2019年统计，在新宿区迎来20岁的“新成年人”有4109人，包括外国籍的1868人，意味着该区将近一半的新成年人属于外国籍。这个情况，看似和“西川口”（埼玉县川口市）的中国城有点相似[2]。除了西川口，首都圈还有不少民族城，如池袋的“新中国城”（丰岛区）、西葛西的“印度村”（江户川区）、竹之冢的“小马尼拉城”（足立区）或锦糸町站附近的“小泰国城”（墨田区）等，也有小规模的外国人聚居地，如高田马场（新宿区）的缅甸人、代代木上原（涩谷区）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人。这样看来东京的外国人之多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市面上也有专门介绍这些地区特色餐厅的指南书。

但“新大久保”仍然获得了日本媒体和社会学者的关注。有几个原因，这一带拥有历史文化内涵，有过一种坚固的当地居民的生活体系，临近首都最繁荣的地方、人流多，更能表现出社会多元化的一个形态。看着眼前的“新大久保”风景、在这里上班或学习的年轻外国人以及他们散发出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你会直观地明白，没有“外国”的力量日本经济只能继续萎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对外国“移民”一直限制得比较严格，虽然已经有不少外国人通过各种途径来日本生活，但在社会中人们对于这件事尚未形成具体的共识。那么，在已经接受了大量外国人的“新大久保”，日本居民对“外国人”的看法是怎样的？更进一步地说，“新大久保”到底会不会是日本社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版本？



周末的“新大久保”风景



南边与歌舞伎町相接，北边有早稻田大学和学习院女子大学，新大久保位于日本最大红灯区和学校区域之间。



新大久保车站。过了这个高架就能看见“韩国城”。车站另一边的民族城（中东街）。



民族城的商铺招牌。

民族城里有不少日语学校。这条街上有一所著名培训机构，专门辅导中国留学生。

01 百年书店

开始寻找“新大久保”的采访对象时，不少人提起“盛好堂（Seikōdō）桑”[3]，理由简单明了，那是百年老店，知道它的人多。盛好堂书店位于韩国城的中心地带，在一栋水泥楼的底层，左右邻居和上层商铺都是韩国料理或居酒屋。书店门外和窗边也摆出不少韩流海报和相关书刊，表面上选择附和周围年轻客流的口味，但踏进店门又是另一个世界：那就是日本中年人最熟悉的小书店，卖新书、杂志或文库本，它和近年多见的新一代小书店也划清界线，不卖咖啡，也没有杂货。

第四代店主道冈宽史得知我的来访目的，就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去年刚迎来喜寿（七十七岁生日）的道冈胜人（Michioka Masato）。我和这位充满活力、非常健谈的老先生约在附近的一家老咖啡馆，他指着随身带来的地图、照片和地方报等资料跟我解释，“我不是什么专家，所以只能跟你讲和这家书店有点关系的，应该也可以让你了解一些这里的历史吧”。

事情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当时这一带当时就叫做“大久保”，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洼地”（日语的“久保”和“洼”是谐音）。江户幕府在这里设有步枪百人队，至今JR中央线大久保站和山手线新大久保站夹着的地区仍沿袭了这一地名“百人町”，该部队居住地的小路故意做成狭窄细长，以便于防御外敌，现在百人町附近



盛好堂书店外观。



店内风景



在大久保居住的铁炮百人队以栽花（杜鹃）为副业，JR 中央线大久保站前的一幅壁画描写了这段历史。



从箱根山眺望新宿区（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宿历史博物馆提供）



为解决战后的住房问题，陆军训练场在战后被改建成公共住宅“户山团地”。图为该团地举行的一场运动会（上世纪四十年代，新宿历史博物馆提供）



现在的户山团地（新宿区），65岁以上的高龄居民占56.4%。



道冈胜人先生。他拥有一个好嗓子，每周参加当地著名合唱团的排练。



盛好堂书店门口附近的“韩流”书刊，也有日文翻译版的韩国文学作品。

还留有当时的痕迹。离百人町往西走，相当于现在的早稻田大学理工部校园附近还有尾张家[4]的下屋敷[5]，相当于藩主的别墅，其院子里的一座筑山“箱根山”标高44.6米，至今仍是东京中心23区内最高的一座“山”。

十九世纪后半的“明治维新”废除了武士阶层的特权，使他们的地位大幅下降并成为“普通人”，也有部分通过明治政府被纳入军队、警察、学校等公职部门。尾张家的下屋敷后来成为陆军训练场并吸收了下级武士从军，周围还出现了教育机构，如陆军士官学校（1874年创办，现为防卫省）和成城学校（陆军预备科、1885-）、法政大学的前身“东京法学社”（1880-）、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1882-）以及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弘文学院（1899-1909）等。馥郁书香熏陶出知识分子和革命思想，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1871-1911）、革命家宫崎滔天（1871-1922）和辛亥革命的支持者暨商人梅屋庄吉（1868-1934）都住在这附近，孙中山（1866-1925）、马君武（1881-1940）、黄兴（1874-1916）、宋教仁（1882-1913）、梁启超（1873-1929）以及郭沫若（1892-1978）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留学生也曾是他们的邻居。

“所以这附近外国人多，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感觉这一带有种氛围吸引着各种背景的人。我爷爷海军出身，咱们这家书店盛好堂是他在大正13年（1924年）创办的，就在关东大地震的第二年。那年他刚好退休，想找个地方开书店，听说大久保这一带地盘坚固，就选择了这里。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多东京人在地震之后也搬到这里来。”道冈胜人出生于1943年，两岁时在东京遭到空袭，母亲带他和弟弟疏散到广岛去，那里又遇上原子弹，幸好和核爆中心点有点距离，三个人又回到了东京。他的父亲也是海军军人，败战后回来继续开书店，据道冈胜人回忆那就是“最好的时代”，人们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疯狂地想看书。整个社会怀着热忱的教育情怀，大家争先订购文学全集和儿童报刊，他也骑车帮忙去送书，每天串门一百多户。

“让我们头疼的是教科书。政府颁发的教科书是先送到学校附近的书店，然后由书店负责送到各个学校，当时这附近有十七八所学校，一个学年有五六个小时，一个班级四五十个小孩，我们从十月份开始搬运教科书，才能赶上去年四月份开学时间。从我小时候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都是这样。过去还好，附近一共有九家书店，现在只剩我们这一家，当然学校和学生都少了许多，但还是很辛苦。这种活现在很多书店不愿意接了，人手不够、没地方放那么多教科书，报酬不是没有，但也不算多，而且我们店主都老了，根本搬不动。”

02 共存共荣的秘诀

“说到这里的韩国城，也是二三十年前才开始。此前是非常庶民化的一条街叫‘新大久保商店街’，想买蔬菜就去八百屋，想要鲜肉就去肉铺，生活起来很方便。这个商店街现在还有，我也是（新大久保商店街振兴组合）成员，虽然不少老店已经关门大吉，但近年来部分韩国餐厅有参加。二三十年前也不是完全没有外国特色商店，

因为附近有歌舞伎町，在那里工作的外国人在新大久保租房子住，特色商店也就是针对这些人而开的。2002年世界杯（韩国和日本共同主办的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掀起了第一波‘韩流’热潮，韩国店铺和餐馆随之增加，除了韩国人，其他国家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看这和手机有点关系，刚好在2000年前后手机达到全民普及，这边也开始出现拿手机讲外语的外国人，边走边聊，声音可大呢。以前这附近有一些房东不给外国人租房，但这样的房东开始变少了，有些老公寓日本人不愿意入住，就慢慢开始接受外国房客，来了一个就会叫好多同乡来一起住，以前在川崎市（神奈川县）的工厂上班的外国人也都来了，有手机嘛，联系起来都很方便。”

“韩流热潮的第二波是《冬季恋曲》（韩国电视剧，2004年在日本上映），当时的粉丝年纪比较大，以‘欧巴桑（中年妇女）’为主。2012年开始日韩关系恶化[6]，仇恨言论、游行也曾在这里频频发生，直到几年前迎来韩国男女团带头的第三波热潮，年轻客流比第二波多了许多，以女孩为主，来这里边走边吃韩国小吃，也会买化妆品。不过新大久保的外国人不只是韩国人，毕竟这里的交通方便，也有不少语言学校、专门学校（相当于中国的职校）和大学，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等亚洲人，中东国家的人也多的是。”

透过一个书业人士的视角，他也目睹过周围环境的变迁。从大约二十年前开始，盛好堂的外国顾客也渐渐多了起来，以韩国人和中国人为主，地图和时装相关的书刊最受他们的欢迎。

“以前这些外国顾客不太会讲日语，但他们的下一代是在日本出生的，看着日文绘本和漫画长大，这些小孩到了来我们店里买文库本的年龄，他们的父母那一代的日语也已经相当流利了。所以我们书店还是保持原来所谓‘本屋（书店）’的样子，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还有绘本、参考书、实用书、漫画和杂志。我们会把韩流海报贴在门外，那是想要让大家注意到我们，不管怎样首先要吸引眼球嘛，但希望他们进来之后能够偶遇到一部好作品。不过现在的店主是我儿子，我自己三年前退休了，书店的事儿我不应该说这么多。（笑）”

“我最担心的，就是现在小孩还是太少了，整个新宿区每年新生儿数量才两千多[7]。这对当地的经济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我有一种危机感。所以接受外国人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之前也有过一些矛盾，比如外国人扔垃圾不会分类，也不知道必须在指定日的早晨放在回收处，前一天晚上是不能扔的。现在好一些，房屋中介会主动给外国房客进行指导。也有一些噪音问题，他们发出的声音比较大，但这都慢慢解决了，互相了解是必须的，我们之间有差异，就像每个人有个性，有这些差别才有意思嘛。估计现在的小孩更能学习这点，因为身边的外国人比过去多。我也学到了一点，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共存共荣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和他们交朋友。让自己意识到共同存在的必要就好。”

03

看得见的韩国人，看不见的中国人

道冈胜人说及的新大久保商店街由该商店街的“振兴组合”运营，和盛好堂书店同一条街上的印章店“岛村印店”也有参与，老板娘伊藤节子（Ito Setsuko）是该组合的顾问。她的祖母二战前就居住于此，父亲从战地回来之后辗转各个行业包括印章制作，1946年“岛村印店”正式开业，伊藤节子升入小学时（上世纪五十年代）搬到目前店铺所在的住所。

“但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想过继承家业，我上都立青山（位于涩谷区的公立高中）的那几年学生运动最为激烈，高三的秋天我去准备文化祭（文艺节），结果发现学校迎来警方的机动队，不让我们学生进校。之后就是一片混乱，直到次年的三月份根本没法上课，连毕业典礼都没有[8]，就这样进入社会了。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所谓的‘成年人’没有什么信任感了，过了一段打工生活。”

当时的印章基本都是手工雕刻，大久保附近也有不少印章职人。日本印章发展出各种形式，私人印章可分为实印（刻上全名）、认印（只刻姓氏）和银行印（刻全名，用于开户或大额取款用）的三种，工作场合也需要职印（刻上职称和个人姓名）、社印（刻有公司名称）等各种印章，总之社会各个场面需要盖章，印章店生意兴旺，尤其在高度经济成长时期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

“我回到新大久保是平成元年（1989年），那年父亲七十岁，他说若我不回来这家店也不开了。我当时在北海道，也听说开印章店很能赚钱，就决定回来继承家业，结果一回来经济泡沫破裂，同时工业廉价产品开始普及，我们这种专门店的生意不是那么好做了。印章店的另一个主要收入是印刷品，贺年明信片、暑中见舞（夏季的问候明信片）等，以前我们的大客户就是歌舞伎町的妈妈桑，夜总会和高级酒吧经常办活动，除季节问候之外也经常寄明信片邀请客人来店。现在那里的酒吧都换了人，很多店都是外国人开的，他们没有（用明信片问候的）这个习惯。还好我们不需要付房租（注：因为房子是自己的），否则开这家印章店会非常辛苦。”



伊藤节子女士，摄于岛村印店。“最近迷上了中国电视剧，杨幂和孙俪我都喜欢。正在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大久保站前风景（新宿历史博物馆提供）



岛村印店为外国游客和外国居民提供外文印章。 关根美子女士



荒吐族把“遮光器土偶（体态夸张、眼睛硕大的人形土制品）”当做信仰对象。关根美子的名片 自主出版物也有该土偶形象。

曾经不相信成年人的伊藤节子，在继承家业的同时加入了新大久保商店街振兴组合，发现“其实大家也在努力”。该组合的前身是1947年设立的“商光会”，店主们从废墟上站起重新修建了商店街，为周围居民添加光明，还自掏腰包包装路灯。从五十年代开始店铺不断增加，到七十年代把街道照明换成汞灯，废除电线杆的同时把电缆线全部埋入地下。除此之外，每逢过节进行街道的装饰，周末人多的时候雇佣保安进行客流控制，也都由参与组合的店主们负责。“也许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很多人没注意到的小事情，才是生活本身。这是我回到这里之后才学到的”伊藤节子说道。“这些年我也很努力呀，以前振兴组合以男性为主，不让我们女性参加开会。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开完会想去歌舞伎町玩，他们怕的是被太太知道。（笑）现在好些了，组织理事会包括我在内有几位女性，这就是我们争取的结果，而且五六年前开始也有韩国人理事了。”

伊藤节子说，作为一个店主她从韩国人学到的也不少。曾经的韩国店主是所谓的“在日第一代”，即1910年的日韩合并到1945年日本战败之间来日本的，而现在的店主以第二代或第三代为主，受过高等教育也有财产，按她的说法就是“头脑转得快”，能够把握市场趋势、应对策略，韩式辣炒鸡排、韩国糖饼，流行什么就卖什么。疫情刚开始、日本店主们还不知所措的阶段，韩国店主们主动为顾客发放口罩、准备消毒液，也有韩国店主为附近医院捐款一百万日元。“韩流”第三波引来满城人潮，流行的都是适合边走边吃的韩国小吃，游客乱扔垃圾的现象严重，振兴组合的店主们去原宿考察之后得知，那里的干净清洁也是当地店主们努力的结果。“现在我们在营业前后把店门口清扫干净，顺便把周围也打扫一下，有的韩国店主更主动，创建义工组织进行更大范围的清扫。”

这样看来，新大久保商店街达成了民族多样化的理想。被问及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时，伊藤节子眯着眼睛跟我说，韩国店主的话都很长。

“那应该是因为韩国人比较重视彼此的身份。昨天参加一场忘年会，是东京都日韩亲善协会组织的（注：伊藤节子是该协会新宿区会长），首先必须有一场纪念演说，接下来是主办方、各位来宾、当地议员和各位会员，每个人的话都挺多的，一共有半小时十九分钟！（笑）若是我们日本人，先说几句，马上干杯，接下来就边喝边听。另外，我们商店街四年前还创立了国际事业者交流会，尼泊尔人和越南人都有参加，我们店主们之间若有什么矛盾就先在交流会中提意见，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疫情之前还办过一次盂兰盆节交流会，一起跳传统舞蹈，有了这样沟通的场合可以更深地了解对方。”

“日本政府推出了三十万留学生计划，这样的时代和政策之下，你拒绝外国人是不现实的。农村也好，工业也好，以后会更需要外国人，新大久保也很缺人呀，很多店都在招人，说什么国家人都行。（笑）我对中国人了解不是很深，感觉他们比韩国人更加独立，不太会跟周围的店主和日本人交流。让人比较担忧的是，中国人买了很多楼房。这附近的楼房被出售会有各种原因，以前的主人因为高龄或其他原因搬到别的地方，也有的楼房设备都老化了、需要更换，但原来的主人花不起这笔钱就干脆卖掉，那中国人买了这些楼房之后到底有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我们都没法知道，因为这些买主平时不在日本。找不到当事人的话，在楼里租店面的人有什么问题，也很难一次性解决掉。其实出现问题不是个问题，只要能沟通，就有机会解决，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去了解他们。”

04

一个人的印刷店

伊藤节子有个朋友叫关根美子（Sekine Miko），是“荒吐协働印刷所（Arabaki Press Works for Customers）”的老板娘。该印刷店由关根美子于1965年创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过几位员工，现在又回到她一个人继续运营的状态，目前主要负责自主出版物的印刷。与前面两位店主不同，关根美子并不是本地人，那么她选择了这一带并定居于此的原因，也许可以说明这里的另一个历史。

“荒吐”指的是从绳文时代（始于公元前12000年，属于日本石器时代后期）起居住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原住民，有一个说法是阿伊努人也是荒吐族之一。该民族的基本理念是万民平等、“天下没有人上人，也没有人下人”，虽然后来被大和朝廷讨伐，但至今仍有不少人被该民族的神秘感和神清气爽的风格所吸引。至于这间印刷所本身，就如其名称中的“协働（一起努力、工作）”所表达的，它是关根美子和周围的亲朋好友一起培养出来的交流场所。

“我出生在茨城县，但三岁时和父母搬到东京。父亲是电影看板的画师，这行业已经消失了哈，我在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协助他工作。但我当时渴望自由，在一家面包店找到工作之后，就卷铺盖离家出走，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姑娘，想法就这么简单。（笑）先在大井町（品川区）的一家面包店，然后到初台（涩谷区），说是包吃包住，但每天都吃面包和味噌汤，这个味噌汤呢，料还是挺少的，也没有其他菜。而且我当时不怎么喜欢吃面包，就这样身体吃不消了，不得不住院。我在病房里看

报时，发现有人在招聘打字员，履历表是我自己写的，然后交给我的祖父，他帮我写信封、投在邮筒里。所以信封上的文字和履历表上的文字很不一样，引起了对方的注意，我就这样无意中赢取了面试机会。”

关根美子在中目黑（目黑区）的印刷公司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她工作扎实认真，而且聪明、记性好，能记住所有顾客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该公司社长是一位豪爽大气的中年女性，非常喜欢关根美子，除了打字还把印刷的全部流程都教给了她。

那正是学生运动波澜壮阔的时代，边看客人的稿子边打字的她，政治意识突然觉醒，也有一两次加入了游行队伍。“刚好社长的儿子要继承印刷公司，我刚满二十四岁就被裁员。朋友们是很支持我的，建议我独立开家公司，印刷器材和打字机也都是朋友给我提供的。”

刚开始是在中目黑的铁路高架下，因为“工作到半夜也不会吵到别人”，然后辗转文京区和江东区等东京几个地方，最后到了新宿区。当时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印刷店并不多，有家印刷店帮忙学生印刷传单，这个口碑相传，光顾的学生越来越多。印出来的传单马上被搬到东京大学等“现场”，关根美子也有几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帮他们发传单。

05

“带着印刷机周游世界”

关根美子通过印刷机开辟了自己的新世界，当时的年代和社会氛围也接受了这样开朗活泼、充满了好奇心的年轻女子。

“有个朋友想出一本日韩关系主题的书，内容含有韩文，所以我想找一台能打韩文字符的打字机。在日本根本找不到，那只能去韩国找，可能因为做过和学生运动相关的事儿，我到韩国就有当地公安总跟着我。他能说日语呢，也很热情，问我明天要去哪里，我就把行程统统告诉他，他都会带我去，连博物馆的参观费用都是他请的，好玩极了。冲绳也去过，1972年不是要回归日本了吗，我想那之后的冲绳肯定和之前不一样，所以想在回归之前去那里看一看。刚好在那霸市有个朋友，通过工作认识的，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左右吧，白天在当地的印刷店帮忙，晚上在居酒屋打工，这样自己也可以喝点酒。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误会，冲绳当地的黑帮以为我是从日本本土过来的御姐。好像那时候在当地有个传言，回归日本之后本土的黑帮会来扩大势力，人家以为我就是先遣队员。他们蛮会接待我的，还带我去看脱衣舞。（笑）”

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搬到新大久保，“因为在里穿着纱丽（民族服）的印度女性走来走去，感觉很好玩”。1983年，有几位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创立了非政府组织“和平之船（Peace Boat）”[9]，这些学生是关根美子的主要顾客，通过这个关系她也偶尔登上他们的邮轮，在亚洲各地教当地人印刷技术，也会把二手印刷机送到菲律宾。

当时的关根美子希望“带着印刷机周游世界”，看来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有一件事情，让一直往外追寻理想的她，又被拉回到眼前的地方和人——那就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

“那些大媒体呀，只会报道每天死了多少人。我很难理解这点。地震是1月17日发生的，第二天我们刚好安排了新年会，大家来我家一起喝酒。朋友们建议我去灾区帮个忙，我跟和平之船的伙伴们一起赶到灾区，24日已经带着印刷机在那里了。”她跟和平之船的伙伴们携手并肩，从第二天（25日）傍晚开始在灾区发行手绘报纸《Daily Needs》，内容都和灾区生活有关，医疗咨询、工作机会、公共浴室开放日或坏掉的眼镜去哪里可以修等等。手机尚未普及的时代，纸质媒体是几乎唯一能够把信息传递给每个人的手段，后来当地的大媒体也介绍了《Daily Needs》，并称“这是媒体的原点所在”。而关根美子至今还强调保留纸质媒体发行体系的重要性：“大家认为有手机就可以，政府也开发了灾难应急软件什么的，但你要知道，灾害发生之后电是会停掉的”。

“当时我们也很关心灾区的外国人，比如在神户做鞋子的越南工人，也有不少韩国人。但他们在自己圈子的关系很密切，信息传播也很快，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从灾区回到新大久保这一带，就发现这里没有神户居民那样的连带感。这么窄小的小街上，不管外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混着住，还有很多观光客，可以想象，若在这里发生灾难会比神户更糟糕。这就是让我决定参与本地自治治理的主要原因。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和这块地区的关系不大，和外来长住的客人差不多。”

在上世纪人们对大久保（含“新大久保站周围”）地区的印象并不佳，邻接着歌舞伎町，这一带确实有过不少“色情旅店”，在红灯区上班的不少外国女子，选择住在大久保地区的也不少，毕竟上下班和生活各方面都很方便。作为当地居民，关根美子总是对这点不服气，向新宿区的市民活动组织“共住恩”提议，制作一份自主出版物《OKUBO（大久保）》，以当地小商铺和当地人的介绍为主。

“从 1999 年开始正式发行，每两个月月初出刊，发行量约有 15000。当时是夹在报纸里送到附近居民家里的（笔者注：日本的报纸一般直接投递到订户家中，在报亭买报纸的属于少数），为此报纸发行商也收费，每张最多要 4 日元（约合两毛钱），加上采访、写稿或印刷，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我们都累了。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们写的东西，因为几乎没收到过读者的反馈，所以到 2006 年决定休刊。结果呢，休刊没多久盛好堂书店的老板来问我，最近怎么没看到新的内容，我才发现还是有人在看。《OKUBO》在 2009 年 11 月复刊，现在还在做。”

关根美子今年八十岁，她的印刷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经营规模稍微大了一点，雇佣了七位员工，现在又回到她一个人的状态，负责从制版稿的制作到印刷的全部过程。“扩展业务范围，这并不适合我的性格。以前跟我一样开印刷公司的也有，但他们都开始接大公司的印刷业务，从收入方面来看那样确实比较赚钱，但我这家还是以市民运动相关的印刷品和个人自传作品为主。世上有这么多工作种类，但我觉得还是印刷这一行最适合我。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作业，这辈子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也喜欢这样的生活。”

“大久保地区的商店街，老店已经越来越少了，搬走的老居民也有不少，搬来的以外国人为主。已经有了这么多外国人，但在当地日本居民之中，对这样的现状不怎么有好感的人也有。虽然有过种种的不愉快，但彼此之间还有一种关联，这是我们生命的绵延不绝的根源。失去这种连带感，一个社区或城市是不成立的。这家印刷店也一样，我好几次想放弃它，但能够做到今天，是因为我喜欢与人接触。这份工作有时让我沮丧，有时也会给我打打气，我想再努力一阵子。没过几年，这家印刷店就会迎来六十周年，到时候打算和大家再聚一聚、搞一场活动什么的。”

06

新大久保的“新来人”

最后介绍的一对情人是小西先生和田中女士，他们在新大久保算是新来的，2012 年从国立市（东京都）搬进韩国城附近的一所公寓。被问及在这里生活的感受，小西先生跟我说：“也挺好的，目前除了蟑螂和老鼠之外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小餐厅比较多，这也没办法。我个人比较喜欢新大久保的另外一块，就是中东人和其他亚洲人比较多的西边，但在那里没找到合适的租房。其实新大久保的房租不便宜了，一室户月租五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2800 元）以下的已经很少了。”

这对情人从事同一种职业“查水表”，这是在东京所谓“自由人”圈子里很受欢迎的一份工作，“所以竞争率也挺高的”，田中女士说。据她解释，自来水的设备和供水本身由东京都水道局负责，但检查水表这项服务委托给民营公司（注：目前东京有四家公司），查水表的员工一般都是打工族。

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是自由，从早上开始查表，查完这一天负责的地区之后直接回家即可，有了经验查表就会越来越快，在傍晚之前可以下班，而且工资也比其他行业高一些。他们的圈子里有不少话剧演员、搞乐队的年轻人或尚未出名的搞笑艺人，他们的排练或演出时间一般都安排在傍晚以后，白天赚生活费，晚上继续追梦。“其实我也搞些音乐，偶尔在家弹吉他，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抱怨这件事。在东京别的地方就不太可能吧，但在新大久保的邻居不一样，因为外国人多，他们本来就比较吵，所以我这边发出点声音人家也无所谓”，小西先生笑道。

两人曾经居住的国立市位于东京都多摩地区，是首都郊区口碑比较好的地方之一，居民教育水平高、自然环境也很丰富，有不少带小孩的家庭选择这里定居。但小西先生说，这就是他们决定搬走的原因之一。

“这和上次的大地震（2011 年的东日本大地震）有关。你有没有记得，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社会里出现一种逆境中的互助精神。这种心理上的连带感没能持续多久，不到半年之内完全没有了，之后就被‘絆’（kizuna= 纽带）一词吸纳了。其实我很不喜欢‘絆’这个词，到现在人们还动不动强调‘絆’。在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国立那一带也有这种感觉，虽然居住环境很不错，但总让我们不舒坦。那新宿区我比较熟悉，因为父亲是公务员，小时候我们一家住过新宿区的公务员专用住宅。在新宿区为何选中新大久保，首先我就是被街上的风景吸引住了，大家的表情也都很明亮。这我在东京别的地方没看过。”

田中女士是一位从容淡定的女性，她一直在聆听小西先生和我的对话，然后主动开口说道：

“对我来说，住在新大久保等于是让自己从压力之下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我在东京其他地方容易感觉到所谓‘同辈压力’，逼你服从集体或周围的‘氛围’做事。东京有几个地方经常上‘最想居住的地方’排名，比如 JR 中央线上的西荻洼（杉并区），连在那儿我会感到同样的压力，因为从着装也好说话风格也好，街上的人都有一种共同之处，你不符合那种风格的话，就有点不好意思走在那儿。大久保这一带就不一样，穿着睡衣也好，可能穿得更少、更奇怪，人们也不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思想方面也差不多，你和我的想法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大家的接受范围非常之广。反过来说，我认为在这里生活，就需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不管是买东西或跟邻居聊天，要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和立场。”

小西先生一直在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接着说：

“不少媒体报道新大久保的种种，都说这里的风景和外国一样。但你开始住在这里就会发现，其实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还是属于一个被优待的存在。租房也是，记得有一次房东跟我说，他很高兴日本人来租房。外国人经常很多人一起住一个小房间，五六个人住在一起也很常见的，那我们就比较正常一些，才两个人。另外，语言方面也好，生活习惯也好，这里毕竟是日本，日语和日本的方式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哪怕外观比较特殊，这里并不是海外，也可以说我们在这里有点‘挑肥拣瘦’，享受着海外比较好玩的表面因素而已。我经常提醒自己这点，否则会过于依赖这里的环境，无法自拔了。但我还是喜欢新大久保的，因为和人的距离比较近，碰到邻居几句，连这么一点小事，在东京别的地方都很少了。”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 2021 年 12 月 21 日，东京都武藏野市市议会以多数反对票否决了关于当地外国人参与住民投票 [10] 的条例提案。从一个国家的框架来看，日本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保守、谨慎，甚至封闭。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城市可能更需要像新大久保的一个角落，能够吸纳不同人群，将他们融合在一起的同时，以其间的积极改变来破圈，并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新的价值观。同时我们也不必把多元文化过于概念化，更重要的是，就如商店街的店主们所显示的思维方式，继续更新对周围的认识。



从新大久保站到新宿站，曾是色情旅店密集的地方。自主出版物《OKUBO》



关根美子女士人缘很好，“到年末了，从今天开始连续一周都有安排忘年会”。
小西先生和田中女士，中间的青年是他们楼下餐厅的员工。



一百多年前的新大久保周边。（摄于 1913 年，新宿历史博物馆提供）

[1] 以 2021 年 10 月的东京人口（14,028,589 人）和常住外国人人数（528,927 人）来计算。数据来自东京都总务局统计部官网。

[2] 请参考《中国料理店扎堆的日本“西川口”①～④》（《好奇心日报》2019 年 5 月）

[3] “桑”源于日语“さん / san”，是对人的称呼，不管年龄、性别都可以使用，亲切友好、又不失敬意的称呼。

[4] 尾张家（全称为“尾张德川家”）是江户时代的德川御三家之一，除德川将军家外，拥有征夷大将军继承权的三大旁系，另有纪州德川家和水户德川家。

[5] 在江户城（现为皇居）周围有各藩的统治者的居所“上屋敷”，这周围还有一圈“中屋敷”，是各地大名下一代和臣下生活的地方，“下屋敷”在离江户城比较远的几个地方，是大名（各藩的统治者）的别墅。

[6] 2012 年时任总统李明博登上“竹岛（韩国称独岛）”，引发在日本宣扬“仇恨言论”的游行示威活动。

[7] 2019 年的新宿区新生儿数量为 2348。生育率只有 2014 年的数据，新宿区为 0.97，比全国平均（1.42）低许多。（出处：《新宿区 2020 年人口展望》）

[8] 日本的年度从四月开始的，三月相当于日本的年度末。学校也是四月开学，三月相当于“毕业季”。

[9] 和平之船（Peace Boat）：致力于国际交流的日本非政府组织（NGO），也是该团体所主办的环球邮轮旅行项目的名称。1983 年创立之初以环游亚洲航线为主，自 1990 年代起致力于环绕地球航线，至今已有超过八万名乘客登船。

[10] 投票权与选举权不同，其所对应的内容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利，而目前旅居日本的外国人并没有投票权。这次的判例，可谓是对日本宪法关于外国人参政权利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引起了众多媒体关注。

文内图片如无标注，均由作者吉井忍拍摄；题图来自 Dino Sobic on Unsplash

吉井忍（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 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 2016 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场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再给我一些时间

Christopher St. Cavish | 局外人

签证官先生，我请求您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才刚刚开始啊。

我们正在消散。可能在昔日法租界的街道、餐馆里看起来还不是很明显，但上海的外国人社群正在缩水。官方数据显示，2010 年的外籍人士有 20 多万人，2019 年已降到 15 万以下。到了 2020 年，政府甚至没有公布数据，但我们心里有数——来自天南海北、但都选择把中国当家园的我们。这个官方数据是在疫情爆发前统计的，可想而知，数据只会偏高，绝不会偏低。疫情第一年，我在一家英文媒体供职，其网站流量——我们的网民大概率都是外国人——直降一半。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里，我们始终是小众，从没占到过总人数的 1%，但现在的比重甚至越来越低了。我们正在消失。

以前，有些餐厅一眼望去尽是韩国人、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的面孔，如今，为了让中国本地顾客更满意，餐厅都在进行调整。那些曾让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渴望学会普通话的留学生心满意足的中国大学现在都没动静了。听相熟的房产中介说，因为很多中国海外留学生都在新冠疫情期间回了国，市中心的公寓租价被抬高了不少。北京的情况甚至更糟，这十年里，官方公布的外籍人士数量下降了 40%，现在只有不到 65000 人。

而且，我发现越来越频繁地去想：在中国住了快二十年，我是不是也该走了？我曾自不量力地攀比祖辈——作为传教士，他们在北京工作了五十多年，我琢磨着，如果他们能在帝制崩塌、民国混战、义和团起义的乱世中得以幸存，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在外卖和手机购物的宠溺中，我怎么着都能撑下去吧！从我 2005 年第一次踏足上海到今天，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变，我认为，大部分变化都属于进步。生活更舒适了，街道更干净了，服务更好了，火车更快了。我试着不用多愁善感的姿态回首往事，不用怀旧的心态去看待不久以前的时光，而是着眼未来，关注本城大部分人的生活是如何被改善的。政府翻新了附近旧巷弄里的老房子，眼下还在为老龄住户加装电梯，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我也很开心地看到朋友们用手机应用程序就能预约华山医院的专家门诊，还能像叫外卖一样下订单，让他们照着中医处方煎煮中药，并直送到家——仅在几年前，这套流程至少需要几小时。不管在哪个层面，我都看到了进步。

但是，读到的新闻却让我有点怕。我是 SHINE 的订户，这是上海唯一的一份国营英文报纸，登了些给外国人看的新闻摘要，虽是扼要的概述，但也够吓人了。每次看到文化新动向的推送消息时，我都会想一想，这也是进步吗？禁播禁演的明星黑名单，大肆渲染大麻的危害，时尚摄影师的广告人物造型引发网民过激反应……事情虽小，杀伤力却不小。凡事都要上纲上线、被如此苛责吗？难道文化不可以时不时地出自草根吗？十二月的封面标题也挺耐人寻味的：《外籍人士看好在中国大陆的生活》。这让我很想发问：这是和哪些外籍人士相谈的结果？这些没名没姓的拉拉队员都是谁呀？

我关注的多半和文化有关，但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迫使我们离开中国的实际

问题更让人忧虑。我身边有很多同龄人，他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孩子如何就学。他们压根儿没多少选择：要么让孩子读免费的中国学校，可以迅速提高语言能力，但对孩子来说很辛苦；要么就送去西式教学的国际学校，这更符合西方父母的价值观，但是费用很高（国际学校一年的单人学费就可能超过 25 万人民币）。这笔账谁都会算，而且，往往算一算就回老家了，因为他们只要回到祖国，就能享受免费的、或接近于免费的西式教育。

不过，这件事向来如此，最近也照旧如此。国际学校的费用历来居高不下。既然如此，外国人的总数又怎么会减少了呢？新冠疫情“功”不可没。因为中国秉持“清零政策”，死守边境，外来者进不来。被挡在国境线之外的外籍人士中有很多人本来就住在中国，只不过在 2020 新年期间去海外度假，但没能赶在边境线关闭前及时返回，到如今，他们被挡在国境线外已不止十八个月了。很多人已经放弃回中国了，索性就地安顿，要回国老家，要么驻足在其他亚洲国家。（从上海出去的那一波人大概都涌上巴厘岛了。）许多人都很疲惫，因为我们与家人、与祖国的联系实际上已被阻断了两年多，为此殚精竭虑。是的，我们可以买张机票飞出中国，但能不能回来就难说了，就算能，还要先隔离。我们都觉得进退两难。

本来还会有些人入境，取代在上海“老去”（或其子女“长大”）的老一批老人，但边境的局势也把他们屏蔽在外了。大家都在走，但没有人来取代他们。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期间，大家都想回到真正的“家”，回到亲朋好友中间，另一方面，开启旅程、离开祖国、移居中国的人越來越少了。

至于另一部分原因，就要谈到政治了。《南华早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引述了美国商会主席的一番话，他说，美国在近几个月里向中国学生发放了大约 85000 个学生签证。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发放任何有效签证。美国人还要面对冬奥会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说到底，中国为什么需要外国人呢？

为了两个人类的每一次相视一笑，为了在拥挤的地铁里共享的每一分钟，为了工作中每一段无聊的对话，为了在银行排队时苦苦等待的分分秒秒，为了私密空间里的每一个吻，为了和同事共享的每一顿饭，为了握住或牵住的每一只手，为了每一个大喊“老外！”的小屁孩，为了在外滩、在西岸的每一次散步，为了办公室里集体忍受的每一次悲惨遭遇，为了出租车和网约车里的每一次闲聊，为了和理发师的每一次失败的沟通，为了在餐厅里得到的每一次惊喜，为了每一次得到邀请去别人家作客，为了在公众场合落下的每一滴热泪，为了每一次意料之外的医院之行，为了每一次无声胜有声的交流，为了每一次友谊的开始，为了坐火车时挤在陌生人当中，为了每一次好奇心爆发……

为了一切能向你证明‘我是人’的事物——哪怕我说不好你的母语，甚或根本不会发音；哪怕我和你看起来挺像的，甚或从头到脚都不像；哪怕我和你的行为举止无有差别，甚或大相径庭。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缺失信任，觊觎控制，各国最高领导层间争斗不断，分歧巨大，民族主义深化，无知者无端自傲。我们都不喜欢对方的政府，责怪对方的领导人。

但是，老百姓呢？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都是人，有同样的渴望和需求，同样的胜利和失败，同样的脆弱和力量，都被老板们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也都需要被爱。我们长相不同，语言不同，某些在我们来说最寻常不过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很奇怪，反之亦然，对别人来说天经地义的习惯却会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易于把自己不了解的、从未见过的人妖魔化。也很容易把某个国家政府错误地等同于真正的国民。我们很容易依赖刻板印象，越无知越舒坦，愚人傻乐。以偏概全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但是，恰恰是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这类日常互动才重要。这些互动不需要发生在某个“外国专家”及其技术同行之间。陌生人和陌生人的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能闲聊几句甚至更好；友谊就是可喜可贺的大成就。

不管对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这一点都成立。每个外国人，甚至每个来过中国、对中国有所了解的游客，都会在回家后变成非正式外交官。他们会向别人介绍这个国家，描述现代化的城市和高铁、不可思议的食物、干净的街道以及任何令他们难忘的细节，就这样，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普及了活生生的中国形象。“中国不再让人感觉太抽象，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地方，甚或是生活过、爱过的地方。

他们会回答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裹脚女人、猴脑大餐之类的蠢问题，同时还能反击一些源于无知的种族偏见。对全球各地的许多人来说，中国是个挺吓人的地方，但一旦有所了解，他们就不再那样想了。

要是没有外国人，中国就会失去这些日常生活里的外交官，成千上万的外交官，他们把亲身感受传播到世界各地，有助于创建更亲善的中国形象、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形象。

而且，就算在华外籍人士不会像外交官那样一天到晚自豪地为祖国代言，至少也能代言普适的人性。我们会做傻事，在街角被绊倒，在公共场合发火或哭泣，在餐厅里说话太大声，点了太多食物，根本吃不完，笑得不合时宜，在工作中受挫。我们根本不算是特殊，和旁人毫无二致，哪怕我们和旁人交流起来有点磕磕巴巴。我们只是普通人，这，就是我们能带给中国的最重大的信息。

假设你赞同我的说法——再微不足道的日常互动也对了解人性有绝对的助益——那么，进一步推断也说得通了：中西交融的情感关系可谓是终极外交。爱情征服了无知。然而，就连这层关系也面临重重危机，因为官方统计年鉴中所说的“处于涉外婚姻中的公民”的人数正在减少。事实上，这个数字每年都在下降，2001 年有 3438 宗涉外婚姻，2019 年仅有 1246 宗。在这个 Tinder、Bumble 和探探睡手可得的时代，我们只需滑动手指，就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约会，但对我们彼此的爱却越来越少了。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春节意味着阖家团圆，但对我来说，春节意味着签证地狱。2005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在春节期间横穿上海，到浦东的出入境管理局，恳求批准，让我在这个我称为“家”的国家里多住一年。今年的情况有点不一样。管控更严了，除了惯常需要的身份证明之外，我还要带上我的公司签署的每一份合同、今年每一笔银行流水和每一笔税单，还要证明我的公司有实体办公室（还真有！），诸如此类。我在这里的存在被简化为最基本的项目：纳税人。没有人问我有多少中国朋友？我爱过或正在喜爱哪些中国人？遇到盯着我看的小孩子，我会怎么办？或是我为了尽可能了解这个国家，去过多少个省份？没有人知道我的家族曾在北京落地生根，也没有人关心我在上海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涉及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如果有的话，也没有人问我学到了什么。

所以，我的春节长假被豪掷在忧虑中，我担心浦东的官员们觉得我尽责缴纳的税太少，或嫌弃我公司的办公室太小，就轻快地盖下拒签的印章，结束我在这个国家将近二十年的生活。是的，外籍人士确实可以申请绿卡——堪称外籍人士在华生活的圣杯：政府允许你免签五年或十年——但门槛很高，我这样的工薪阶层老外是不可能申请到的。首先，我必须证明自己在过去四年中缴纳了48万元或更多的税，证明我没有换过工作，证明我的驾驶记录是清白的（应该只有一张在浙江的超速罚单），再证明我目前所在的公司支持我申请绿卡。我有一些朋友申请到了，但他们都是有钱的高管。我靠写作为生。除非绿卡申请考试里有关于中国食品秘笈的题目，否则，每到新春佳节我就必定寝食难安，一年比一年焦虑，试图守住我的家。

我琢磨过，我可以和中国公民结婚，但想一想就觉得太功利了（搞不好还是非法的），虽然我是单身，但也不急于投奔第二次婚姻。而且，无论如何，配偶拿的签证是不允许工作的，我也没兴趣当家庭主夫。怎么办……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这个月我在广东待了一星期，生平第一遭，因为我一直忽略了这个省份。结果，我一下子就爱上了顺德的热带风情和沧桑的小巷，爱上了用水牛奶做的双皮奶，还有能容纳500人的大饭店。茂盛的大榕树让我有归家的感觉。一个星期根本不够，我需要几个月。还有潮汕呢？雁江呢？新会的陈皮，台山的牡蛎？我还想去江西附近的山区，广西西部的村庄，那儿的村民烹饪时会用许多草药。我需要的不是几个月，而是好多年。广东才不过是一个省啊！东北也不算真正去过，我没到过中国与俄罗斯的边界，也没见过黑龙江。没有开车穿过内蒙古平原，也没仰望过西藏高原上的寺庙。我至今仍没有机会去金华，参加以杀猪为始的火腿季盛事，也没去过湖南西部，看当地人如何做腊肉。我得去自贡，好好研究一下食不厌精的高级会馆菜和老百姓猛火烈油菜式的区别。我还得再回一次安徽，拜访猪栏酒吧的阿姨们，再看看灰瓦屋顶的徽州建筑。还有，兰州西部的顶乐拉面学校的那些朋友们怎么样了？还有，江西的Ed和Selina在乡下造的英式新豪宅如何了？在上海的珺倩和志伟、Rachel和煜彦、Mia和Jessica、樱和张婧怎么样了？我们家在北京的教堂还开放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福建了解一下客家文化？

不仅仅是我的老朋友们告诉我，一大批老前辈正在纷纷离散——他们一直待在中国，待到实在待不下去才走。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参加商会活动的人数之少刷新了近二十年来的最低值。Florent，这个会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法国白人朋友昨晚飞回了法国，打算待到春天，他在上海的时间和我一样长，明年能不能回中国还不确定。这十六年，我一直很幸运，空降中国的时候刚好国门敞开，给了我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厨师一次良机。我飞来的时候对中国一无所知，经过如许多年，现在知道的反倒显得更少了。我是有福气的，因为我主动选择客居此地，而非因战争或经济所迫而被迫离开祖国的难民，也非移民。中国给了我很多收获，远比我应得的多。但我又贪婪又固执，还没玩够呢。还没到我离开的时候。其他外籍友人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人数可能会继续缩减。但是，签证官先生，我请求您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才刚刚开始啊。



Christopher St. Cav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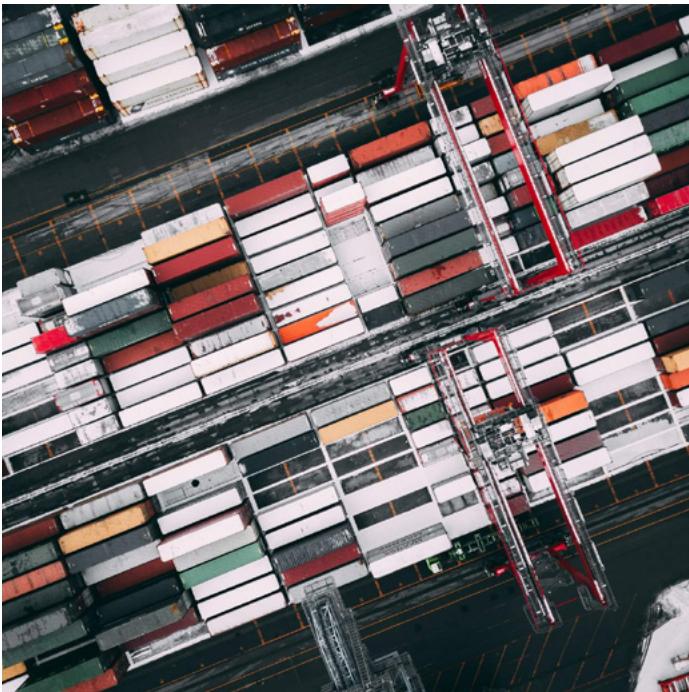
美国作家，2005年移居上海。他写美食，也写作为一名“局外人”的生活。

译者

于是

局外人

Christopher St. Cavish 以前是个厨师，他也是这样开始他在中国的生活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作家、编辑或者随便怎么称呼那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他与他感兴趣的人交谈，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也写下了这个剧变中的国家不少变迁故事——直到他发现自己和中国的更多关联。



图片来自 Erik Odin on Unsplash

档案

加入世贸组织 20 年， 中国做对了什么？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中国的经验并不是发明新的经济学规律，
而是发挥好已有的规律。

2001 年 11 月 10 日，卡塔尔多哈，身穿阿拉伯白袍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敲下木槌，宣告通过中国入世的决定。12 月 11 日，该决议生效，中国正式加入 WTO。

20 年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占比从 5% 上升到 28%，人均 GDP 从突破 1000 美元到超过 1 万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毫无疑问，取得这些经济成就，和中国当初努力与国际接轨，积极加入 WTO 密切相关。

“入世”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中“开放”的代表，而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是中国过去 40 年的重要经验。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WTO 上诉仲裁员杨国华所说：“国内单向的、自主的改革有时确实会遇到来自各方利益集团的阻力，而加入国际体制能够从固化角度倒逼国内改革。加入 WTO 的 20 年来，我国政府贸易规则的透明度和规则遵守意识确实因此得到大幅提升，这对我国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全球化并非单向昂扬的凯歌。自 2016 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世界兴起一股反全球化潮流。尤其 2018 年开启，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更加重人们的担忧。特朗普就曾多次批评 WTO 优待中国，威胁退出。到 2019 年 12 月，因美国拒绝提名新法官，WTO 的上诉机构停摆。2020 年 8 月，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提前离任，雪上加霜。

中国入世的成功和 WTO 当前的危机，背后实质是中美两国国内变化导致的关系变化，从政治、外交到经济、文化领域都有体现。比如最新例子是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加强监管在美上市中国企业。

为了更好理解历史与现实，我访谈了远在纽约的魏尚进教授，和他聊了聊许多重要话题，包括中国入世 20 年到底改变了什么；为什么绝大多数美国工人是从中美贸易中受益；为什么会出现反全球化运动，又怎样消除全球化的悖论；中国如何走向真正的“共同富裕”；中国过去 40 年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不是发明新的经济学规律，而是把已有规律发挥得特别好，等等。

现年 57 岁的魏尚进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外交与公共政策学院终身讲席教授，兼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等职。他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2 年博士毕业后，他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经济学专业正式教师，后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工作过。

他的研究涵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国经济等领域，有关逃税、腐败和投资、贸易自由化、性别失衡与储蓄率等研究具有很大影响力，是国际上高引用率文章最多的华人经济学家，在中国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次）、当代经济学奖等殊荣，著有《经济全球化：金融、贸易与政策改革》，编有《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等。以中国性别失衡的相关研究为例，魏尚进和合作者十多年来阐述了年轻人性别失衡对经济增长、储蓄率、贸易逆差、房价等多个问题可能带来的巨大甚至意想不到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性别失衡意味着一部分适龄男性没办法娶妻。适龄男性们不得不为自己在婚姻市场中争取更大竞争优势，努力增加储蓄。这增加了居民储蓄率，也推高了房价。性别失衡导致的婚配竞争，还驱动更多人冒更大风险成为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驱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减少了人们的幸福感，因为额外的辛苦工作和冒险行为并不能降低人口中非自愿单身的数量。

为了解决中国人口中的性别失衡和老龄化问题，他建议政府做几件事：第一，取消对每个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第二，对生女孩的家庭给予更多的奖励和补贴；第三，从多方面提高和保障女性权利，提高其社会和经济地位。

2021 年 6 月，魏尚进出版了一本中文的经济学普及读物《寻找经济最优解》，探讨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诸多热点问题，其核心是帮助读者学习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只强调效率而忽略社会公平或类似于气候变化的其他社会目标。这是对经济学狭隘的认识。经济学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认识到在资源总量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找最优解，其目标函数可以涵盖社会公平与人类长期生存。”他在书中写道。在《寻找经济最优解》的一场活动上，他和学者香帅（本名唐涯）还讨论了今年热议的中国针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举措、教培行业的“双减”政策等话题。

魏尚进称，“中国的监管体系仍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各国政府出台类似政策时，中国股市的震荡幅度之所以远甚于其他国家，原因在于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既要对垄断等影响整体效率的行为进行纠错，也要能够对监管措施可能出现的偏差进行纠错。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两种纠错机制同时存在。”

“比如，前几年智能手机芯片巨头高通在美国被判违反《反垄断法》，高通对此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最终在 2021 年 3 月美国政府表示放弃对高通反垄断诉讼。这一案例的具体进程暂且不说，但它让我们看到对市场主体的纠错机制和对监管部门的纠错机制要兼而有之，两种纠错机制整合在一起才有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目前国内监管体系还缺少一个纠错机制，就此机制的完善是接下来我们需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比如，政府出台监管措施后，企业不认同政府的相关判断，可以诉诸独立的第三方判定相关措施是否执行过度，从而及时纠偏，这样整个市场经济就能实现更加完善的发展，也可以减少出现股票全面下跌的‘团灭’现象。”

“目前的（‘双减’）政策并不足以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找到造成所谓‘内卷’更本质的原因。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目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但对于人才的判断维度单一，尤其高考在职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所占权重非常高。家长为了让孩子获得一个好的高考成绩，报名课外培训成为一个相对容易的路径。所以我们要实现人才培养的多元化，首先是学生可选择的学校要实现多元化，其次对学生的考核标准要更加多元化。”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访谈节录。

01

中国入世改变了什么

小鸟文学：今年 12 月 11 日是中国入世 20 周年，回看这 20 年，你觉得中国入世改变了什么，还有什么需要改变但没改变的？

魏尚进：中国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重重要，有些比较明显，有些重要性很大，但不一定明显，所以按照我的理解讲五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为了准备入世以及入世后实现入世时的允诺，中国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壁垒。造成企业竞争增加，老百姓的可买的产品种类增加、质量增加、而价格下降了，这些等于提高了实际收入。

第二个变化是入世让中国的企业把更多的产品可以卖到国际市场。如果中国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的话，每个企业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就无法发挥，产品卖不出好价格。但把低劳动力成本生产出的产品拿到世界上、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产品进行交换的话，就能拿到比原先高很多的价格。这是中国家庭实际收入提高的第二个渠道。

第三个变化，中国通过入世，经济更加市场化，很多经济管理规则更加透明。具体来说，在争取入世时，很多跨国公司抱怨中国到处都是暂行规定，还有一些规定不成文。在中国运作的跨国公司或者对中国市场出口的企业，常被告知有些做法不符合规定，但它们说，听都没听过这些规定。所以在中国争取入世过程中，别的国家贸易官员要求，任何影响企业经营的条规、法规都应该有统一的地方大家可以容易看到。如果你要改变规则，最好让公众或者企业参与评论。

这不是我们原来的行政方式，但别人把它作为中国入世的要求，那就做吧。既然要做，不会只针对跨国公司，那就改成让影响所有企业运作的条规都公开透明，这个做法到了现在数字时代就变成法规在网上可以查到。这个做法虽然最初是跨国公司通过本国政府贸易代表对中国入世谈判提的要求，但是最后结果让中国所有企业都受益，其中最大受益者是民营企业。入世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里面 70% 的增长来自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增长后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面临的管理规则更加透明清晰了。

第四个变化，入世要求的所谓降低壁垒，不仅仅针对制造业产品，也包括服务业的开放。以金融服务业为例，从当时仅有国内金融机构变成承诺三年之后开放外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五年后逐步开放商业银行业务等。这些开放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金融改革，使老百姓与国内企业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的种类与质量都有了大幅提高。

第五个变化是中国数字时代的到来入世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而这一点许多人不一定

认识到。中国今天引以为豪的电子商务、数字金融之所以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背景之一是中国加入WTO，奠定了这些行业的发展。因为数字时代成功企业里有很多非国有企业，比如阿里、腾讯，这些企业的重要特色是年轻人有闯劲、有思想、有想法，但缺乏创业需要的大量资金。他们去银行借钱，银行不会借，因为他们没有可抵押资产。

为什么这些企业最后能诞生并成长呢？重要原因是在加入WTO时，金融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要求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比如美国就叫中国全方位开放金融服务业。中国对国内的商业银行是否能适应与国际大银行的竞争比较担心，要求把过渡的时间表拉得长一点，能晚开点就晚开点，能少开点就少开点。

但是，当美国与别的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私募和风险投资行业，中国一下就答应了。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没有私募和风险投资公司。答应的后果之一就是一大堆数字经济公司的人可以通过国际私募和风险投资基金得到融资，从而发展起来。今天，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疫情来了以后，数字经济是支撑老百姓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中国经济今天的很多成就都可以和20年前加入WTO挂起钩来。改革和开放成就了中国经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好几倍增长。中国经济接下来还有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空间和必要，国内的讲法是供给侧改革，其中包括服务业开放。把这些事情做好，可以为中国接下来保持中高速的发展继续提供支持。

02

75%的美国工人从中美贸易中受益

小鸟文学：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是2018年以来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引发了许多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退潮的担忧。其中，中国制造对美国白人蓝领的冲击是讨论焦点，许多人都认为这能解释特朗普2016年的上台。但是，你的研究表明，其实中美贸易使得75%的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长。能不能再讲讲该如何理解这种认识偏差？

魏尚进：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容易被人关注到，有些是间接的，或许不太受到关注，但间接影响可以很重要。具体而言，直接影响是说，比如美国企业从中国每多进口一吨钢材，美国钢厂可能就要少生产一吨钢材，所以从中国进口的东西越多，与中国企业相竞争的美国企业生产就要萎缩。它们订单少了，就会少雇工人，或者已经雇的工人工资也涨不快。这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讲法，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特别制造业，造成很大负面冲击，这个被称为“China Shock”（中国冲击）。

但这样的分析其实很不完整，因为它忽略了今天中美贸易里的两大块。一个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不是放在货架上卖的商品，而是零部件，所谓中间产品，比如手机、电脑、电器等产品的许多零部件都从中国来。美国企业通过进口中国性价比比较好的零部件，由此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全球竞争力，从而雇更多美国工人，给他们涨工资。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利润也会上去，供应链也赚钱。这个间接效应对美国的就业与收入都是正的贡献。

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方面，中美贸易里，美国对中国有很多出口美元反应在贸易数字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虽然没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量那么大，但增加值很快。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在过去20多年要快于美国对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增长率。美国的出口显然对美国企业和工人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中国还有不在商品贸易里统计的服务行业出口，而且美国在服务行业的出口总是大于美国在服务行业的进口，比如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用到的投行、律师、咨询、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里有许多美国企业。这些出口机会给美国带来了高收入的就业。

美国和中国做的生意里还有很多不以贸易形式反映出来，比如今天很多美国汽车公司卖给中国居民和企业的汽车数量要大于它卖给美国居民和企业的汽车数量。但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在中国设厂、制造、售卖，所以大量销售并不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有人会说，也有中国企业在美设厂，然后直接卖给美国居民与企业。这话没错，但在美国的中国企业数量要远远少于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数量，所以这方面也对美国有利。

这几个方面，前一个是产业链，通过进口中国零部件，让美国下游企业提高效率，增加效益；后一个是出口，加上通过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做强做大生意。这些增加美国收入的渠道对美国多半民众比较间接，尤其是产业链，作用很大，但老百姓不一定能感觉到，政客一般也不会去宣传，媒体也不一定报道。

我猜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一个美国企业要解雇工人时，老板往往会对工人说，对不起，解雇你是因为我们国家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太多东西，冲击太大。反过来，当这些企业由于进口中国性价比比较好的零部件，扩张规模，新雇佣工人时，老板往往不会说让我们一起感谢中国，而会说我们公司的成功是我有本事，才会增加雇佣工人。

这样的不对称性造成多半老百姓的对中美经济关系对美国影响的理解比较片面，然后媒体上的讲法也有偏差，当经济不好时，它会想到进口和本国经济不好的联系，但在哪些行业发展比较好时，往往不做反过来与国际贸易联系。这种不对称认知造成很多老百姓在感觉上说，和中国做生意，很亏，收入受负面影响，而不是从事实上看，收入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影响。

03

反全球化运动出现的三大根源

小鸟文学：如果说中国入世是深度加入全球化，但在2001年前后，从1999年的美国西雅图到2001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也有许多反全球化的抗议行动。你怎么看待他们的做法？甚至有人认为，现在可能是一个新的反全球化时代。你有什么感受？感

觉很多讨论都和不平等相关。

魏尚进：反全球化的现象很普及，我们可以不断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有三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国家和别的国家有经济交往，有人吃亏，有人受益，但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受益的。不过，受益的人不一定知道他受益与全球化有关，但吃亏的人往往知道他吃亏与进口可以挂起钩来。他知道钢厂解雇工人是因为我们国家进口钢材太多。另一方面，媒体不断在渲染后一种联系，强化了这样的印象，美国很多行业衰退是因为进口太多，所以这个认知的不对称性也是全球化抗议活动很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大原因，全球化可以把一个国家的饼做得更大，但并不能自动保证每一个人拿到的份额一定变大，有些人群可以从全球化中受损。所以这里有利益分配是否平均的问题。一般来说，企业老板很喜欢国际化，尤其那些属于本国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老板，能从企业扩张里受益，而且不光是我可以在世界更大市场上卖产品，而且可以通过在国外设厂这件事情作为威胁，跟国内工人说，我不能给你加太多工资，你如果工资要求太高，我就把工厂搬到国外。这样，很多工人更加觉得全球化是便宜了老板，对自己没有好处。

这背后反映的情况是很多国家即使由于全球化把饼做大，很多人也从全球化中受益，但是不少人从全球化中吃亏，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解决弱势群体饼变小的问题，他们就会反对全球化。如果我能够通过选择一个反全球化政客的途径，那我就选他，比如特朗普。如果我没办法通过选政客的途径，那我就上街游行，让政府政策做不下去。第三大原因，全球化那些比较强烈的反对声音或者抗议行动，往往反映所在国教育制度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全球化过程中往往是教育水平比较高、技能通用性比较好的人群会受益。因为全球化往往造成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有些行业萎缩，有些行业扩张，扩张的行业工资涨得很快，萎缩的行业当然工资在降。一般来说，教育水平比较高或技能通用性比较好的人，换工作相对容易，而那些教育水平与技能比较落后的人群，往往比较难适应经济结构变化，所以反全球化也意味着教育制度不太成功，没让更多人掌握比较好的技能。

对政客来说，我要改革教育，不光要投资，而且要跟老百姓说，你不能适应新的工作机会，是因为你没有足够刻苦地学习，这比较难，选民不太愿意听。所以能赢得选民支持的政客会讲，我们国家全球化做过了或者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什么不公平做法，这样选民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势力也会强化反全球化声音，造成很多国家有反全球化的抗议行动。

04

消除全球化悖论需要解决分配问题

小鸟文学：关于反全球化，我想起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他在书中阐述了一个“三元悖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民主三者不能同时成立，最多取其二。也就是说，选择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则国家主权受抑；选择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则民主受抑；选择国家主权和民主，则全球化受抑。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在中国也很有影响，不知道你怎么看？

魏尚进：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所以Rodrik是我的同事。他很有独立思想，有一定概率得经济学诺奖。他提出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以及民主选择往往不能同时兼得，注意到这些不同维度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引人深思。

但是，这个讲法我觉得不太全面，这跟我们前面讲的反全球化分析可以挂起钩来。换言之，多半国家反全球化声音很强的重要原因是这个社会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让饼做大以后，很多人受益，但几乎没人吃亏。

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有很多因素，比如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如果由于全球化饼做大，直接受益的人不愿意把自己变大份额里切出一块分给受损的人。他觉得他做大是自己本事，是靠自己的辛劳和创造力。那受损的人就会觉得只有强烈反对开放贸易和资本账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反全球化声音后面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于利益分配的谈判失败。

“三元悖论”是说在现有情况下，分配机制不太有效，也就不能几者兼得。反过来，如果这个社会能够找到办法有效解决分配问题，“三元悖论”就不会像Rodrik想象那么紧张。比如很多国家曾经成功解决分配机制问题，像中国加入WTO，降低关税壁垒，引发经济结构变化，速度和规模超过大多数国家迎合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以前中国有很多行业，尤其制造业里效率比较低的国有企业，入世之后，它们就萎缩了，工人也没了工作。但是20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出现失业猛升的现象。重要的原因是在大的经济结构变化之际，中国相对于许多其他国家而言，比较好地注意到了再分配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印度上个月刚刚取消的一个农业改革。印度农业有很多低效率的做法，比如全国统购统销粮食。这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粮食统购统销有什么区别？中国以前的统购统销是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农民产品，所谓剪刀差，补偿工业。印度倒过来，统购统销是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为什么？因为印度农村选民多，为了讨好选民，所以农产品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但是，不管低于还是高于市场价格，都会造成资源分配扭曲，效率变低。

而且，国家统购统销，愿意出高价买某些农产品，造成一些低效率的农民积极性过高，产量太多；反过来，国家没有统购统销政策的产品，即使城里老百姓需要，农民可能也不去生产。所以莫迪政府从上台时就说，我要做改革，其中一项改革要取消国家在农村的统购统销，让城里超市等民营机构直接向农民买。他跟农民说，城里人愿意买什么，你就生产什么。他愿意出什么价格，你就跟他讨论，市场决定这个价格。结果，印度农民反对。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政府一旦撤掉统购统销，许多农产品价格会跌，所以不愿意。农民就把拖拉机开到首都，牛赶到首都，把路挡下来，游行持续一年。即使来了新冠疫情，农民仍在首都扎营，即使死了很多，继续留在里面。直到上个月，总理终于宣布撤掉改革，理由是太多农民反对。

这不是一个全球化的例子，但它是经济改革利益分配的例子。这个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取消非市场化行为，把饼做得更大，但在饼做大过程中，农民觉得吃亏，所以反对。类似的改革，中国这方面做得就很有创造性，叫双轨制。怎么做呢？取消非市场统购统销是我的目标，但达到这个目标，有一个过渡阶段，做双轨制。

如果中国派个顾问去印度，可能会这样设计，比如接下来5年，我答应你的统购统销继续做，农民不用担心吃亏。但是，我承诺收购的量，限制在2019年的水平。不多买也不少买。接下来你要生产什么，你去跟城里超市商量。他们要以什么价格买，你跟他们商量。这样，没有农民吃亏，因为国家保证原来价格，而且农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国家收购种类有限，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做更多东西。

中国做好的改革往往是同时既把效率提高，同时又把利益受损者数量降到最低。这种改革方式是中国过去40年的重要经验，值得很多国家思考借鉴。

05

中国加入CPTPP类似“第二次入世”

小鸟文学：在《寻找经济最优解》中，杨国华将中国试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称为“第二次入世”。2021年9月，中国已正式提出申请。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其影响？与此相关，11年前你编了一本《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相比过去，你现在怎么看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

魏尚进：把加入CPTPP比作第二次入世，我觉得有道理。显然，加入CPTPP和加入WTO不完全一样，但为了加入CPTPP，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降低产品上的关税，不仅仅是需要降低进口壁垒，更加重要的是在有些规则上做改革。这些改革要求短期看很痛苦，比如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行为CPTPP会有很多规定，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

我前面说，中国对企业管理的规则，因为加入WTO变得更加透明，最后受益者主要是跨国公司，而是国内企业，所以加入CPTPP可能不会有类似情况，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或许会带来更多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CPTPP可能类似于第二次入世。

相对于11年前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经济体量、贸易量、投资量变大，更加具体来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十几年前，中国正向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迈进，越来越多领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由于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劳工成本上升很快。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比大多数国家劳工成本都低，包括比大多数非洲国家、南亚国家的劳工成本都低。今天反过来，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劳工成本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带来比较优势变化，从而带来经济结构变化。第二，进出口平衡情况也发生很大变化。十几年前，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在过去几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不断缩小，进出口变得更加平衡。现在强调所谓双循环，也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变化，造成后果之一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上升，国内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在上升。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角色和11年前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过去40年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改革对中国很重要，开放对中国很重要，接下来，改革和开放也很重要。但是，具体的改革和开放的内容会随着比较优势、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经济发展是动态的，所以不断在经济发展中寻找还有什么资源配置不太有效率的地方，可以通过改革把它解决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在不同阶段、行业也不一样，需要不断探索。监管不到位或监管越位，都对经济不利。

06

如何走向真正的“共同富裕”

小鸟文学：刚才聊到中国劳工成本上升的问题，其实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和阶层跃迁困难越来越成为热议话题。像去年两会提及的我国约有6亿人口月均收入1000元，今年政府着重强调“共同富裕”。在《寻找经济最优解》中，你和李实、甘犁、陈志武都讨论了相关问题，比如甘犁称政府要改良二次分配政策，更多补贴低收入人群等；陈志武认为守住消费差距是关键。我比较好奇，你怎么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和阶层跃迁困难之类的问题？

魏尚进：在经济增长中出现不同群体收入或财富增长速度不一样，经常发生。不仅在中国，大多数国家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你要强制各个群体收入一样速度增长，反而可能对总体经济增长不好，比如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是各个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平均，大家都是低增长。显然，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要比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强大很多，所以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中出现收入和财富的不同增长，问题是说你做什么样的调节，使得财富不均不会无限扩张，同时又不对经济增长造成太大负面影响。

这告诉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一个是说刚才说的，怎么再分配，使得饼做大以后，让绝大多数群体都能受益。另外一块，要强调对低收入群体的技能培训，怎么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享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水平，尤其他们子女的教育与技能培养。比如中国的边远地区教育资源比较差，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尤其薄弱，这方面需要加强。

第三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再就业要求，社会怎么提供更好的再就业帮助，减少结构转型中的转型成本。

如果你把这三方面——再分配，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对再就业人群的帮助——做好，原则上只要你增长比较好，就可以把良好的增长转化成社会上绝大多数群体都受益。

小鸟文学：关于教育，我挺有感触，记得你在书中也提到，根据教育部2019年的数据，

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逾5万亿元，占GDP的4.04%。在世界有可比数据的190个国家和地区中，4.04%这个数字居110位。而且，虽然中国的教育投入逐年增长，尤其学前教育增幅最大，但资金的落地和成效还不尽如人意。

其实不只是教育，再就业、再分配这些都属于民生支出。但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来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方面的政府平均支出占到GDP的24%，而中国只有13%。所以不少经济学家都建议中国政府要加大民生支出，这又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尤其过往发展模式带来的债务问题相关。

对中国经济来说，因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非常严重。今年，恒大的危机引发很多人对房企的担忧，觉得不是个例。后面，中国政府宣布将实行房地产税试点，房子在今年又成为关注焦点，想问你有什么观察和想法吗？

魏尚进：我觉得房地产税对中国有三个重要性，一个是房地产税收上来以后，应该可以优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使得它们不依赖卖地作为收入重要来源。

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财富分配的问题，其实房地产税也是调节家庭财富分配的工具。因为房地产中的财富是中国很多家庭财富中的大头，尤其一家有房子，另一家没房子，两者之间的财富水平可以随着房价变化拉得越来越远。

第三点，房地产税如果设计得好，实行得好，能够降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投机需求和投机性价格上涨，也会为接下来年轻人买房子创造更有利条件。年轻人觉得买房子有希望，一定会带来社会长期稳定。

从这几个角度来说，房地产税很重要，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房地产税，所以从概念上说，这不是新税种，从实践上说，中国也不需要发明太多东西，征收房地产税是比较成熟的做法。之所以中国这个讨论得比较晚，是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早期发展时主要借用香港模式。

香港政府收入里卖地是重要一块，由于卖地卖得收入好，不需要通过房地产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且香港对财富分配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早期发展借用香港模式，好处是当时有现成模式可以用，但今天发现香港模式对接下来的发展不太适用，需要调整。

房地产税对别的国家来说是比较成熟的工具，有非常多经验可以借鉴。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怎么从香港模式转化到其他国家模式，这里面有转化成本。很多人说，我在买房子时，你没告诉我有房地产税，怎么忽然要征房地产税？有房子的人都会反对，所以目前就出现在什么情况下房地产税可以减免的各种各样的讨论。

但是，这些转型成本早晚得绕过去。刚刚通过的法律是让地方继续做试点，虽然重庆和上海已经试点一段时间，新的法律要更多地方试点。更多地方试点实际上就是希望各地使用创造力解决问题。实行房地产税的最终目标很明确，而且对社会来说很重要，但怎么做能够尽量减少那些认为自己会在房地产税改革里吃亏人群的利益（受损），希望地方政府能做些创造性实验，但我想必要性很明确，早晚需要做下来。有些地方政府会说免掉第一套房的税，其实执行成本很高，而且执行成本高的做法往往会引起一些新的不公平现象，因为你要去审核什么人什么房子符合或者不符合免税要求，里面会出现很多寻租可能，反而比较麻烦，所以最后我猜测比较可行、有效率的做法是，如果要减免，减免规则一定要简单透明，不太容易被操纵。你也可以考虑短期之内对哪些家庭，比如因为征收房地产税对他们财富或者收入有很大冲击，可能需要做一些过渡性补偿。但是，从方向上来说，中国肯定早晚会实行房地产税，而且最后实行，一定是普及性实行，不能有太多各种各样复杂规则所规定的减免办法。

07

中国经验是发挥好已有经济学规律

小鸟文学：今年“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很火，扎克伯格把Facebook更名为Meta，预计元宇宙将在未来十年触及10亿人。不知道你怎么看这股热潮？

魏尚进：我理解很肤浅。从小的意义上讲，元宇宙显然提供了一些新的娱乐可能性。一些公司就从这个角度去开发元宇宙概念，做好的话就像20年前的腾讯。不过，元宇宙还有一些别的用途，或许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更大。比如在设计新的汽车、飞机过程中，在元宇宙里面设计可以把整个过程看得更清楚，能相对低成本看到问题，不需要试一试生产线。也有人提到，元宇宙可以提供一些新的办公安排，在办公场景里面的应用或许也可以提高效率。

很多讲法处于半猜测阶段，最后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但至少从概念上说，有这样的可能。元宇宙最后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会不会大到像二三十年前的互联网出现？很难说，至少现在还看不到。但是，任何一个创新总是会给社会和经济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既然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以比较开放的态度来看它的发展。

中国现在没有太多企业直接大张旗鼓说在做元宇宙，但从技术上说，中国这方面并不落后，所有公司都在起跑线，而中国的数字经济中又有很多企业做得很大很强，所以原则上说这方面中国不该落后，或者不该比美国这些企业差太远。我们也很憧憬中国的数字经济里的一些巨头思考相关问题，探索相关应用。当然，世界各国现在都属于憧憬阶段。

小鸟文学：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或东亚的经济发展，很多人称之为“奇迹”，并概括为“中国模式”或“东亚模式”。你认为存在吗？像今年畅销的经济学著作《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就提到一种讲法将其概括为重投资，重积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魏尚进：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过去40年间比较少见。这是事实。怎么达到？重视投资、重视积累不会是我的概括，我会概括说，中国的经验并不是中国发明新的经济学规律，而是中国把经济学里面一些重要规律发挥得特别好。

我理解中国经验里面至少有三大点很重要。第一点，哪个企业哪个个人能够为社会

创造价值，该个人该企业就应该得到回报，而且回报的大小基本上要和该个人或该企业对社会贡献的价值成正比。这是过去 40 年中国经验印证的重要规律。改革前和改革后这方面很不一样，改革前，能够创造价值的个人不一定得到回报；改革后，重要一点就是两者挂钩。

第二个，拥抱比较优势。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闭关自守，不遵循比较优势，人多，大家都穷。广东一个低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和浙江另外一个低工资的工人相互竞争，大家的东西都卖不出好价格。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什么？中国广东与浙江把利用比较廉价的劳工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美国人、欧洲人，他们愿意付很高的价格，远远高于湖南人、贵州人等。拥抱比较优势带来了收入的快速增长。

反过来，中国闭关自守时，不仅仅是低工资工人生产出的东西只能卖给其他低工资的人，而且我要强迫自己做没有本事做的东西，生产很多化学产品、机器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我们没什么比较优势生产，成本很高，结果发现如果我只做我有比较优势的东西，然后用我的收入从美国、欧洲、日本买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样的东西，他们卖给我们便宜很多。

这两件事情做好，而且把规模做大，中国人均收入就上去了。中国人均收入之所以能每 7 年翻 1 倍，和中国及时拥抱比较优势不可分割。

第三个，在做改革时，注意前面讲的利益分配与共享问题。双轨制等做法体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思想。尽管具体做法，中国有继续改善空间，但和许多国家相比，做得相对较好。中国 40 年来经济结构发生无数变化，也接受过许多负面冲击，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失业率也没到百分之十几。这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对冲负面冲击的做法，有很多改革具体设计，使得在把饼做大同时尽量缩小利益受损者数量，或者出现利益受损者，也尽早给他们提供适当补偿。

中国为什么过去 40 年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有很大变化，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后这三点做得比较好。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这三点也很明显。比如东亚其他出现所谓经济奇迹的国家，往往也是这三点做得比较好。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太好，像刚才讲的印度就是第三点没做很好，但印度现在在拥抱比较优势上正在做很多改革。反过来，接下来中国能不能保持相对中高速增长，部分取决于能否继续把这三点做好，具体做法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原则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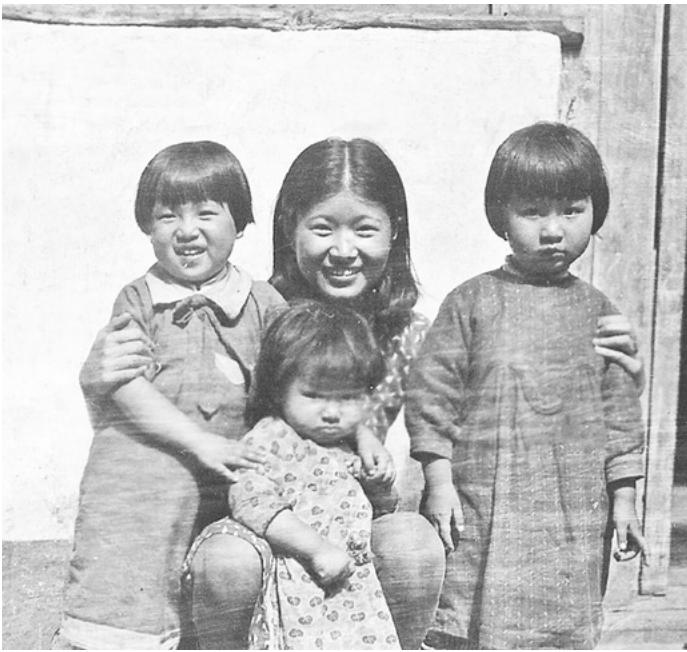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回娘家的母亲和她的妹妹，七姨、八姨、表妹。题图及插图由本文作者惠允。



1945年，六姨、七姨、八姨，外婆家紫藤花架下。

古今中外亦然。

八姨和哥哥同岁，是孩子头，每周都发明不同的游戏。四姨家住在前院，小我两岁的明莉表妹是我最亲密的玩伴。明莉上小学一年级作文《我的家庭》写：“我家有六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弟弟、表姐和我。”传为佳话。

外婆家饭菜清淡可口、别具一格，豆腐每餐必不可少。苏家的典型菜式我沿用至今。晚上，一群小孩都盼望迟归的二舅。他一定提着一包宵夜，不是回饼，就是萨琪马或重油蛋糕。我九岁那年已是回外婆家的尾声。有一回吃过一轮点心，明明看见还剩下一半，大人催我们去睡了，二舅悄悄问我：“你几岁？”“九岁。”“九岁以下的去睡觉！”二舅高声宣布。噢，我爱二舅。

大舅在军中任职，驻东北。三舅中学毕业后考取云南省公费留美生，1945年便远离家乡。外公的书桌一扇半圆推盖永远关着，我常常好奇地想推开看看。外公时时抿着嘴笑，可是有无上的威严，小孩可不敢乱动他的东西。书桌盖顶上一边摆着大舅、公公、二表姨在南京时的合照。二表姨原是复旦的校花，因为在省政府任过科长，附带有过的军衔，1950年代恰恰够判刑送去劳改。另一张照片上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三舅，灿烂的笑容照亮了外公的书房。三个舅舅那时都英俊得像电影明星，姨妈们个个端庄秀丽。母亲教我唱一首歌，一唱便记熟。对我，这首歌永远牵连着对塘子巷外婆家的回忆：“我的家庭真可爱，清洁、美丽、又安康；兄弟姐妹多和睦，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玫瑰常飘香，家啊，家啊，可爱的家……”伴着音乐的是每次我们去按外婆家门口的门铃，应门的惊叫“二姐回来了”，接着一片叽叽喳喳，俏丽的姨姨一个个赶过来，衣裙窸窣。1948年，大舅、舅妈从东北回乡，为这和谐、温馨、欢愉的大家庭生活带来闭幕前的高潮。大舅此时已脱下军装，却未脱年轻军官的潇洒和气派。大舅妈是日本人，身材高挑，说话轻言细语。她笑起来撮着口，不似我们昆明女子张口大笑。长女慧中还在襁褓中，粉红的小圆脸藏在粉红的绒帽里，立即成为所有人的掌上明珠。大舅年少离家，乡音已改，说纯正的国语，加上他们三人的穿着举止，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令我们小孩感到好奇又敬畏。

日本媳妇从昆明婆婆和妯娌们那里学会许多新鲜手艺，包粽子、做香肠、醃咸菜。大舅妈至今还对当年与昆明家人相聚的一件件小事、几十位亲戚的音容笑貌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一幕幕亲情故事曾在她脑中一遍遍重温。那时的中国烽火四起，大舅一家即将弃国远走他乡。对可爱的家庭的赞颂“冬天温暖夏天凉”，也适用于政治气候。大舅走后，外公外婆不放心舅妈携婴儿出远门，让十五岁却十分聪明能干的七姨相伴，那时谁也料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1997年，几乎半个世纪后，舅妈、慧中、七姨结伴重返昆明。外公外婆早已安息，故园也找不到一丝痕迹。

一年一度，裁缝师傅请到家中，在厅堂外走廊上搭起椅子，替各人缝制一套新衣。每个姨姨都是清一色昆明大道生纱厂“荫当士林布”浅蓝旗袍，外公外婆则灰色长衫。裁缝师傅成了苏家的老相识，外婆任他的助手，一边与他闲话家常。

在物尽其用的社会观念下，妇女贡献最大。从中药店“抓”来的药由薄纸包着，红白两间细细的棉线捆住。所有包装物品均不可丢弃。我能派上用的工作便是把棉线死结打开，婆婆将线一圈圈绕好，收在抽屉里待用；包药的纸也要抖干净药屑，平平整整折起来。从淘米水到粪便、垃圾，没有一样是废物。

住在邻村的两兄弟，大张和小张，天天来外婆家收米缸水去喂猪，去厕所倒粪、倒垃圾，担回去做肥料。小张十分勤快，从不坐下歇会儿，打个招呼就走了。大张则总要到厨房来找人聊天，抽竹水烟筒。他胡子拉碴，眼睛随时笑得眯成一条缝。只要大人不撵我，我就坐在小凳上听他摆龙门阵。记得有一次他数落外婆：“老太太，洗完碗，瓷碗不能摆在土碗上，要不然往后你家姑娘找错婆家呢。”外婆不信他的一套，不晓得后来是否后悔过。现在我还记着大张的教诲，碗柜里不同花色的碗一定要分别摆放。妈妈说小张不止勤快，又省吃俭用，攒钱买了地，后来被划为富农分子，地被没收了，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大张当他的贫农，倒分了块好田，还在农会里当了个什么。到外婆家坐人力车（昆明人称黄包车），妈妈一路自言自语，我只听得出来她的“……八妹……爹说……”。后来我当了少年先锋队员，戴着红领巾，耻于压迫人力车夫，任凭妈妈怎么劝也不肯坐车。妈妈带着弟弟在车上，我在侧边小跑，一路跟到外婆家。生活中从此掺上政治，外婆家的欢聚也快散场了。外公自杀的早上，二舅慌慌张张来到我家，对妈妈说：“爸不在了。”“不在了？到哪里去了？快去找呀！”“爸过世了。”妈妈像条棍子似的应声倒下去。

外公找不回来了，童年最欢乐的时光和那个时代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档案

外婆家 | 长辈的故事②

熊景明 | 先睹为快

“自己长其志”也不尽然，
我仅有的一点好德性都来自父母，尤其是母亲。

外婆家

每个星期天跟妈妈回外婆家，是童年生活中头等大事。整个星期都盼望周末到来，好去外婆家的大花园中玩耍，去吃好东西，去被外公外婆和众多的姨姨宠爱。七姨八姨正是妙龄少女，五姨六姨已到被人追求的年纪。母亲是众姐妹尊重喜爱的二姐，二姐的孩子也是大家爱屋及乌的对象。我不会走路时，大家争相来抱，我专拣七姨。七姨后来到美国去了，母亲想念七妹时，总学我幼时口吻说：“我要七姨这么抱，我要七姨那么抱。”印象中外婆家的花园太极了，前后三层。现在回想那个温暖大家庭，芳草碧树，恍如隔世。在童年欢乐与亲情之爱的点染下，好像在外婆家度过的周末都是阳光普照。门口的紫藤花一串串挂在花架上，沿墙根的美人蕉四季开花，果实内白的小粒是我们玩煮饭必不可少的鸡蛋。昆明称美人蕉为凤尾花。“娘娘跟着皇帝走，你说是朵什么花？”“我说是朵凤尾花。”酸木瓜花和石榴花虽然红得似火，却不及金凤花一样可以用来染指甲。爬在庭院墙头上的素馨四季飘香，优雅柔和的香味正衬合苏家的姐妹。摆在沿小路石礅上的瓷花盆里，高贵昂首的兰花是外公的宠物，不可随便去碰。沿后墙一排枣树满身荆棘，据说可防止盗贼翻墙。梨树、柿花、银杏被剪得齐齐整整的白腊条枝神秘地围住。缅桂（香港人称白兰花）开花的季节，外婆衣服的斜大襟扣子上总挂着两朵。一棵老观音柳的树桠是我在花园中的“雅座”，坐上去两只手扶住分杈的树干，身子尽量靠后，两只脚在空中乱荡，嘴里哼着自己编的歌，看白云在树顶上飘过，用它变化的形状去编织我的幻想。

外公在日本时感染了许多新潮思想，不过那时文化人类学还没有面世，他不知道尊重本土文化才是时尚中的时尚，只一味嫌外婆迷信。家里不许供拜，七月半接祖的鬼节更不能容忍。外婆带着我们一群孩子搞“地下活动”，派外公最宠的明伟表弟去缠住他。众人先去洗澡间举行仪式，举着接祖的道具在花园绕一周。参加这类秘密活动的阴谋感最令我们过瘾。外公唯一庆祝的是每年二月廿二的花节。用红纸做成一个个小灯笼，带领我们去到花园中，给一棵棵花、一株株树挂上。

花园里的腊梅不如红梅、白梅般娇艳，但它黄色的小花气味芬芳隽久。蜂蜜水泡腊梅花是外婆常年的润肤露。梳洗罢，抹在手上面上，再用刷子沾一点“刨花水”，把头发弄得服服帖帖。不知道刨花是什么树的木屑片，一股清香味。我喜欢看外婆梳头，却怕看她裹脚，只有一次好奇心战胜了畏惧，看着她把长长裹脚布一层层拉开现出小脚。除大脚趾外，四个脚趾一排地被压倒贴在脚底板上，畸形得怕人。外婆与她的同辈不兴化妆，却很重视额头要光洁，不生汗毛，把专司“扯头”的女人请到家中。这位“美容师”自己颜面光滑，一并做活招牌。她两只手拉住一条线两端会旋转的木梭子，转动细线，在额部上下来回，嗡嗡作响，把在规划线以下的头发、汗毛拔个精光。我被好奇心驱使，冒险伸手拉扯一下，大叫饶命。妇女为美而忍痛，

碰到引我入胜的书，我常拿给母亲看。她读罢《居里夫人传》，最津津乐道的是居里夫人曾跳了一整夜舞，磨穿一双鞋底，以此教训我不可只劳而无娱。另一个母亲喜欢引用的例子，是不愿片刻休息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友人评论他道：此人似乎知道他的有生之年将何其短暂，是故一分一秒都不愿虚度。母亲警告我说：“看你一双手抓十条鳝鱼，一分钟也不歇，我怕你也是在赶命。”

母亲的话其实包括着许多朴素的真理，但我听不进去，只相信学校里教的、书本上说的，从小母亲就笑我“将老师的话当圣旨”。我念中学、大学的时代，认为虚度光阴相当于犯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云南大学坐落在翠湖公园边，上大学的五年中，只有一次三八妇女节和同学一道去公园玩过。放寒暑假，第一天的重要任务便是定一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虽然做不到，但从不敢“放纵”自己去消闲。其实那时乱七八糟看了许多书，不求了解，如鲁迅形容的，让各国马队在头脑中踏上一遍，得益甚少，唯一的收获大概是训练出一点自制与自律。

母亲失去健康，体会到人生没有什么比此更可贵。她最不喜欢我晚间准备考试不按时睡觉。“一百分有什么用？”“考第一名为什么？”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母亲极少板起面孔斥责我，我不依规劝时，她也只是叹气。我有个同学代济敏，是温良恭俭让的化身。我们曾一道在乡下同住半年，例如我说：“代济敏，我们去厕所好吗？”（厕所在村子另一头）“好的。”“还是不去了罢？”“好的。”“我又想去了。”“好的。”我回来告诉妈妈，不如我们学代济敏一般彼此千依百顺。晚间我看书过了钟点，妈妈说：“妹妹，关灯睡觉！”

“好的，妈妈，我再看一下可不可以？”

“好的。你看一会就睡吧！”

“好的。我还要再看一阵。”

结果还是学不成，两人大笑一通。母亲在和我摆家常、聊闲话时，常把她为人处世的信条挂在嘴边，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吃得亏，在一堆”，“一句好话暖三冬”，“与人为善”。当然影响她的子女的不止于她说什么，而是她一生实践了这些信念。母亲认为讲谎话是小孩子最大的罪过。我今生记得被罚过一次就因讲谎话，遭母亲重重的训斥，被关到后花园中。那时约四五岁，我坐在草地上哭闹、哭够，走到住在后门的表姨婆家。老人家拿出零食来招待这个小可怜，并牵我回家向母亲赔罪。讲一点于他人无害的假话是不是优点，我不敢说，但确实因为开不了口编谎话，后来带给我许多麻烦。到上大学以及工作、参加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听旁人不费吹灰之力编大话，我自惭无能，如坐针毡。来到香港这个无须用谎言护身之地，对我是巨大的解放。

并非从未讲过谎话，有两次经验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干爹黄湛有个弟弟，我们叫八叔，一表人才，倾倒众小姐，我的表姨是其中之一。我也喜欢八叔，当然没有性别的含义，主要因为听见他对妈妈说：“嫂嫂，小孩子喜欢吃什么，就表示他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太美了！虽然妈妈没听进去，我倒爱上这条理论，信奉至今，自己的孩子也沾光不少。八叔说他未来媳妇的标准便是我母亲。为了实践理想，他开始去追求六姨。表姨和我们同院住，每星期我从外婆家回来，她就叫我去到她房中，先酬劳一点好吃的，接着就问我有没有听见八叔对六姨说什么。小孩子哪里听得到别人的情话？但一周复一周，次次被她款待而无所回报，无功受禄的愧怍令我难以忍受，于是对她说：“我听见八叔说要买一支领针送六姨，问她喜欢什么样的。”永远不要派小孩去打探有关你意中人的情报，连最诚实的小孩也不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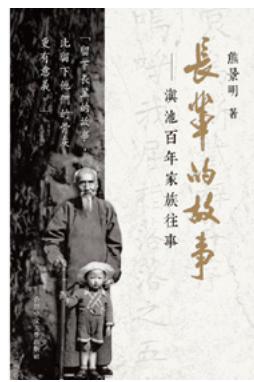
另一次难忘的经历，我连当时的场景、教室的桌椅、老师的表情都不会忘记。那年我有八岁，虚岁已九岁。老师要我报岁数时弄不清虚实，就报了九岁，被选为班上十个红领巾之一。参加了庄严的入队仪式，才知道实岁九岁才够资格，这一个无心之过很令我担心。不久少先队开会，要轮流讲自己戴上红领巾有什么进步。别人讲什么我一概听不见，只忙于脑中上下求索，去求证红领巾除了让我觉得比没有入队的人光荣外还有什么？轮到我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让我编造说：“妈妈叫我洗碗，我不肯洗，低下头看见红领巾，觉得自己是少先队员，应帮妈妈做事，我就去洗碗了。”教育令儿童失去真诚的，这仅是一例。

母亲和我其实有许多性格迥异之处，有时代的分别，也有女儿对母亲性格的异化。母亲是纤纤作细步的斯文女子，我是大跑大跳的野丫头。有一次我翻出妈妈的一件旗袍穿上，非常合身。高兴地跑到她房间让她看看，急匆匆跨出几步便听到“嚓”一声，旗袍衩口被我的大动作撕开。我们曾住在宿舍的三楼，沿长长的外走廊上住有十家人，妈妈说我上楼她一定听得出来，因为我从来是跑上来而不是走上来。此刻想起来，也想到终日躺在床上的妈妈，静听着户外动静，盼望儿女归来。

妈妈太多忧虑与牵挂，不时悔不当初这般那般，事事必求做到最好。大概为了安慰她，“不怕”两字变成我的口头禅。尤其文革当中，听见我自己一天不知说多少遍“不怕”，连我也好笑。人的性格几乎是不能开导的。托尔斯泰说“疾病和后悔是人生的两大痛苦”，母亲受够痛苦的一生，随时提醒我要避开两个讨命鬼。母亲和我最相似的是我们固执于自己的行为准则，不愿违心去屈从，但又不与人怒目相对，尽量维持和谐。父亲说：“你和你妈一样，不肯做的事就‘软顶着’。”

母亲常说“父母养其身，自己长其志”，她很清楚所处的时代给女人带来的局限，生了大哥后就一直说要生个女儿“扳扳本”，意思是争口气。我生下来，脸上一大块胎记，又憨傻十足，母亲的愿望传为笑谈。大人笑我傻时就说：“你妈说要生女儿替她扳本呢！”稍后长大，也算渐渐不太难看了，逢人曲意讨欢心说她的女儿好看，母亲就添一句：“她皮肤一点不好。”我有时插嘴道：“‘父母长其身’，不关我的事。”但还是觉得很尴尬。日前翻大学时的日记，不止一处说要努力，要为母亲争气。好生奇怪，原来求学时代上进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当时受的英雄教育，而是我母亲。

“自己长其志”也不尽然，我仅有的一点好德性都来自父母，尤其是母亲。



本文摘自
《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熊景明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熊景明

1943年出生于昆明，1979年移民香港。
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

先睹为快

这里是尚未上市的新书。我们选摘部分章节，但一本书是不可割裂的领土，希望这些章节能引领你们读完全书。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康熙帝一生的七个阶段

史景迁 | 发现经典

学习历史，就当景仰司马迁，以之为楷模。

12月26日，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去世，享年85岁。他1936年出生于英国，1965—2008年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著作包括《康熙》《王氏之死》《天安门》《追寻现代中国》等。“史景迁”这个名字来自他在耶鲁读书期间，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所取，意为：学习历史，就当景仰司马迁，以之为楷模。

史景迁中文作品丛书主编郑培凯、鄢秀，称他妙笔生花，最大贡献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历史有了“感觉”。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选了《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中《康熙帝一生的七个阶段》一文刊发，以此纪念。

康无为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清中期的君主政体观》（Some Mid-Ch'ing Views of the Monarchy）的文章，其中称，他已经超越了“简单陈腐的一维观念”和“复杂老套的二维观念”，进而获得了能够揭示乾隆皇帝这个“复杂人物的不同侧面”的三维观念。这个“三维”的提法立即促使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门外汉都试图再加上第四重维度：比前三个空间维度更具历史性的时间维度。

我们既然已经学会了识别老套、扭曲的形象，就可以回到历史当中，去研究年谱。年谱中的皇帝有血有肉，和他们的臣民一样，是被时代所束缚的凡夫俗子，他们的身体和思想都有局限性。他们必须要运用手中的工具和通过想象力制造出来的工具，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展示他们的雄才大略。考察皇帝一生有个简单方法，便是采用莎士比亚的人生七段论。莎翁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痛苦却又才华横溢地将人生浓缩为七个阶段，这比起历史学家的狭隘分期来说，更适用于全人类。1654年出生的康熙，在六十八岁去世之前统治中国长达六十一年之久，完整地经历了人生的这七个阶段。他，既是一位皇帝，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第一阶段，“最初是婴孩，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这个婴孩，顺治帝的三皇子玄烨，在法理上来说是纯正的满族后嗣，但从血统上来说就不那么纯粹了。他的母亲来自佟氏家族，佟氏一族在归顺努尔哈赤成为旗人之前，长期居住于辽东，是明朝的官宦世家。仔细考察佟氏家族会发现，这个年轻的满族皇子身上流淌着不少汉族的血液。他啼哭，至少在小时候他是会啼哭的，在他年仅两岁的时候，父亲迷恋上了一个妃子，便将小皇子玄烨送到宫外去抚养；他也会呕吐，因为他得过天花，还在脸上留下了疤痕，所以会比一般的婴孩更容易呕吐。但幸运的是，他的天花最终康复了，这还帮他夺得了皇帝的宝座，因为他对这个可怕的疾病有了免疫能力。他的保姆当中至少有一位因为抚养他而得到了奖赏：这位年轻的宫女姓孙，之后嫁给了正白旗的包衣曹玺。后来康熙帝惦记她的恩情，提拔她丈夫做了工部尚书，并赐予她“一品夫人”封号，她的长子曹寅也成为官至省级的皇帝宠臣。

第二阶段是“背着书包、满脸红光的学童，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拖着脚步，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但康熙当然没有什么可呜咽的。根据中国官方史料记载，康熙四岁起就喜欢读书，并乐此不疲；五岁以父为志，七岁为民祈福。后来，康熙曾告诉大学士高士奇，他四岁便能识字读书。然而，这并非康熙的鼎盛时期。首先，尽管康熙精通满语，汉语口语也不错，但在写汉字——特别是在写汉字的偏旁部首时，还是会犯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说明他接受的汉语教育并不完善。其次，在成年男性的世界中，那时的康熙毕竟还是个孩子。

1661年顺治突然去世，康熙帝即位，这个七岁的小孩自然是没有实权的。四位满族摄政大臣统治着国家，其中最具权势的是鳌拜。这四位摄政大臣拟定了顺治“遗诏”，在遗诏中，已故的顺治帝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深感自责。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犯下的错误竟如同“末代昏君”一般——迷恋宠妃、奢侈淫逸、用人不当（未能重用满人）、宦官滥权，等等。我们很难相信康熙竟不去怨恨这份遗诏给先皇留下的羞辱。他也未能长期得到母后的庇佑：康熙的母亲作为皇太后，本来是极具影响力的，但她在1663年，即康熙年仅九岁的那一年，也去世了。

康熙至少对第三阶段应该是颇为满意的。这一阶段“然后是情人，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这景象着实就是一幅中国画啊！康熙在比莎翁诗篇中所说的还早的年龄便享受了爱情的果实。他十一岁就迎娶了孝诚仁皇后，之后记载的时间可能有误。但在十五岁之前，他与荣妃马佳氏生的儿子，也就是康熙的长子确实是出生了。从此之后，有太多的史料说明这位年轻的皇帝卓尔不群。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正式选秀召进宫的后宫嫔妃中，侍女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就在不太正式的场合生下了皇子，也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对于当时宫内的人来说，小皇子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对于下一代中国史官来说，雍正的出生毫无疑问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吉兆。

这里采用莎士比亚的人生七段论就会模糊不清了。毕竟，一个中国的皇帝并非凡人，康熙年纪轻轻便开始对国家大事发号施令了。1690年代，康熙御驾亲征平定噶尔丹；而在此之前，他便以军人的姿态出现过，“然后是一个军人，满口发着古怪的誓，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爱惜着名誉，动不动就要打架，在炮口上寻求着泡沫一样的荣誉”。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当时康熙是掌控大炮的人，但他的胡须也从来没有“长得像豹子一样”。在康熙初长成人的时期，对他歌功颂德的文字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不过，康熙帝从孩提时代开始就继承了满族的传统，是一个骑射好手。1669年他击败鳌拜，其速度之快，显示了他有胆有识。也正是在这一年，康熙王朝才真正开始。1673年，在大臣明珠、莫洛、米思翰的支持下，康熙帝又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平三藩，剥夺南方吴三桂等藩王的权力。经过八年的内战，大清帝国取得了胜利，平定了三藩之乱。经历多年的危险之后，康熙政权最终得以巩固。到1683年康熙帝三十岁之时，可以说实现了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吴三桂及其他藩王已被铲除，余孽也溃不成军；康熙还从郑成功后人的手里收复了台湾。似乎是为了宣示他本人君临天下，1683年康熙第一次西巡，次年第一次南巡至南京。不过在当时，康熙王朝还只是满人的康熙王朝，在巡游的过程中，康熙只住在城市中八旗军驻守的要塞，他的主要辅政大臣也都是满人。汉人学士，如高士奇，只是慢慢才得到了他的信任。这一时期还不是改革内政的时期，康熙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于巩固北部和西部的边界。在他执政的前半段时间里，一直到四十岁初期，康熙都是一个“武帝”的形象，镇压国内的暴乱和开拓疆域。

但是，“武”只是“文”的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士”的形象逐渐让位于“民政长官”的形象，战争一结束，康熙便要开始整修内政。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非条件反射；这是政治现实，而非假象。这便是莎翁所说的第五个时期，法官的时期：“胖胖圆圆的肚子塞满了阉鸡，凛然的眼光，整洁的胡须，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此时的康熙帝，既有从生命中汲取的慈悲为怀，也有从经验中获得的冷峻严酷。在他统治的1695年到1715年间，这两个方面在康熙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慈悲为怀的一面。这一时期，康熙与耶稣会士相处得非常融洽。康熙之所以颁布允许基督教活动的圣旨，一方面是因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另一方面是因为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高烧。即便是在中文的材料中也有记载，说康熙在巡游途中停下来与传教士们交谈，还邀请他们去行宫做客。康熙多次悠然南巡——1699年到1707年就四下江南——在一些盐商为他专门修建的行宫中大摆筵席、品茗观戏。这一时期，康熙也多次下令大赦和减赋，1711年之后开始执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惠及后代。同时，康熙还下令进行大规模的文献编纂和重新绘制地图的工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热河的夏日行宫避暑山庄开始修建。康熙还大力提拔杰出和廉洁的官员，委以重任（当然，有时也会有差错）。对于情节较轻的腐败，康熙并不会过分追究：据一份官方的密报记载，某总督和其他官吏一年从盐税中非法贪污的银两高达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得知后，以“数目不大，如若追究，必使其他总督寒心”为由，没有严查此事。这一时期，康熙还特别注重协调汉人和满人的关系，保持满人集团和汉人集团的平衡，有时还会亲自出面阻止满人官员对汉人官员的排挤。

虽说康熙有着慈悲心肠，但对此也不能赘述，毕竟他作为帝王也有冷峻严酷的一面。有充足的证据显示，1690年代以后，康熙帝就致力于集中王权，避免大权旁落。皇家家奴（包衣）——这些先代汉族仆人的后代——都官居财政要职，如长期任职的两淮巡盐御史、粤海关监督、内地关卡监督、铜矿采购员、贡粮监督员等，他们的工作由皇上亲自督查。最初被任命为南京织造和苏州织造的包衣，从1690年代开始，便奉旨向皇帝秘报当地官员的行为和当地的财政情况，以便皇帝对日常官员行为进行多重监督。由此建立起的密折体系，甚至绕开了内阁大学士，从而成为康熙的私人情报处。这些奏折都被密封送到皇帝手上，由皇帝亲自打开，之后再通过专人秘密送回上奏者手中。

康熙帝也相当乐意在公开和私人的场合表现出愤怒：例如，他曾当众指责张鹏翮治水不力，罚他在百官面前下跪；教廷使节铎罗（Maillard de Tournon）也见识到了康熙的龙威，对于教会统治中国天主教徒之精神的要求，康熙出语轻蔑，毫不让步。康熙还曾多次褒扬明太祖这位明朝初期实行集权的皇帝。

但是，衰老最终还是到了。这一阶段并没有起伏跌宕的大事，不像乾隆时期有大臣

和珅——这位奸臣在二十六岁便平步青云，最终达到权力和财富的顶峰。康熙的衰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慢慢失去了曾经的英明果断，手中的缰绳也慢慢地松了。可以预见到的是，衰老会由身体显现出来。康熙晚年的肖像画也无奈地印证了莎翁的话：“第六个时期便成了精瘦的趿着拖鞋的龙钟老叟，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他那年轻时候节省下来的长袜子套在他皱瘪的小腿上显得宽大异常；他那朗朗的男子口音又变成了孩子似的尖声，像是吹着风笛和哨子。”康熙的身体不如他的孙子乾隆健壮，他在幼年和青年时期都曾身患重病，也许正是苦难的人生让他早衰。据 1715 年的一份诏书记录，他的右手已经不能用了，因此所有密诏都是他用左手写的。那么康熙是否得过轻微的中风呢？1717 年，一位退休的知府得知他身体状况堪忧，便到避暑山庄中进贡一些特制的药材，但康熙并不愿意尝试。1718 年 12 月，康熙告诉李煦，他从夏天开始便身感不适：1721 年康熙又写信给年羹尧，说他身体有所恢复，但仍然非常虚弱。这段时间，密折从未被批阅，因为皇帝不会让其他人批阅密折，而他的身体又太虚弱而无法亲自批阅。这一时期朝政松懈，地方财政亏空，这些即使上报给康熙，康熙也已经无力处理了。他也无法阻止关于皇位继承人的争执，尽管他不停地警告，但是最有可能继位的皇子之间仍然形成了各个派系。毫无疑问，皇位继承人引发的争吵给康熙的晚年带来了真正的痛苦，他还被迫废黜了他深爱的二阿哥胤礽的太子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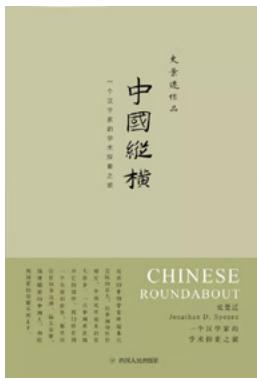
幸运的是，康熙的第七个阶段很短。摄政王可以辅佐年幼的新皇，却不能代表年老的帝王，“终结着这段古怪多事的历史的最后一场，是基督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在 1722 年末，雍正帝最终脱颖而出，逐渐接近父皇为他预留的皇位。篡改后的历史记载中充斥着他那长长的施政建议，也没有任何争执皇位的迹象。雍正的继位仍然充满了疑点，似乎他并不是康熙选定的继位者，但他也不可能有谋害康熙的行为。雍正是一个小心谨慎且很有耐心的人，在康熙病重之时，他在隆科多的帮助下，仔细为今后的继位打下了基石。当康熙在北京寒冷的冬季驾崩之时，雍正果断行动，最终登上了皇位。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康熙呢？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什么样的皇帝才是伟大的皇帝？他是统治着一个强盛的国家还是创造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同样，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强盛？评价一个人创造了一个强盛的国家是否有意义？对我来说，一个国家的强盛蕴含着活力、力量和灵活性。具有这些优良品质的君王可以取得惊人的成果，但他的国家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历史偏爱康熙。他所统治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李自成、张献忠军队的烧杀抢掠和满族入关后的征伐——谁又能忘记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当中记载的大屠杀？——这些屠戮劫掠所带来的恐惧震吓了民众，也荒废了土地。在百废待兴中，康熙顺时而动，节流开源，休养生息，恢复朝政使得经济富裕、社会安定。由此，中国可以消化掉迁界禁海所带来的破坏，也可以平定削藩所带来的南方八年的叛乱。康熙时期，政府征税不难，即使是平定噶尔丹那样的大战役，花销也不会给国库造成太大的压力。当然，康熙王朝也并非十全十美，没有必要粉饰太平。当时，很多省份都长期遭受饥荒，如 1708 年江苏的大饥荒，大江大河沿岸洪水肆虐、某些省份的科举考试腐败丛生。但是，国家粮仓充裕，饥荒能得到救济；河流整治工程颇有成效；舞弊行为能够得到惩治，考生的抱怨也得以上传，从而树立起了诚信考试的风气。这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很多杰出的作品都富含反叛精神——只需想一想画僧八大山人和画家石涛，或者是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但是他们的创作都是不受干扰的。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词人纳兰性德和画家王原祁，以及官营织造出品的丝绸和官窑烧制的瓷器。可以说，康熙年间思想活跃、艺术精良，危机之后的社会进入了人人可见的稳步恢复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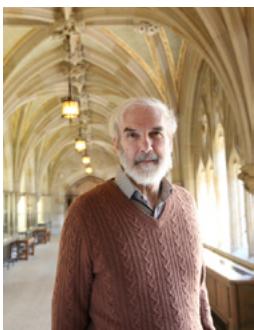
我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是个强盛的国家。康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可能会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统治中国长达六十一年之久——但这与康熙成为一代明君并无关联，而是因为他将自身的伟大之处融入了统治之中。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君王，就不会如此果断地对付鳌拜、吴三桂和噶尔丹。康熙懂得自身实力，甘冒风险，每次都取得了胜利。除了勇敢果断、执行力强之外，康熙也是一个颇具个人魅力的人，这一点从耶稣会士的历史记载中可以清晰有力地得到证实，中国的文献也让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康熙并不是一个矫揉造作的人，他富有幽默感和好奇心，喜爱新鲜事物。他宽厚仁慈，不拘小节，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皇帝所应承担的角色——这让他不得不表现出不苟言笑、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当然，他也遗传了父皇顺治帝的一些暴躁脾气，但却没有记载表明他也和顺治帝一样时常孩子气地大发雷霆。他可以很严厉，也时常嘲讽他人，但他并没有皇子雍正的辛辣狠毒。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的人格赋予了他统治下的中国。

这时的中国是个统一、富裕、强大的大国，在领土边界上极富进取性，内政外交极具灵活性，部分要归功于康熙帝的人格和能力。康熙时代的中国令人景仰，有助于矫正我们在研究中国 19 世纪到 1949 年前得出的印象。这才应当是研究当代中国的起点。



本文摘自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美]史景迁
钟倩译
理想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史景迁

1936 年出生于英国，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1965—2008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著作极丰，主要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改变中国》《曹寅与康熙》《康熙》《天安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Marjan Blan on Unsplash

诗歌

大地的馈赠， 或诗歌的纠正 | 臧棣的植物诗学

臧棣 西渡 | 只有诗

这是植物与人的“美妙的相看”

臧棣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作《诗歌植物学》。这是一本规模宏大的诗集，是诗人关于植物的诗歌全集，收入诗作 291 首，时间跨度长达 35 年，涉及植物的数目与诗篇数目大致相当。书腰上说诗集“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全部的植物，是诗歌史上罕见的集中书写植物的诗集”。前半句语涉夸张，后半句却是实情。即使在农耕时代，中外诗史上似乎也找不到规模相当的同类个人诗集，毕竟郭沫若当年搞诗歌大跃进，也才写了“百花齐放”。与传统的植物诗相比，本书在主题、方法、风格、语言上都有引人注目的创新，可以说发明了一种具有鲜明的臧棣特色的植物诗学。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诗的发明上看，这本诗集都堪称当代的植物诗经，不但在臧棣个人创作史上，而且在当代诗史上具有标程式的意义。

中国传统诗歌中有咏物诗一类，作为与农耕关系最密切的植物在其中占有主要的席位。在这个传统中，咏物诗的功能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物在其中虽然是直接的对象，但却是功能化的，是主观情志的客观化道具，可以说并无自己的主体性。实际上，中国诗中最为迷人的物 / 我关系，并不体现在咏物诗中，而在更大的山水、田园诗传统中。处理物 / 我关系，尊重物性，平等待物，一直是国诗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咏物诗看起来反而像这个传统的堕落。西方咏物传统中出场的主要是动物，植物出场的机会极少。拉封丹《寓言诗》244 篇，植物作为正面出场的机会仅两回。和那些动物角色一样，这两次出场的橡树和芦苇、橡实和南瓜也仅仅作为寓意的载体而存在，其地位比起中国传统咏物诗更等而下之。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咏物诗传统中，物大都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到里尔克手上，西方的咏物传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到罗丹的感召，里尔克试图以语言呈现“纯粹的物”，赋予物的存在以独立的意义。他的工作方式类似画家或雕刻家，把物当作他的模特儿，“用语言再塑大理石雕像”。[1] 但植物在里尔克“咏物”时期的《新诗集》《新诗续集》中出场的机会也不多。在这些诗中，里尔克试图赋予物某种主体性，极力把诗人的主观情感排除在诗的表现之外，以压制诗人的主体性来换取物的主体性。但正是这种压制把我们再次带进了物 / 我的紧张对立，在这种对立中，那个自我压抑的观察者仍然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物。可以说，物的主体性在里尔克的咏物诗中并没有建立起来，“自我和对象的同一化”的目标也没有实现，“纯粹的物”仍然盈满审视者、观察者的主观意志和心情，只是其主体姿态更加隐晦罢了。

臧棣在他的植物诗中，并没有刻意去建立植物的主体性，但他笔下的植物却自然地拥有一种主体性。在臧棣的这些植物诗中，物和人始终处于一种活跃的对话关系中，

并由此否定了传统诗中那种单方面的人对于物的对象性关系：“你走向它们， / 但它们并不是一个对象”（《岳桦树丛书》）“开始时，它是我们的对象， / 告别时，我们是它的对象。”（《蓝花楹简史》）。在臧棣早期的诗中，例如《房屋与梅树》《玉兰树》，仍然残留着里尔克式的物 / 我模式，但在后来的诗中，这种紧张的模式消除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从容、活泼、互动而富于变化的物我关系。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新型的人 / 物关系称为“互为主体性”。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红醋栗入门》中，诗人说：“生活的秘诀原本就是 / 在平凡的场合去接触，物在风物中。”“风物”的特征就是关系。在“风物”中，物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终处于物与物、物与人的互动中。所以，臧棣并未追求表现“纯粹的物”，而他笔下的物却自有一种迷人的主体性。这种关系的出现与诗人的天性有关，也与中国诗传统中的“物权”有关。在中国诗歌的天人关系中，对自然物权的尊重是一个值得珍视的传统，臧棣的这些植物诗表明，他仍然是这个传统的一员。诗集中有仿王维、杜牧、白居易、苏东坡诸作。从主题和风格看，这些诗与上述古典诗人并无直接的联系，也许，诗人不过借此表明他对这个传统的归属之感。

“你中有我”这个短语曾多次出现在臧棣的植物诗中：“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你中有我 / 可不必依赖玫瑰红和海棠绿的对比”（《满天星简史》）；“你不得不将你中有我 / 更彻底地暴露在宇宙的、非正式的入口处。”（黑松简史）；“自然，离你中有我更近。”（《香樟树下》）。另一个相近的说法是“花中有人，人中有花”。在《梅花节指南》中，诗人写道：“花中有人，人中有花， / 一个怒放就能把你结合到 / 意志的姿态中”。这足以说明，诗人对“互为主体性”的发明非常自觉，而且视之为植物自身意志的体现。这是植物与人的“美妙的相看”（《蓝玫瑰》）。在这样的相看中，人与物彼此充满倾慕、怜惜的情意（顺便说一句，诗集中的《椿树之死》《铁线莲协会》是我读到过的为植物所写的最深情的悼诗），互相以对方为主体，或者说互相帮助对方建立对方的主体，而人性和植物性的边界都得到了拓展：“匆匆的一瞥，它的模样 / 也会让你从你的身体里拎出 / 另一个你”（《雷公山归来，或秃杉简史》）；“每一次弯下身， / 都意味着你在它的高度上 / 重新看清了我是谁”（《人在科尔沁草原，或胡枝子入门》）。这种彼此成全、互相发明有力地反驳了存在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它刚刚诅咒过 / 一种浅薄：他人即地狱”（《巴西风铃木丛书》）。在《蜜蜂花简史》中，诗人引用了兰波的说法：我是一个他者。他写道：“想猜中谁是受益人的话，只需大声重复 / 兰波的叫喊：我是一个他者”。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我敏感于天鹅，就好像 / 人不是我的标签”（《鹅耳枥丛书》）。从植物和人的关系中，人终将领悟到他是他者的受益人，而且他自己的主体性同样依赖于和他者的关系，因此向他者开放意味着向更广的存在解放自己。下列诗句把这种开放的奇迹表现得尤为动人：“在万物的静默中 / 我听见了，你是我的回声”（《蚕豆入门》）；“你在这些美丽的小乔木的呼吸里 / 用永恒的轮回插过一次队”（《山茱萸协会》）；“你比我们更接近纯粹的人： / 假如我没判断错，你身上有树的味道”（《银杏入门》）；“而它的芳香又是我的年龄的弹簧： / 轻轻一按，我的飞翔 / 就会在它的枝条间找回全部的翅膀”（《橄榄树协会》）；“如果时间的神经也会 / 在命运的诡异中动摇过，而你 / 的确曾在岁月的漫长中 / 抽出过五分钟，用于阅读 / 金光菊的头状花序写给 / 蝴蝶的密信，你怎么会怀疑 / 我不可能是你”（《黑眼菊，或雌雄同体协会》）；“如果你还是无法确定这是不是 / 一首合格的赞美诗，那么刚从树枝上 / 跳下来的，我又是谁呢？”（《银杏的左边简史》）。在永恒的尺度上，蚕豆可能是人的回声，人可能是山茱萸的前身，人身上有树的味道，树身上有人的翅膀，因而，“和花草保持多大的距离 / 最能反映一个人是否可信”（《棣棠丛书》）。甚至，生活的意义也需要由植物来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当他需要从存在的晦暗中 / 夺回某种无形的归属权， / 它就会贡献一个新的基础。”（《蓝花楹简史》）这些诗句展示了一种万物同源、万物一体的朴素信仰所具有的魅力。它可能不是一种可以应用的知识，却是一种启迪生命的灵智。在这样的灵智面前，“我不可能是你”这种貌似真理受到质疑，与这种伴随的则是生命的解放和拓殖。在《天物之歌，或红梨简史》中，诗人提出了一个别具深意的问题：“你的命运 / 难道仅限于你是一个人？”在《尖山桃花观止》中，这个问题以一种遗憾的形式出现：“阅历再丰富，我们所能经历的 / 也只是一个半生。”诗人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能把植物的生命也纳入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半的人生，以至于“我们看待它们的眼光是否狭隘”（《梭鱼草简史》）会影响到梦的出口。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在《兰花简史》中。在这首诗标为“仿苏东坡”的诗中，诗人提出了生活和人生的区别。人生是人的生活，而生活包括了人以外的生活，其外延和内涵都大于人生。这种看法回应了海子关于宇宙生活的说法。海子说：“真正的艺术家在‘人类生活’之外展示了另一种‘宇宙的生活’（生存）人类生活不是‘生存’的全部。‘生存’还包括与人类生活相平行、相契合、相暗合、相暗示的别的生灵别的灵性的生活——甚至没有灵性但是物理有实体有法律的生活。所以说，生存是全部的生活：现实的生活和秘密的生活（如死者、灵魂、景色、大自然实体、风、元素、植物、动物、皿器）。这种‘秘密的生活’是诗歌和诗学的主要暗道和隐晦的烛光。”[2]

臧棣这本《诗歌植物学》可以说集中展示了这种长期为现代人所忽略的“秘密的生活”。“互为主体性”展示了人 / 物关系中最为迷人的一面。在传统人 / 物关系中，物始终是被动的一方，但在臧棣的笔下，植物很多时候反而是主动的一方：“从现实中发出 / 一个小小的邀请：伞状花序， / 涉及情感的秘密”（《比水仙更对象入门》）；“它邀请你 / 最好用自己的方法，再次确认 / 大地的精华无不来自根部”（《小葡萄简史》）；“它也仍渴望邀请你继续修剪 / 我们对世界的短暂的好感”（《水竹芋入门》）。有时，这些美丽的植物就是为你而来的：“与其说它是为你而生的， / 不如说是为你而来的： / 为报答你，在这晦暗的尘世中 / 并未错过它奇异的卑微”（《金莲花简史》）；“淡淡的幽香却犹如经久的 / 潮汐朝你持续涌来， / 就好像它们只能以你为 / 最后的海岸”（《香料简史》）。大多数时候，双方处于“美妙的相看”中：“当我们忙于以世界为对象时， / 它却一味以我们为对象”（《菠萝蜜协会》）；“你朝它走去，它也会朝你走来”（《羊蹄甲简史》）；“此时，你不是从外面凑近它 / 而是它，正在你的身体里凑近你”（《木瓜灯协会》）。当彼此进入的美妙时刻发生在人和植物之间，它的

抖动应和着你的心动：“每一次，走近的脚步 / 都会让它的卵状叶抖动如小鳟鱼；/ ……你的心 / 能将秋天的颜色浸润到何种程度，/ 它就能将同样的热忱 / 分毫不差地反映在醒目的乔木树叶上”（《丝棉木简史》）。这种美妙关系有时体现为陪伴：“它们的友谊很少受到天气的影响；/ 它们的陪伴，像一件不容易看出来的家具”（《蔷薇简史》）；“它的被动中 / 其实埋伏着更深邃的陪伴”（《竹芋简史》）；“作为一种陪伴，它站在像你这样的人 / 已没机会错过你的前世一边”（《山丹丹入门》）。有时体现为守护：“它宁愿变成安静的小矮人，/ 将自己缩小在大花盆里 / 守护着你的生活中不时 / 冒出的热带潜意识”（《巴西木简史》）；“你从未想过守护神的角色 / 这么容易就降落在 / 一个现实中，且和你关系密切”（《绿萝简史》）；“每一种照料，/ 不光是冲着花草去的，/ 也涉及亲爱的神性。/ 而它的观赏性只会源于 / 你身上必须有可供它 / 攀援的支撑点；只需综合 / 一种人的目光，它就会引你 / 走进宇宙的另一个缩影”（《文竹》）；“给它浇水的同时，你本人 / 也正被看不见的水浇着”（《巴西木简史》）。这里的守护是相互的，既有人对植物的守护，也有植物对人的守护，所以诗人提醒我们“谁是谁的守护神 / 你千万不能打错主意”。有时，它是一种无言的托付：“它们把它们的新鲜托付给你”（《紫肉丛书》）；“镜子的深处，我看上去 / 应该更像一个神秘的受托人”（《白鹤芋简史》）；“它把它的生与死分别交到你手上”（《蛇瓜协会》）。这种大胆的托付基于一种神秘的信任：“我羡慕你 / 不必用狐疑的眼光去打量 / 我们的生命之花就赢得 / 神秘的信任”（《琼花的逻辑入门》）；“信任是神秘的，/ ……最深的信任必须来自 / 最陌生的你曾独自在荒野中 / 停留过四十八小时”（《蜜蜂花简史》）。信任也召唤人的责任：“汹涌的花瓣将我的敏感变成了一种责任”（《樱花丛书》）；“它们的新鲜紧迫如一种责任”（《紫肉丛书》）；“它甚至赌你知道它的成活率 / 意味着你的责任最终会升华 / 我们的好奇心”（《扦插入门》）。而我们必须随时反躬自问，我们是否对得住植物的这份信任：“那深刻的 / 责任是否经得起身体的依偎？”（《常春藤简史》）人和植物关联的最高形式是一种美妙的伴侣关系：“不同于朋友，它近于一个美妙的伴侣”（《蛇瓜协会》），而且这种关系将会生产美好的子嗣：“它们碧绿的质量摸上去 / 就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菠菜》）；“更何况记忆之花 / 完成受精后，你身上 / 像是挂满了无形的籽粒”（《记忆之花简史》）。人和植物的“互为主体性”最终定格于“人之树”的形象中。“人之树”的说法出自澳大利亚小说家帕特里克·怀特 1955 年出版的同名小说《The Tree of Man》。小说的主人公斯坦是一位新土地上的拓荒者，他在一片蛮荒的土地上靠双手创建了家园，同时经历了内心的艰难成长。从怀特用单数 Man 命名小说来看，“人之树”主要指向主人公的内在成长，而不是人类的世代。在怀特的小说中，自然不仅作为背景和征服的对象出现，也不仅是人的隐喻，而且是更高生活（宇宙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怀特自己说，“我想要在小说中暗示我相信超越人类事实的存在”。[3] 主公临死前指着一口唾沫对福音传教士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就是上帝。同时，他对自己说：“我借用这片树叶”“我相信小路上的裂缝”。他在最后的日子找到了他心中的“一”：“一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一股巨大的、理解了万物的柔情，从他的胸中升起”。[4] 斯坦临死所悟到的“一”某种程度上就是臧棣诗中的“互为主体性”。换句话说，作为小说象征的“人之树”，在臧棣的笔下转化成了诗的现实。在小说的结尾，斯坦的孙子渴望写出的那首生命之诗，也在臧棣的“诗歌植物学”中完成了。在《琼花的逻辑入门》中，诗人写道：“我走过的路即我扎下的根；/ 但我并不确定，我的成长 / 将会如何重叠于人之树。”“路”和“根”的出人意料的比喻，填补了“人之树”这个象征形象中空缺的一环，完善了这一象征的基础。在《郁闭度简史》中，诗人写道：“人之树作为一个远景，/ 可瞭望的对象，曾耸立在 / 人性的复杂中。这首诗的题记引用了穆齐尔的话‘发明那个内在的人’。显然，此诗的主题是人的成长。在诗人看来，人（之树）的成长离不开真正的树木的矫正。他说：“你无法否认我们曾去那里——/ 一个比最奇怪的梦还幽深的地方；/ 每侧下身，都会有高大的乔木 / 在你的深呼吸中矫正 / 秘密的时间。”人曾经粗暴地用锯子、斧子纠正甚至毁灭过树的生长，现在，我们却迫切需要树用它身上的温柔力量来纠正甚至发明那个内在的人，以它们的挺拔做“我们和自然之间最新的仲裁者”，乃至作为“我们用于另一种飞翔的燃料”（《加利福尼亚的棕榈入门》）。

臧棣的植物诗在主题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植物智慧的发现。在《吊兰协会》中，诗人写道：“以前被问及吊兰最大的特点时 / 你会犹豫，而现在脑海里会立刻浮现 / 叶芝在谈到诗最大的特点时 / 用到的那个字眼：智慧。”吊兰的“智慧”能感受到你的气息，并回应你的友谊：“气息的相同果然很神秘，它并不希望 / 将你卷入一种无爱的劳役；/ 它不需要主人，它只需要感受到 / 你的友谊像开窗后涌入的空气”。薰衣草的芳香是一种智慧（“我的芳香就是我的智慧”），“人的一生中那些无形的伤口终会因我的渗透而渐渐愈”，而“一件熏过的衣服就可能把你套回到真相中”（《薰衣草丛书》）。植物的滋味也是一种智慧（“真正的智慧 / 无不来自万物的滋味”），擅长沉淀人生的孤独（《马黛茶简史》）。而落叶是治疗悲伤的最好的心理师：“落叶代表着 / 更完美的理智，强大到 / 你忽然发现，对比人类的愚蠢，/ 再没有比真正的悲伤更健康的东西了”（《落叶启示录入门》）。美人蕉以它的“盲目”看透并理解了我们：“你误解过这世界，而它没有眼睛，/ 仿佛很盲目，可它却从未误解过你”（《美人蕉丛书》）。因此，走近植物就意味着接受来自植物的教育：“来自草木的刺痛 / 是最好的教育”（《荨麻简史》）；“怒放的桃花就是一门课”（《碧桃诗学入门》）；“它们却是我们能依赖的 / 最好的自我教育”（《杨梅入门》）。植物的智慧处处启示我们，有时甚至是绝对的天启：“开始时，你是唯一的观看者。/ 绝对的见证把你带向 / 绝对的天启。”（《甘菊颂》）这种来自植物的启示是对容易受伤的人类的绝好治疗：野草“曾从死者手中夺下 / 绝望的画笔。它们用它们的根 / 在黑暗中，在大地的另一面作画；/ 每一寸都不放过”（《野草丛书》）；皱皮椒的皱纹是针对人的皱纹恐惧症的偏方（《皱皮椒简史》）；蓝盆花负责矫正人身上的“弯曲”：“你身上的所有弯曲，被迫的，/ 或是天生的，都会被它用坚挺的草茎、重新弄得直直的”（《蓝盆花协会》）；水仙负责矫正“人生的自觉”——实际上不过是人的功利：“在时光的流逝中，/ 凡在人生的自觉中称得上 / 是虚度过的，都实属极其幸运”（《比水仙更对象入门》）；

而花的盛放主治人的虚无：山桃花踢过虚无的屁股（《山桃花简史》）；樱花“竭尽一个热烈”，把虚无的陡峭踩在脚下，“带我们回到世界的起点”；紫鸢尾的天真令“虚无也会心虚”（《紫鸢尾入门》）；尼罗河白莲“稍一摇曳，就是虚无已死”（《尼罗河白莲丛书》）；山楂花敢于“给虚无也上点眼药”（《山楂花简史》）；凌霄花的“小喇叭像颜色鲜艳的红鼻子，/ 一直嗅到虚无不好意思为止”（《凌霄花入门》）。甚至，“剥洋葱剥到的空无 / 恰恰是对我们的一次解放”（《剥洋葱丛书》）。

植物的智慧有几个关键词：爱、献身、忘我、赞美。事实上，爱的语言最有可能是植物教给我们的。臧棣笔下的爱人是这样表白爱的：“我是你身上的叶子。”（《爱情植物》）植物的爱是对信任的颂歌：“如果你依然值得信任，/ 爱，就深过所有的记忆”（《白蜡树简史》）；也是对爱的忍受的颂歌：“这么多刺，至少意味着 / 我绝不止是 / 仅仅忍受过爱的痛苦”（《蓝玫瑰》），它甚至忍受了爱的不对等：“它对你的爱，多于你对它的爱，/ 这一切，尤其发生在你进入 / 生命的觉悟之前”（《醉浆草简史》）——它始终以爱的信心呼唤你的生命的觉悟；也是对爱的原谅的颂歌：“看它身上粗暴的断痕就知道 / 因为美，它被出售，而命运 / 并不允诺只有一个真相；/ 但它选择了爱的原谅”（《白玫瑰》），甚至对背弃的原谅：“静静的开放 / 意味着它渴望你能听懂 / 即使全部的时间都背弃了你，/ 它依然会用它的花心 / 将你的偏爱涂抹在世界的影子里”（《长春花简史》）。这些美好的爱的品质最终归结为伟大的爱的信仰：“如果不能因爱而名，命运还有何意义？”（《窄门开花，或迷迭香简史》）。奉献是爱的另一个名字。在《青蒿简史》的题记中，臧棣引用了惠特曼的话：“一片草叶的奉献，不亚于星辰的运行”。绿萝和紫秋葵把自己奉献给人类的友谊：“将有害气体吸收，将弥漫在 / 城市时间中的粉尘没收在 / 一个碧绿的献身中，不仅你 / 做不到，很多神也做不到”（《绿萝简史》），“这个世界上，/ 最安静的思想来自它们液质中的 / 黏性的奉献”（《紫秋葵入门》）。蓝靛果除了奉献人类，也奉献一切“单纯的事物”：“它把自己能把握的真理 / 都献给了单纯的事物”（《蓝靛果丛书》）。荷的奉献是超我的，也是超道德的：“奉献该奉献的，/ 才没功夫道德靠近岸边的莲蓬 / 是不是又被人偷偷摘走了 / 一大把呢”（《荷塘简史》）。狗尾草的奉献则是无对象的：“随和到随处可见，直至盛夏的 / 骄阳下，无私的奉献 / 在它们身上显露出：你有一个羞愧 / 已有很久都没更新过”（《狗尾草简史》）。水仙把自己的盛放奉献给时间：“它更愿意从时间的美德中 / 找到一个位置，把生命的开放 / 献给时光对它的期待。”（《比水仙更对象入门》）这也是全体花的宣言。可以说，绚烂是花的语言，奉献则是花的内涵。绚烂的花容“仿佛可以稀释 / 最深的绝望”，“醒目如我们从不知道 / 我们从前有一个绰号叫盲人”（《绚烂入门》）。我们曾经自信理性是我们的天眼，但有时候正是这理智使我们近视乃至盲目，阻挡我们看清生命的本质。对于盲目的理智，植物的这份绚烂便是有效的醒目剂，其中一个重要的提醒是我们对表面和内部的区别中存在的陷阱。鸡冠花说：“除了你 / 已看到的外表，它没有别的内部”，“尊重它，就请永远呆在它的外面”（《鸡冠花丛书》）。对此，众多的繁花无条件赞成，一致判决我们对表面和内在的区分无效，并提醒我们：“多看一眼繁花，便意味着 / 内心的渴求获得了一次绽放”（《繁花》）。这份绚烂也涉及植物的一个普遍品质：忘我。梅花将火热的冷艳贯穿到 / 你差一点就要领会忘我 / 究竟事关怎样的奥秘”（《梅花节指南》）；紫薇教导我们“忘我是如何可能的”（《以紫薇为路标》）；桑叶“从自然的印象中获得的 / 灵感，最精通如何忘我”。实际上，没有哪一种植物是自我主义者，而对我们来说，没有人不是自我主义者。人要达到忘我的境界需要漫长的路，也需要从植物那里获取教益。

植物身上另一个可贵的品质是赞美。在《龙舌兰入门》中，诗人写道：“赞美比恐惧更原始”；在《辰山植物园入门》中，诗人写道：“水落之处，缝隙即赞美”。植物的存在，它的萌芽、生长、开花、结果，就是对天空和大地的赞美，它以一生的全部力量肯定了光的力量，空气的力量和土地的力量。在存在和虚无之间，它永远站在存在一边；在恐惧和赞美之间，它永远站在赞美一边；在爱和仇恨之间，它永远站在爱一边。而赞美不也是诗人的任务吗？1921 年里尔克在米索写了《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迹 /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像风雷 /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因为我赞美。”我相信里尔克这首诗既是对诗人职业性质的最好阐释，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好阐释。问题是我们在很早就失去了我们本应从生命本源处获得的这份肯定的力量。那么，就让我们从最接近本源的植物身上汲取力量吧。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们可以把臧棣的植物诗学概括为：向植物学习，或者从植物学到的。这或许就是臧棣这本《诗歌植物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它是植物的教育，也是植物的治疗，还是诗歌的纠正。这种教育、治疗和纠正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礼物——是免费的，然而也是无价的。但愿人们知道感谢自然和诗人的慷慨，而不会因为这慷慨而轻视了他们的礼物，虽然在以价格计算的市场上，这样的事情总是不断发生。

本期我们从臧棣的新诗集《诗歌植物学》中精选 16 首以飨读者。诗集目前还未上市，《小鸟文学》的读者庶几可以先睹为快。



《诗歌植物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11 月)

柿子的神学简史

和往年不同，柿子树上的果实
多到从来就没数过。
有谁能体会，这数目的含混
像一个小花招，不停地放大着
丰收的喜悦。而我的邻居，
他急需冷门的神学来解决
柿子和偷吃柿子的鸟类之间的
灵魂问题。他急需形而上的
缝隙，来撬动内部的
一个死结：他种下了柿子树，
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
那些吃柿子的喜鹊，白头翁
或三道眉真的不懂得如何
分辨这棵柿子树的归属吗？
抑或这些欢叫着享用美味的
偷食者从来就不需要分辨
谁才是柿子树的主人。他的辛劳，
身体上的，特别是心理上的，
对那些鸟来说，不过是时间的空白，
意识的缺席。那些顺着脖子
滴进泥土的汗水，已令他独享了
种植者隐秘的喜悦，这难道还不能
让一个人满足于他几乎参与了
造物的过程？而那些鸟的出场
更像是神秘的分享环节的
一个自我完善。成熟的见证者，
它们聪明于鸟类的本能，
这难道也有错？而他急需神圣的洞察
来纠正世俗的盘算：假如他
没有种下这棵硕果累累的柿子树，
那些鸟将如何度过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天？
难道它们感恩的方式，就是
不停地摆弄灵巧的身姿
变换着花样，偷吃人的收获？
抑或他更急需一个乔装的天使
放下身段，用纯洁的影子
靠近他的疑惑：将吃柿子的鸟
归入小偷的行列，不仅有点自私，
甚至这想法本身就很原罪；
它们吃掉的不过是树枝上
颜色橙黄的柿子，谁能证明
那些果实上可曾刻有他的名字？
他急需上帝的偏见，假如我作为邻居
提供的安慰是不合时宜的：
那些鸟的啄食行为展示了
大地的意愿，而他现在急需的，
是从一个想象的个人损失中跳出来。

2020 年 1 月 9 日

芥菜简史

左手提皱巴巴的塑料袋，
右手握着小铲子；头戴的遮阳帽
像是刚抖落掉半斤火山灰——
一点都不夸张，开春不到十天，
小小的燕园里，她已是见到过的
第一百六十四个挖野菜的人。
五十出头，但下手很准；
要是体力允许的话，所到之处，
绝对够得上，一个都不放过。
可怜的芥菜，可怜的蒲公英，
刚梦见春回大地，还未完全醒过神，
就被连根铲除；紧接着，憋屈在
丑陋的塑料袋里，不知被带向何方。
在她之前，另一个挖蒲公英的老人
甚至将他的魔铲伸到我的窗户根下；
看他挖得起劲，我推开玻璃，
将幽暗的抱怨混淆在搭讪里问道：
就不能等它们长得再大点，再挖吗？
他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和十年前毫无差别：

再大点，就被别人挖走了。
他的行为介于休闲和劳作之间，
他的竞争者，比拟人的麻雀还多；
他弯腰，蹲下，和一只山羊转身，低头，
仿佛有很大的区别；但其中的
一些界限已模糊得令人吃惊。
和芥菜的命运相比，他是幸运的；
阻止他的力量几乎不存在。
虽然不是野地，但不可能指望
他或她，挥舞小铁铲的地方
会竖起一块牌子：禁止挖掘野菜。
也不可能将他们的爱好纳入
合理的分辩：这些野菜被连根挖掘后，
会破坏植被；留下的小土坑
会为扬尘天气提供充足的货源。
构不成事件，也谈不到违法，
牵扯的道德角度也很暧昧；
那些被挖掘的痕迹，又太表面，
甚至连形状都不像受过伤的眼睛。

2019 年 3 月 25 日

杨梅简史

灰白的头发令他矛盾于
信使已有很长时间没刮过胡子，
甚至长相都变得像一位父亲
又穿错了浅蓝的袜子。
不会弄错的是，保鲜用的冰块没忘加吧。

抱歉。这么跳跃，多少显得有点失礼。
但重要的，难道不是比生活更重要的是，
一个人应尽可能地生活得毫无概念吗。
甚至减轻的东西，都和压力大不大，没一点关系。
嫌镜子浪费时间的话，不妨把倒影搅浑。

只要归宿还没太偏离轮廓，
天空越蓝，命运就越不好意思；
继续，继续，需要神会
一个心领的话，加点油呗！
最好的弹力无不来自脚心已经出汗。

快步走着，手里拎着一大袋杨梅，
剩下的路途是以星光为单位的；
侧面不太像，有什么关系？
因为根据新算法，他距离美丽的土星
还有八百三十六天的行程。

2018 年 6 月 5 日

紫鸢尾入门

已消失的爱人克服了
死亡的错觉，从它们伸向
时间之谜的，小小的蓝梯子
爬上来，冲我们招手。
就没想到，虚无也会心虚。
就没心虚过花容里
会有这样的天真：假如一切
终将随风而去，而它们
只剩下它们身上的这幽蓝
完美得就像刚刚跨越了
我们的深渊的，一个小小的拥抱。
它们蓝得别有深意，但它们
并不想为难你，因为这深意
主要取决于你如何倾听——
记忆的链条，在高大的白杨树下，
正犹如醒来的蓝金属一样哗哗作响。

2015 年 5 月 7 日

杜甫的玫瑰入门

既然是替自然出头，就不一定
只有大浪，才能淘沙。
更何况玫瑰不仅仅看上去很美，
玫瑰真正的用途在于

它能帮我们节约大量时间；
如此，金子完全可以有另外的来源。
假如杜甫活着，新诗
和古诗的区别，不会大于
早市上草莓和菠萝的区别。
才不和你赌气呢。信不信，
十根韭菜就能让这首诗下个鸡蛋。
小是小了点，但也轮不着野鸽子犯浑；
最起码，它对得起生活的意义中
始终有虚构的那一面。

2015年3月24日

柠檬入门

护士拿着换下的内衣和床单
去了盥洗间。测过体温后，
护士也走了。病房又变得
像时间的洞穴。斜对面，
你的病友依然在沉睡。
楼道里，风声多于脚步声。
你睁开迷离的眼神，搜寻着
天花板上的云朵，或苇丛。
昨天，那里也曾浮现过
被野兽踩坏的童年的篱笆。
人生的幻觉仿佛亟需一点
记忆的尊严。把你最爱的柠檬
塞进你的手心。你的状况很糟，
喝一口水都那么费劲。
加了柠檬，水，更变得像石头——
浸泡过药液的石头。卡住的石头。
但是，柠檬的手感太特别了，
它好像能瞒过医院的逻辑，
给你带去一种隐秘的生活的形状。
至少，你的眼珠会转动得像
两尾贴近水面的小鱼。我抬起
你的手臂，帮你把手心里的柠檬
移近你干燥的嘴唇。爆炸吧。
柠檬的清香。如果你兴致稍好，
我甚至会借用一下你的柠檬，
把它抛向空中：看，一只柠檬鸟
飞回来了。你认出柠檬的时间
要多过认出儿子的时间：这悲哀
太过暧昧，几乎无法承受。
但是，我和你，就像小时候
被魔术师请上过台，相互配合着，
用这最后的柠檬表演生命中
最后的魔术。整个过程中
死亡也不过是一种道具。

2014年11月28日

鸡冠花丛书

它没有兄弟，虽然在旁边
马鞭草伸出的手
已能稳稳接住大雁的雄心。

外形如此美艳，比我们中的任何人
都更接近完美的拒绝中的
完美的挽留，以至于秋天的猛烈

反而看上去像时间的嫉妒。
它的肉全都露在外面，
但你不太相信。你渴望探索

内部的美。而它坚持除了你
已看到的外表，它没有别的内部，
它没有你能进入的秘密。

你最好站在飘香的桂花树下，
就那么站着；它的请求带着血色——
尊重它，就请永远呆在它的外面。

2014年9月

桑葚广场

蜗牛的桑椹之歌，
除了你，仿佛没有人听过。
它很难归类，不同于现实中
有这么多超现实的小手腕。
它倾心于生活的寂静
是一场惊心的埋伏。
只有模糊的背景音乐
还算宽厚，严格于模糊的本意，
绝不挑剔它的哑巴风格。
在它之前，那听上去很熟悉的东西
也很难归类，即使你建议它
应该像长椅上无人认领的帽子里
又扔进了几枚硬币。
乞讨者的尊严看上去也很模糊，
甚至不依赖于时间的荒谬。
乞讨者不要你手里的桑椹，
他只想听到硬币之歌。
乞讨者的衣服上印有一只蜗牛。
你一边照相，一边咀嚼桑椹；
你看上去好像一点也不介意
落日的底片上也有一只蜗牛。

2014年6月24日

蛇瓜协会

它身上有两件东西
牵扯到顾名思义。第一件
和形状有关。你很容易猜到。
第二件，除了我，没人能猜到。

它的左边是苦瓜苗。每天的浇水量相同，
但它的长势像张开的蝙蝠翅膀，
而苦瓜苗则像安静的灯绳。
它的饥饿掩盖着它的疯狂，

它的呼呼像一盏只能照亮蜜蜂的灯。
脆弱，是它使用过的语言中，
你唯一能听懂的词。就凭这唯一的交流，
它把它的生与死分别交到你手上。

两米内，你必须对它的生负责。
这样，冬天来临前，它是盛夏的别针，
将忠实的绿荫别在热浪中；
但一米内，你必须对它的死负责。

不同于朋友，它近乎一个美妙的伴侣，
但你别指望它会以同样的方式
对待你。不。它没有别的选择，
半米之内，你就是它的上帝。

远去或抵近，它能随时感觉到你的脚步。
它甚至能嗅出你手里有没有小水壶。
如果你偷懒，你的脑袋里
就会浮现出一条蛇。

2014年4月29日

穿心莲协会

诗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
——加西亚·马尔克斯

去年种下的，没熬过冬天。
它们死的时候，我甚至不能确定
我们在哪儿？它们是被冻死的，
它们的死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微。
而狗的见证，也仅仅限于
狗已不再凑过去嗅它们。
为它们举行葬礼的，仿佛只是
凋萎的落叶和干硬的鸟屎。
也许旁边还陈列着蟋蟀的假木乃伊。
我仿佛收到过警告，但它轻得
像从喜鹊嘴里，掉下的树枝。

而你能推测的只是，如果这些树枝
没从喜鹊嘴里掉落，会被用来
筑起一个醒目的越冬鸟巢。
此刻，我能想到的是，假如它们
熬过了冬天，它们现在便会晃动
它们众多的名字：从印度草到苦胆草，
从一见喜到金耳钩，像试探
你的秘密一样，试探你
究竟喜欢哪一个。而它们最喜欢做的，
仿佛是绕开这些不同的别名，
用同样的苦，笔直地穿透你的心。

2014年4月18日

好色的蔬菜丛书

意识到土地的意义
尚未被完全污染之后，
我爱上了种菜。我种的西红柿
表皮上透着诗歌红。所以，
我并不惊异于攥紧的拳头里
握着的有时是一道彩虹。
我种的小油菜泛着诗歌绿，
所以，新鲜岂止是一种滋味。
我种的四季豆富含诗歌氨基酸，
不偏食，偏心才有底牌可言。
我种的菜花让诗歌的生殖器
沉重如硕大的花球，洁白而紧凑。
我种的南瓜洋溢着诗歌黄，
靠底色环保，本色才有面子。
我种的茄子像一只小圆鼓
从内部膨胀着诗歌的紫色。
顺便提一下，小说的紫色
已由美国人艾丽丝·沃克写出。
1986年的夏天，我花了一个晚上
把它读了两遍。从此，觉醒的颜色
就由紫色来定性。我喜爱清晨，
也主要是因为一天之中只有这时
紫色才会准确地出现在天边。
我种的那些蔬菜看不见
天空中的紫色，但它们喜欢我
起得比清晨还早。它们的喜欢
可以作为一种信任延伸到
我的色谱声明中：我的时光只限于清晨。
我的清晨，就是我的上午和我的下午。

2012年5月

绣球花丛书

我测试我的轮回时，这六月的花
是一道题。以前，我只是听说过
有的填空题出得很活，比灵活还飘，
但从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

许多空白，像挖过的坑，
等待着被填满。而代表着空白的
那些横线看上去很单薄，
其实却结实得像硬木做的床板。

怎么填，表面上都限制得很死，
但其实也可以很活。我是我的空白，
这算是一种填法。我从不是我的空白，
这又是一种填法。

我说过那些空白很像挖好的坑，
而那些横线像床板，但真的躺下去后，
感觉完全不同。你会觉得这些花
丰满得就如同生活的乳房。

躺在第一个空白里时，我觉得人不会
随着尸体腐烂而消失。那些撒过的鲜花，
至少改变过记忆。躺进第二个空白时，
在坑里的感觉很逼真，但更逼真的是，

人，其实从未真正进入过他的尸体。

与此相似，人其实也很少走进他的生活。
大部分生活中，人很少会从里面向外转身，
因而不会觉得它们像不像生活的乳房有多么重要。

2006年7月 2013年5月

剥洋葱丛书

表面上，圆石头和洋葱
是两回事。大小即便一样，
我们的精神分裂也不会波及它们。
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故事中
转动我们的眼球。西西弗斯把石头推向山顶，
从汗味判断，他喜欢吃洋葱，
他的臂力有一部分来
明显源自橄榄油炒鸡蛋洋葱。
剥去神话的外衣，那也是
一件苦活。所以，他理应知道
用洋葱浸过的葡萄酒
对浪漫的夜晚所起的作用。
小花招垫底大探索。只有胡须茂密的
易卜生才不在乎西西弗斯
爱不爱吃洋葱。他派了一个小角色，
像模像样地登上世界的舞台，
让冷酷的戏剧给诗歌剥洋葱。
洋葱的包皮不断被剥去。
据说，每一层葱皮都代表
人的一种性格。以至于剥到后来，
那可怜的人发现活干得越多
它就越像是在受刑。而且尺度暧昧的，
几乎没有会同意他的遭遇
比西西弗斯的处境还残酷。
按旁观者的说法，洋葱并没有
把洋葱的本质留在洋葱里面。
手艺精湛，所以那小小的失望
仿佛并不是在剥去的洋葱中
一个人没能找到那颗被想象过的心。
不就是剥洋葱嘛。怎么可能剥着，
剥着，竟然把人给剥空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为自己感觉不到
他的恐惧而羞愧。我想建议他
去剥柚子，或是用石榴代替洋葱。
也许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
好的办法消除他的不安，而是
找不到合适的语调，像聊天那样
告诉他，剥洋葱剥到的空无
恰恰是对我们的一次解放。

2004年4月，2012年2月

一串红丛书

很快，推土机和铲车
像轮番冲锋一样
产生的轰鸣，便淹没了
人群的叫喊；偶尔也能听到
狗的吼叫夹杂在
人的叫喊中。而房屋倒塌时，
拆迁费是如何被清点的，
则微弱得像白天的蛐蛐。

如果缺乏敏感，历史的画面
会由另外的场景构成；
如果缺乏同情，构成
真相的画面往往已模糊不堪；

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为了走捷径，我常常穿越
那片已拆毁的房屋；
一开始，它看上去很像废墟；

但随着季节变换，它越看越像
资金链有点紧张的电影
外景地；残酷来自时间的暗示，
而起伏的噪音里已不再有

人的叫喊和狗的狂吠；
直到有一天，在断墙下，
几株一串红并未因照料过
它们的主人被迫匆匆离去

而停止它们美丽的绽放，
我才若有所思，仿佛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克尔凯郭尔会坚持说
诗人必须成为例外。

2001年5月 2007年4月

橄榄树协会

吹向它的风都将被女人的歌声
编入远方的绿色发辫；
但那时我还年少，不知道齐豫的嗓音
多折叠几下，重新支起来时
也可以像金色的梯子。

更早些时候，青春的轨迹已被密集的格言
扳过道岔，就像地理老师说的——
你们的生活已变成投篮。
因为身高太明显，我当然渴望
我不会轻易就输给投篮；

而那回荡在耳畔的歌声
就如同私自配制的一把钥匙，
让它远远看去，完胜南方的橡树
或北方的梧桐：少年的圣树；
不仅如此，那些发辫中的一根

有一天突然像从峭壁上扔下的绳索；
恍惚之际，它已把我吊起来，
吊向我的第一个非理性的质疑：
假如没有空想主义，我的成熟
会不会被它的小白花缩短得

像透明的液体黄金。
我的本能肯定被它粗糙的树皮惹毛过，
而它的芳香又是我的年龄的弹簧：
轻轻一按，我的飞翔
就会在它的枝条间找回全部的翅膀。

1999年11月 2002年6月

百合花

十次路过花店，你会有一次
走进去，从里面带走
一束刚刚开苞的百合；
五十次路过花店，你会有四次
走进去，从里面带出
一束凝着露珠的百合；
你的举止并无特异之处，
最多也就是像一头熊
在冬眠之前反复勘察
那被选中的地方是否有
陌生的痕迹出现过。一个花店
就是一座洞穴。你无需给出
特别的解释，但假如
你不理解这比喻的暗示性，
说明你还从未像一头游荡的野兽
自荒野返回到你的身体里。
一百次路过花店，你会有二十一次
走进去，从里面带走
一束百合。单身汉的小秘密，
将花茎修剪后，插入啤酒瓶，
如此简单的仪式之后，
一束美丽的百合就很适合送给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中的女人。
基于同样的理由，亨利·詹姆斯
在金碗中描绘过的女人
也配得上它们。一千次路过花店，
你会有九十九次走进去；
平均下来，你徜徉在花店里的时光

已严重超时；而在领略过
郁金香的风姿和玫瑰的深意后，
你仍会选择从里面只带走
一束百合。一种偏好，
一种令象征性都感到费解的固执；
但如果弗洛伊德活着，
那也许意味着一次放生，
一次非凡的解救；意味着虽然
类比很成问题，但看起来，
终于有东西不是凭侥幸
而是经由你的双手，从它们
含混的存在中独立出来，
走向生命的独唱。

1995年5月 1998年9月

[1] 参见霍尔特胡森《里尔克》，魏育青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3-135页。

[2] 参见《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09页。

[3] 转引自邓萍《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解读帕·怀特小说<人之树>》，《咸宁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61页。

[4] 帕特里克·怀特《人树》，胡文仲、李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690-692页。



臧棣

1964年生于北京。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出版诗集有《骑手和豆浆》《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等。曾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中国十大先锋诗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当代十大新锐诗人等；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诗歌节。



西渡

诗人、诗歌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67年8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其间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2018年调入清华大学。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天使之箭》《钟表匠的记忆》，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壮烈风景》《读诗记》等。

只有诗

但是，我的河流与你的河流 但是，我的手与你的手 永难相聚，亲爱的，除非 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



电影《洛丽塔》(1962)剧照

专栏

纳博科夫： 杀人犯总能写出好文章

黄昱宁 | 对照记

他要提醒我们认识到心灵在振振有词地
推卸它所造成的伤害时能达到怎样的力量：
心灵越强大，我们就越要加倍警惕。

在她之前有过别人吗？有啊，的确有的。实际上，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那是在海滨的一个小王国里。啊，是什么时候呢？从那年夏天算起，洛丽塔还要过好多年才出世。我当时的年龄大约就相当于那么多年。一个杀人犯总能写出一手绝妙的文章，你对这一点永远可以充满信心。（《洛丽塔》第一章）

在这部名叫“洛丽塔”的小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真实、准确的洛丽塔本人。洛丽塔始终如同一颗洋葱，读者一层层剥下去，到最后也得不到一个稳定而实在的形象。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拿不准她的真名究竟是什么，只知道亨伯特对她有各种各样的昵称；我们完全不明白，洛丽塔的天真与性感是怎样糅合在一起的，她的性格怎样迷失在华丽的修辞中，她对于亨伯特的那种有意无意的“诱惑”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或者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亨伯特的主观投射，真相在多大程度上被亨伯特的叙述扭曲。实际上，早在小说的第三自然段，亨伯特就已经取消了洛丽塔本人的“原创性”——她只是一个杀人犯（根据另一个原型）“总能写出”的一手“绝妙的文章”而已。

洛丽塔的“原型”，那个曾让亨伯特获得初次性体验的小女孩名叫安娜贝尔，名字和爱伦·坡的著名诗作《安娜贝尔·李》完全相同。纳博科夫将这首悲伤的诗歌描写的故事和意境完全移植到小说中：安娜贝尔因伤寒早夭，也将亨伯特所有的情欲想象，永远地定格在一具十三岁少女的躯体上。经过岁月的消磨，这个原本就高度符号化的形象，显得愈发暧昧难辨，成为亨伯特“闭着眼睛，在眼睑的阴暗内立刻唤起的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亨伯特说，这就是他后来“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

我们在这段话里找到了关键词——“复制”。关于安娜贝尔的记忆诗一般地栖居在亨伯特的意识中，铸就了一副“性感少女”的模板。与其说亨伯特试图寻找的猎物是一个特定的女人，倒不如说他寻找的一种特定的状态——由他的模板“复制”出的对象，是不可能也不应该长大的。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虚幻的“复制”产生了相当逼真的效果，以至于亨伯特的指尖第一次掠过洛丽塔“细小的汗毛”时，就认定：“洛丽塔已经安安稳稳地唯我而存在了。”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段落时，其实应该已经意识到亨伯特的心理不是健康正常的，但面对他引经据典、风趣高雅的笔触，面对他超强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常常会忘记，病态的心智对于他的叙述、对于他眼中观察到的事物，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

读者眼下已经对我有所了解，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当我极力想瞥见在中央公园玩耍的性感少女时（嗨，总是离得很远），我会变得多么暧昧和激动；而当那些花哨的、除过臭气的职业妇女，给某个办公室里的某个色鬼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感到多么厌恶。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我的健康十分糟糕地忽然垮了，于是在一家疗养院里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又住进了医院……读者会相当遗憾地知道，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错乱（如果必须用这个令人痛苦的名称来指忧郁症和一种难熬的压抑感）又发作了一次。我的彻底康复都亏了我在那家特殊的、费用昂贵的疗养院里接受治疗时发现的一种情况。我发现耍一下精神病大夫真是其乐无穷：狡猾地领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前；始终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这行中的种种诀窍；为他们编造一些在体裁方面完全算得上杰作的精心构思的梦境（这叫他们，那些勒索好梦的人，自己做梦，而后尖叫着醒来）；用一些捏造的“原始场景”戏弄他们；始终不让他们瞥见一丝半点一个人真正的性的困境。（第九章）

我丧妻后的第一晚喝得烂醉，睡得就跟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孩子一样香甜。第二天早上，我急忙查看口袋里那三封信的碎片。它们已经完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再整理成三封完整的信。“……你最好把它找回来，因为我无法买……”我猜想这是写给洛的一封信上的话。其他一些碎片似乎表明，夏洛特打算带着洛逃到帕金顿去，甚至返回皮斯基，以免这个贪婪的家伙夺去她心爱的小宝贝。另外一些碎片纸条（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手指这么强劲有力）显然是一份申请书，不是写往圣阿，而是写往另一所寄宿学校的。据说，那所学校的教学方法非常严厉、陈旧和贫乏（尽管也提供在榆树下的槌球游戏），因而博得了“少女教养院”的绰号。最后，第三封信显然是写给我的。我辨认出了诸如“……经过一年的分居以后，我们可以……”“哦，我最亲爱的人儿，哦，我……”甚至比你另外养个女人还要恶劣……“……或者也许，我会死去……”等这么几条。可是，总的说来，我搜集到的这些零星的材料并没有多少意义；我手掌心里这三封仓促写成的书信形状各不相同的碎片，就跟它们的各条内容在可怜的夏洛特的头脑里一样混乱。（第二十三章）

“不可靠叙事”是作者故意选择在感知视角、理解能力上受到限制的叙述者，用被扭曲、遮蔽的视角去观察、去讲述，由此造成事实真相与叙述文本以及读者实际感受到的内涵之间的多重偏差。严格地说，所有第一人称叙述都带有人物的主观倾向，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不可靠”因素；但是，有一些特殊身份的叙述者，比如涉世未深的孩子，比如精神病患者，“不可靠”的变形程度会特别大。对《洛丽塔》的文本加以道德谴责的读者，或粗心或故意地忽略了全书的第九章。在这一章里，亨伯特不仅提到自己“因为备受煎熬的欲望和失眠症”进过“疗养院”（这显然是精神病院的委婉语），回到文明世界之后不久又复发，还对自己的病程、症状以及假装“彻底康复”的伎俩津津乐道。他吞吞吐吐地说到了“精神病”这个词。显然，纳博科夫在这里给读者亮出了明确的不可靠叙事标记。



《洛丽塔》

跟着亨伯特的“不可靠叙述”，我们踏上了追寻洛丽塔的不归路。为了接近猎物，他追求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跟这个他其实相当讨厌的女人结婚。在费尽心机接近洛丽塔的过程中，亨伯特似乎总是堕入怪圈。在他的主观视角中，这个女孩从来都不是沉默的羔羊，反而在举手投足间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勾引”他；当他憧憬着与夏洛特和洛丽塔一起去沙漏湖，从而有机会重现当年跟安娜贝尔的海边旧梦时，夏洛特却自说自话地把她送去了夏令营。

亨伯特气得发疯，甚至虚构了一桩完美的谋杀案，想象自己怎样把她拖到湖底淹死。纳博科夫将他的想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以至于读者可能会猜想亨伯特最终的受审是否与此相关。然而，阴差阳错之间，亨伯特没能下手，现实却提供了比完美谋杀案更“完美”的解决方案：夏洛特遇上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死于非命。亨伯特当晚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撕碎了夏洛特没有发出的三封信。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再一次有意或无意地避开了对真相的陈述。但我们从那些碎片上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猜测夏洛特生前已经有所察觉，正在试图带着女儿离开亨伯

特——进而，我们也能倒推出，在亨伯特遮遮掩掩的叙述中，一定缺失了几块关键的拼图。他究竟做过什么，让夏洛特感觉到了对女儿的威胁？我们并不知情。

读到这里，我们发现，亨伯特的故事在纳博科夫的控制之下，正在沿着一条精巧而险峻的、充满反讽意味的路线行进。亨伯特的如意算盘不断落空，故事的悬念被不断延宕，而叙述者的欲盖弥彰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叙事游戏的难度。夏洛特死后，亨伯特把洛丽塔从营地里接出来，谎称夏洛特生了病，因此洛丽塔只能跟着继父在外面住一阵子。自此，亨伯特带着洛丽塔上路，几乎走遍了全美国各个州的汽车旅馆。一路上，汽车经过许多典型的北美场景，纳博科夫不时用嘲讽的笔触信手拈来，妙趣横生。小说出版后，这样的描写招来两个截然相反的罪名——有人因此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反美”倾向，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看成含沙射影，暗示“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对于这些无稽之谈，纳博科夫只能无奈地说，“这样的看法，要比愚蠢地说淫秽不道德来，更让我痛苦……我选择美国汽车旅馆而不是选择瑞士饭店或者英国客栈，只是因为我要努力做个美国作家，只要求得到其他美国作家享有的同等权力。”

在我们这条街的对面，就在我们房子的前边，我发现有一小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上面有些富于色彩的矮树丛、一堆砖头和几块散放着的木板，路边还有那片泡沫似的寒伧的紫红和铬黄的秋花；越过那块荒地，你可以看见跟我们塞耶街平行的校园大街上微微发亮的一段路面，路那边就是学校操场。这种总的布局可以使多莉一天都靠我很近。除了这种布局带给我的心理上的安慰外，我还立刻预见到我会有的另一种乐趣。那就是在课间休息时，我可以高倍数的双筒望远镜从我的书房兼卧室里辨别出在多莉四周玩耍的女孩子中的性感少女，她们从统计学方面来说不可避免会占有一定的百分比。不幸的是，就在开学的头一天，来了一些工人，沿着那块荒地修了一小段围墙，不久，围墙里面便恶毒地耸立起一座黄褐色的木头建筑，完全挡住眼前神奇美妙的景致。

旅程中，亨伯特的行为和思想，同时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一方面，他无视洛丽塔远未成年，一厢情愿地扮演一个成熟的情人，一步一步将少女引到床上满足私欲，冷酷地将她囚禁，直到洛丽塔从起初的好奇、依赖变得越来越怀疑、厌烦，越来越想挣脱；另一方面，他也不止一次地暗下决心，“要给这个小孤女一种健全的教育，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纳博科夫不吝篇幅，写亨伯特给洛丽塔置办各色行头的购物清单，写他如何测量少女的身高体重三围乃至颈围大腿围小腿围，写他为洛的十三岁生日买了精装本的《小美人鱼》，同时也替自己买了一本《了解你自己的女儿》。他肆无忌惮地告诉洛丽塔，她也许可以告自己强奸幼女，但是，他又说，“当我在牢里紧抓住铁栅栏时，你就成了无人看管的儿童”，他说洛丽塔可能会被送进感化院之类的地方，把小姑娘吓住。潜意识里，亨伯特似乎成功地让自己分裂出了“父亲”的角色——既对“乱伦禁忌”怀着某种恐惧，又盼望女儿永远不要长大，从而把每一个出现在女儿身边的男子都当成了假想敌。

然而洛丽塔毕竟在长大。随着时间的推进，她知道了母亲已经死去，对亨伯特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渐渐消失。亨伯特把洛丽塔送进附近的私立学校，兴致勃勃地在学生课间休息时“用高倍望远镜辨别出在洛丽塔四周玩耍的女孩子里有多少性感少女”，但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拒绝意识到，自己在主观视角里臆造的那个美丽而感伤的、充斥着复制品的天堂其实并不存在。当洛丽塔很快找到从他身边逃走的机会时，书外的我们并不意外，而书里的亨伯特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文学不同于社会学，不能用简单的道德评判来干扰文学解读。然而，话说回来，对于《洛丽塔》这样的特殊题材，你也很难用晦涩的文学理论驱散各种层面的读者对其道德责任的疑虑。所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回到文本。如果跟着纳博科夫的文本顺序，大致把全书的情节线走了一遍，其实完全可以看出小说讲述的既不是什么跨越年龄或者阶层的爱情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刑事案件。关于纳博科夫自己的态度，人们通常喜欢引用的话是这一句：“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不过，其实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纳博科夫曾在给文学评论大师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指出：“当你果真阅读洛丽塔时，请注意，它是非常道德的。”对于小说的叙述者亨伯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纳博科夫在访谈录《独抒己见》中也给出了鲜明的定义：“亨伯特是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却努力显得很‘动人’。”

“动人”的亨伯特在纳博科夫逼真的塑造下，确实给阅读和分析造成了很大的难度。特里林曾经这样概括过对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感受：“我们实际上已经准备宽恕这种亵渎行为……我完全无法激起道德义愤……亨伯特心悦诚服地说他自己是一个恶魔，而我们却越来越不愿意同意他的说法。”对此，纳博科夫最重要的传记作家布莱恩·博伊德则针锋相对地说：“特里林只是接受了亨伯特版的亨伯特，他回应的是亨伯特的雄辩，而不是纳博科夫的证言。纳博科夫更多地使得‘从亨伯特的角度看待亨伯特’成为可能，他要提醒我们认识到心灵在振振有词地推卸它所造成的伤害时能达到怎样的力量：心灵越强大，我们就越要加倍警惕。”博伊德似乎在暗示，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对于精神病态的展示和解释，本身也可能构成亨伯特的伪装，也可能是“不可靠叙述”的一部分。

无论是否同意博伊德的判断，我们对于亨伯特的叙述，确实有无尽的开掘空间。在大量细节中，亨伯特将自我合理化、审美化和诗意化的天赋令人惊叹，其中调用的大量话术的套路既不乏道德感，也具有堪称深远的文化内涵。他的忏悔深切诚恳，既能说服自己，也容易将读者带入他预设的轨道。凡是在阅读过程中掉入叙事陷阱的，要么会被亨伯特的魅力俘获，将他与洛丽塔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情感，要么会将作者立场全部或部分等同于叙述者立场，从而对小说的道德取向产生严重质疑——



《独抒己见》

《洛丽塔》的屡次遭禁，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想抵抗这样简单化的阅读，那就需要时刻记住叙事游戏的基本规则：从细节中寻找拨开迷雾、识破套路的钥匙。高明的作者给高明的读者准备了最丰厚的礼物，一旦绕过重重陷阱，抵达作者的文本意图，那么你对人性深度的理解就会比阅读那些一目了然的作品要高明得多。

我们又搏斗起来。我们抱成一团，在地板上到处乱滚，好像两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他浴衣里面是赤裸裸的、淫荡的肉体。在他翻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要透不过气来了。我又翻到他的上面。我被压在我们下面。他被压在他们下面。我们滚来滚去。我猜等这部书出版被人阅读的时候，总也得是公元两千年的最初几年；年纪大的读者看到这儿，肯定会回想起他们童年时看过的西部片中那些必然会出现的场面。然而，我们之间的扭打既没有那种一拳把牛击昏的猛烈的拳击，也没有家具横飞的场面。他和我像两个用肮脏的棉花和破布填塞的假人。那是两个文人之间的一场默默无声、软弱无力、没有任何章法的扭打，其中一个被毒品完全弄垮了身体，另一个患有心脏病，而且杜松子酒喝得太多。等我最终把我那宝贵的武器抓到手里，而那个电影剧本作家又在他低矮的椅子上重新坐下的时候，我们俩都上气不接下气，而刚刚经过一场争斗的牧牛人和放羊人却决不会如此。

这是走向决定性的时刻——无论是对人物的命运，还是对小说的结构，都砸上了最后一枚坚实的钉子。

在洛丽塔逃走的五年后，亨伯特收到了她用干巴巴的语调写的求救信，说自己已经结婚，即将临产，丈夫在远方找到好工作，但是夫妻俩在离开没有钱还债，希望继父能把她以前自己的东西卖掉，换几百美元寄给她。亨伯特带着枪、开着车找到洛丽塔的极具象征意味的住处——杀手街十号。而此时，已经十七岁的姑娘却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对亨伯特并不设防。读者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在亨伯特的逼问下，洛丽塔说出了五年前诱拐她离开亨伯特的人是谁。亨伯特在给洛丽塔四千美元之前，最后一次以舒适富裕的生活诱惑她跟自己走，被洛丽塔坚决拒绝。故事进行到这里，纳博科夫虚晃了一枪。他写道：“接着，我拔出自动手枪——我是说，这是读者可能没想我会干的那种蠢事。其实，我甚至根本没想要这么做。”

直到此时，我们才对《洛丽塔》的文本结构有了全面的认识。某种角度看，《洛丽塔》的情节线就像是一部逆向而行的侦探小说。我们从第一页就知道主人公是一个杀人犯，却直到最末几章才知道受害者是谁，在破解这个谜团的过程中时常产生误解。现在我们知道诱拐洛丽塔的男人才是亨伯特真正的目标。这个男人叫奎尔蒂，是个有一定才华的剧作家，但也具有更为典型、更为外露的恋童癖症状，同时还吸毒成瘾，穷困潦倒。亨伯特的心理逻辑也容易理解，他不伤害洛丽塔是因为女孩早已长大，远远地偏离了被亨伯特“复制”的性感少女的轨道，报复甚或夺回这样一个褪去了光环的赝品变得毫无意义；而追杀当年诱拐洛丽塔的奎尔蒂则变得刻不容缓——在亨伯特看来，正是奎尔蒂，强行打乱了他的“复制”工序，最终使得珍宝沦为赝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之前的叙述中，纳博科夫其实已经藏下了很多伏笔，奎尔蒂的名字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处，但读者很难轻易察觉。纳博科夫善于驾驭结构、营造草蛇灰线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只需要寥寥数笔，我们就能看出，奎尔蒂的心理痼疾与亨伯特是高度同构的。在亨伯特的叙述中，这个形象既无比猥琐、不堪一击，又莫名其妙地让他想到自己。在最后与他狭路相逢时，亨伯特注意到奎尔蒂“穿着一件紫色的浴衣，跟我过去的那件很像”。奎尔蒂从亨伯特身旁大摇大摆地走过，亨伯特觉得“他不是没有看到我，就是把我当作什么熟悉、无辜的幻觉而不予理会——他让我看到他那毛茸茸的小腿，像个梦游者似的朝前走下楼去。”画面奇诡，就像亨伯特迎面撞上一面镜子，或者在梦中与自己擦肩而过。

亨伯特与奎尔蒂最后的对峙被纳博科夫写成了一出精彩的闹剧。他们喝酒，抽烟，谈论戏剧，朗读用韵文写的判决书，兜着圈子聊着那个“小姑娘”。亨伯特拿出的枪在奎尔蒂看来只不过是一件玩具。在纳博科夫笔下，他们的“搏斗”是一场炫目的人称代词的魔术。他们抱成一团的时候，“我”、“他”、“我们”和“他们”奇特地交织在一起。“我被压在我们下面，他被压在他们下面”是简洁而有力的神来之笔，构成了两个男人两面一体、互相指涉的直观景象。他们扭打在一起的样子，就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镜像交战——在这一瞬间，亨伯特与奎尔蒂合二为一，他们也成了对方的复制品。

亨伯特在他的自述最后声明，这部书稿只有“在洛丽塔不再活在世上时才能出版”。读者这才意识到，第一章里雷博士交代了一系列书中人物的结局，其中提到的“死于难产”的理查德·弗·希勒太太（纳博科夫设下的众多文本圈套之一）其实就是洛丽塔。

也就是说，虽然亨伯特在写完这本自述时认定洛丽塔还会比他多活很多年，而事实上，她却在亨伯特冠心病发作之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所以亨伯特原以为“公元两千年”之后才会重见天日的回忆录才能这么快就出版。被复制的洛丽塔并非直接死在亨伯特的枪下，但亨伯特对她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造成的破坏，无疑间接导致了她的悲剧。由始至终，纳博科夫都在提醒我们，在这个故事里，无论是怎样“绝妙”的文章，它的作者终究是个杀人犯。



黄昱宁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翻译家，作家。译著包括《甜牙》、《追日》、《在切瑟尔海滩上》、《螺丝在拧紧》等，出版随笔集《一个人的城堡》等、小说集《八部半》等。2016 年获得浙江传媒“春风阅读盛典年度金翻译家奖”，2018 年，《八部半》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及《晶报深港书评》年度虚构类十大好书。

对照记

在一个叙事速度已经被大大提升、一条故事线就能打造 IP 流水线的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文本细读？——进而，我们还需不需要经得起推敲的文本？这是个问题。

有两件事给了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其一，几年前，为了一档音频节目，开始重读一批名著——与最新的小说夹花着读，惊讶地发现儿时初读的印象是何其模糊，有些印象甚至是错的。重读是颠覆性的，也是快乐的，就像梦里多少次回到出生时的那栋老房子。回头一看，重读的过程里攒下的笔记，居然也已经厚到需要找新房子安置的地步。其二，当所有的既定节奏都被 2020 年的疫情打破、重组时，我发现，惟有读书——沉浸式读书才能保持抵御的姿势。合上一本小说，便是记忆消褪的开始。笔记里留下的细节，以及围绕着这个细小的切口生长出来的花草，自有它柔韧的生命力。

写在这个栏目的文字，将最大限度地保持笔记的原生态。原文段落与我的笔记互相对照的形态，更为直观，更接近于写在书本空白处的样子。在这里，“对照”不仅仅是一种排版形式，它也是赋予文本更自由的生命力的催化剂。理顺这些笔记，将某些碎片合并同类项，间或插入新的灵感，让整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有乐趣。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得如此快乐了。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彼得·汉德克的夜生活

王竞 | 作家笔记

“我是一个作家，我来自荷马，
来自托尔斯泰。
请让我安静，不要向我提这些问题。”

01

本来，我对自己的德文很自负，读起德文的当代小说，跟读中文小说的速度差不多。拿起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的新书《我的他乡一日》（Mein Tag im anderen Land），我却产生了自我怀疑。怎么读得直犯磕巴？

这本小说不到一百页，2021年出版，距离汉德克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过去一年半。诺奖作家获奖后的第一本书总是让人格外期待，它就像一份自首，把自己交出去，供世人再评判一遍：爬到了世界文学塔尖的你，是不是真的配得这个奖？我扫描了一遍德语区的各项评论，无人失望，清一色的好评。

有一位文学批评家写到：想读懂这本书，第一要慢读，第二，须读两遍。另一位评论家讲得详细些：汉德克用了极多的逗号，将语句拦腰折断，横生他义，几经波荡后，再接上开始的意思，而这时，被中断数次后终于完成的句子，饱含了思绪的流动感和思想的多层次性，无损德语语音节奏的完美动人。

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这些德语为母语的人，且拿读书当生计，居然也被《他乡一日》折磨得够呛，我这点儿读不下去的挫折感又算什么？坚持读到四十页左右，就是魔鬼附身的“我”突然被一道纯善的目光击中后，我也跟着主人公“清醒”过来。我的清醒是，我终于适应了汉德克密集的逗号，进入了他独创的语境，在他的小说里自在了。瑞典文学院给汉德克的获奖理由里写着，嘉奖他“富有影响力的写作，他用语言的创造力，持续探索了人类生存经验的边缘地带及细节”。

发疯肯定是人类极边缘的一种经验。《他乡一日》里的主人公跟汉德克一样，也是一位作家，在许多年后，他回忆起自己早年当果农时魔鬼附身、心智全失的经历，对这段经历他没有主体记忆，而是靠他人的二手叙述记录的。除了是个社会边缘人，他还是个怒火中烧的人，白天穿过村子，对世间一切破口大骂，这种骂声，让熟悉汉德克的读者立刻联想到他1966年写的戏剧《骂观众》，那里没有人物、剧情、冲突及高潮，只有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的语言狂欢。沉寂半个多世纪后，这种“骂声”又借一个狂人之口，重返老年汉德克的文本了。而到了夜晚，疯子“我”在荒弃的墓地里搭个帐篷，整个人没了攻击性，但还在彻夜喃喃自语。

奇迹发生在随便那么一天，随便那么一眼。果农来到村外的湖边，看见几个渔夫在收网，其中一位用纯善的目光看了看他，还把手搭到他的肩上，用跟正常人说话的口气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这样被瞬间治愈了。接下来的故事，如果也算是故事的话，就是主人公坐上了一条小船，到湖对岸的“他乡”畅快行走，他获得救赎、重回人间。

的感受，随着一路走来，变化出千万种流动的诗意，扩展出寓意极其辽阔的阐释空间。典型的、不讲故事可又讲出比故事还多的汉德克。

那个多年来被公共舆论随时激怒的汉德克，是不是在这个新小说里降服了愤怒，跟世界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假如我们猜得对的话，这当然是在一种极抽象的层面上进行的。

汉德克是欧洲当代最有争议的一位作家。事后回忆听到自己获诺奖的消息，他说，那一刻心里升上来的，不是大喜，而是大平和，“好像有一道光，宁静美好的光，有那么一会儿照在了我写的书上。”

02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汉德克的文学品质。就连激烈抗议他获诺奖的各派，都不得不承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可正因为他属于欧洲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诛伐他的人便更不能饶恕他在政治问题上逆主流的“站队”。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南斯拉夫陷入内战，西方各国的政界及媒体对该地区的不同民族做出了“好人”和“坏人”的划分，主流一致支持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把民族内战的另一方塞尔维亚定性为非道义方。

汉德克是一个对政治、政权以及媒体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的人。他发现西方阵营如此众口一词，而自己对南斯拉夫颇为了解，唯有对塞尔维亚地区还不熟悉，于是就在1995年10月底动身，前往炮火连天的塞尔维亚等地考察了四周。回来后，他写下纪实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1996年夏天，他又再次返回那个地区，写下第二篇：《冬日之行之夏日补遗》。他的德国出版社苏尔坎普把这两篇游记收集成册发行，书的大标题叫《梦想家的告别》。

梦想家当然是汉德克自指，他在为南斯拉夫不可逆转地走向分崩离析而伤痛。与其说告别，不如说是用一种拒绝人云亦云的态度，追问民族冲突的复杂起因。汉德克从来反感媒体那种立场先行的做法，他质疑，只有被定性为正义一方的痛苦才允许被读到、听到、看到吗？谁有权利做出这种定性？谁规定这种定性就一定正确？在他的理解中，南斯拉夫原本是一个多民族共生的国家，此时发生的内战是一场“兄弟之战”，国际社会应该给这个地区留出时间，让这里的人们自己去寻找实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在他的文本里，他提供了一个冷僻的观察视角，即写出不被国际社会听到和看到的另一方——塞尔维亚在民族内战中的痛苦。这当然是挑战西方体系的政治决策和媒体的主流话语。

汉德克的发声是危险的，因为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在以“种族屠杀”的罪名声讨塞尔维亚。

这年，汉德克54岁。1996年成了他的声誉分水岭。之前，他是一位令人尊敬、到处接受欢呼的大作家，身上挂满了文学奖项，从席勒奖、毕希纳奖到卡夫卡奖……他的创作领域横跨戏剧、小说、电影、散文和诗歌，无不精彩、深刻、动人。1996年后，他变成了一位饱受争议的作家，人们客气地谈几句他的书，然后都要用一个“但是”，跳转到他的“南斯拉夫”问题上，对他指指戳戳；或者，他出场时，周围总弥漫着一种暧昧的期待，期待他能幡然悔悟。

“我给你一千块钱，你给我闭嘴好不好？他经常搞恶作剧，反戳那些言辞闪烁的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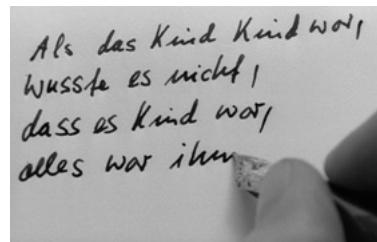
03

为塞尔维亚书写正义过去了20年后，汉德克受邀来了一趟中国。

中国媒体一共掀起过两次对汉德克的报道热潮。第一次是在2016年10月，汉德克唯一的中国之行；第二次是2019年10月至12月，与世界共振，大量报道了汉德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2016年那次，我不在汉德克的中国之行现场，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后来从中文媒体读到，出现了一些尴尬的场面。热情的中国读者，盼望见到一位先锋叛逆的奥地利大作家，这是汉德克的成名戏剧《骂观众》留给人的印象。可汉德克早就不玩先锋叛逆了，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位74岁的哲思型老人，还爱去树林里采蘑菇。这个感觉好怪，仿佛等人等错了。

汉德克恐怕也觉得，自己在上海下了飞机后，就误入了另一个时代。中国文青们追着问他跟文德斯的合作，他们无比热爱那部老掉牙的电影《柏林苍穹下》，剧本是他写的不错，贯穿电影始终的那首诗也是他的，“当孩子还是孩子时，不知自己是孩子，以为万物皆有灵魂。”可他还是被惹烦了，他求中国观众不要再跟他提文德斯，也别总聊《骂观众》，这是他50年前写的本子，之后他可是又写了好多。“我整个大活人都摆在你们面前，可你们只盯着我的一个指甲盖看。”这好像是他的原话。



电影《柏林苍穹下》(1987)中的诗。

2016年，世纪文景出版了八卷本的汉德克作品集，日耳曼学者韩瑞详教授率领一个译者班子，集中翻译了汉德克的早期代表作，比如，至今被捧读得最多的小说《无欲的哀歌》(1974)，还有他史诗风格的戏剧剧本《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两个半小时的舞台表演容量，剧中人不发一声，不吐一词，观众却被奇异地带入人

类共有的困境不能自拔。两篇南斯拉夫游记（1996）也被幸运地译成了中文。文集里的中后期作品不多，汉德克 2013 年写的《试论蘑菇痴儿》算是最新的收录。很可能他驾到时，这八本中文书刚上市，大部分读者和主持人还没怎么来得及读。2016 年的这场中国之行，让我觉得汉德克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晚，总之，双方都没踩到点儿上。文化交流有时差，拿这件小事跟他的“南斯拉夫”问题相比，顶多算个美丽的误会。

04

对照他年轻时的酷范儿，我更喜欢汉德克 60 岁以后至今的样子。他体型嶙峋，可比一棵硬木老树，枝干虽不粗壮，可因为根扎得深，什么也吹不倒。他的脸发生了很大变化，感谢顺着鼻翼两侧深下来的皱纹和从颧骨凹下去的部分，让这张原本平滑的脸有了波澜，多了深度。年轻时候的他，戴一副有近视刻度的墨镜，梳着甲壳虫乐队那款蘑菇头，额前有齐刘海。他成名于 1966 年，才 23 岁，除了照片，在当年已经留下了影像。影片中，他的脸显得圆润，眼睛不大，薄嘴唇，上嘴唇更薄，人中偏长。若不是墨镜、发型和严肃的表情为他三重组合出先锋叛逆感，这张脸相当没有吸引力。吸引人的，是他在镜头前说的话，还有他的声音，像一个高中男生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的声音，细高，从嗓子里出来，不像后来的声音，浑厚，从整个人内部发出来。

1966 年，他就是用这种细高的男孩声音，到美国普林斯顿的德国作家大会 G47 上即兴发言，谴责那一代功名成就的作家创作呈阳痿状，背弃了反思。有人说，这个发言终结了德语的战后文学。

1975 年，演员妻子离开了他，但给继任者留下一个传统，此后，汉德克身边的所有女人，无论妻子还是情人，一律为电影演员。这年，他带着六岁的女儿住在巴黎，又当爹又当妈，靠他一辈子没换过的职业——写作为生。一个德国电影人把这个时期的他拍成了一部纪录片。他留起了八字胡须，多少遮盖了上唇和人中。大大的头部特写镜头，给人一看就是个矛盾体，本性是羞涩内向的，思想表达又刀锋般尖利，用词充满新鲜的感性，对现存秩序和价值除了质疑就是挑衅。这种人进不了公司也当不了政客，天生就是属于文学的。因为家境贫寒，他差点想去当律师，在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前，幸好苏尔坎普出版社签下了他的处女作，他像得到天助，立刻放弃了学业，全身奔向文学。

瑞典文学院说得好，汉德克的强项是他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是。他对着镜头，还是用这个细高年轻的声音，叙述语言对他的意义。他说，秘密都藏在句子里，他只是做了稍微的一点改变，但就是这貌似稍微的句式调整，发力点全用在对抗让我们失掉感觉的语言里的日常性，唯其如此，叙述才能活起来。他是个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世界观的人，他做的事，就是用句子表达自我，这些句子被他揉来捏去，直到变得有质感，在那些我们往往无语的经验面前，他尝试通过对语言下透功夫，来让这些经验重新复活。

我看了不少近年来他的访谈视频，发现无论换成谁，跟他对谈都不容易。倒不是你说东他说西，故意跟人作对，而是他对用词太执着了。无奈的是，每次都是对他。比如有一次讨论“看”和“观察”这两个词：

“您的小说里，一个作家坐在公共汽车里观察着车里的人……”2008 年的德国电视二台著名访谈节目里，主持人这样开始聊汉德克的一本新书。

“他没有观察，他只是在看。”汉德克立即反驳。

“这有什么区别？”

“作家既不是侦探，又不是警察。不要用观察这个词。”汉德克说。

“那您怎么说？”主持人是德国最资深的文化节目明星，对汉德克的生硬态度一点都不恼，继续兴趣盎然地问下去。

“要用‘看’这个词，”汉德克也来了解释的兴致，干脆从自己讲起：“我是个观看者，看着看着，周围的人物事态自然就会作用于我。比如小说里写的，坐在车里的巴尔干男人穿着劣质的皮夹克，一动，假皮子就发出咯吱的响声。这个情景十分符合我们对巴尔干男人的偏见，他们不就是这个样子嘛，拎个塑料袋，穿身假的皮夹克。可故事往下走，还是我们用偏见看到的这个人，坐在这趟车里，目的地是一个被炸毁的墓地，他要跟死去的亲人告别。在车里，这个巴尔干男人玩着猜字游戏解闷，突然，在下一个瞬间，他就悲伤起来，他要做的，是逃亡前的最后一别。我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这样，人类生活中，一个瞬间会翻转成意料不到的下一个瞬间，我们带着偏见看到的人会忽然挣脱偏见，在我们眼里变成一个另人，这个人又带出一个故事。我就是这么看的，看久了，目光会变得通畅无阻，这么说吧，就像看到了人性。”

05

拍板的时候，瑞典文学院一定没有预见到，2019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等于把汉德克押上了道德法庭。

1990 年夏天，汉德克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一个叫查维依（Chaville）的小镇上买了房子，定居下来。这里没人打扰他，连他的第二任妻子都要住在别处，他说过，他不认识比他更需要独处的人。巴黎远在西北方 16 公里之外，一片半月形的森林从巴黎铺展到查维依，汉德克出了家门，就能走进森林里去散步。

2019 年 10 月 10 日，他站在家门前，面对第一时间获知诺奖消息的各国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乱糟糟的问题。他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十分重要，可没有出现在任何文字版的新闻报道里，他说：看来，这些瑞典人是好人。媒体报道出来的是：你今天会干什么？

跟每天一样，下午去森林里散步。

在媒体对他坚持负面报道二十多年后，瑞典文学院居然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他，他们成了他的好人。他原以为，自己早就不在瑞典人的考虑之列了。

可从第二天起，风向就变了，像天边的乌云，先是片片分散着，但很快就在一个方向的风力鼓动下，聚集成了黑压压的一大块。再度拥到他家门口的记者，都只提一

个问题，即他的南斯拉夫立场。除了 1996 年的图书出版，在 1999 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期间，他再次公开表达了对塞尔维亚的同情。2003 年，他去海牙国际监狱探望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2006 年，米洛舍维奇死于狱中，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这一系列置主流评判标准之不顾的“反动”立场，在 2019 年的舆论“照妖镜”下被一一回溯、放大。

离那最激烈的几个月过去快两年了，现在开始有人持较公允的态度，反思 2019 年秋冬欧美媒体和文化界对汉德克进行的道德围剿，围剿的方式是以阉割文学为代价的。无人提议，让我们来读读他的书；没有任何人跟他讨论关于文学的问题。只有政治、政治、政治。瑞典文学院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攻击，要求撤销汉德克获奖决定的呼声铺天盖地。别人等待领奖的过程是享受，汉德克却在经历一场海啸，一个高过一个的浪打过来，他必须在将被吞没的瞬间屏住呼吸。

听说他发过几次火，冲记者吼，叫他们走开。还有一次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来自荷马，来自托尔斯泰。请让我安静，不要向我提这些问题。”

06

汉德克说，从一个人的作品里能认识到生活在进行，这个写作者才称得上是一名模范的作家。要想成为一名模范作家，至少要经历三到四次充满折磨的蜕变。



电影《左撇子女人》（1978）剧照

七十年代是痛苦、欢乐和激情的混合。1972 年，他以母亲自杀为题，创作了小说《无欲的哀歌》。小说不长，用冷硬精准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冷硬是悲伤的外衣，精准是作家手中的软尺，微妙地丈量母亲在时代局限中的幸与不幸。这部小说加上几年后写的《左撇子女人》都被拍成了电影。再往后，汉德克的小说越写越抽象，能拍成电影的，几乎只剩他本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 1978 年，他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写作危机。这场危机始自创作长篇小说《缓慢的归乡》，也以这部小说的完成而告终。这当中，他去美国阿拉斯加旅行，在那里掉进了一个语言和无语相互缠绕的漩涡。他突然极度渴望读卡夫卡，深信只有卡夫卡能救他。妈的，我必须看看卡夫卡的句子是怎么写的！他终于在一家书店里找到一本英文版的《城堡》，翻开一读，英文翻译得实在太糟糕了，卡夫卡对他爱莫能助。他在街边一屁股坐下，精疲力竭到极点。等力气一点点恢复，他又能再写一段。这种从悬崖边上爬回来的感觉，浸润了创作史诗的气息。

1987 年，汉德克 44 岁，女儿高中毕业，他放弃了固定的居所，开始为期三年的周游世界。这之前，他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定居七年，完成了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有让中国读者心跳、读后又发现与我们毫不相干的《痛苦的中国人》。他还发表了诗剧《关于村庄》，多年后，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朗读过开篇：

“参与到其中，不要围绕你自己。

寻求挑战，但别期待特定结果。

摆脱别有用心的动机，不要有所保留。

要温柔又有力量……

不要在意亲人向别人伸出了援手，

去关注细微琐事，去往荒芜之地。

不要相信命运的戏剧性，笑吧冲突撕碎。

展示你的真面目，直到你被证明是正确的，

树叶的沙沙声也会变得悦耳。

去吧，去村庄里游荡。”

07

周游世界的三年，他去了南斯拉夫、希腊、埃及、比利时、日本、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

他越来越没有耐心去适应各个国家字母排序不同的打字机。1987 年 3 月的一天，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镇上，他带着纸和铅笔橡皮出门，坐在路边写起来，写的是《试论疲倦》。他发现这才是他想要的写作状态，他不再被写作工具钳制，他自由了。耳边风的声音，街上跑过的小孩，都好像随着铅笔的滑动，流进了他的手书，世上的气息由此饱满地进入了文字。从此，他所有的小说、散文、诗歌全部手写，只有戏剧除外。为了写戏剧对话，他需要打字机咔咔的节拍声。

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编辑，细心记载了汉德克的一部轰动德语区的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这部小说叫《我在无人海湾的岁月》，目前还没有中译本。1993 年 1 月 11 日，

汉德克坐在查维依家中的书桌前，在一张 A4 白纸上手写了一个句子：“到目前为止，我在生活里经历了一次蜕变。”这是开头。这天他写满了一页半。A4 白纸上，左边留出一条窄边儿，上面除了标记写作的年月日及地点，有时还会描述几笔写作环境，比如，1993 年 4 月 3 日，“生父去世”，又比如，8 月的纸上画了几个老鼠头，注明“在森林小湖边”。除了家中，森林也是他主要的写作场所。1993 年 12 月 18 日写作结束，汉德克连续写了 322 天，无一天中断，用铅笔一共手书了 535 张 A4 纸，每页写满 38—48 行不等。1994 年，该小说的精装版印刷出版，全书厚达 1067 页。汉堡文学馆馆长莫里茨前不久回忆了这部小说出版时的狂欢情景：苏尔坎普对内容严格保密，派特快专递（1994 年！）把限量试读本一本本送到著名书评人手中，谁收到，谁就几乎有了“上帝选民”似的荣耀感。莫里茨承认，他读到六百多页后对人物情节还是一头雾水，同时又被汉德克宏大的格局、复杂的意象、超凡的语言、深邃的精神感动得不知所终。

1996 年后，这种文学狂欢不再。2019 年，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是狂轰滥炸。

08

汉德克曾说，写作是一个人的远征。冷眼观察他和主流话语的对峙，很像“一个人的战争”，或者像一个西部片，汉德克承认，他的榜样就是美国西部片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在福特的影片里，他的英雄从来站在输者一边，明知事态不可挽回，往前是一败涂地，也不放弃最后一搏。

有人嘲笑汉德克，你一个作家，为什么偏要掺和到扯不清的南斯拉夫问题里？即便要站队，你也是斯洛文尼亚这边的，塞尔维亚跟你有毛关系？

身为奥地利人，他有一半来自母亲的斯洛文尼亚血统，一半来自父亲的德国血统。1942 年 12 月 6 日，他出生在外祖父的房子里，母亲这边的家人生活在奥地利南部的格里芬，跟斯洛文尼亚接壤，母亲和家人都是奥地利人中的斯洛文尼亚族裔。他的生父是二战时驻扎在格里芬的一名已婚德国士兵，汉德克 18 岁时，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战后的银行职员。他的继父，也就是母亲嫁的男人，也是德国人，酗酒潦倒。两个父亲都占据了他心里给父亲留出的位置，他一生都解决不了所谓的父亲问题。是母亲和外祖父撑起了汉德克的童年，斯洛文尼亚的田园风景、语言、生活习惯成了他的童年布景，继而在作家汉德克那里，幻化成日后各种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渴望。他对斯洛文尼亚代表的南斯拉夫的文学情感投入，跟“身份认同”这种流行的政治术语风马牛不相及，而更多的是一种从根部生长出来的通向人类情感的态度。

为塞尔维亚发声，因为塞尔维亚是被国际社会不公正对待的南斯拉夫的那部分，有一次他给出了一点解释。他不需要多讲斯洛文尼亚，因为这部分的南斯拉夫没有这个问题。“所有意识形态中最可恶的，就是所谓的只有他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哪个民族是好的，哪个民族是坏的。我就是要说出不同，看见不同。干了这件事以后，可以说，我还真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自信和骄傲，是否对得起作家这个职业，得看一个人是不是具备这两样东西。”

可是为什么要去参加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呢？

“因为，当南斯拉夫还是南斯拉夫的时候，他是坚决反对分裂的政治人物。对我来说，他是象征南斯拉夫的最后一人。向他告别，对我意味着跟南斯拉夫告别。”

南斯拉夫解体后，世上不再有这么一个民族共生的国家了。汉德克犹豫了片刻，还是说出以下的话：“假如我怂了，没有去参加葬礼，我会一辈子都留一个念想，想念一种痛苦的感觉。”

09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媒体人不好，你们艺术家才是更好的人？”奥地利电视台的一位年轻女记者有一次这么质问他。

汉德克被逗笑了，“艺术家聚到一块儿，可能比媒体人更糟糕。不过，”他说，“艺术家必须独处。当他单打独斗时，就好过你们媒体人。”

“为什么？”

“因为你们媒体人是受限的，艺术家是不接受任何限制的人。艺术家没有边界。”

有一位过世的德国大作家说过，在德国这种人口规模的国家，八千万人里至多有两三万人会认真读纯文学的书，汉德克对此深表认同。青壮年时，他还有冲畅销榜的野心，到了晚年，畅销榜早不是他的野心所在了。他的野心是写作本身。他让我们着迷，是因为在他身上，文学还呈现着文学该有的纯粹性。

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巴黎实行了宵禁。每天从晚七点到第二天早六点，居民不得出门到离家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德国世界报周日报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一天半夜，三名法国巡逻兵看见一位老人，坐在巴黎圣母院前的椅子上，对着石雕上的玫瑰花纹画素描。他身份证件上的住址是查维依镇，离他被发现的地点相距 16 公里，严重违反了政府的防疫规定。

老人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出版社伽俐玛开的一封证明信，证明他们的作者汉德克正在创作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因工作所需，他必须不受限地到处游荡。德国世界报写到：法国是一个文化民族，这三位巡逻兵对大作家油生敬意，立刻就不再打扰他了。

汉德克当时正在创作《我的他乡一日》，而他自己也像书中的主人公，深更半夜待在一个正常人不去的地方，醒着不睡。

汉堡，2021 年 12 月 15 日



王竞

中西文化项目策划人 / 写作者 / 德国当代文学翻译者。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 年赴德国工作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和教育学博士。2013 年至今生活在汉堡。

作家笔记

王竞是中德两国文学的游历者，她将在这个专栏中记录作家们生活和精神的种种碎屑，并让这些碎屑神奇地闪出文学的幻彩。



题图为《十二月月令图 十二月》（局部）

专栏

昔人已随青楼去，此地空余小红楼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食尽鸟投林”是每个人的归宿，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你我的片尾曲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当你用这些前人发明的词，来形容眼前的日子时，说明生活又重来了一次，生活在重来，或许是因为地球一直在自转。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读起来令人正能量爆棚，仿佛希曼的妹妹希瑞公主附体，手中的剑一举，正义自然来。但这届苍天明显不行，元宇宙商业化之后，苍天也利欲熏心了，经常饶过有钱有势的人。

我们这还流行另外一句从西方搬来有类似意思的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听上去也是“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的法治社会感觉。这话其实是从美国大法官休尼特的话演变出来的，但演着演着变味了，其本意是对“迟到的正义”的批评，对低效率的法庭审判的不满，表示迟来的正义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真正的正义。但这话放我们这，却成了昏暗人生的希望，因为正义在我们这太稀缺了，迟到就迟到吧，别旷工就行，但在有些地方，对于某些人而言，正义不仅仅迟到了，好像还被开除了。比如说 2017 年的上海创富大厦，现在人称小红楼，对于美国留学回来的陈倩而言，正义就被开除了三年。从她踏进大厦的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没有了出去的机会。她被困在这座人称“小红楼”的地方，被殴打、强暴、强迫取卵……在她终于找到机会报警的时候，黑警通知了她的老板赵富强来领她。生活总是以一种“不可能的”“早就过去几十年了”的面貌公转几十周后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打我们的脸。那时是 2017 年的上海，国际化都市，市中心所在地，赵福强跟区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派出所所长勾结在一起，在人称魔都的地方经营着一家魔窟，封建压迫感好像历史课本里 1949 年以前的上海滩，直至 2019 年这些人伏法。

2019 年的二十年前，陶晶莹发行了自己的主打歌《姐姐妹妹站起来》，“如果相爱要代价 / 那就勇敢接受它”，鼓励女性勇敢地去争取自己的爱情。六十年前的 1951 年，中国大陆上映了一部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目前豆瓣评分 8.9 分。这是一部关于妓女的电影，收容部门经常组织“解放”的妓女观看。它讲述了乡下女大香，丧父，跟随母亲投奔舅母，却被黑心舅母卖进窑子的故事。就像陈倩一样，大香屡次想逃，可惜没有机会。转眼到了 1948 年某个晚上，警察来妓院查验捐照，大香鼓足勇气报警，哪料到警匪一家，大香又是被一顿毒打，法院的法官也是拿了钱替妓院办事的，像极了 2017 年创富大厦里的女子。

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溃败，从 1947 年到 1951 年，石家庄、北京、吉林、南京、苏州

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取缔了娼妓业。上海属于取缔比较晚的地方，1951 年 11 月 13 日，上海警方通知全市还没关门的妓院老板马上关门。十天后，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市政府关于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议。历史往往很简单，一份决议就能概括，几十个字就能决定一群人的命运，但我们得尽量知道生活本身的繁杂以及每个个体的生活细节，这才能使得我们对当下生活的感知更为真切。就像那些被收容、被教育的妓女，她们是有血有肉鲜活饱满的，不是一句“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妇女”能概括的。1948 年一项针对上海市 500 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 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如果能找到一个有钱的丈夫，可以金盆洗手。”她们虽不是唐传奇里感情真挚敢爱敢恨的奇女子，也不是晚明才华横溢深明大义的秦淮八艳，但她们引领了社会风尚、开创了风气先河并且还承担了不少社会责任，一个尚未取得她们信任的人，口口声声说解放她、给她新生，她只会觉得你过得还不如她，不如她快恩仇，不如她敢为人先。

只有当历史把个体作为服务对象时，它才开始变得值得信任。在众多接受改造的妓女里有一个叫俞欣芝的，她经过改造后被介绍给一个三轮车工人相亲，头一次见面她说：“我旧社会是‘万人妻’，让政府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强求。”三轮车工人说：“以前归以前，现在好就行。”。临结婚俞欣芝问“你就不嫌我？”他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找个人不错了，你得给我生个儿。我们不能绝了后。”俞欣芝告诉他自己打过两胎，无法保证。他想了想说：“那也结吧，有感情了。咱俩都是苦人儿呀！”俞曾问过他：“旧社会你就那么干净？”他脸红了半天说：“踏三轮车的没几个娶得起老婆，有几个钱就走那道去坏地方呗。”坏的地方，也就是旧时的妓院，俞欣芝工作的地方。俞后来说了一句，“说不定我们是旧相识呢！即使是，也认不得了。”这是最打动人的一句话，既有对过往云烟的告别，也有不舍，既有对未来新生活的不确定也有美好展望，同时也饱含了对眼前人甚至是所有旧人的一缕思念。

写了这么多篇青楼主题的文章，查阅了不少专著和资料，也去过很多次夜总会做田野调查，不论是美好还是残酷，总感觉很虚幻。直到看了对俞欣芝的采访，这是第一次有如此真实的感受，虽然这份真实感觉源于掺杂了个人和集体的言不由衷以及别有用心的访谈。早期的狭邪小说也好，半真半假的历史资料也罢，往往把青楼描绘得过于美好，里面的女子美艳动人，才艺非凡，还重情重义富有家国情怀，而客人们也是学富五车，彬彬有礼，国之栋梁，正如鲁迅所说，这一时的狭邪小说不仅是才子佳人的一脉，更与红楼一泽。鲁迅在描述晚清狭邪小说的流变时说：“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以上海为背景的狭邪小说，基本处于近真与溢恶的阶段。这当然是与时代的变迁密不可分，早期的才子佳人溢美阶段，大家互相欣赏，彼此提升，置身世外，心里只有男欢女爱。到了近代，内忧外患，特别是身处漩涡中心的上海，西风东渐，诸如现代商业的发展、报纸的诞生以及它开始介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里，对青楼妓院这个行业产生了彻底的变革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使得妓女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甚至说是出尽风头，妓院成了维系许多商业利益的生意场，妓女成了生意场上重要纽带，她们也借此有了提升社会地位的空间和通道。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对于男性而言，特别是那些书写妓女的男性而言，是一种思想上的冲撞，她们不再软弱，不再小家碧玉，她们也就不那么惹人怜爱了，这大概是溢恶小说出现的社会心理根源。

不论是早期的溢美小说，还是近真阶段的作品，妓女都是作为男性的消费品出现的，是肉体娱乐消费品，也是文化精神消费品，所以他们对她们保持着珍爱珍视的姿态。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没落消亡，而思想开放的新派文人和商界精英开始崛起成为主流，青楼妓院的客户开始重新组合。客户的需求不再是含情脉脉、吟诗作对的浪漫主义人文情怀，而是把商业利益和商业合作当成主要目标，从花前月下，变成了花钱日下。以往有点才华的穷酸文人尚能在妓院找到知己，现在却常常因为囊中羞涩被拒之门外和床下，于是所写妓女主题的作品，自然是抨击和溢恶为主，他们小说中的妓女，呈现出与传统青楼文学中的妓女截然不同的形象，是一副只知道逢迎嫖客、榨取嫖客钱财的唯利是图的嘴脸。

不论对上海妓女再怎么“溢恶”，这些旧文人们肯定想不到，一百多年后，宣称“把鬼变成人”的新社会，居然还会出现重新把人变成鬼的事情，而且这个人还是先从自己的老婆开始变起。据媒体报道，上海红楼主人赵富强的第一单生意，是通过自己的妻子做成的：“把妻子推给其他男人完成皮肉生意，赚了第一笔钱。”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东北爆发大规模的下岗潮，女性失业尤为严重，在夫妻双双下岗又找不到新工作的家庭，很多女人被迫走上了卖淫的道路。据说，只能说据说，不少女人这样做，都是经过家里丈夫同意的。比如说沈阳的八一公园，“每天上午 8 点，丈夫主动骑着自行车，后面驮着老婆从铁西区到和平区，把老婆放到八一公园，老婆上班，男人离开，回家带孩子做饭。到了晚上 5 点钟，男人再骑着自行车到八一公园门口，接老婆‘下班’回家。家里每天用老婆挣来的钱买点一天吃的东西。”

我还看过一个类似背景的虚构故事，作者说是虚构，读完却感觉是源于生活，这故事说的也是东北下岗大潮里的一对夫妻，老婆在发廊卖淫，丈夫每天接送。一天中午他去送饭，发现发廊门口围着一堆人，还有警察。一打听才知道，嫖客不给钱，他老婆拉着不让走，被杀了，办案民警向丈夫介绍了案情，这个男人一言不发，表情麻木，最后，警察带着同情给他递了一根烟，丈夫抽完以后，说了一句话：“好久没抽过这么好的烟了。”我能理解男人的感受，生活的苦难一层层地压在心头，最后一丝希望也变成绝望，能自由支配的只剩下生存的欲望了，人类的自然情感被压抑着难以释放，感觉不到痛，感觉不到悲，哭也哭不出来。

1997 年，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展开，国企不再是铁饭碗，大批的工人纷纷下岗。对于后人而言，“打破铁饭碗”是好事，改革就要付出代价……，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历史，对于很多人来讲，却是痛彻心扉、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往事。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组以下岗再就业为题材的公益广告，主题曲是《从头再来》，“勤勤苦苦已度

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当年我被这首歌的旋律打动，被豪迈的歌词鼓舞着，虽然我不是下岗工人，现在回头看看，恰恰是因为我不是下岗职工，我才难以体会这首歌给他们的真实感受，第一句还算是人话，第二句算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第三句抒情的还不算过度，第四句就开始飘了，第五句简直不是人话，什么叫“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都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了，简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1999年的春晚，有个小品叫《打气》，哈尔滨人黄宏有这么一句词“当时我就表了态，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当时东北下岗潮已经拉开序幕，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而言，这个小品很搞笑，对于东北人而言，这个小品很可笑，既是对他们无情的吵闹，也是对他们无耻的消费。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别人陷于困境时，总有人替他们说着豪言壮语和催人泪下的话，这样做既掩盖了问题根源，也推卸了自身的责任，不出意外的话，未来会有更多感人的事情涌现出来，大家时不时的就要感动一下，这感动不能说是廉价的，它从他人的苦难里生出来，苦难如何定价？它又是廉价的，因为众人那轻而易举的感动。大家要坚守一个原则，绝不问这苦难从何而来，只是感动就行，只是落泪就行，谁要是发问打破这美好的氛围，就将他绳之以法，这很变态，也会是常态。

2016年，法国导演纳埃尔·马朗丹拍摄的影片《站街女》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背井离乡来到巴黎，被迫做起“站街女”的东北女人的故事。导演还是一名长期给性工作者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的公益组织成员，他说这些华人“站街女”中鲜有年轻貌美的少女，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上有老下有小，挣到的钱要么是寄给孩子，要么是寄给老人，导演感叹中国人好像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活，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却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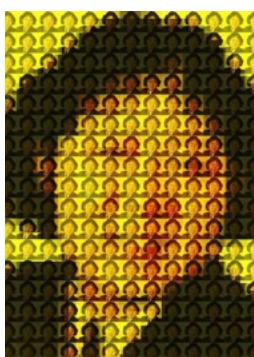
《站街女》剧照

从达旦连宵的秦楼楚馆，到旖旎多情的勾栏瓦舍，到风月无边的秦淮画舫，再到名伶齐聚的八大胡同，最后到中西合璧的长三堂子，她们既见证了一段历史，也推动了一段历史，而且她们中的个体，在滚滚的历史红尘中，也留下了鲜明的个体印记，于国于民，于公于私，她们应该被正视。当她们走到近现代，特别是那时的上海，商业的发展使得经济利益变得至高无上，商品经济原则成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自由平等的观念和思想，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进一步被打破，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同时获得了话语权和自由意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至少是在往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只是谁都没想到，发展到现在，权力腐败的加剧，导致了商业文明的溃败，这个行业以及女性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江河日下，甚至成为了上海红楼里的牺牲品。

年轻时，我痛批过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现在发现自己冒昧了，这个社会的现状是只要你有钱，什么笑都能买到，只要你贫，别想得到一个笑脸，除了嘲笑。我们活得越来越没原则，连古代土匪山贼都有个规矩，娼妓、和尚、道士、孤儿寡母、赶考举子、红白喜事，一般都不会抢，抢了会被人看不起，在同行里也会抬不起头。而现在的从业者，越来越没规矩了，行业越大越没规矩，就像房地产行业，12月3日，恒大集团在香港联交所发布了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近几年，恒大老板许家印曾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恒大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社会给的。”他还说恒大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党，当时我以为他说的是恒大的财富，现在才知道，是恒大的1.96万亿债务。正义在许老板这不仅仅是迟到的问题了，我怀疑正义被他包养了。

现在是2021年最后一个月，青楼主题的文章也写到了第十二篇，不出意外应该是告别篇，或许正是因为要告别，所以青楼写成了红楼，一种悲凉感压在心头，《红楼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女为他演唱了《红楼梦》十二支曲，最后一首是《收尾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世，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人生百态，往往殊途同归，“食尽鸟投林”是每个人的归宿，“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你我的片尾曲，也包括许老板。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专栏

从边界到边界

潘尼克 | 昨日世界

也许这里的宏观局势的确是动荡的，但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因生机勃勃而自然有之的混乱

当我站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地带时，我突然意识到两国之间的这条边境线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从地图上来看，它跟所有依据山脉和河流等天然地形来划分的边境线一样曲折蜿蜒，但实际上，这条线穿过的和美国中央大平原一样辽阔而平坦的旁遮普平原（线的西南端则是同样辽阔平坦的塔尔沙漠）。边境如此模糊不清，两个国家为了突显它的重要性，一致采取的方式是在往返于印度一方的阿姆利则与巴基斯坦一方的拉合尔的那趟列车的时刻错位。坐火车穿行这两座城市之间不到30公里的距离，你得一大早从印度这边出发到边境，然后在临近傍晚边境口岸关闭之前，才从边境区域继续前往拉合尔，中间还得换三次车。

在中间漫长的等待中，我百无聊赖地望着车窗外广阔的旁遮普平原。如果说旅行真的能教会人一些事情的话，那首先就是应对无聊。无聊可能是长途旅行中（可能也是生活本身）最大的常态，这是大部分游记作者不会轻易提及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眼前的平原可能比自己的处境更无聊：平静，干燥，灰尘纷飞，这片平原尽管位于喜马拉雅山西南麓，却与中国的华北平原颇有几分相似：平坦、干燥、灰尘纷飞，同样在等待列车出现的人。他们究竟是印度人还是巴基斯坦人并不重要，不出意外，他们都是旁遮普人，只是因为宗教信仰和一条草率划就的边境线而拥有了不同的身份。

“旁遮普”在波斯语里是“五河之地”的意思，因印度河的五条支流流经此处而得名。几条河流在这里冲积出一大片平坦而肥沃的平原，继而孕育了古老而灿烂的印度文明。可见，一片土地的富庶程度与其历史文化的浓度成正比，与自然景观成反比。自古以来，旁遮普地区都是南亚次大陆上最为富饶而发达的区域，现在依然如此。经济地位的重要就意味着政治地位的显著。1947年印巴分裂之后，旁遮普也被一分为二，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的时任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和曼莫汉·辛格，还有现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可汗都来自这片被一分为二的土地。可是也正由于这里平坦的地势，南北两头却有荒漠和高山阻碍了通道，所以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外来侵略者入侵南亚次大陆的时候，他们的铁蹄必须先踏上这片土地。千百年来，财富聚散、尔虞我诈和攻守退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演绎。古印度的文明余音与熙来攘往的不同民族和宗教也不断冲撞又融合，繁衍出文化灿烂而独特的旁遮普，又最终将它撕裂。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

火车轮轴转动的声音在空气中飘荡。炎炎夏日之下，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农夫在耕作。过边检的时候总算有了一些喧闹，印方卫兵总显得过分疑虑，寥寥无话；巴方卫兵一见来客是中国人，热情引导之余，争分夺秒用他们捉襟见肘的英文来跟我交谈：“中国、巴基斯坦，好朋友！印度、美国，敌人！打！一起打！”一边说还一边坚定地比了一个“砍”的手势——火车所经过的区域如此空空荡荡，让我几乎都忘了印巴两国大军正驻扎在国界两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等我到达拉合尔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对于刚从印度过来的人来说，即便刚刚见证过各种各具特色的火车站，也许仍然会为拉合尔火车站的庄严所赞叹，但同时也会惊异于它在夜色中的萧条。与熙熙攘攘又生机勃勃的印度火车站相比，拉合尔火车站实在太过于冷清，连车站外的突突车司机见到外国游客之后也并不十分殷勤。这样反倒更好，省去不必要的纠缠之后，我直接坐上其中一辆突突车，跟司机直指我的目的地，拉合尔的市中心皇家集市（Regale Chowk）。

拉合尔是整个旁遮普地区最大的城市，而且千百年来一直是这片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座城市起源和其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大部分都笼罩在各执一词的传说之中。譬如，有说法认为拉合尔为罗摩神的儿子、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英雄Loh 所建并以其命名；又或者说，它的名字来源于“铁”的古语“Ioha”，以此来表明城池固若金汤，尽管事实正好相反：由于坐落在南亚次大陆和中亚的战略和贸易通道上，并且缺乏天然的屏障，其历史在攻陷、破坏与重建之间不断循环重复。

历史上关于拉合尔第一个可靠记录却是来自于玄奘和尚，在公元 630 年到访这个城市，并在《大唐西域记》里留下了简短而且早已面目全非的记载。当时，拉合尔仍然主要流行着印度教和佛教。1021 年，马赫穆德·加兹尼（Mahmud of Ghazni）率领大军从婆罗门国王手中夺下了拉合尔，成为这里的第一个穆斯林统治者。其后，这里成为加兹尼帝国的首都，一直到 1186 年。

在接下来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拉合尔在不断更替的王朝手中传来传去，并不时地受到蒙古人的侵扰。直到莫卧儿帝国的巴布尔于 1524 年君临此地，拉合尔才迎来相对的和平。第三位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于 1584 年至 1598 年定都于此。此后尽管都城东移，拉合尔仍然是整个莫卧儿帝国的政治重镇。而最后一位伟大的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拉合尔，他于 1707 年死去，当时整个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其后，拉合尔陷入莫卧儿人和锡克人之间的血腥争夺之中，中途却被阿富汗人阿哈麦德·沙·杜兰尼夺去。1799 年，拉合尔的权柄转移到以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为首的短命的锡克帝国手中。随着兰吉特·辛格的死去，拉合尔旋即陷入权力真空，很快就被英国人所填补，直到 1946 年。

那时候的拉合尔演到如今只不过是整座城市西北部一片被包围在 9 米高的城墙和 13 座城门之内的区域，也就是所谓的老城。乍看之下，仿佛回到了德里的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同样的古老，同样的拥挤和喧嚣，同样的像蛛网一样的街道，连两地最为壮观的清真寺和城堡彼此都是相似的。

马路两边商店招牌上的乌尔都文时刻提醒我如今身在巴基斯坦。普通老百姓的着装也大不相同——这边的男性大都身穿巴基斯坦的国服“Shalwar Kameez”，是一种在阿拉伯长袍的基础上略作修改，上衣下摆长及膝盖的宽松套装。在这里没有人会跟我提到宝莱坞电影 Chandni Chowk To China，取而代之的是“巴基斯坦，中国，好朋友”，尽管最后难免殊途同归至“中国人是不是都会功夫”之类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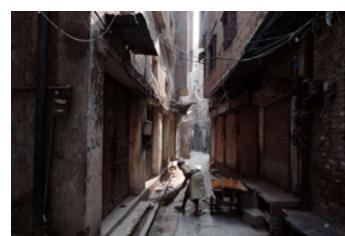
应付过无数寒暄和好奇之后，我终于在杂乱无序的老城中迷路。如此正合我意。依然坚持顽强抵抗日益迅猛的全球化的古代城市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人仍然能够在古老的生活方式中怡然自得。我迷恋并追逐着这样的城市，并深信迷失其中是最好的体验方式。我悠闲漫步于无数蜿蜒狭窄的小巷之中，一边看着两边摇摇欲坠却雕饰讲究的老房子，偶尔从夹缝中窥见清真寺的宣礼塔，一边与匆匆忙忙的贩夫走卒在拥挤的空间里擦肩而过。逛累了就在随处可见的奶茶铺坐下，喝上一杯甜得发腻的奶茶，等着过往的路人中间，时不时停下来一个稍微会讲一些英文的跟自己攀谈。



夜晚拉合尔街边的水果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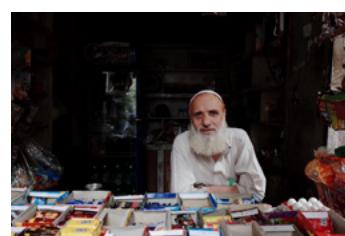
穿梭在拉合尔老城迷宫里的马车



拉合尔老城里，一名老人在打扫巷道



拉合尔老城里两名并肩行走的男子



拉合尔老城里的杂货铺



拉合尔老城里，两个在巷子里玩耍的男孩

“噢中国人！好朋友！”

“谢谢。”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生子。你呢？”

“我有3个兄弟3个姐妹。”

……
“中国现在的总统是……Who (Hu) ?”

“不，是成龙。”

“啊……？真的吗？”

“真的。因为他的功夫打得最好。”

“是是是！没错没错！”

……
“啊中国人，欢迎欢迎……你知道吗？本·拉登是好人。”

这时候空中悠悠传来响亮的伊斯兰吟唱——礼拜时间到了。如果将拉合尔老城比作梵高的名作《星空》，那片螺旋状的混沌是这里密密麻麻的街道巷陌，而点缀在这片混沌上的星星，毫无疑问就是老城里的清真寺。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在老城里随处可见，其中有三座最为著名。苏尼里清真寺 (Sunehri Mosque) 坐落在老城的中心，于1753年由比哈里汗下令建成。尽管规模不大，但它著名的三个镀金圆顶和镀金尖塔，至今仍闪亮如初。

而我更偏爱坐落在老城东端的瓦希尔·汗清真寺 (Wazir Khan Mosque)。它于17世纪由沙·贾汗在位期间的皇家医师及旁遮普省的长官瓦希尔·汗下令建成，此后一度是培养伊斯兰书法家的重要场所。其堪称巴基斯坦境内最精美的清真寺所言非虚，对建筑艺术史一窍不通者如我，也仍然可以从清真寺外墙内壁上精致繁密的装饰感觉到它的非凡小可。匪夷所思的是，身处闹市的它却乏人问津，前来做礼拜的穆斯林寥寥无几。而清真寺本身虽风韵犹存，实际上缺乏修缮，所见之处，颇显破败。这恰恰是我钟爱此处的原因。清真寺的高墙和宣礼塔生存在闹市中隔出一片萧索和冷清，能听到的唯有夏日和凉风的声音。在礼拜堂里的地毯上一坐半日，偶尔伸手抚摸斑驳的墙壁和渐渐剥落的壁画，又慌忙缩回，仿佛触及了整座拉合尔老城最隐秘的历史。

位于拉合尔老城西北部的是拉合尔最大的清真寺巴德夏希清真寺 (Badshahi Mosque)。它由奥朗则布在1674年下令建成，是莫卧儿王朝最后的建筑大手笔之一。它一度被英国人毁坏，随后得到重建。其庭院据说能够容纳10万人，这也是其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虽有偷换概念虚张声势之嫌，但是它庄严的主门，四座由红色砖石砌成的高耸的圆锥形宣礼塔，主殿上方三个由大理石砌成的巨大穹顶，仍然构成令人赞叹的恢宏。1991年，清真寺的毛拉们曾引起过全世界的关注，他们抗议来访的戴安娜王妃所着裙子过短，而且官方还允许她在“穿着不得体”的情况下进入圣堂，亵渎了宗教。这种浪费生命的案子最后当然不了了之。也正因为名声在外，如今的巴德夏希清真寺即便对于很多本地人来说，也更像一个旅游景点，大部分人都在这里忙着合影留念，做礼拜做功课的人反倒寥寥无几。

巴德夏希清真寺大门外南侧，是巴基斯坦著名哲学家及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Muhammad Iqbal) 墓，他在1930年代首次提出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想法。奶油色大理石砌成的墓上永远铺满了鲜红的玫瑰，使得整个墓室芬芳扑鼻。北侧则是兰吉特·辛格的神龛，以及由他下令建成的纪念锡克教第五代领袖 Arjan Dev 的金庙。顶上结合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风格的穹顶，如金色莲花盛放在巴德夏希清真寺的红墙边。1947年印巴分裂期间，巴基斯坦境内的教徒绝大多数都迁徙到了旁遮普地区的印度控制部分，留下这空荡荡的异教神庙，在穆斯林的土地上顽强记录着锡克帝国转瞬即逝的辉煌。

巍然矗立在巴德夏希清真寺对面的是壮观的拉合尔堡。这座由11世纪的迦色尼帝国皇帝建立的古堡，经历了数次的建立、毁坏、拆除和重建之后，由阿克巴大帝以拉合尔为首都期间，奠定了主要形态。1618年，贾汗吉尔大帝对拉合尔堡进行了一些修缮和调整，此后历任皇帝也有加进自己的建筑。和莫卧儿王朝的另外两座著名古堡——分别位于印度德里和阿格拉的两座红堡一样，拉合尔堡也主要使用红色砂岩和白色大理石修建。而其中最精美的建筑当属沙·贾汗的手笔，比如有着四十根高大立柱的会客厅，以及为他的皇后所建的镶满镜子和宝石的镜宫。对了，这位沙·贾汗也是著名的泰姬陵的修建者，他在位期间可以说是莫卧儿建筑艺术的黄金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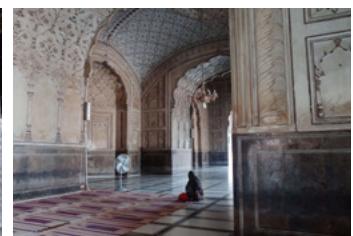
夜幕降临，我也回到了旅馆的所在地，林荫大道 (The Mall Road)。林荫大道又称“Shahrah-e-Quaid-e-Azam”（由于太过拗口，所以当地人也往往弃之不用），是拉合尔最主要也最有名的一条大道。它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建成，也许出于乡愁，顺手就用伦敦的林荫大道为之命名。甚至街道两边建筑的功能也与之相仿，许多曾经和现在的权势人物的办公地点乃至居所，皆位于这条大道的两边。

不但历任统治者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又各不相同的烙印，再加上宗教的差异和将近70年的政治分裂，这一切都为拉合尔塑造出了独特的城市面貌——如果说以拉合尔堡和巴德夏希清真寺为主的拉合尔老城象征了莫卧儿王朝时代的恢弘，那么林荫大道则保留着大英帝国殖民时期庄重而严谨的遗产。沿路大部分建筑建于英国殖民时期，以红砖为主要建筑材料，是莫卧儿和英国殖民风格的美妙集合，配以繁茂的绿荫，拉合尔最美大道的赞誉当之无愧。沿着大道自东往西，首先会到达有“巴基斯坦的伊顿公学”之称的艾奇森学院。在相继经过真纳公园、真纳图书馆、拉合尔动物园和旁遮普大学之后，最后到达拉合尔博物馆。

印巴分裂的时候，拉合尔博物馆里许多展品都被搬到了印度。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巴基斯坦最大而且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博物馆内将近20个展厅娓娓讲述了从石器时代一直到20世纪整个南亚次大陆的灿烂历史。来自摩亨佐-达罗 (Mohenjo Daro) 和哈拉帕 (Harappa) 的文物显示着古印度文明的发达，细密画、地毯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伊斯兰艺术作品则彰显着古代伊斯兰世界的繁华。犍陀罗时代的展品最为独特，其中又以禁食佛陀雕像最为著名。这座雕像描绘的是佛祖悟道前苦行六年的形象，只



坐在店铺门口横凳喝茶的店家



巴德夏希清真寺里做礼拜的穆斯林



巴德夏希清真寺里，一名妇女在祈祷



两名男子坐在巴德夏希清真寺的阴凉处歇息



白沙瓦街头就地用餐的当地人

见黑色石材上呈现出一副宛如骷髅的趺坐躯体，然而皮包骨头的瘦削之下，突出的脉络分明让人感知到无限的生机。

如此这般在拉合尔盘桓数日之后，我开始动身前往位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的白沙瓦。从拉合尔到白沙瓦全程走高速的话大概耗时8个小时，自西向东地势由低变高又变低，一路上绿野山峦，阅之不尽。途中还经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座20世纪中后期方才开始兴建的城市乏善可陈，大可略过不表。

一般人要是知道白沙瓦的话，不可避免会将它与各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基本上，那也是人们对白沙瓦仅有的了解。我并不怀疑此地任何一起暴力事件的真实性，我只是不觉得，当地居民真的会时刻被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惶恐终日。我只是相信，在有限而且片面的媒介信息之外，有着另外一个白沙瓦，一个古老而依旧充满活力，一个嘈杂混乱但大多数人安居乐业的白沙瓦。

巴基斯坦的一大魅力就在于，由于整个国家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地理位置，这片土地上的主要城市，都有意无意成为不同的民族和文明的交汇点。白沙瓦也不例外。作为内陆亚洲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自古以来就是连通南亚次大陆和中、西亚地区的交通要道上的贸易和军事重镇，而内陆亚洲各地缤纷多彩的文化也在此处交汇出独特而绚烂的花朵。

与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同时期，信奉佛教的贵霜帝国（也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大月氏）曾经以白沙瓦为冬季首都，白沙瓦梳理成章成为犍陀罗艺术的中心之一。公元11世纪，在阿富汗的加兹纳维兹王朝的占领之下，白沙瓦开始伊斯兰化；随后，它又落入莫卧儿帝国之手。此前白沙瓦的其他统治者一样，莫卧儿皇帝也清楚认识到这座开伯尔山口下的城市的战略重要性。莫卧儿帝国不遗余力地在白沙瓦建立起一座座花园、清真寺和纪念堂，其精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其在拉合尔和德里的同类，直到阿富汗人在1680年代又重新控制这座城市。

和贵霜帝国一样，这一时期的阿富汗统治者也喜欢把白沙瓦作为其冬季的居所，可惜在1818年，崛起的锡克人攻占白沙瓦之后，将他们修建的建筑夷为了平地。1849年，随着锡克人的迅速衰落，此时已经活跃在南亚次大陆上的英国殖民者成功将白沙瓦据为己有，并将其作为印度的边境总部，一直持续到印巴独立和分裂。由于处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交界位置，随着苏联入侵和9·11事件的发生，白沙瓦的地缘政治意义依然鲜明。

虽然只距离8个小时的车程，但拉合尔和白沙瓦之间的差别绝不比沈阳和昆明之间的差别要小。拉合尔的主要居民如前所述是旁遮普人，而白沙瓦的主要居民则是普什图人，并且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旁遮普人一样，普什图人同样可以在邻国找到大量的亲戚——普什图人不仅是白沙瓦及其所在省份的主要民族，也是阿富汗的多数民族；至于从白沙瓦开车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般情况下只需要6到7个小时。忽略边检



白沙瓦老城的街头，依然有马车在缓慢行驶



走在白沙瓦老城街头的母子



白沙瓦街边贩卖各种二手、盗版书的小男孩



白沙瓦老城珠宝店满脸白须的老板



马哈巴特·汗清真寺的穹顶上布满华美的装饰



马哈巴特·汗清真寺里，人们正在做礼拜

因素不提，从德里开车到拉合尔，所花时间大约也不过八九个小时——于是有时候讨论拉合尔和白沙瓦的差别时，竟近似于讨论印度和阿富汗的差别。

恐怕其他游客也有类似感受，在拉合尔总觉难拂印度余香，周遭一切似乎都还是咖喱味的；到了白沙瓦，咖喱虽说并未销声匿迹，领袖地位却早已被烧烤取代之，在中午之前，甚至还有洋洋中亚风的羊肉抓饭伺候。拉合尔的风气相对开放，又或许旁遮普人在生活上更愿意适当恪守自身传统，于是那里的女性大多身穿旁遮普民族服饰（就叫 Punjabi），头巾也不是至关重要的；白沙瓦则要保守得多，头巾自然是无一例外，绝大部分女性总有这样那样的装备和方式遮住面孔，能够让人一睹真容者寥寥无几，倒是更贴近游客对封闭又神秘的伊斯兰世界的奇特想象。

老城，依例是我造访白沙瓦的主要原因。它是一个拥挤而喧闹的迷宫，甚至比拉合尔老城还复杂得多：满载货物的骡车和马车、突突车、摩托车把道路堵塞，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在此间匆匆交错穿行，偶尔还夹杂着几个身穿布卡（覆盖全身包括头部的长袍）、身份神秘的女人施然行走其中。我也依例会迷失其中的，任由那些蛛网一样密布又蜿蜒的街道领我进入布满货物堆积如山的小商店的幽暗通道。

在这座古老的贸易城市里，一切都是待价而沽，于是整个老城也由一个个功能不一的“巴扎”组成。从军营区沿着铁道街走向老城，沿途会经过开伯尔巴扎，大部分的廉价旅馆、烧烤摊、地毯客商都聚集于此。1950年代，白沙瓦的城墙及16个城门几乎都被推倒，但城门所在之地仍保留其名。在不复存在的喀布尔门，开伯尔巴扎摇身变为奇萨·霍安尼（Qissa Khwani）巴扎。这里是白沙瓦最著名的巴扎，奇萨·霍安尼的意思是“讲故事的人”。只不过，商人和旅行者聚集在这里的茶馆，呷上一口加盐或加糖或加奶又加糖的劣质红茶，将各自带来的故事娓娓道来的盛景早已不再——大部分的茶馆如今都被服装店和电器店所取代。从奇萨·霍安尼巴扎的拐角处左拐，在原来鸟市所在的地方，则充斥着铜器商店。

就这样盲目地在各个巴扎里漫步穿梭，时而被香料刺鼻的气味迷惑，时而被缤纷的民族服饰吸引，时而被各式各样的坚果和干货唤起原初的食欲，时而被闪耀的珠宝首饰晃住双眼，本就已迷失的思绪更加不知身在何地，今夕何夕。于是便大胆断定自己回到了中世纪，似乎那些不合时宜的电器，也并不必插上电源，只需要点上几把柴火或者拴上几匹毛驴，便会笨手笨脚地运转起来。

后来竟不知不觉在珠宝市场深处寻到了马哈巴特·汗清真寺的踪迹。清真寺建于1630年，无独有偶，和拉合尔的瓦希尔·汗清真寺一样，都是莫卧儿皇帝沙·贾汗时期的建筑。此时礼拜的时间还没到，大殿里面幽暗寂静，从里面往外看，拱门上方是彩色镶嵌的玻璃窗，阳光穿透过来，把五色的图案画在灰白云雾状大理石的地面，也落在大殿里几个低头静默的男子身上。四面的墙上的色彩比外面更加令人目眩，殷红深紫和墨绿湛蓝的宝石和荧亮的贝壳平整嵌入墙面，组成枝繁叶茂花草妖娆的美丽图案。

我此刻难免心醉，遂也觅了一个僻静之处自顾自坐下来。回想起近日来从边界到边界的行迹，虽跨度不大，仍觉阵阵恍惚。这个国度固然是年轻的，可是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比印度河更源远流长；也许这里的宏观局势的确是动荡的，但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因生机勃勃而自然有之的混乱，而这显而易见的混乱之下，又有旁人难以察觉的古老秩序在稳定运转。我只好微微摇头，既知连日所获依然消化不及，而未曾涉猎者远甚更多。

这时礼拜的广播终于响起，念诵经文的声音一貫的洪亮而深沉，平和而悠远。我内心

突然有一丝恍然：也许不管时局如何，也不管街上何等嘈杂，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们内心始终持有一份安宁，或来自宗教或来自传统，与此地的高山大河平原一道，皆非一切说变就变的风云所能轻易左右的。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潘尼克拍摄



潘尼克

曾供职于北京数家媒体，业余写作者、当天来回徒步爱好者，擅长休闲式穷游及半糖水纪实摄影。目前在重庆某洞子酒吧打工，尚无任何著作出版。

昨日世界

总会有一个时刻，我们会怀念起自己的语言，习以为常的眼神，熟悉的言行习惯和道德标准时，然后恍然惊觉自己已经距离家乡几万公里远。



图为电影《无依之地》(2020)剧照

专栏

瘟疫之下： 2021年度文化观察笔记①

曾梦龙 | 小鸟 2021年终回顾

你又会如何回望 2021 年？

去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最糟糕的一年”，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如果回顾今年，你还会同样的感受吗？

12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今年330多万人死于新冠病毒，2022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大流行。明年的事不好说，但若论今年，新冠疫情肯定是关键词。在中国，从张文宏医生“与病毒共存”的言论引发的争议，到最近西安的封城，疫情仍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远未结束。

在国外，《牛津词典》和《韦氏大词典》的年度词汇都和新冠疫苗有关，前者是接种疫苗(Vaccination)的口语简称“Vax”，后者就是“疫苗”(Vaccine)。而从Google的2021年搜索趋势看，人们关于“如何治愈”“如何纪念某人”“还会再次封城吗”“如何关爱心理健康”“什么时候我可以打疫苗”等问题的搜索量也明显上升。

今年除了疫情，还有太多事情发生，但正因为太多，距离太近，我们往往来不及讨论、记忆、回望和反思。况且，在这样一个缺乏共识、躲进个人的时代，做这样一种年度文化观察笔记势必困难，很容易视角有限，挂一漏万。但是，人如果没有记忆与回望，就没有认同和反思，也就没有更好的人以及公共生活。

所以，《小鸟文学》仍旧尝试从文学、影视、社会、媒体、城市、历史、思想七个方面，观察文化趋向，记录未来可能有价值的一些事，以及最后留下一丝逝者记忆。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场回顾，也可以是一份邀请——你又会如何回望2021年？

01

年度文学观察——瘟疫文学

瘟疫和人的历史有多长，它和文学的关系就有多密切。在灾难的阴影下，凝结了许多经典，比如14世纪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19世纪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红死魔的面具》、20世纪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20世纪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2021年，各地关于瘟疫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卫报》一篇盘点文章称](#)，第一批瘟疫小说已经到来。先是英国作家阿莉·史密斯在《夏》(Summer)中融入瘟疫的情节与反思；接着，[萨拉·霍尔](#)(Sarah Hall)的《烧衣》(Burntcoat)、萨拉·莫斯(Sarah Moss)的《坠落》(The Fall)、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的《没有孩子的生活》(Life Without Children)等，完全把小说背景设置在新冠疫情期间，探讨亲密关系、心理状态、社会变化等主题。

这些小说大多偏历史和现实，病毒像是导火索，暴露出社会已有弊病，如政府腐败、社会不平等、公共服务不足，以及由于封锁、隔离带来人的关系、情感和心理变化，人与人的连结和共同体塑造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

还有一类瘟疫文学则是幻想小说，情境更为极端，许多带有反乌托邦色彩。比如今年获阿瑟·克拉克奖的小说《在那个国度的动物们》(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想象了一个被“动物流感”(zooflu)袭击的世界，自此人类和动物能够理解彼此语言；奥纳·阿里斯蒂德(Oana Aristide)的《蓝色之下》(Under the Blue)将瘟疫和人工智能结合展开故事；柳原汉雅的《去天堂》(To Paradise)写到2093年，那是一个被瘟疫撕裂的极权世界。

除了欧美，《世界文学》在11月推出的“疫情现场”专题里，刊登了四篇“南非作家封城纪事”的文章，包括《封禁：并非笑料》《论移动、人权和新冠肺炎》《思乡：封城琐记》《野兽、巨龙和其他启示》，均译自《封城选集》(Lockdown Collection)一书。该杂志称，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南非在2021年7月爆发了1994年解除种族隔离以来最大的骚乱。从这些作家对“封城”生活的记录，我们能提前感知这种紧张不安的气氛，窥见南非的社会痼疾(如贫富分化、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如何被疫情突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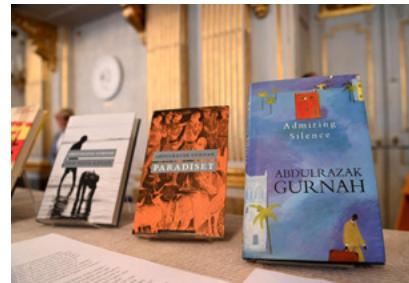
在中国，虽然素材颇丰，但原创的瘟疫文学似乎并不多见。其中，《小鸟文学》曾刊发的两篇小说——六神磊磊的[《疫区》](#)、李静睿的[《流调报告》](#)，值得一读。至于引进，美国作家劳伦斯·赖特的《十月之殇》、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新冠时代的我们》，胜在应景，但反响平平。联想到去年方方日记引起的争论，中国作家如何书写瘟疫和人，不啻是一道棘手难题。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

1、2月，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据缅甸诗协统计，政变以来，已有30多位诗人被关进监狱，至少4名诗人——占塔瑞(Ko Chan Thar Swe)、敏敏金(Ma Myint Myint Zin)、祈宅荣(K Za Win)、克薛(Ko Khet Thi)——被杀。克薛被杀前，曾在占塔瑞的葬礼上朗诵诗歌：“他们开始烧死诗人/但灰烬会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

2、5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再次爆发冲突。11月，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拒绝出售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的希伯来语版翻译权，表示抗议。随后，两家以色列连锁书店宣布将鲁尼的书下架，但鲁尼得到杰夫·戴尔等70名作家与出版商的支持。

3、8月，塔利班夺取喀布尔，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历史终结。《追风筝的人》的作者卡勒德·胡赛尼，心情悲伤、恐惧，希望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阿富汗人的未来，尤其在妇女和女童的基本人权保护上，给予更多援助，也希望人们能更深入挖掘和阅读历史书籍，了解阿富汗。



瑞典学院陈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作品。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4、2021年成为“非洲文学年”。6月，法裔塞内加尔作家戴维·迪奥普(David Diop)获得国际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摘得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作家；10月，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出生在东非桑给巴尔岛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11月，南非作家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凭借小说《承诺》(The Promise)获得布克奖。

5、2021年，老作家方面，在国内，余华的《文城》、[刘震云](#)的《一日三秋》、[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等受到关注；在国外，[乔纳森·弗兰岑](#)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科尔姆·托宾](#)的《魔术师》(The Magician)、保罗·奥斯特的《燃烧的男孩》(Burning Boy)等引发讨论。

年轻作家方面，在国内，陈春成、[周恺](#)受到文学奖项青睐；在国外，鲁尼依然火热，《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获近7万票，荣膺Goodreads年度最佳小说。如果你对鲁尼感兴趣，推荐《小鸟文学》刊发的两篇小说([《罗比·布拉迪惊人的终场射门载入了我们的私人史》](#)和[《色彩和光线》](#))以及[黄昱宁的书评](#)。

02

年度影视观察——《长津湖》和《鱿鱼游戏》

作为现象，而非作品，《长津湖》和《鱿鱼游戏》可能是2021年最值得讨论的两部影视。不过，前者只针对国内，后者则是全球观众，期间的差别或许也反映出中国和世界这些年变化。

先说《长津湖》，它以累计57.7亿的票房，超越《战狼2》，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榜冠军。关于为何如此，有许多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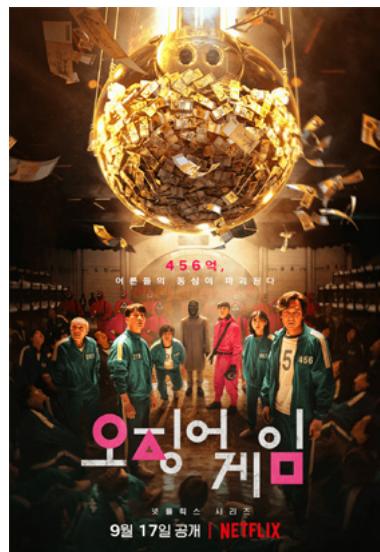
据《文艺报》，[总制片人于冬称](#)，这不仅仅是中宣部电影局亲自指导的命题作文，更是几代导演的梦想。《长津湖》投资14亿元人民币，超过2亿美元。疫情期间，

好莱坞都没有超过 1 亿美元的电影，复产复工速度更晚于我们，但是中国的影视公司能够在疫情期间克服困难，从容面对相当于好莱坞 A 级制作的规模，着实体现了中国电影人的勇气和实力。

《环球时报》则把《长津湖》放在时代语境中，称“电影中展示的民族感情呼应了挑衅面前维护国家利益的公众情绪在上升，这对今天的中美竞争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发表早于《长津湖》上映时间，学者常江在论文《流行化宣传：数字时代中国爱国主义动员》中，并未直接讨论这部电影，但他的历时性观察很有价值。在他看来，过去十年，中国的文艺宣传品开始向流行化转型，打造作为“商业—道德联合体”的“新偶像”（如 TFBOYS），对青年亚文化进行主流化改造。这些策略背后是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群体心理基础，两者相互建构、维系与交缠，使得新时代的宣传在商业和文化上取得成功。

除了票房，《长津湖》在今年还引发了对历史的广泛讨论和社会影响。比如，河南郑州宇华实验学校组织 500 名学生观影，并为学生准备了冻土豆和炒面粉，希望他们感受当年战争条件的艰苦和胜利的来之不易；江西赣州的赖先生在看完电影后也尝试吃冻土豆，但由于有牙周炎，他咬了冻土豆后牙齿松动，不得不上医院拔掉 3 颗牙齿；前媒体人罗昌平在微博评论《长津湖》，质疑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警方认为，罗昌平的言论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已对其刑事拘留。



连续剧《鱿鱼游戏》海报

至于《鱿鱼游戏》，它成为 Netflix 有史以来播放量最多的剧集，全球观众超过 1.4 亿。一种被多次提到其流行的原因是，它和韩国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寄生虫》类似，批判了资本主义和不平等，所以引发许多共鸣。

《鱿鱼游戏》的导演黄东赫在接受 Variety 采访时说：“我希望写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描绘极致竞争，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极致竞争一样。我想使用我们在真实生活中都遇到过的人物。”

学者方可成指出了这种批评中蕴含的反讽：“这部剧通过批判资本主义，让全世界那么多人觉得感同身受，最后直接受益的还是这家资本主义公司和它的投资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似乎并不惧怕对自身的批判，甚至能通过批判自己，进一步发展自身的利益。”

要知道，有些国家和主义是不允许批评自身的，比如称赞《鱿鱼游戏》揭露资本主义黑暗的朝鲜，断然不会说自己不好。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

1、4 月，赵婷凭借电影《无依之地》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裔女性，也是第二位赢得该奖项的女性导演。在颁奖典礼上，她用中文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因为过往言论，赵婷遭到一些中国网友围攻，电影和本人均被限制讨论。后来，采访赵婷的澳大利亚网站做了更正，表示错误引用赵婷的话，但收效甚微。

2、8 月，FIRST 青年电影盛典颁奖礼在西宁举行，其纪录片奖项空缺。嘉宾马英力在现场解释空缺原因说：“由于今年的纪录片竞赛中有 4 部作品完全或部分缺席面向公众的放映场次，当奖项脱离观看、脱离观众，它也会因此失去评价的有效性和意义。因此，评委会决定，本年度最佳纪录片荣誉从缺。我们期待影像终将抵达现实、抵达观众。”

3、《你好，李焕英》以累计 54.1 亿票房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榜季军，仅次于《长津湖》《狼 2》。贾玲由此超过《神奇女侠》的导演派蒂·杰金斯，成为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除了《你好，李焕英》，今年《我的姐姐》《兔子暴力》等女性电影也惹人瞩目。

4、三位成名艺片导演的新作，口碑和票房均不理想，包括贾樟柯聚焦作家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许鞍华、王安忆改编张爱玲原著的电影《第一炉香》；娄烨、马英力改编虹影、横光利一原著的电影《兰心大剧院》。相比之下，年轻导演魏书钧的《野马分鬃》、鹏飞的《又见奈良》等，获得一些鼓励和认可。

5、在国外，日本电影导演滨口龙介成为许多外媒年度评选的宠儿。今年，他以短片集《偶然与想象》获得柏林银熊奖，紧接着又以改编村上春树原著的电影《驾驶我的车》获得戛纳最佳剧本奖。

03

年度社会观察——举报文化 VS 取消文化

今年 1 月，《小鸟文学》在回顾《2020 留给我们的文化记忆》时，就讨论了 J.K. 罗琳的跨性别言论引发的许多争议。这被一些人看作西方“取消文化”思潮的代表，侵害了言论自由，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取消文化”这个词如同“政治正确”，本身是对左翼“警醒”风潮的偏见和污名，根本无助于细致讨论，侵害言论自由也是夸大说法。无论如何，这场争论仍在继续。2021 年 11 月，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 20 周年之际，HBO Max 宣布将在 2022 年推出特别节目《重返霍格沃兹》，邀请了丹尼尔·雷德克里夫、艾玛·沃森、鲁伯特·格林特等主创，但其中唯独没有罗琳。与此同时，罗琳称，去年 6 月以来，她收到源源不断的辱骂和威胁信息，而且有三位跨性别活动家在其家门口抗议，后在社交媒体上贴出显示罗琳住址的抗议照片。“取消文化”在中文世界也引起不少关注，一些网友对此持看热闹心态，觉得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如此；另一些网友则对这种思潮忧心忡忡，担心自由世界和其价值的蜕变和崩溃。其实，两者也许都有失偏颇，看到的是想象中的西方，低估其自我调整的能力。相比之下，与其津津乐道“取消文化”，不如多关心一下这几年中国社会似乎愈演愈烈的“举报文化”风潮。毕竟，罗琳被“取消”了这么久，影响有限，但我们这里的“举报”，能让迅速被“取消”。

关于“举报文化”，2021 年公众最为关注的或许是宋庚一事件。12 月 14 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在《新闻采访》课程中发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学生将其视频传到网上，引发热议。12 月 16 日，校方宣布开除宋庚一，称其言论错误，造成重大教学事故和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虽然一些网友认为视频上网是否属于举报有待讨论，但至少从大量讨论将其称为“举报”的现象来看，反映出对社会氛围的普遍忧虑心理毫无疑问是真实可感的。的确，这几年类似事件似乎层出不穷。这也引发了许多人对宋庚一的声援，湖南湘西永顺县教师李田田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微博上公开批评学生、学校、官方报道和沉默的知识分子。

12 月 19 日，李田田在微信朋友圈称，“昨天被永顺县教体局和公安局登门威胁，现在又被教体局和医院的人登门威胁，以精神有问题为由，要求我住院打针治疗，否则将开除和抓捕”。此后，李田田失联。据财新，李田田的多位好友证实上述消息，称李田田曾向他们求助，说永顺县教体局、公安局突然登门，要求她就微博言论在相关材料上“签字认错”，并以“开除”等施压。

12 月 24 日，湘西自治州政府称，李田田入院是本人和亲属意愿，“目前正按照其亲属意愿继续住院治疗，对其发表不当言论的行为，待出院后再依法依规进行教育劝导”。

12 月 26 日，李田田的微信公众号“山花诗田”发文称，自己刚从“医院”回来，一切暂时安好，向大家报平安，感谢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

深圳大学讲师吴远卿是另一位声援者。他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人民日报》2015 年的一篇文章，批评举报老师的学生成小人。该文写道：“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这条底线，在大学里首先应该明确、清晰起来。”

学生杨桐林看到吴远卿的转发后不满，认为吴“将国家的根本底线抛在了对立面”，质问“这是堂堂深圳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师无法分辨到底谁在断章取义，还是为了别有用心只能找到如此粗烂之文来支撑其观点”。举报信显示，杨桐林曾于上学期举报过吴远卿，这次他想到举报后会遭遇批评，“但是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邻，我觉得有必要也有意义发出该文”。

除了声援及其衍生事件，一些人还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批评上传视频的学生，但这些人又反被爆出。比如，12 月 17 日，山西晋城交警的官方微博称，网友反映，疑为我支队四大队民警张某通过手机短信对网称某爱国青年发送不当信息，正在展开调查。

而在支持上传视频学生的言论中，《环球时报》的评论属于代表。该报宣称：“这名学生不是令人不齿的‘告密者’，而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吹哨人’。”



《休战》一书在豆瓣上的评分截图。

如果说宋康一事件是许多人对学校文化担忧的映射，那么今年3月豆瓣上围绕小说《休战》发生的举报事件和“一星运动”，则是“举报文化”更为广泛的体现。3月16日，北京语言大学研一学生高晗在豆瓣给《休战》打出两星，称“机翻痕迹严重，希望出版社至少找西语科班出身的译者翻译这些名家”。

《休战》译者韩烨认为高晗的评价并不公允，译者、编辑汪天文也表示支持韩烨。但是，韩烨的朋友杨君宁直接向北京语言大学寄出举报信，称“本着维护贵系乃至外语学部和学校学术形象的考量，以及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贵系应该主动介入”，此举“挽救失足学生，不失为教育之初心”。

3月27日，高晗发布致歉声明，称经批评教育后，意识到发表不妥言论，已做删除，向韩烨与作家出版社道歉。随后，大批豆瓣网友为其鸣不平，对《休战》打出一星评价，汪天文及其译作也遭波及。

回顾整个事件，正如《T》中文版一篇评论所说：“关于《休战》的这出闹剧中，举报者的品格固然应当被鄙夷，让举报得以生效的土壤才更值得人警惕与忧虑。仅仅自下而上的举报，只要经过合理流程处理，并不至于颠倒黑白，乃至扭转校园与社会的风气：只有自上而下的认可嘉许才能让举报生效，才能鼓励举报成为手段、生意、甚至进身之阶。”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

1、防疫政策下政府对宠物的处理，各地呈现差异。比如，四川成都一名居民因发现与某确诊患者行程重合，主动上报并隔离，但未经其同意，家中三只猫被杀；江西上饶的傅女士被带去酒店集中隔离后，两名防疫工作人员进入家中，扑杀宠物狗，称是“无害化处置”。

相比之下，上海黄浦区规定，在转移居民到宾馆集中隔离时，家中宠物可随行前往。而北京大兴区规定，在对居民集中隔离时，如果家庭中有宠物需要饲养，可以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以照料宠物。其实，如何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怎样对待动物，意味着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

2、女性主义的影响在今年继续扩大，但几千年的男权文化使其遭遇的污名和反对同样强大，其中包括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刑拘，#girls help girls# 成为热门标签；李靓蕾与王力宏事件掀起反思煤气灯操纵等讨论；阿里员工被猥亵案引发对酒桌文化的批评等；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的书籍持续热销；引起广泛关注家庭暴力的“拉姆遭前夫烧伤致死案”宣判，被告人唐路一审被判死刑；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被驳回；肖美丽因劝阻和曝光火锅店男性吸烟者最后演变成网暴；杨笠因代言英特尔被男性网友抵制，随后英特尔下架其广告，等等。

3、加班文化和躺平文化交织。1月，拼多多一名23岁的员工在凌晨1点半结束工作后下班，突然紧捂肚子倒下，立马被同事送往医院，6小时后去世。不到两周后，另一位拼多多员工在短暂探望父母期间跳楼身亡。次日，第三位员工说他因为批评拼多多的工作文化被开除。拼多多显然不是个例，这掀起人们对中国公司广泛流行的加班文化的批评。另一边，加上阶层流动机会缩小的现实，躺平文化在年轻人中盛行。

4、3月，H&M等企业弃用新疆棉的声明引发争议，大量中国民众发起抵制弃用新疆棉企业的运动，一些中国企业随之退出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这被看作是自2012年抵制日货以来，中国最新一场大规模抵制外企的运动。受此影响，学术著作《棉花帝国》突然销量剧增。

5、12月，作家郑渊洁在微博宣布，由于自己作品中的角色多年来被恶意抢注商标，维权艰难，现今66岁的他精力有限，只能选择停止创作，《童话大王》将于2022年1月停刊。该刊于1985年创刊，出版495期，总印数超过2亿册，几乎全由郑渊洁创作。他笔下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等角色是中国许多80后、90后的成长记忆。

因内容过多，下篇将于1月4日在《小鸟文学》卷十三发布。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2021年终回顾

关于2021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每周一篇。



小鸟文学出品
卷十二，2021.12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